

先秦秦汉史史科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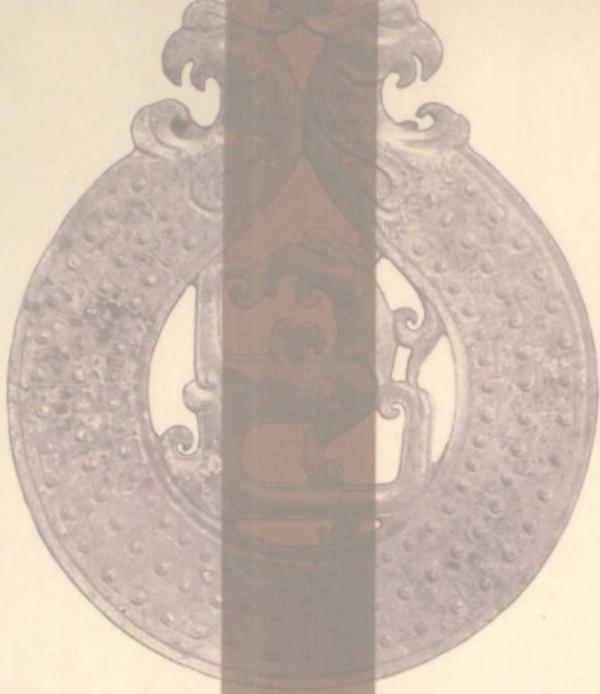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不仅介绍古书和古文字资料的性质和主要内容情况，同时还介绍这些古书和古文字资料的年代或大致时代情况。本书重视并特别介绍了战国秦汉时期特别是诸子中有关传说时代的资料。本书对古文字资料和古文献资料并重。同时对一些比较重要的考古资料也作了一些介绍。本书十分注意利用战国秦汉出土文献资料来考证古书的年代问题，并注重利用出土古文字及其上古汉语语法及其特殊虚词来判断古书的年代问题。本书对研究先秦秦汉历史、文化、哲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和教师是很实用的工具书。



王晖 贾俊侠 著





XIANQIN

QINHANSI

SHILIAOXUE



ISBN 978-7-5004-6760-1



9 787500 467601 >

定价：38.00元

先秦秦汉史史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不仅介绍古书和古文字资料的性质和主要内容情况，同时还介绍这些古书和古文字资料的年代或大致时代情况。本书重视并特别介绍了战国秦汉时期特别是诸子中有关传说时代的资料，本书对古文字资料和古文献资料并重，同时对一些比较重要的考古资料也作了一些介绍。本书十分注意利用战国秦汉出土文献资料考证古书的年代问题，并注重利用出土古文字及其上古汉语语法及其特殊虚词来判断古书的年代问题。本书对研究先秦秦汉历史、文化、哲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和教师是很实用的工具书。

王晖 贾俊侠◎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秦秦汉史史料学/王晖, 贾俊侠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5004 - 6760 - 1

I. 先… II. ①王…②贾… III. ①古文献学 - 史料 - 中国 - 先秦时代
②古文献学 - 史料 - 中国 - 秦汉时代③古文字学 - 史料 - 中国 - 先秦时代
④古文字学 - 史料 - 中国 - 秦汉时代 IV. G256.1 H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8212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臻 树
责任校对 王应来
封面设计 典雅设计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传 真	010 - 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1/16	插 页	2
印 张	21		
字 数	338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这一部《先秦秦汉史史料学》最初是我在为中国古代文献学、先秦史等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开设“先秦史料学”课程所编的讲义。从2000年上半年开始，我为当时中国古代文献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先秦史料学”，但是我发现当时根本没有这类现成的研究生教材。“历史文献学”或“中国史料学”的教材倒是有几部，然而涉及先秦部分不仅数量不够，而且在我看来，也基本未能体现先秦史料学的特点。因为我觉得先秦史料学的特点与秦汉之后的时代大有区别，正如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所说的，应该是古代文献、古文字资料和一些重要的考古资料一起上。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就自己动手编写讲义。从2000年开始至今已经在六届研究生中试用，并且是不断进行修改，反映不错。后来大约是2001年，在贾二强教授的积极引介和鼓励下，申报了全国古籍整理委员会的所级古籍整理项目“先秦秦汉史史料学”，并获得立项。但是，由于我当时还有其他的一些研究任务，“汉代史料学”部分便请我的研究生贾俊侠教授来承担，我则集中修改完善“先秦秦代史料学”部分，终于在今年暑假期间完成了这项工作，并提交出版社出版以飨青年学子，同时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本书后面还附有三个附录：附录一和附录二是我过去写的《古文字中记数使用“又”字的演变及其断代作用考》、《从数词组合方式的演变看先秦古籍的断代问题》，是根据甲骨金文及战国文字的记数中使用“又”的变化规律情况，去判断一些年代模糊、说法纷纭的古书成文年代问题，附录三是贾俊侠教授作的《二十世纪以来秦汉史研究的部分重要论著要目》，一并请读者参阅。

下面我介绍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编撰体例、方法及其特点。

其一，本书介绍的古文献和古文字资料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介绍先秦秦汉时期古书和古文字资料的性质及主要内容情况；二是介绍这些古书和古文字资料的成文年代或大致的成文年代情况。

其二，本书特别介绍了战国秦汉时期特别是诸子中有关传说时代的资

料。因为传说时代的专门性的文献资料十分少，只有《尚书·尧典》、《舜典》、《皋陶谟》、《益稷》、《史记·五帝本纪》、《世本》、《大戴礼记·帝系》、《五帝德》等书篇。但是其他这种传说时代的资料往往散见于战国秦汉的文献之中，例如《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礼记·礼运》、《易·系辞》（上、下）、《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篇之中。本书很重视这些战国秦汉时代古文献资料中所记的传说时代的资料，并选择一些比较重要的资料作了介绍。

其三，因为先秦古文献资料有限，所以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古文字资料和古文献资料并重，同时对一些比较重要的考古资料也作了一些介绍。特别是商代的甲骨文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是研究商代和西周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本书花了比较多的篇幅对它们作了介绍。

其四，利用战国秦汉出土的古文献原貌来考证先秦古书的真伪问题。例如，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十三篇，又出土了《孙臆兵法》十六篇的残简，可证《孙子兵法》与《孙臆兵法》都是存在的，传世的《孙子兵法》不伪。在银雀山西汉墓葬中还出土了《晏子》、《太公》及《尉缭子》等竹书的残简，可证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不伪。

其五，利用出土古文字及其上古汉语语法及其特殊虚词来判断古书的年代问题。这是本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也是本书的一个创新点。例如，商代直接把主谓词组放在一个中心词前作修饰语，不用任何虚词来表示这种特殊的语法关系；西周时开始用“攸”及“迨”表示所字词组；战国早期才出现用“所”字来表示的所字词组。这种所字词组用词用法的历史演变可以判断一些时代不明的古文献的成书年代，还可以判断一些先秦古书中哪些是后人增添的句子。又如，从西周春秋时期金文资料可知，“之”字放在主谓之间取消独立性的用法是春秋时期才出现的一种句法现象，利用这种特点可以断定《尚书》中的《商书》诸篇最后的写成年代应是春秋时期，时代不可能太早。再如，先秦时期记数的整数与零数之间用不用连词“又”或“有”有比较明确的时代区别，尽管古文献中用不用连词“又”或“有”的时代界限不大明确，但是古文字资料中使用“又”的演变兴衰时代情况是十分清楚的，它的兴衰变化可以作为判定古书年代的一个重要标尺。

王 晖

2006年2月

目 录

第一章 概 论	(1)
一 史料学的研究目的与内容	(1)
二 先秦秦汉时期史料学的特点	(1)
三 古书年代与辨伪问题	(4)
四 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相互关系	(11)
五 关于处理先秦文献的一些方法	(12)
第二章 古史传说时期	(16)
一 从古文字材料看战国秦汉时古文献中 所见传说资料的史料价值	(16)
二 传说时代的史料	(18)
三 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以及反映传说 时代的古文字资料	(24)
四 夏代史料与考古资料	(29)
第三章 殷商时代	(33)
一 商代的文献资料	(33)
二 商代的考古资料	(41)
三 商代甲骨文资料	(46)
第四章 西周春秋时代	(67)
一 西周春秋古文献书籍	(67)
二 西周春秋时期金文及其他考古资料	(107)
第五章 战国秦朝时期	(123)
一 战国时期的古代史著和现代史著	(123)
二 战国秦朝时期的古文献资料	(129)
三 从战国秦汉简帛资料看战国文献的年代问题	(139)
四 战国秦朝时期的出土文字资料	(143)
五 有关先秦史料的汉代简帛资料	(151)
第六章 两汉时代	(155)
一 两汉史料概述	(155)

2 先秦秦汉史史料学

二 两汉文献资料	(157)
三 两汉考古资料	(239)

附录一 古文字中记数使用“又(有)”字的演变及其 断代作用考	(291)
附录二 从数词组合方式的演变看先秦古籍的断代问题	(306)
附录三 20世纪以来秦汉史研究的部分论著要目	(315)
附录四 古文字著录书目简称与全称对照	(332)



第一章 概 论

一 史科学的研究目的与内容

史科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是研究史料的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的学科。其任务与目的是从事史料的搜集、核勘、考证及其编纂，而主要工作是史料的整理与鉴别，把价值不同的史料区别开来，把内容不同（是政治、军事，还是经济、思想、文化，抑或是宗教、民族等等）的史料区别开来，把正确与错误的史料区别开来，把时代不同却为同一事件的史料区别开来，并确定史料的绝对年代与相对年代。学习和研究史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利用古文献和古文字资料，把握和分析同一事件各种不同史料的不同价值情况，使我们的古史研究的论证更充分有力。

史科学是有关历史资料研究的学问，依其史料内容大致可分四个方面：（1）古文献史料。这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与历史有关的文字资料。如十三经、二十五史、历史档案、地方史资料等。（2）出土的文字资料。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文字、敦煌遗书等。（3）考古文物等实物史料。如古器物、古建筑、古迹遗址等。（4）口碑史料。口碑史料又称口传史料，是指民间流传的历史传说、史诗等。口碑史料也指一些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以及人们早期社会的历史，是靠一代又一代口耳相传而保存下来的。战国秦汉时期有关夏商周以及黄帝尧舜的传说资料十分多，这些实际上也是一种口碑史料，是有很高价值的史料，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史料是需要认真鉴别的。

二 先秦秦汉时期史科学的特点

1. 先秦秦汉时期史料来源的多样性

如果说秦汉之后的祖先留下来的是以古文献资料为主，那么先秦时期就完全需要考古资料与古文献资料一齐上——需要说明的是古文字本属考古资

料，虽然这些古文字材料现在已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但从学科划分上它又属于考古学。因此，我们在先秦秦汉史的史料学介绍中，不仅要介绍古文献资料、古文字史料，还要介绍一些考古遗址和有关的资料。

先秦秦汉时期史料学有一个演变趋势：（1）商代以前（包括商代）是以考古资料（包括古文字资料）为主，古文献资料为辅。因为这时考古资料不仅多，而且是当时人留下来的实物，是第一手的可贵资料。而古文献资料则是后代人根据传说记录下来的。虽然我们不能对这些资料像疑古学者那样轻易地加以否定，但这些传说在长期流传并形成文献的过程中又经过屡次传抄，肯定不是原汁原味。只是有的掺水多，有的掺水少罢了。（2）西周春秋时期是以古文字资料（金文）为主的考古资料与古文献资料平分秋色的时代。如果我们把古文字资料从考古资料中独立出来，那么，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古文献资料就会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所以有的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考古资料与古文献资料的拉锯战时期，是有道理的，这两个方面均应受到重视。（3）战国秦汉以来，是以古文献资料为主，考古出土的文物文字资料为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当然今天的史料又有了新的领域：音像资料、胶片、磁带光盘等新型的知识载体，也都是将来的宝贵史料。

2. 二重证据法与多重证据法

（1）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提出来的。其历史背景之一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思潮。当然，疑古学派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其起源于宋代，到清代古书辨伪风气逐渐兴盛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年代达到高潮。这时以梁启超、胡适、顾颉刚为首的疑古派，继承了清儒辨伪的学风，进一步怀疑古史传说时代，甚至提出“东周以上无史学”的观点。这是由于清代末年随欧风美雨的洗礼，中国传统学术开始向现代学术转变。这种转变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使人们从完全相信“三皇五帝”的盲目信古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去考察历史的真实面目。但是疑古活动显然过分了，不仅黄帝、颛顼等五帝被怀疑，尧、舜、禹被怀疑，甚至春秋孙武也被怀疑是战国时的孙臆，庄周被说成扬朱……王国维是对这些现象不满意才提出“二重证据法”的。

提出“二重证据法”的历史背景之二是清末大量新史料的发现。（1）由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而建立了甲骨学。（2）敦煌遗书的发现而建立了敦煌学。（3）汉晋简牍的发现。（4）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王国维因此而称清末是学术发现的年代，并对这些发现的意义作了肯定：孔子曾感叹“殷礼不足征”，现在可以考证了；宋儒以来看不到的魏晋隋唐时的古书抄本，现在可以看到了。王氏追溯历史，指出由新发现将兴起一代新学问。他

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所发现之学问》中说：“古来所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字之学（按：即古文经学家学派）；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①也正是由于这些新材料的出现，王国维对疑古思潮进行了批评。王氏批评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②可见，王氏对疑古有肯定有批评：肯定怀疑的态度与批评的精神是可取的；而批评的方面是疑古过分了。不仅疑古书，而且也怀疑古史人物的存在，如对尧、舜、禹这些传说时代的古帝王也一概怀疑。王氏认为这种做法是对古史材料未做充分处理。但如何充分处理呢？他认为，古书未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已得证明的，必须加以肯定。^③

如何肯定已得证明的古籍文献呢？这就是著名的“二重证据法”。王氏在《古史新证》中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④

先秦文献中可证全为实录者不太多（当然也不是全无，如《逸周书·世俘》篇即是），然更多的是百家不雅驯之言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如“王亥”事迹，见于甲骨文，而《山海经》、《世本》、《天问》等书篇中也有。《山海经》向来被视为神话，以此来看，《山海经》的确保留了远古的不少历史传说，只可惜无年代序列。王氏之说影响甚大，由此形成中国 20 世纪学术转变期的史学乃至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2）多重证据法

继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陈寅恪在阐述王氏之学特点时提出了“三重证据法”。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总结王氏之学的特点说：“一曰取地

① 《王国维遗书》第 5 册，《静安文集编》，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 页。

③ 同上书，第 2—3 页。

④ 同上。

下之实物与纸上之异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国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并且认为：“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

陈氏对王国维学术的总结实际上已超出王氏“二重证据法”的范畴。可惜的是，人们只重视王氏“二重”说，而对陈氏之说未深加探讨。我以为依陈氏之说，可将国学研究法概括为“一论三史料”。“一论”是指某一学科中理论方面的各种学说。三种材料：一是地下出土文物文字，二是古文献资料，三是外国异族的材料（包括少数民族的历史资料）。对史学研究而言，应是一种理论，即史学理论与方法；三种史料，一是地下出土文物文字及考古资料，二是古文献史料，三是外文中的有关史料（尤其是唐宋以来）。对先秦史而言，应是一论，即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三种史料：一是古文献史料，二是地下出土的文物考古及古文字资料，三是中外民族学资料。我们强调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作为理论或方法，是因为人类各个民族虽有各种差异。但各种文化又都有一些具规律性或普遍性的演化阶段。因而就先秦史而言，我们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上，不仅可获得可供借鉴比较的史料，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而且可以提供视野更为宽阔的理论模式和参照系统，使我们对某些历史现象作出更合理的解释或推论。

三 古书年代与辨伪问题

先秦文献资料本来就极为有限，但这有限的文献也多数是时代不清、作者不明。因为许多先秦古籍年代不清，作者不详，所以考证作者、判断年代便成了史料学中十分重要的工作。过去学者在古书辨伪中总结伪书有二种，一是自觉地作伪，如古文《尚书》中的许多篇章，汉成帝时张霸伪造百两篇《尚书》就是这种自觉作伪的典型；二是不自觉地作伪，先秦诸子中许多书籍，如《管子》、《黄帝书》、《周礼》等等，其书明显不是其所处的时代写成，但名称却冠以某人，故称不自觉地作伪。我们认为，前者可称伪书，后者不可称伪书。书名上的某人只表示其书内容是属于书名人物的这一学派，是作者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作成的。或是某人在世时还没有形成学派，在战国时才有某一学派却命以某人，仅表示战国时的这一学派。如《黄帝书》、《管子》、《神农》等。

两千多年来，由于政治的需要形成了独尊儒术的学风，于是经学的研究始终是学术热点。但由于先秦古文献资料有限，学术问题便众说纷纭。虽然众说纷纭，但由于政治的力量和独尊儒术的学风，问题便也不难解决。司马

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说：“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又在《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以布衣身份为“学者宗之”，而且“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就是说，自西汉以来尽管文献载籍极其繁多，但对于学术问题的裁决判断，是以儒家的“六艺”——诗、书、易、礼、乐、春秋——作为鉴别是否真实可据的标尺。但对诗、书、易、礼、乐、春秋“六艺”的裁决判断，则是以孔子言论思想作为评价的标准。如依孔子思想言论作评价的标准，那么殷末周初的文武周公都是圣人，是不会有不仁之举的。所以在《孟子·尽心下》中孟子就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可见孟子就认为“仁人无敌于天下”，如周武王是“仁人”中的“至仁”，怎么会“血之流杵”呢？所以就断言描写这些事实的《武成》肯定是不可信的了。

唐宋怀疑古书就更进一步了。子书辨伪，唐代有柳宗元，宋代辨伪有两位最主要的学者就是朱熹与叶适。柳宗元断定《鹖冠子》、《鬼谷子》、《亢仓子》、《文子》等是伪书，今天以出土简帛资料看来，疑伪就过头了。这一问题我们下面再详细论述。

清代以来的学者，古书疑伪之风越来越强烈，成就很大，但问题也不少。其突出成就是阎若璩、万斯同等学者在经学特别是《尚书》辨伪方面的成就，为学术界众望所归，其成绩今天应充分肯定。但姚际恒所著《古今伪书考》对古书的辨伪就大胆地超越古人，许多问题今天看来也是过分了。到近代梁启超的古书疑伪就显得更为大胆，由于他执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又突出了古书考证辨伪的理论与方法，其影响则更大。本来清乾隆中叶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已经明确用“全伪”或疑撰者或疑时代来怀疑古书了，但梁启超认为这还远远不够，说“《四库备要》为官书，间不免敷衍门面”，认为“总之《提要》所认为真的未必真，所指为伪的一定为伪，我敢断言”。^①梁氏的这一思想是那个古书疑伪时代的代表。

其实，古书在形成过程中是十分复杂的。余嘉锡曾在《古书通例》中论及古书命名的一些原因：“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故惟官书及不知其学之所自出者，乃别为之名，其他多以人名书。”“古书多无大题，后世乃以人名其书。”又具体地说：“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最典型的的就是《司马法》。《史记·司马穰苴传》载：“齐威王使

^①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1—93页。

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非一代更非一人），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即《司马法》。这可说明《司马法》成于战国中期齐威王时。而司马穰苴则与齐景公、晏婴同时，时在春秋晚期。《司马法》并非司马穰苴的著作，也非他一人兵法，是包括了许多时代的观点和兵法，当然有比司马穰苴早的，也有比他晚的。

先秦时期古书的成书年代，均可作如是观。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中也说：“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今其书之存者，大抵治其学者所为，而其纂辑，则更出于后之人。亡佚既多，辑其书者，又未必通其学。不过见讲此类学术之书，共有若干，即合而编之，而取此种学派中最有名之人，题之曰某子云耳。然则某子之标题，本不过表明学派之词，不谓书即其所著。与集部书之标题为某某集者，大不相同。书中记及其人身后之事，及其文词之古近错出，固不足怪。至于诸子书所记事实，多有讹误，此似诚有可疑。然古人学术，多由口耳相传，无有书籍，本易讹误；而其传之也，又重其义而轻其事。”^①所以对大部分古书，我们要探讨其来源，不可简单地以“伪”字来加以判断。春秋之前文献史料甚少，而战国秦汉时诸子百家中追忆春秋之前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资料甚多，这些史料需要好好地整理方可加以利用。从我国史学研究经过“信古—疑古—释古”的历史看，完全信古是不对的，但过分地疑古同样也是不对的。

从战国时代到清末，文人学士皆相信所谓的“三皇五帝”，均有详尽的年数，并且有详细的年代图表，这当然令人难以相信。

为什么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会出现这一疑古学派？其因有二：一是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的引入，学术研究首先要有怀疑的精神，封建时代的信古派则没有怀疑的精神；二是清代古书辨伪派的直接经验及其成果，如崔述等。其学说主要体现在顾颉刚所谓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否定了以“三皇五帝”为中心的古史系统，这是对的。中国古史“层累说”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这就以偏赅全了。

疑古派学说在当时对于转变传统史学观念、认真审查史料、建立现代史学观是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有负面影响，疑古过度了。胡适为近代疑古学派之先导，20世纪20年代就将疑古精神概括为：“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顾颉刚也说，“东周以上只好说无史”、“自三皇以至夏商……都是伪书的结

^①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20页。

晶”等。^①这就不是客观的史料审查工作。对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如对老子的怀疑——认为老子与孔子的关系是后人伪造的；还有对孙子（武）的怀疑等，显然这些怀疑都过分了。

近现代疑古派学者的问题还出现在对于传说材料的认识上。顾颉刚先生就认为古史传说“大半由于时代的发展，出于后人政治上的需要而有意伪造的”（《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这种观念是有问题的。实际上，诸子虽有利用上古传说宣传自己主张的倾向，这一点毋庸讳言，但无编造历史的功利性目的。王国维在《古史新证》第一章中认为，在古史中，传说与历史史实混而不分。历史事实被修饰扩大，就与传说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他说：“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者。”对顾氏之说，王国维以金文的材料加以批评，引用春秋时秦公敦（簋）说“鼎宅禹责（迹）”，齐侯罇铭文“宗宗成唐……咸有九州，处禹之堵”，认为这些金文材料与诗《大雅》、《商颂》、《鲁颂·閟宫》、《尧典》、《皋陶谟》、《禹贡》中的记禹之事迹互相呼应。并且说：“然近人乃复疑之，故举此二器，知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②王氏这里用的正是二重证据法来证明禹应是历史人物，而不是神话人物。如果说王国维是从史学实践上批评疑古派，而冯友兰、傅斯年及钱穆等学者则是从理论上批评疑古学说，并进一步提出释古之说。信古、疑古、释古是近代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1935年提出来的。^③他认为：“清朝人研究古代文化是‘信古’，要求遵守家法；‘五四’以后的学者是‘疑古’，他们要重新估定价值，喜欢翻案文章；我们应该采取第三种观点，要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④

傅斯年认为应把古史传说材料当作“间接材料”，把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等当作直接材料。间接材料当然不如直接材料，为什么呢？“一件事经过三个人的口传便成谣言，我们现在看报纸的记载，竟那么靠不住。则经几百年，辗转经若干人手的记载，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并无恶意，已可使这材料全变一翻面目；何况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知不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正确的做法是用直接材料去更正间接材料：“一旦得到

① 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第1册，第63页。

②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第5—6页。

③ 冯友兰：《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书之看法》，见《三松堂全集》第11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

④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1卷，第359页。

一个可信的材料，自然应该拿他去校正间接史料。间接史料的错误，靠他更正，间接史料的不足，靠他弥补……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① 但如果没有直接材料，就不能否定间接材料。这一点，钱穆说得十分清楚。他在1939年写成的《中国古史大纲》中，批评顾氏古史观为“极端之怀疑论”。他认为：“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带有‘神话’之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即无从说起。”“且神话有起于传说之后者，不能因神话而抹杀传说。”“假造亦与传说不同，如后起史书整段的记载与描写，或可出于假造，其散见各书之零文短语，则多系往古传说，非出后世一人或一派之伪造。”“欲排斥某项传说，应提出与此传说相反之确据。否则此传说即不能断其为伪或必无有。亦有骤视若两传说确切相反，不能两立，而经一番新的编排与新的解释，而得其新鲜之意义与地位者。”我认为钱穆之说是比较合理的。传说资料不可全信，但也不可完全否定。“信则传信，疑则传疑”，这应是我们对待古籍中传说资料的正确态度。

张荫麟曾经指出疑古派的方法是“默证”。他说：“凡欲证明某时代无某历史观念，贵能指出其时代中有与此历史观念相反之证据。若因某书或今存某时代之书无某史事之称述，遂断定某时代无此概念，此种方法谓之默证。默证之应用及其适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论。吾观顾氏之论证法几尽用默证，而十九皆违反其适用之限度。”这种“默证”的疑古之法，与实证的史料审查不是一回事，其经不起20世纪以来出土文献资料越来越多的检验，是必然的。近年来李学勤先生进一步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获得学术界多数学者的肯定和响应，其原因也是在这里。

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先秦秦汉简帛的不断出土，古书疑伪者论定的伪书不少已被证明是错的。过去认定《老子》晚出，且是众口一词，几乎可以盖棺论定，而20世纪70年代就有西汉马王堆三号墓帛书本出土，90年代又有战国中期偏晚的《郭店楚墓竹简》的简本《老子》与世人见面。今传世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繚子》等书，曾被梁启超认为属“全部伪绝对决定者”之列，认为《晏子春秋》大约是西汉人伪撰，并说“此书依我看纯属伪书，没有费力校释的价值”，认为《六韬》是汉代以后人伪作，《尉繚子》是晋至唐人陆续依托。^② 然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

^① 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② 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第69—93页。

汉前期墓葬中出土了《晏子》、《太公》及《尉缭子》等竹书的残简，内容与今本《晏子春秋》、《六韬》、《尉缭子》基本相同。可见梁启超对这几本书的怀疑都是不对的。我国古代书籍从开始成书到普遍流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可证这几种书的著作年代应该不会晚于战国。过去因为《左传》、《国语》中不见孙武其人，《史记》中记载了孙武并言孙武及其后人孙臧皆有“兵法”之书，但现存只有《孙子兵法》，却不见《孙臧兵法》，于是《孙子兵法》被认为就是《孙臧兵法》，甚至怀疑孙武其人的存在。而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既出土了《孙子兵法》13篇及其佚文五篇的残简，又出土了《孙臧兵法》16篇的残简，可证《孙子兵法》与《孙臧兵法》均是存在的，孙武及其《孙子兵法》都是不容怀疑的。《文子》也曾被怀疑是伪造的古书，梁启超认为是晋至唐人陆续依托，也有学者认为是根据《淮南子》编成的，然1973年在河北定县西汉后期的中山王墓中发现了《文子》的竹书残简，证明《文子》也并非伪书。20世纪上半期还有人否认屈原的存在，并认为过去旧说宋玉的许多辞赋都非其所作，而西汉前期的墓葬中就出土了《离骚》和《涉江》残简；有的学者通过对银雀山汉简《唐勒赋》的研究，证明了宋玉大部分赋作的可靠性不容置疑。马王堆汉初帛书《春秋事语》的出土，也证明过去所说刘歆伪造《左传》的说法是错误的。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15号墓出土竹简有“易占”内容，经研究是过去所说的“三易”之一的《归藏》佚文。这证明了传世本《归藏》也不是伪书。但过去由于它不见于《汉书·艺文志》，唐宋以来学者多以为是伪书，近代学者甚至认为《归藏》本来就是伪书，传世本《归藏》更是伪中之伪。^①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中有两个卦名与《归藏》卦名有关，于豪亮先生便推定《归藏》成书一定不会晚于战国，不是汉代以后人所伪造的。^②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发现，更加证明了这一问题。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疑古确实走过头了，是值得反省的。其实，古书辨伪一般都是依照宋代以来古书流传的情况来判别的，但在宋代印刷术出现之前与后来的情况有所不同。裘锡圭先生曾经分析这种现象说：

通过对西汉墓葬出土的大量竹书、帛书的全面观察，我们对当时的书籍制度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并为前人已经提出来的早期古书没有专

^① 余永梁：《〈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容肇祖：《占卜的源流》，见《古史辨》第3册。

^② 于豪亮：《帛书〈周易〉》，载《文物》1984年第3期。

用的书名，不署作者之名，多以部分篇卷别行等特点，找到了很多实证。通过把古书的流传之本、类书引文和敦煌写本等跟竹书、帛书本对照，可以看出比起宋以后的刻本来，唐代类书用的本子以及敦煌唐写本跟竹书、帛书本要接近得多。这说明印刷术的兴起一方面减少了古书失传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却增加了比较剧烈地改变古书面貌的危险性。^①

以此看来，古籍整理与古书辨伪往往依据古籍文献的现行本来分析讨论，这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这种情况在先秦秦汉时期则尤为严重。如何更好地分析先秦秦汉时代的文献古籍？李学勤先生曾将新发现的大量简帛书籍与现存古书对比，指出有10种不同的情况（所举例已略）：

(1) 佚失无存。地下发现的简帛本古书，不少是不见于现存著录的佚籍。另外还有一些简帛本书，虽曾见于著录，却在时间的长河中久已湮没无存。

(2) 名亡实存。有的简帛古籍前所未见，实际其内容仍保留在后世的书里。

(3) (古本) 为今本一部。

(4) 后人增广。古书开始出现时，内容较少。传世既久，为世人爱读，学者加以增补，内容加多，与起初大有不同。

(5) 后人修改。古书传流多赖师传，有时仅由口传，没有书于竹帛，因而弟子常据所见，加以修改，不能斥为作伪。

(6) 经过重编。

(7) 合编成卷。

(8) 篇章单行。古人抄书很不容易，书不易找，书写材料也有困难，因而大部头的书籍有时只有部分篇章单行，普及于世。

(9) 异本并存。

(10) 改换文字。古人传流书籍系为实用，并不专为保存古本。有时因见古书文字艰深费解，就用易懂的同义字取代难字。^②

从上可见，古书在流传抄写过程中的情况十分复杂，而且也为时很长。因此，“对古书形成和传流的新认识，使我们知道，我国古代大多数典籍是

^① 裘锡圭：《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5页。

^② 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见《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8—32页。

很难用‘真’、‘伪’二字来判断的。……从这个角度看，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在文化史研究上也有方法论的意义”。^①

就古书辨伪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学派屡屡震撼当时人们的心灵，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量出土的竹简帛书资料，给人们带来的震撼似乎更为强烈。不同的是，古书辨伪是对古文献资料的否定，但新出土的竹简帛书却是否定之否定。清代以来许多被认为是伪造的古籍文献，现在在竹简帛书资料面前，又不得不给其“平反昭雪”，这是值得反思的。在1981年，当代史家余英时先生评论现代史家顾颉刚、洪业的史学成就时，分析了现代与后现代治学（治史）方法的不同。他指出，根据后现代主义先驱福柯（M. Foucault）的观点，“审订文献的真伪、性质、意义，然后再在这种基础上重建历史陈迹”，代表的是现代史家的方法；他认为后现代的治史，“则并不取这种被动的方式，而是主动地组织文献，把文献分出层次，勒成秩序，排作系列，定出关系，并确定何者相干何者不相干等等”。这种方法实际上是超越了简单的疑古和盲目的信古，是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古文献的形成过程，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思路，并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探索出一些可供实施的有效方法来。

四 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相互关系

史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直接史料，又称为第一手史料；二是间接史料。直接史料是未经他人转抄、修改或增加减损的材料，如金文是直接材料，《左传》、《国语》是间接材料——经过后代传抄；甲骨文是直接材料，《世本》、《殷本纪》是第二手材料；《明史》、《清史稿》是间接材料，明清内阁档案则是直接材料，第一手材料。至于《周本纪》、《秦本纪》、《鲁周公世家》、《卫康叔世家》、《齐太公世家》等，《史记》中关于西周、东周时期的历史记述，是作者根据《尚书》、《诗经》、《世本》、《国语》、《左传》等书编写而成，则可视为第三手材料，其价值比《书》、《诗》等史料更低一些。但并不是说《史记》这一段可以不看，因为记载这一段历史的有些书篇今已失佚，那么只有依据《史记》的内容。《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等篇中所述远古时代的历史，其价值很大，因为这些篇章所据的史书多已亡佚。虽这些书今天已亡佚，但西汉时其书尚存，司马迁必有所据，如《殷本纪》的世系记载应是

^① 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见《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32页。

据《世本》等书，已为出土的殷墟甲骨文所证明。另外，《史记》最可贵之处在于有关西汉时期的记述，其史料价值最高，《汉书》无法比拟。但是直接材料也有许多内容方面的局限。殷墟卜辞主要是记述祭祀与战争，对政治、经济生活方面除农业外涉及甚少；周代金文多记赏赐，历史事迹较少；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好像都是“断烂朝报”。傅斯年说得好：“若是我们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与位置，是不知道的；不知道则无从使用。所以玩古董的那么多，发明古史的何以那么少呢？写钟鼎的那么多，能借殷周文字以补证经传的何以只有许瀚、吴大澂、孙诒让、王国维几个人呢？……珍藏唐写本的那么多，能知各种写本的互相位置者何以那么少呢？直接材料每每残缺，每每偏于小事，不靠较为普遍、较具系统的间接材料，先作说明，何以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所以持区区的金文，而不熟读经传的人，只能去做刻图章的匠人；明知《说文》有无穷的毛病、无限的错误，然而丢了他，金文更讲不通。”^①

这就是说，要了解并分析直接史料，必须先熟悉间接史料，大量阅读间接史料。可能我们会提出问题：既然有这么多的文献资料，且齐整、完全，为什么还要用那些少而且不完整的直接史料呢？这是因为直接材料虽然少，而且不完整，但它却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同一件事经过几个人口耳相传，便早已面目全非。所以历史传说经过成百上千年的流传，哪里还能完全保留原来的历史面貌？因此完全信古的见解也是不对的。

五 关于处理先秦文献的一些方法

史学研究与史料鉴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历史学在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中，是一门比较特殊的学科，是特别重视实证的学科。任何观点，不管多好，多么重要，如果没有史料支持是不行的。我们对史料的基本处理方式应该是：时代越早越好，第一手史料尤为可贵。某一学术问题，史料很多，因此得出的观点和说法也很多。但如果我们把众多的史料按照时代的先后排队，再按照第一手史料、第二手史料、第三手史料来排队，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自然要相信并肯定那些时代早且为第一手史料的说法。

不过，先秦文献是我国古文献中存在问题最多的一个时期，处理这一时期的古文献也是最难最复杂的。我们只能根据前辈以及自己多年实践的经

^① 傅斯年：《史料论略》，见新世纪万有文库《史料论略与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验，提出自己一些粗浅的看法，仅供初学者参考。

1. 全伪者全不可用。近几年由于战国秦汉简帛书籍出土越来越多，对疑古学者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新的审视，学术界也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一些学者便以为对古书的检验审视工作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是不对的。实际上，古书的检验审视工作不是不重要，而是要进一步加强。特别是过去古书疑伪中被人们肯定的成果要充分肯定。例如，清代阎若璩等学者对伪古文《尚书》的否定，就需要充分肯定，决不能含糊。但由于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的广为流传，其中包括了伪古文《尚书》，这些在重新出版时并未注明哪些是今文《尚书》，哪些是伪古文《尚书》。因此，不仅研究哲学史、文学史的青年学生、青年学者常常错误地引用那些被证明是伪古文《尚书》的内容，即使从事考古工作的一些学者，也常常错误地引用伪古文《尚书》。甚而至于一些著名学者，也常常犯这样的错误。由王力先生主编的《王力古汉语字典》是目前古汉语字典中最为权威的一部字典，其语词解释是一流水平。但就是这样一部权威字典，在引用古书例句时却常常引用伪古文《尚书》，其中有《大禹谟》、《泰誓》、《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武成》等等。^①是不是语言文字学的语词解释对古书的时代就不那么讲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虽然是古汉语语词解释，这种情况也是不允许的，因为古汉语语词也是要讲究时代性的。《王力古汉语字典》常常把《尚书》的语词用法放在第一项，表明这些语词在《尚书》中的用法是最早的。但是引了伪古文《尚书》的例句，其时代就不能说是最早的了。

需要向青年学生说明一点的是，在先秦秦汉诸子特别是战国诸子书中引用上述《大禹谟》、《泰誓》、《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等篇中的一些字句，就是战国秦汉时期学者所见真古文《尚书》了，我们应该相信并可以大胆引用。

2. 有的书籍可能最后完成或整理的时代比较晚，可能有后人增添的部分。也有可能原有传抄本，后人在前人基础上做了些加工整理，甚至语词的翻译工作。就像《史记》转引《尚书》，却又不是完全照抄，而是做了些语词的翻译工作。如《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等篇就是这样，既有甚古的天文记载，也有只有在殷墟甲骨文中才出现的感叹词“俞”等字，但从整篇语

^① 王力主编：《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年版。例如第19页引《书·武成》、《书·大禹谟》、《书·胤征》；第72页引《五子之歌》，又引《泰誓》，又见第73页；第325页引《书·伊训》；第1279页引《书·太甲》下，等等。

言文字的使用来看，不会早于春秋早期，但又不会晚于战国早期。

3. 中国远古时代神话与历史往往混而不分。不可因为是神话就否定其中的历史因素，甚至人们不再把它们看作是史料；也不可因为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实，就不再承认它们的神话性质。例如《山海经》就是这样的一部书。它既充满了神话色彩，但许多地方又保存了十分原始的古史资料。这种神话与历史事实混而不分的现象，更需要用多重证据法以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去分析并加以利用。

4. 战国诸子学派的许多书籍，成书时代虽在战国，但它往往冠以一个历史上的伟人名字或称号，如《管子》、《晏子春秋》、《六韬》、《伊尹》、《黄帝书》、《神农书》等。这些书籍一般都是战国时某一学派的书籍，只是抬出一个与自己学派有关的历史上的伟人，用来增强自己这一学派的号召力。对待这些书中的材料，要区别对待，不可一概而论。《神农书》及马王堆出土帛书《黄帝书》、《伊尹》等书，所说的人物，也许历史上是存在的，但所述历史故事、言语及思想，就完全是战国时期这一学派的思想。而《管子》、《六韬》中所说的人物、事件，也许是存在的。特别是《管子》所述主人就是春秋早期的人物，《晏子春秋》中的晏子是春秋晚期的人物，战国时期一定有他们好多历史故事，这些历史故事也可见于《左传》、《国语》之中。因此，这一类材料基本是可以使用的。如果再用先秦其他文献进行互证，就更有说服力了。但这些书中所包含的思想观点就不能说是吕尚、管仲、晏子的了，这类材料只能说是战国时期这一学派的思想主张罢了。如《六韬》是反映战国兵家的军事理论及其战略战术的兵书，马王堆出土帛书《黄帝书》则反映了战国中后期的黄老思想，《管子》是战国齐国稷下学派杂家思想的反映。对于这些问题，《荀子·非相》中的一段话很应引起我们注意的。他说：“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按照荀子的话来看，因为时间太久远的缘故，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以前的人物是不大可信的；五帝有人物故事流传下来了，但有关的政治制度就没有流传下来；夏商有流传下来的政治制度，但是就不如周代流传下来的那么详细。因此，有关五帝时代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应该在荀子的时代还有流传下来的传说，但说到他们的言论以及有关的制度，显然就是后来某一学派的思想主张了。

《周礼》的情况就更复杂一些了。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说，它反映的是西周春秋时的官职名称、战国中后期的社会制度。该书应该是战国中后期学者

综合西周和春秋时晋国、鲁国、齐国等国的官职制度而编成的一部带有理想化的书籍。因此，《周礼》的官职名称往往和西周以及春秋时期的一些官职相对应。就这一点说，研究西周官制可以参考《周礼》一书。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外一方面是，《周礼》中的官职所负其责与西周金文中所见大致相合，但所言官职的秩位与西周金文中差异甚大。例如西周金文中有“大祝”，见大祝禽鼎；《周礼·春官宗伯》中有“大祝”，但是为“中大夫”，为第四级。唐兰认为，“《周礼》虽是春秋末拟作，但这种等级区分是有根据的”。^①我们认为此说是不对的。如果说古文字资料要和古文献资料互证，也只能引用《礼记·曲礼下》所言天子所建“天官”，“先以六大”，而“六大”之一便有“大祝”，既然是天官“六大”之一，那么官秩肯定不低。又如西周金文中有“善夫”，就是《周礼》中的“膳夫”。《周礼·天官》中的“膳夫”只是“上士”，官秩甚低。但西周中后期金文的“膳夫”地位可能相当于“太宰”（“太宰”金文中未见）。例如善夫山鼎（《殷周金文集成》5·2825），有的学者认为此善夫就是古文献中的仲山甫，是有道理的。仲山甫见《诗经·大雅·烝民》，其诗歌颂仲山甫云：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保兹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赋。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

从《烝民》诗来看，任膳夫一职的仲山甫决不会只是个“上士”，而是地位很高的一个官职。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周礼》中所见土地所有制形式、行政区划型的中央集权制、编户齐民式的社会组织形态，完全是战国中后期才出现的，在西周春秋时期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看来，《周礼》一书只能形成于战国中后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谈西周官职的官名、职责，可以引用《周礼》和西周金文互证；但是如果分析西周官制的秩位，要论述西周的典章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社会组织形态以及户籍制度等方面，就千万不能依据《周礼》去进行分析论证了。

^①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页。

第二章 古史传说时期

一 从古文字材料看战国秦汉时古文献中所见传说资料的史料价值

战国时官学式微，私学蓬勃兴起，诸子百家才开始把远古时代的传说书之于简帛。但这些传说资料世世代代口耳相传，是有一定来源的。《越绝书·外传·记宝剑》中风胡子所言：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越绝书》所记古史传说时代这种以器物发展进化来反映不同时代的做法与今日的考古发现十分接近，这决不是偶然的。这说明秦汉时代的传说是有依据的，也是有道理的。疑古学风始于宋代，盛于清代，但一般多限于古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50《史部·别史类》针对《逸周书·世俘》、《克殷》，谓其篇“所云文王受命称王，武王周公私计东伐，俘首或殷遗，暴殄原兽，辇括宝玉，动至亿万，三发下车，悬纣首太白，又用之南郊，皆古人必无之事”。这显然是以儒家的仁爱学说去无端地怀疑古书，肯定是不对的。近代则认为远古传说是人为地层累式地造成的，则可能完全否认传说史实和人物的存在，更是不对的。

王国维曾在《古史新证》一书中，针对当时不仅怀疑古书而且怀疑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风气，以考古出土的文字资料，证明传说时代的禹和王亥均是存在的，且都是历史人物。

春秋时期西方秦国秦公簋云“鼎宅禹责（迹）”，东方齐国叔夷罍有“宗宗成唐……处禹之堵（都）”的记述，东西两大国都不约而同地记述并歌颂夏禹的事迹，可证《诗经·大雅》、《商颂》、《鲁颂》、《尚书·吕刑》中所言不假。禹应是历史人物，而不是神话人物。

王亥见于殷墟卜辞中，称“王亥”或“高祖亥”。如《前》4·8：“贞，侑于王亥四十牛，辛亥用。”在《史记·殷本纪》与《三代世表》中没有“王亥”。但《殷本纪》中有“振”，为冥子，上甲微之父。索隐谓

“振《系本》作核”；《汉书·古今人表》作“王亥”。王国维认为“振”是“核”或“垓”字形之讹。

王国维引《山海经·大荒东经》及古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证王亥之事。《大荒东经》说：“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服牛。”此事亦见于古本《竹书纪年》，言之亦详。今本《竹书纪年》加上帝泄十二年与十六年，并称“殷侯子亥”，显然是不知古史而妄改。此事亦多见于战国秦汉间的文献中，如《吕氏春秋·勿躬》作“王冰作服牛”，“冰”古字作“欠”，与亥近而讹；《世本·作篇》作“胙作服牛”；《楚辞·天问》中有“该秉季德”以及《周易·大壮》六五爻辞（“丧羊于易，无悔”）、《旅》上九爻辞（“丧牛于易，凶”）皆有对其人其事的记载。

这一考证的意义，不仅仅是考证了“王亥”是历史人物，以及《殷本纪》所述虽有讹误，但世系基本可信这一史实，更重要的是证明了战国秦汉间古书所记历史传说的史料价值基本可信。

据上述考证，王国维最后说：“夫《山海经》一书，其文不雅驯，其中人物世系亦以子虚乌有视之。《纪年》一书亦非可尽信者，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其事虽未必尽然，而其人则确非虚构！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非绝无根据也。”^①这显然是可信的。《山海经》常被人视作神话书籍因而不屑一顾，但在有关王亥的传说书籍中，关于“王亥”的称名、文字及事迹叙述之详细，要数《大荒东经》。正史以及被认为较可信的书籍不是字别，便是字错，要么便是语焉不详。特别是“两手操鸟方食其头”，可能是《山海经图》的画像，意与“王亥”之“亥”的形体十分相似。在殷墟甲骨文中，王亥之亥上常加一鸟形，如《库方》1064；或在鸟旁加一手形，见《京津》3926。依此来看，我们决不可把《山海经》视作神话书籍而不屑一顾；更不能因把它看作是神话书籍而低估它的史料价值。王亥于有易牧牛事亦见于《周易》，但未明言为王亥，顾颉刚说此即《山海经》中王亥。卜辞中有其人，却无其事；《周易》中有其事却无其人，只有《山海经》中有人亦有事，说之最清，言之最详。汉以后之人已不知“王亥”为何时人，或称“黄帝马医”，或称“黄帝臣”，或说是“少昊时人”。看来已不知其人其事，而今本《竹书纪年》所记时代为“帝泄十二年”、“十六年”，却是大致可信的。今本《竹书纪年》的价值也需要重新估价，有的学者认为其书不伪，是后人在原本基础上作了修改，是有道理的。

^①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第14页。

商代或丁之子“孝己”之事见于战国文献中，却不见于《殷本纪》之中。《战国策·秦一》：“孝己爱其亲，天下欲以为子。”《燕策》同。《庄子·外物》：“人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忧而曾参悲。”又见《吕氏春秋·必己》，而《荀子·性恶》、《管子·枢言》也都大谈孝己感天动地、却被冤死的悲惨故事。其事只有《尸子》言之较详细：“殷高宗之子曰孝己，有孝行，一夜五起，视衣之厚薄、枕之高下也。其母早死，高宗惑其后妻言，放之而死。”

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孝己”其人其事是否真实存在不得而知，因为这些传说均见于战国秦汉文献之中。这是因为孝己仅见于战国秦汉诸子之中，却不见于正史之中。实际上正史中是有记载的，即《尚书·高宗彤日》中的“祖己”，亦见于《史记·殷本纪》。但前人却不知“祖己”就是孝己，以至于《史记》集解引孔安国说祖己为“贤臣名”。只有《尸子》中所说是对的，且可证明“孝己”的确早在武丁时已死，故未即位称王，但在甲骨文武丁卜辞中称为“小王”。只有殷墟卜辞问世，而首先为王国维证明其人其时代确如文献中所记传说那样：“孝己”在武丁时已死，死前已称“小王”，祖庚、祖甲时称“兄己”，廩辛、康丁之后称“祖己”，所以《尚书·高宗彤日》中的“祖己”应即“孝己”。

依此可见，《战国策》、《庄子》、《吕氏春秋》、《荀子》、《管子》等书中的说法是对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尸子》过去曾被视作伪书，但其书所记“孝己”明言是殷高宗之子，可证是正确的。那么，《尸子》其书不伪，其所记历史传说的史料价值也由此可见一斑。这些情况说明，殷墟甲骨文出土后证明古史传说时代及夏商历史中过去被认为是值得怀疑的人物和故事，其实是有历史根据的。我们也可以推测，古史传说时代的人物和故事，虽然现在还没有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加以证实，但也不能随便加以否定。

二 传说时代的史料

古史传说时代的史料是比较少的。除《尚书》中“虞书”部分和《史记·五帝本纪》、《世本》、《大戴礼记·帝系》、《五帝德》等文献以外，主要见之于战国诸子之中。

《尚书·尧典》、《舜典》、《皋陶谟》、《益稷》（今文《舜典》合于《尧典》，《益稷》合于《皋陶谟》），从语言文字方面看，我认为是春秋时写成。但其中有的资料来源甚早。例如四方神及风神见于殷墟卜辞，相当于《尧典》羲和氏四子，而《山海经》中有比较完整的记载。《尧典》有关四

仲星鸟、火、虚、昴，竺可桢曾撰文认为前三者是殷末周初的天象。^① 另外，《尧典》、《舜典》、《皋陶谟》、《益稷》中语气词有“俞”，此词不见于先秦时期其他文献。但是在甲骨文中有这样的用例：《甲骨文合集》10405 正云：“王占曰：俞！有求（咎），有梦！”16335 反：“王占曰：俞！不吉，在兹。”这说明《虞书》等几篇的文字也确有更早时代遗留下来的。但我们也曾依照古文字资料中记数用“又”（有）的演变情况来检视《尧典》、《舜典》的年代，指出其成书年代在西周晚期之后，也不可能晚于战国早期（见本书附录一）。另外这几篇也有战国之后加入的个别文字，如“如丧考妣”。这种现象说明了古书在流传过程屡有增添改易的情况。

除了《史记·五帝本纪》等正史外，《世本》及宋忠注、《大戴礼记·帝系》、《五帝德》等均有记载传说时代的资料。《世本》清有八辑本，最早为王谟本，秦嘉谟三辑补本汇集材料最多。但有一些古籍还可提供一些有关传说时代世系方面的资料，如《国语·晋语四》记述了黄帝 25 子、得姓 14 人、为 12 姓的情况，是了解氏族部落时代氏族分化及其母系社会组织形态的重要资料；《国语·郑语》谈到了祝融氏部落分化及其迁徙与分布情况；晋王符《潜夫论·志氏姓》谈到了姓氏的来源及其分布情况，也往往涉及传说时代的氏族和部落分化的情况。

《山海经》是研究上古时代历史、地理及其神话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在此，我们将该书的年代、性质及其内容作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

《山海经》共有 18 篇，其成书年代古代多认为是虞夏时代，作者是夏禹和益，是由他们治水之时记述山川物名及其怪异而成的。如刘秀《上山海经表》明确说《山海经》“出于唐虞之际”，是“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论衡·谈天》更明确说“禹之《山经》”；《颜氏家训·书证篇》也认为《山海经》是“禹益所记”。至于《山海经》的成书时代，近现代学者绝大多数认为《山海经》的成书时间是在东周至汉代之间。不过，蒙文通认为，《大荒经》以下五篇写作时代最早，大约在西周前期；《海内经》四篇较迟，但也在西周中叶；《五藏山经》和《海外经》四篇最迟，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作品。^② 也有人认为，“本书成书年代可上溯至夏商”。鲁迅曾在 20 世纪 20 年代说，《山海经》“盖古之巫书也，然秦汉人亦有增益”。^③ 今天甚至还有学

① 竺可桢：《论以岁差定〈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

② 蒙文通：《中华文史论丛》第 1 辑，1962 年。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 页。

者认为，“《山海经》的相对年代以儒家所说尧舜时期较为准确，即夏代建立以前，约在公元前 21 世纪”。^①

近现代学者关于《山海经》作者的说法甚多。何观洲主张邹衍为《山海经》的作者；^② 顾颉刚《禹贡全文注释》等主张非一人之所作，作者为秦人。袁珂主张《山海经》作者为楚人或楚地人。^③ 蒙文通认为是巴蜀人的论著。另外，卫聚贤主张战国中期的“楚以南人所著”，并进而推演为墨子弟子随巢子写定；李行之认为《山海经》的作者是楚国南部一位少数民族土人，其籍贯之地望为今湖南省常宁县；^④ 还有人主张《山海经》有北方齐国或燕国人的手笔。

《山海经》其书详细地罗列山川河流、地形地貌、物产资源、方向里程等等，古代多数学者认为是夏禹治水后做成的一部历史地理书籍，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但也有把它归之于术数类，如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它归之于术数家的形法类——这实际上应是刘歆《七略》的观点；还有把它归之于小说家类，如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把它归于子部的小说类。近现代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山海经》进行了研究，《山海经》研究的地理学派、历史学派和文学神话派发端甚早。地理学派认为，《山海经》是一部主要记述地理方輿及其出产名物的著作；历史学派认为，《山海经》是反映中国上古时代历史的著作；文学神话派则认为此书是神话故事汇集。^⑤ 除此之外，宗教学、方志学、科学史、民族学、民俗学等学者也从多视角对它进行观察研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从事自然科技史研究的学者也参加到《山海经》的研究队伍之中来了，他们的研究侧重于《山海经》有关科学史方面的记载。但人们还是较多地把它看作上古的神话著述，或称之为地理与神话相结合的古书。

需要指出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少学者从历史地理方面研究《山海经》。段瑜主张《山海经》是一部“侧重反映上古历史的珍贵古籍，虽有许多神话传说，但应与史实区分开来，通过此书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由原

① 段瑜：《中国〈山海经〉讨论会争议的问题》，载《新华文摘》1985 年第 4 期。

② 何观洲：《〈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载《燕京学报》第 7 期，1930 年。

③ 袁珂：《〈山海经〉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载《中华文史论丛》第 7 辑（复刊号），1978 年。

④ 李行之：《〈山海经〉作者考》，载《求索》1989 年第 6 期。

⑤ 鲁迅于 1923 年提出《山海经》“盖古之巫书也”，见《中国小说史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始蒙昧向高级阶段渐次前进的发展总过程”。^① 胡钦甫《从〈山海经〉的神话中所得到的古史观》、^② 朱希祖《〈山海经〉内大荒海内二经古代帝世系传说》、^③ 常征《〈山海经〉及其史料价值》^④ 等论文，大都倾向于《山海经》为历史书。关于《山海经》一书的性质虽然近现代以来众说纷纭，但认为该书的性质在于历史地理方面或认定该书为地理书的学者，仍占绝大多数。主要论文有顾颉刚《〈五藏山经〉试探》、^⑤ 徐旭生《〈山海经〉的地理意义》、^⑥ 曹婉如《〈五藏山经〉和〈禹贡〉中的地理知识》、^⑦ 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⑧ 等。刘起钎认为《山海经》保存了丰富的地理素材而附丽以高度神话，它开了幻想的一派，但不能把这一派的这些著作当作严肃的地理书看待。^⑨ 另外，近年来一些探讨《山海经》地理区域范围的学者，大多也主张该书为地理书。

笔者以为《山海经》应分为图与文两部分。从语言文字方面看，文字的写成是在战国时期，而抄本最晚的校定年代也是在西汉时期。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赞》已经说到了此书，《汉书·艺文志》谓该书有13篇，西汉末刘秀（刘歆）校订为18篇，晋代郭璞注本就是据刘氏的校订本。因为校订本成于西汉时期，所以书中对西汉的皇帝有避讳，如夏启就写作“开”，《大荒西经》后有“按语”明确说“按夏后开即启，避汉景帝讳云”。该书原本是有完整的图本，其文字是作为图本解释而出现的，时代比较晚。《隋书·经籍志》记载郭璞有《山海经图赞》，说明魏晋时期还有图本，其文字不过是用来解释说明图像的。今本的附图已非原本。至于图本的年代，其时代应是很早的。我们认为“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大荒四经”及其《海内经》的图本时代大部分是在夏代初期，也有夏末商初的，而最晚的也是商代晚期的或西周初年的。如《海内西经》所记“开明国”东南西的方国分布情况，以今日考古发现来看，其时代不会晚于西周以后，

① 段瑜：《中国〈山海经〉讨论会争议的问题》，载《新华文摘》1985年第4期。

② 胡钦甫：《从〈山海经〉的神话中所得到的古史观》，载《中国文学季刊》1928年。

③ 朱希祖：《〈山海经〉内大荒海内二经古代帝世系传说》，载《民俗》第116—118期，1933年。

④ 常征：《〈山海经〉及其史料价值》，载《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⑤ 顾颉刚：《〈五藏山经〉试探》，载《史学论丛》1934年第1期。

⑥ 徐旭生：《〈山海经〉的地理意义》，载《地理知识》1955年第8期。

⑦ 曹婉如：《〈五藏山经〉和〈禹贡〉中的地理知识》，载《科学史集刊》1958年第1期。

⑧ 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载《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第7辑。

⑨ 刘起钎：《〈禹贡〉作者》，《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因为西周以后的古文献及金文资料便称之为蜀国。从这些情况来看，过去传说《山海经》是夏禹所作，虽然不对，但从《山海经》“海外四经”、“海内四经”、“大荒四经”及《海内经》的图本时代来看，时代确实很早。这是需要我们重新来认识的。

《山海经》的注释有晋代郭璞注，其后的注释考证者，清代有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可参看乾隆四十八年经训堂刻本。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是古代该书注释及其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巴蜀书社1985年据还读楼校勘本影印。

20世纪80年代，袁珂《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包括《山海经山经束释》和《山海经海经新释》两部分，后附“《山海经》叙录”，全录汉刘歆（秀）《上〈山海经〉表》、晋郭璞《注〈山海经〉叙》、旧本《山海经》目录和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并附有“所据版本及诸家旧经书目”及其“引用书目”，书后另有《山海经》“索引”，由张明华编。《山海经校注》的主体部分是《山经束释》和《海经新释》，后者完成于1963年；《山海经校注》的出版说明指出此书的特点是“着重对神话传说部分的注释，蒐罗丰富，征引详博，颇有发明，其他部分也作了诠解和校勘”。《山经束释》完成于80年代。袁氏《山海经校注·序》中认为，“《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乃亦神话之渊府”。《山海经校译》的特色在于校勘方面，作者在《〈山海经〉校译·序》中自述其目的在于“整理出一个《山海经》的新校本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是从错、脱、衍、倒、经文入注、注入经文、脱简和错简、它书窜入、篡改、其他等10个方面着手进行校勘的；另外在校勘的基础上，作者按郭璞注《山海经》18卷顺序作了全译。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袁珂的注本因为过分强调《山海经》一书的性质为神话书籍，自然就淡化了其作为历史书籍的性质。如他在《山海经校注·海经新释卷十三》中说：“犬马既俱生物，则经所记者，自是神话，何可以历史律之乎？以历史释神话，宜恒捍格而难通也。”这种情况在他的两书中常见。这种完全否定神话传说中的历史的因素，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另外，袁珂《山海经校注》的增补修订本于1996年由巴蜀书社出版。

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山海经》研究专著，则有徐显之《山海经探原》（武汉出版社1991年版）和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其余传说时代的史料则散见于《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礼记·礼运》、《易·系辞》上下、《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篇中。《孟子》一书中，言尧、舜、禹传说故事最多。最应注意的是，《吕氏春

秋·恃君览》、《庄子·盗跖》、《白虎通》卷一、《管子·君臣》等篇所言上古原始社会，其时人们知母而不知父，无君臣上下、无血缘关系、无礼乐文明制度等，为我们描述了原始社会的生活状况；《韩非子·五蠹》、《易·系辞》下，叙述了人类物质文明的进化、由无君臣上下之别的原始公社时代向制度文明进化的历史，传说时期有巢氏、燧人氏、包牺氏、神农氏、黄帝氏、尧舜氏等时代的社会特色及其对远古社会的贡献；《尚书·吕刑》、《逸周书·尝麦》等记述了黄帝对蚩尤部落的战争以及氏族部落时代官职的设立情况，还谈到早期法律起源的有关宝贵资料；《左传》昭公十七年郟子所言氏族部落图腾崇拜时期以鸟命官的社会结构特点，还涉及炎帝、黄帝、共工、太皞等部落首领分别以“火”、“云”、“水”、“龙”等作为部落图腾徽帜的情况；《国语·晋语四》晋大夫司空季子叙黄帝之子 25 人的氏姓分化及其婚姻关系；《国语·鲁语上》记述了夏、商、周三代的祭礼国典制度，特别是对异族立功英雄的祭典情况；《国语·郑语》记述了祝融氏后代族姓分化及分布情况；《礼记·礼运》引孔子之语论述了原始社会天下为公、无阶级分化、无私有财产的“大同”社会，以及有了阶级、有了私有财产、百官君臣关系等级制度的“小康”社会；《孟子》中《万章上》、《滕文公上》、《尽心上》、《尽心下》、《公孙丑上》，《墨子》中《尚贤上》、《尚贤中》、《尚贤下》，以及《史记·夏本纪》等，记载了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以及禹后父子相承制度的建立情况。其中以《孟子》所言尧舜时代的传说资料最为详细和丰富。例如，《孟子·万章上》说：“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这是孟子所说尧舜禅让与禹启父子相承的历史转变情况。《万章上》还说：“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

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谓也。’”这是孟子解释舜与其弟象的关系及其远封于有庠的原因，是研究有关虞舜时代的可贵资料。《孟子》一书中关于传说时代的资料甚多，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孟子·滕文公上》、《庄子·天下》、《吕氏春秋·爱类》、《古乐》、《论语·泰伯》、《史记·五帝本纪》等记述了大禹治水的事迹；《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述了上古畜龙神话及其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等职官五正的来源；《大戴礼记·五帝德》记述了五帝的功德情况；《帝系》记述了上古帝王族谱神话资料，是司马迁《五帝本纪》的主要参考资料。

另外，今本《竹书纪年》中有黄帝轩辕氏、帝摯少昊氏、帝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帝禹夏后氏的传说资料，也可参阅。近年来美国汉学家夏含夷等学者撰文认为，今本《竹书纪年》中的资料基本是可信的。今本《竹书纪年》虽然经过后人的改易，但可能也是以原来流传的底本作依据，因而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今本《竹书纪年》。今本《竹书纪年》可看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①

屈原《楚辞·天问》历述开天辟地、女娲、鲧、伯禹、康回、羲和、羿、虬龙、河伯、长人、蛇吞象等神话传说，有帝喾、尧、舜、启、后益、浞、浇、少康、女歧、桀、妹嬉、汤、伊摯、季、王亥、恒等历史人物与历史故事，历来为研究古史传说时代的学者所重视。另外，《楚辞》中的《离骚》等篇，也有不少有关历史传说时代的故事，反映了古史传说在南方流传的情况（蒙文通曾经指出古史传说分为东系齐鲁文化一带、南系长江流域的楚文化一带以及中原三晋一带^②），值得参阅。

三 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以及反映传说时代的古文字资料

商代之前古史的研究，主要依靠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这一阶段在考古学上属新石器及铜石并用以及青铜器时代早期的二里头文化时代。战国秦汉时关于传说时代的文献资料，需要这些考古资料及古文字资料来验证，也需

^① 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见《王忠愍先生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见《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241—247页。

要考古资料及古文字资料来弥补它的不足。因此，考古资料及古文字资料对研究商代以前的历史，作用极为重要，是先秦史料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近年来湖北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到五册，为探讨早期儒家特别是思孟学派的思想和发展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料，其中《孔子诗论》尤为学术界所关注。同时这些资料也反映了许多传说时代的历史事迹。

对古文献与古文字资料中有关传说古史人物的记述，大致可分为世系谱牒的记载与传说故事的记述。如《世本》等世系谱牒的记载应是基本可信的，《史记·殷本纪》所记殷代先公先王是根据《世本》等古文献资料写成的，经殷墟甲骨文的证明是可信的。而战国诸子百家所记古史传说人物，比世系谱牒资料则要略逊一筹。殷墟甲骨文中所记祭祀殷先公先王大概是有族谱世系一类资料作依据，应是可信的。同样，周代金文及战国竹简帛书中所记载祭祀祖先神的序列应是有世代相传的族谱资料作依据的，应是可信的。所以战国齐威王所作的齐侯因脊鞶铭文中所记“高祖黄帝（帝）”，说明战国中期（前357^①）已经有黄帝的传说，田氏齐威王自称黄帝为高祖，这就类似于族谱一类的资料，应是可信的。春秋时期秦公大墓石磬残铭有“高阳又灵，四方以鼐（宓）平”，“高阳”是颛顼之号，可知《史记·秦本纪》所记秦人先祖出自颛顼的传说是可信的。殷墟甲骨文中高祖“夔”，西周金文史墙盘铭文中“上帝后夔”，“夔”即帝誉之誉，这说明《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帝誉，在古文字资料中也是存在的。至于尧、舜，在近来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中更是常见的，如《郭店楚墓竹简》中的《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及《楚竹书（二）·容成氏》、《子羔》与古文献中的《孟子·万章上》、《墨子》〈尚贤上〉、〈尚贤中〉、〈尚贤下〉、《史记·五帝本纪》等书篇可以相互印证。这些古文字新资料证明了传说中的五帝与五帝时代是存在的。

《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与上海博物馆《楚竹书（二）·容成氏》、《子羔》记述尧舜禅让学说，我们认为这是子思学派的学术思想。过去有学者认为孟子谈禅让是学墨家的，现在看来是不对的。上海博物馆《楚竹书（二）·容成氏》为我国由部落联盟阶段或酋邦时代向早期国家转变提供了可供追溯演变之迹的资料，^②为《礼记·礼运》篇有关天下为公的

① 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②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图版第91—146页，释文第249—293页。

“大同”社会向“小康”型早期国家社会转变的中间环节提供了宝贵资料。依《容成氏》可知，传说时代的神农氏、轩辕氏至尧舜时代是原始氏族社会，无私有财产，无刑法，无众多的官僚阶层。尧舜时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代，由于史前大洪水，处于黄河下游及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氏族部落都集中到黄河中游的豫西、晋南及陕东一代，由于公共事务的繁多，各种官员的设置便越来越多。到禹的时代，兵器战争也越来越多了，刑法及管理刑法的官员出现了；派往各方国视察监督的使官也出现了，特别是赋税制度也建立起来，于是早期国家的政治组织形态便形成了。另外，《容成氏》还为我们提供了成汤讨伐夏桀的路线、地点以及周武王灭商方面的新资料。上海博物馆《楚竹书（二）·子羔》记述了舜的家世和成长、选立即位的过程，以及夏商周三王始祖诞生的传说和神话故事，而这一类材料过去仅见于《史记》及汉人纬书之中，且零碎不完整。新近发现的夔公盨铭文记述了大禹治水的有关事迹，铭云：“天令禹敷土，墮山濬川，乃差地设征。”这与《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的记载大致相近，也与《书序》、《尚书·益稷》、《诗经·商颂·长发》等篇的说法相似。其铭文说大禹治水之后，“乃差地设征”，就是说禹依据不同土地情况征收赋税，反映了夏禹时代早期国家的兴起情况。^①

我国古代神话资料一般是稀少且不完整的，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则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资料。（1）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不仅反映了阴阳术数家天象灾异论思想，而且完整地反映了神话宇宙起源说。记述伏羲、女娲及四子、禹、炎帝、祝融、共工、帝俊等共同创造世界的神话故事。有意思的是，其文认为先有土地四方，然后有四季观念，帝俊生十日后才有时间观念。这是把古史传说的人物与天地开辟、宇宙产生结合在一起的神话故事，古文献资料中从来没有如此完整的神话性的宇宙起源论。（2）在20世纪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后，使我们看到了启生而母化为石这一神话故事的原型（《云梦秦简》简文2背壹）。^②这条简文说癸丑、戊午、己未三日是大禹娶涂山氏之女的日期，尽管涂山氏之女没有被禹抛弃，但必定因为生子而死去。这条简文的记述，使启母化为石的神话真相大白。这就是说，大禹之妻、夏启之母、涂山氏之女是在生夏启时因难产而死去。这应该是夏启生而其母化为石神话的原型。《淮南子》佚文，“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

^① 可参阅《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李学勤、裘锡圭、朱凤瀚、李零等先生的论文。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图版第103页，释文第208页。原文“己未”作“巳未”，今依图版2背壹改正。

子!’石破北方而启生”,以及《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谓启出生时是“拆胸而出”的记述,则是把这一传说故事神话化的结果。(3)从出土的湖北《云梦秦简》文字资料来看,神话传说中牛郎与天帝之女织女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其原型是牛郎多次抛弃织女的婚姻悲剧。(4)《尸子》等文献记载了“黄帝四面”的神话,曾被孔子解释成黄帝派使臣于四方,但在20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黄帝书》^①中有《十六经·立命》,为我们提供了较早且较完整的有关“黄帝四面”的神话传说故事。汉简中,明确记述说黄帝有四张面孔,不过这应是宗庙中有四面的祭主之状。(5)虹霓神话传说及形成原因甚多,据殷墟甲骨文文字字形及其卜辞资料来看,其原型是长有两头的龙且能以头入河流水溪饮水的动物。(6)殷墟甲骨文及《山海经》中有四方神名及四方风名,四方神名含义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方风名具有明显的季节特点,其风名与季风有关,其原型为凤鸟及其有关的候鸟;春秋战国以来已发展为八方及八方风名,四方神已变为五方帝与五方神,八方风神已由四位变为一位,其形象也由鸟类变为鸟兽合一型或箕星。(7)湖北王家台秦简《归藏》记述了夏后启上均台占卜、乘飞龙登天以降歌舞之传说故事,与《山海经》、古本《竹书纪年》、《楚辞·天问》、《离骚》、《吕氏春秋·音初》等记载相合。出土文献为古代神话原型的研究提供了最新资料,也为神话原型研究提供了最新视角。

下面介绍一些有关新石器时代综述性(包括部分理论性的重要论文论著)的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主要对1949年后至1981年考古发掘情况进行介绍,其内容有:(1)旧石器时代:元谋猿人、蓝田猿人、北京猿人、大荔人、丁村人、许家窑人等文化遗址的介绍,并附有相关的书籍及报刊论文。(2)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以及东北地区内蒙古、新疆原始文化情况。(3)另外还介绍了石器时代人种成分的分布、研究及家畜养育的情况。该书共分六章:第一章,旧石器时代;第二章,新石器时

^① 马王堆三号墓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唐兰先生称之为《黄帝四经》,见《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裘锡圭先生称之为“道家”,见《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62页;李学勤先生称之为《黄帝书》,见《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140页。此暂从李氏之说。

代；第三章，商周时代；第四章，秦汉时代；第五章，魏晋南北朝时代；第六章，隋唐至明代。

2.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其书介绍了从1979—1989年文物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全书正文有32篇，分别介绍了各省、市、自治区1979—1989年十年间文物考古及其研究成果的情况，并附有国家文物局文物处编纂的《文物考古工作十年记事》。

3. 《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此书主要介绍了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全国的考古工作，特别对1989—1999年之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全书的稿件均由各省、市、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的管理部门或研究单位提供，内容比较丰富、翔实。每章节后均附有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的书籍及报刊论文索引，便于检索。

上面介绍的三种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主要的反映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概述性编著。其特色使人们既能够概括地了解各个地区、各个时代比较重要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而且每一章节之后都附有论文论著的目录索引，便于我们查找。

4. 尹达《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版。此书1955年初版。前一部分写于1939年，后来增加了二三篇论文，1955年出版。1979年再版时，增补了《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5. 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此书收集了苏秉琦从1941—1983年的23篇论文，反映了苏秉琦创建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学术思想及其发展过程。其中，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载《文物》1981年第5期），苏秉琦《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载《文物》1982年第4期）这两篇论文初步建立了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并正式提出了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苏秉琦《华人·中国人·龙的传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主要反映了作者从1984—1993年为探讨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相结合的道路以及中国古史研究的发展道路问题的思索。另外，《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是苏氏晚年新石器时代考古与文明起源研究的系统总结。

6. 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史前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这几部书反映了严文明关于史前考古研究的一些学术观点。

7. 张忠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考古学：走进

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文物出版社 2005 年版。这几部书是张忠培关于史前考古研究的一些成果，其中最后一书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写作的论文集，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他在那个时期对中国考古学的方向和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及基本认识。

8. 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张忠培和严文明撰写的《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此书从考古学文化入手，比较系统地理清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其社会的发展线索和脉络。

四 夏代史料与考古资料

有关夏代的文献资料是比较少的，然近年来考古出土的资料却不断出现，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以来，有关夏代的考古资料越来越丰富，使我们对夏文化的特点及其社会发展情况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

1. 夏代文献资料

夏代的文献资料有《尚书》中的“夏书”部分，有《禹贡》、《甘誓》两篇。《禹贡》记载了禹治理洪水以及平定九州的历史，并根据土壤肥瘠状况安排赋税徭役的情况。治理洪水情况与《书序》、《尚书·益稷》、《诗经·商颂·长发》等篇的说法相近；治赋税情况与《史记·夏本纪》、《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上》及《盐铁论》等书篇所说相近。近来更得到新出土金文资料夔公盨铭文“天令禹敷土，墮山濬川，乃差地设征”的证明，是可信的。过去一般认为《禹贡》的时代是战国时代，现在看来估计是偏晚一些。我们认为其篇的成文年代应在西周时代，晚不过春秋时代。另外，其篇中所说扬州一带进贡有“厥篚织贝”，“贝”金文中从“帛”从“贝”，是本字，传注说是一种带花纹的高级丝织品，西周金文中也说南淮夷负有向西周王朝进贡这种高级丝织品的义务和责任。以此看，《禹贡》大概是参照西周制度写成的，当然也有可能部分语句词汇是在战国时代掺和进去的。

近来邵望平先生结合考古发现所见龙山时期的文化区系，根据迄今所发现的中华史前遗址 7000 多处，确立的 30 多个考古学文化，以碳 14 断代法测定的数百个史前年代数据，由此大体上建立起的中国、主要是黄河长江流域史前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以为《禹贡》所说九州既不是古代的行政区划，也不是战国时的托古假设，而是公元前 2000 年前后黄河长江流域实际

存在的、源远流长、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①刘起钎则进一步指出《禹贡》定稿的作者可能是更熟悉中国西北地理的西周王朝史官，到战国时，又增入了战国的资料，才形成今日所见的定本，但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长江流域古代文化区系的划分与《禹贡》九州的划分基本相符之说应是可信的。^②

《甘誓》篇是夏后启因有扈氏反对启废除禅让而父子相继即天子之位，便兴兵讨伐有扈氏的战争誓词。其事件在《墨子·明鬼下》、《庄子·人间世》、《吕氏春秋·召类》、《说苑·正理》等书篇皆有记述，可参阅。近代有的学者因见其篇中有“五行”的语词，认为其成文年代在邹衍之后的战国后期，现在看来所估计的年代显得偏晚，依据“五行”一词不足判定。王国维《古史新证》认为，《禹贡》、《甘誓》等篇虽然“文字稍平易简洁，或系后世重编”，但是“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③

《史记》中的《夏本纪》是研究夏代最重要的史料。过去有学者曾对《夏本纪》所记世系情况有怀疑。但依《殷本纪》所记录的殷商世系先王为殷墟甲骨文所证明的情况看，《夏本纪》所记先王世系也应该是可信的。《夏本纪》先王世系可能是司马迁依据《世本》等古籍文献编撰而成。《夏本纪》除了引述《尚书》中的《舜典》（今文合于《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资料（《皋陶谟》、《禹贡》、《甘誓》几乎是全文引述），还引述了今天已经看不到的汉本《尚书》资料，如《五子之歌》、《胤征》等，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另外，先秦古文献中还常常引用一些《尚书·夏书》的有关佚文资料，其中最主要的要算《左传》与《国语》了。例如《左传》庄公八年鲁庄公云：“《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僖公二十四年引《夏书》云“地平天成”。僖公二十七年引《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文公七年引《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成公十六年周单襄公引《夏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襄公十四年晋师旷引《夏书》曰：“道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襄公二十一年鲁臧纥引《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昭公十四年引《夏书》曰：“‘昏墨贼杀。’

① 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见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第2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禹贡九州风土考古学丛考》，载《九州学刊》第2卷第2期，1988年。

② 刘起钎：《〈禹贡〉写成年代与九州来源诸问题探讨》，见唐晓峰主编《九州》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③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第3页。

皋陶之刑也。”昭公十七年鲁国大史引《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哀公六年孔子引《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哀公十八年引《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国语·周语上》引《夏书》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下》引《夏书》云：“关石、和钧，王府则有。”《国语·晋语九》引《夏书》云：“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

其他诸子中引用《夏书》佚文资料比较多的要数《墨子》了。《墨子·兼爱下》引《禹誓》云：“禹曰：‘济济有群，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引《禹誓》之文是禹征伐有苗的战争。《墨子·非命下》引《禹之总德》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墨子·非乐上》引述夏启淫泆与五子失国的佚文《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天用弗式。”

上述这些先秦古书中引用《夏书》以及《夏书》中一些佚文篇章资料的内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汉戴德《大戴礼记》中有《夏小正》，记述了一年十二个月的天象、动植物物候现象、时令气候以及农业生产的情况。《夏小正》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将古代天文气象、物候和农事结合叙述的月令式著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老月令，相传是夏代的遗书。据《礼记·礼运》说《夏小正》是孔子访夏后人杞国而得到的古书。有的天文史学家据星象推断是夏代的；^①也有学者认为是公元前五六世纪的天象，该书也是成于这一时期。^②我们认为，《夏小正》一书至少应是西周之前的作品，书中记载的大雨、霖雨在夏历七月，这不是黄河下游一带的杞国的情形，应是华西秋雨区的情况，其地在夏人活动区陕西、山西一带。但这种气候时令在西周之后是不可能的，应是在周武王分封夏人之后于杞国之前。所以，《夏小正》的成书时间只能是西周之前。不过，今本《夏小正》应是在原本的基础上屡加修改而形成的。《大戴礼记》的《夏小正》，实际上有经文，也有传文。传是对经文的注释，传文也极其简略，后来人们又误将传的文字也当作经文，经传不分，增加了难读之感。在经传区分上作出最好成绩的是夏纬瑛的《夏小正经文校释》，

① 胡铁珠：《〈夏小正〉星象年代研究》，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9卷第3期，2000年。

② 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卷第4期，1982年。

可以参看。^①

古本与今本《竹书纪年》记述了夏代帝王的世系、年数以及历史大事，特别是当时向东方征伐诸夷以及东夷向夏王朝称臣进贡的资料。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的资料，这与儒家所记的传说资料完全不同，十分重要。

《左传》襄公四年与哀公元年等文献记述了夏初仲康之子相失国，被后羿篡位，其后又为家臣篡位，到少康时才重新夺得政权复国的过程。这是研究夏初历史的可贵资料。另外，《墨子·耕柱》、《左传》宣公三年记述了夏后启让诸侯贡金铸造九鼎的传说，《孟子·万章上》等篇记述了尧舜禅让禹启父子相承的历史转化及其原因，这些都是夏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2. 夏代与二里头文化

夏代最重要的考古遗址就是二里头文化遗址。过去考古学界关于二里头文化有说一二期为夏文化，三四期为商文化；也有说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的。现在考古学界一般都承认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重要的遗址有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可参看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偃师二里头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2期）。考古发现的夏文化重要遗址还有长城内外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山东东部的岳石类型文化、河北西南部的漳河型商文化、山西西南部的东下冯类型文化，以及近年来在河南中部颍水上游流域登封、禹县一带发现的为夏文化早期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等等。

重要的参考资料有郑杰祥编选的《夏文化论集》上下册（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收集了60多年来考古学界研究探索夏文化的60多篇论文，是从600多篇论文中选出来的，具有一定代表性，反映了半个多世纪考古学家对夏文化研究探索的历程。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初集1980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续集199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两书收集了邹衡先生论述夏商周文化的64篇论文，其中有关夏文化的有15篇。另外，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收录31篇论文，全书论述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起源、分期、分区、谱系演变及相互关系，阐述了以中原三代为中心的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过程及其发展特点。

^① 夏纬瑛：《夏小正经文校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

第三章 殷商时代

有关商代的史料以出土的古文字资料最多，带字甲骨片达 11 万多片，其次是考古资料，文献资料较少。《尚书·多士》篇云：“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这就是说，“殷革夏命”是记录在殷人的典册之上，也说明周初周人是可以看到殷人文献典籍的。但商代的古文献资料还是很少的，目前在《尚书》中所见到的《商书》以及《诗经》中的《商颂》，可能是商人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但从语言文字方面看，《商书》大概在春秋时期已经经过改写，因为所用文字语法显然是春秋时代的语言特征。商代的史料主要还是包括殷墟甲骨文在内的考古文物资料。

一 商代的文献资料

1. 《尚书·商书》资料

《商书》有《汤誓》、《盘庚》（古文分上中下）、《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王国维《古史新证》以为是“当时人所作”。但笔者以为从这些《商书》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看，应为春秋时宋人所作。“如台”、“台小子”等语与春秋时代东方及南方诸国青铜器铭文中的用语情况相合，可证时在春秋时期。但是，结合殷墟甲骨文来考察《商书》诸篇的思想观念特别是神权崇拜的现象来看，《西伯戡黎》反映的“有命在天”的思想，《高宗彤日》反映了商人雉凤图腾崇拜观念与“彤日”的祭祀方式，《盘庚》上中下三篇反映的商人祖先神崇拜观念等等，这些都是殷商时代的思想观念和特征，可能是春秋时代宋人在保留了殷商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底本基础上作了语言文字的处理。

《尚书·汤誓》记载的是商开国君王成汤讨伐夏桀的誓词，亦即战前动员誓词。王国维《古史新证》认为其文字平易简洁，判断是后世人重编，但“至少亦必为周初人所作”。笔者认为，《汤誓》是春秋时宋人所作。

《盘庚》是盘庚迁殷时的诰词。《盘庚》的时代比较复杂，结合殷墟甲

甲骨文与《诗经》、《尚书》看，其思想观念应是商代的；但从语言文字及句法结构看，则为春秋时代的作品。如“予念我神后之劳尔先”，“我神后之劳尔先”主谓词组之间加“之”的句法，这在商代甲骨文及西周金文中是不存在的，这是春秋之时才出现的语法现象，但其篇又不会晚到战国之时。郭沫若曾据其中的“民”字断言非殷商时所作，仍是可信的。其中的“众”字是研究社会史的重要材料，但学术界其说不一。郭沫若依甲骨文“众”认为是日下三人形而解为奴隶，而另外一些学者依《盘庚》中“众”（盘庚对“众”讲话）认为其身份为平民，也有人认为“众”既非奴隶，亦非平民（自由的氏族公社成员），其中大部分为农业生产者，少部分为贵族。《盘庚》还反映古代宗族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神权观念。

《高宗彤日》反映了商人图腾崇拜观念以及周祭祭祀制度，“彤日”从甲骨文可知是殷墟出组及黄组卜辞中五种祭祀方式之一，可与殷墟卜辞相互印证。其文中有“祖己”，过去注疏家均认为是“殷贤臣”，现代学者结合殷墟甲骨文认为“祖己”即武丁长子、祖庚祖甲之兄“孝己”。其篇文字虽经过后人加工，但内容确为商人的。

《西伯戡黎》反映周文王受命称王后，向东方殷人与国连连用兵，而殷人君臣却无可奈何的情况。我认为《西伯戡黎》是春秋时代的伊尹之后所作，因为称“祖伊”，说明这是伊氏，称“祖”大概说明是“祖伊”的后人。

《微子》反映殷王朝人心离散、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病人膏肓的情况，其文也反映了殷王纣对天命虔诚相信的思想。

2. 《诗经·商颂》五篇

《商颂》五篇是《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商颂》五篇，王国维《古史新证》以为是西周时代宋国人所作，“疑亦宗周时宋人所作也”。反映了商人的祭祀制度、图腾崇拜、相土、成汤特别是中兴之主武丁的文治武功等方面的内容。

值得指出的是，《诗经·大雅·荡》是研究商末殷周关系的重要诗篇，是周文王讨伐商王纣的誓词与檄文。过去学者由于囿于文王不反对商王纣的传统认识，对此文认识不足，且有错误。《诗序》说：“《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把《荡》篇看成了周厉王时代召穆公做成的，显然是错的。陈梦家先生指出，《孟子·滕文公下》所引《太誓》为周文王讨伐商纣的誓词：“《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并说此《太誓》是

“战国文王伐邗本”。^①此说是对的。我们以为，文王时代不仅有讨伐商纣的誓词，而且还在《诗经》中留下了誓词的内容，这就是《诗经·大雅·荡》：“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强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兴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义类，强御多怱。流言以对，寇攘式内。侯作侯祝，靡届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奭佻于中国，斂怨以为德。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湏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螟如蟥，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内爨于中国，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篇明白无误地记述了周文王声讨殷商王朝的种种罪行，并指出殷商王朝内忧外患，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故《荡》篇应是周文王公开反叛，公然与商王朝为敌，且在誓师盟会上的誓词。《荡》篇的内容讨论清楚了，它的时代也就相应清楚了：这应是以周文王时期讨商盟会上誓词为主写成的诗篇，其时代应在商末周初。

3. 诸子及战国古文献中所见的《商书》

商代资料很少，但战国秦汉时人们所见《商书》的篇章还是不少的，这些内容我们可通过战国秦汉时期的著述去寻找。这些书中所引用的《尚书》内容应是可信的，不过文字可能经过引述人的改动，但大意应是不错的。

(1) 《说命》佚文。今本《尚书》中的《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是伪古文《尚书》，说明《说命》原文已经失佚。但在《国语·楚语上》中却保留了它的内容，尽管这些内容的文字可能已有改动。《国语·楚语上》中记述白公子张对楚灵王云：“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于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智之不疚也，犹自谓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既得以为

^① 陈梦家：《尚书通论》（增订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8页。

辅，又恐其荒失遗忘，故使朝夕规诲箴谏，曰：‘必交修余，无余弃也。’”韦昭注引贾唐说此为“《书·说命》也”。我们认为贾唐说这一段为《书·说命》佚文，是有道理的。与这一段大致相同的文字也见于《史记·殷本纪》之中，应是司马迁写《史记》时尚能见到的《说命》佚文。

(2)《仲虺之诰》佚文。今本《尚书》中《仲虺之诰》是伪古文《尚书》，根据《史记·殷本纪》的说法，《仲虺之诰》是成汤打败夏桀后由其左相作的。《墨子·非命上》、《墨子·非命中》、《墨子·非命下》均引用了《仲虺之诰》的佚文。《墨子·非命中》云：“于先王之书《仲虺之诰》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丧厥〕师。’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汤与仲虺共非之。”《非命上》、《非命下》均有与此大致相同的文字。其中《仲虺之诰》即《仲虺之诰》。《墨子》所引是《书·仲虺之诰》的佚文。

(3) 记述周武王声讨商王纣罪行的《太誓》。今本《尚书》中有《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三篇，但均为伪古文《尚书》。《泰（太）誓》的内容在先秦诸子及其他文献中屡有记述，如《孟子》、《墨子》、《左传》、《国语》等。不过有关声讨商王纣罪行的文字却以《墨子》为胜。《非命上》云：“于《太誓》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禋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漏。天亦纵弃之而弗葆。’”这一段文字在《非命中》亦有：“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曰：‘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僂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此言纣之执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也。”《非命下》说：“《太誓》之言也，于《去〔太子〕发》曰：‘恶乎君子！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商〕。’”《太誓》是周武王讨伐商王纣的誓词和檄文。从这些佚文中，我们可见早期文献中周人对商王纣的评价和批判以及对商亡原因的认识。

(4)《汤之官刑》的佚文。《汤之官刑》见之于《墨子·非乐上》，其文云：“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呜乎！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非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怀丧。’”

(5)《汤说》佚文。《汤说》佚文见之于《墨子·兼爱下》，其文云：“且不唯《禹誓》为然，虽《汤说》即亦犹是也。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

万方。”’这是商汤祈雨时的祷告之词。

(6) 《孟子》中常见引用商汤征伐诸侯的《商书》内容，一般只说《书》，且为引用与叙述相结合，但叙述部分也应该是有《商书》原文的依据的。《孟子·梁惠王下》云：“《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又见《滕文公下》云：“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讎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这里，孟子用夹引夹叙的方式，介绍先秦时孟子所见到的《尚书》中《商书》有关成汤讨伐葛伯等国家的情况。因为这些资料不见于今本《商书》，所以还是很宝贵的。

《孟子》一书中，还引用了《尚书·商书》的其他内容，如《梁惠王上》引《汤誓》之文，《公孙丑上》引《太甲》佚文，《万章上》引《伊训》的佚文，等等。《论语》也有引用《商书》的内容，如《宪问》述子张引《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此言可能是《兑（说）命》篇的语句。《荀子》中引《中藹》之言说：“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中藹》即《商书》中的《仲虺之诰》，今本已佚。《仲虺之诰》的佚文还见于《吕氏春秋·骄恣》，文义同但文字不同。

另外，《逸周书》中《殷祝解》的内容实际上并非“周书”而应是“商书”之一。《殷祝解》记述商汤克夏桀后，数次迁徙夏桀于“中野”、“不齐”、“鲁”等地，但民众不从夏桀却多次投奔商汤的传说。商汤总结说，这反映了天子之位是有道者处之而无道者失之的道理。《殷祝解》所说夏桀多次迁徙之地与《殷本纪》所说不同，但与近年问世的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竹书（二）·容成氏》所说夏桀多次迁徙之地却基本相合，说明《殷祝解》所记也是有根据的。

(7) 《礼记》中所引用的《商书》内容甚多，有《太甲》、《兑（说）

命》、《尹吉〔告，诰也〕》等。《缁衣》引《尹吉〔告〕》云：“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引《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厥度则释。”又引《太甲》曰：“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引《兑（说）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又引《兑（说）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

《文王世子》还引《兑（说）命》曰：“念终始典于学”，“学学半”，“敬孙务时敏。厥脩乃来。”另外，《坊记》引《高宗》佚文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讷。”《丧服四制》引《书》云：“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大学》引《太甲》云：“顾諟天之明命。”

上述这些都是《商书》的佚文，虽然只是只言片语，但也是研究商代历史的可贵资料，是值得我们珍视并利用的。

4. 《史记·殷本纪》

《殷本纪》记述殷先祖从契开始一直到商末帝辛商王纣时世系及一些重要的先公先王的历史事迹，如契、成汤、太戊、太甲、武丁、盘庚、武乙、帝纣等先公先王。《殷本纪》中所述殷人先公先王的世系继位情况，在20世纪初期疑古思潮下是学术界难以肯定的一大疑案。后来王国维依据殷墟甲骨文证明《殷本纪》所记除个别有倒置外（如《殷本纪》微一报丁一报乙一报丙一主壬一主癸，而甲文中则是上甲—乙—丙—丁—示壬—示癸），基本上是实录，地下资料与地上的文献资料正好可以相互印证。说明司马迁作《史记》时，一定是有《世本》一类的文献资料作依据的，而《殷本纪》这一文献也是很可信的。

《殷本纪》的史料价值很高，不仅前面所述引用《世本》一类的谱牒资料，今已得到出土殷墟甲骨文的证明，而且《殷本纪》所引述的《尚书·商书》的许多内容今天是看不到的。《殷本纪》引用《商书》有三种情况。其一，在今本《尚书》中存在的《商书》，只是文字作了一些翻译。如《汤誓》、《高宗彤日》等是指明引用《尚书》某篇内容。有的是暗引，如引用《西伯戡黎》的全文，但并未指出它的篇名。其二是引用汉本《尚书·商书》的篇名以及《书序》的内容：如“帝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后》”；“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

宗”。《尚书》的这些内容已经失佚，但司马迁写《史记》时这些书篇应是存在的。今本《尚书·商书》中的《伊训》、《太甲训》等是伪古文《尚书》，是不能引用的。其三是不仅有篇名，还有今本《尚书》已经失佚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如《殷本纪》云：“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为帝太戊。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参照《殷本纪》的体例，从“帝雍己崩”到“伊陟赞言于巫咸”，应是原《咸艾》与《太戊》的内容。因为《殷本纪》云：“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祖己乃训王曰：‘唯天监下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绝其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呜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继，常祀毋礼于弃道。’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为德，立其庙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训》。”依据今本《尚书·高宗彤日》，从“帝武丁祭成汤”到“常祀毋礼于弃道”，正是《高宗彤日》及《训》（今本二者合一）正文的内容。以此可知，从“帝雍己崩”到“伊陟赞言于巫咸”，就是原《咸艾》与《太戊》的正文内容。这说明《殷本纪》引述了今本所无，但司马迁写《史记》时可见的许多《尚书》篇目内容，所以《殷本纪》的史料价值应是我们充分予以肯定的。

5. 《尚书》中《周书》部分反映的商代史料

商代古文献资料比较少，但因为《周书》中反映了周初统治者常常要总结商王的经验与教训，这便成了我们了解商代社会历史的有效途径。如《尚书·无逸》中引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穡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还引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鰥寡。”

《无逸》篇引述周公对商代主要先王中宗、高宗、祖甲等治理国家、关心小民、对人恭敬等道德品行和生平事迹作了追溯回忆。这些史料不仅提供

了殷先王在位年代，现已成为研究商王年代的主要资料，而且反映了商代社会制度方面的变化，是以祖甲为转折点的历史变迁。祖甲之前殷先王对人恭敬，有美德，很贤明，不敢酗酒，也不敢追求安逸舒适的生活，而且能了解小民的疾苦，并能与小民打成一片。但祖甲之后的殷王就完全不同了，不知民间劳动稼穡的艰难，不了解小民的痛苦，而只知安逸享乐。原因就是祖甲之后，自幼“立王”而造成了后来商王十分安逸舒适的生活。“立王”就是建立了自幼立储的制度，说明祖甲之前并没有建立自幼立储的制度。但同时，周人先公先王太王、王季与文王却与祖甲以来的先王完全不同，不仅参加劳动，而且能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鰥寡”，这是周人能够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尚书·君奭》提供了商代成汤、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等时代重要辅政大臣的资料：“公曰：君奭，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又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还提供了周文王时期有关辅政大臣的资料：“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又曰：无能往来，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亦惟纯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时昭文王，迪见冒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哉！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后暨武王，诞将天威，咸刘厥敌。”这些都是研究商代及其先周历史的重要材料。

6. 古本《竹书纪年》中的商代史料

古本《竹书纪年》中的商代史料，也是研究商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商代在位之王有 29 位，496 年^①，是研究商代年代学主要依据的数据资料，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所依据的主要资料。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了盘庚迁殷后不再迁徙，并指出盘庚之前各商王居都之地，是研究商都城的重要依据。商王之名唯一可以找寻的古书依据就是古本与今本《竹书纪年》，可以与殷墟甲骨文对照研究。杨树达、晁福林先生曾经作过这一方面的研究。^②

另外，古本《竹书纪年》所说伊尹与大（太）甲的关系，与《殷本纪》及《孟子·万章上》等古书的说法完全不同。杜预《春秋经传集解·

^① 见《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及《资治通鉴外纪》卷二引。

^② 见《杨树达文集之五·积微居甲文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2—59 页；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23—331 页。

后序》引古本《竹书纪年》云：“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又云：“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但《孟子·万章上》却说：“伊尹相汤以王於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可见两者说法是完全不同的，是值得注意的。

7. 《楚辞·天问》中反映的商代史料

《天问》中有不少反映商代历史的材料。既有先商高祖时代的传说资料：“简狄在台，譬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又有商汤讨伐夏桀的史料：“汤谋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汤何殛焉”，“缘鹄饰玉，后帝是飨。何承谋夏桀，终以灭丧？帝乃降观，下逢伊挚。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说”，“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汤出重泉，夫何罪尤？不胜心伐帝，夫谁使挑之”，“初汤臣挚，后兹承辅。何卒官汤，尊食宗绪”。另外还有商末商王纣淫乱狂妄、乱杀无辜的传说资料：“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弼，谗谄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开阿顺，而赐封之？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详狂。”也有周文王、周武王讨伐商纣的记述：“伯昌号衰，秉鞭作牧。何令彻彼岐社，命有殷国？迁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受赐兹醢，西伯上告；何亲就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这些传说资料虽然简短，但为我们提供了涉及许多重要历史大事的资料，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商史的史料。

二 商代的考古资料

1. 商城遗址与二里冈文化

20世纪80年代初，在偃师城西一公里处的尸乡沟一带，发现了早期商城遗址。虽南城墙已不可见，但其他三面城墙保存完好，南北现长1700多米，北部城墙1215米，南部城墙740米，总面积达190万平方米。而1997年在偃师商城中南部新发现了一座时代更早的小城，它的南墙、西墙南段和东墙南段与商城大城墙正好重合，可见大城墙是在小城墙基础上向北扩建而成的。偃师商城遗址可分为三期六段，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其遗址中兽骨、木炭及人骨用常规碳14测年得出的数据并拟合后日历年代在公元前1600年至

公元前 1260 年之间，用 AMS 测年得出数据并拟合后日历年代为公元前 1605 年至公元前 1365 年之间。^①学术界不少学者认为这就是夏商文化的交界时段，从而大大地开阔了夏商考古的视野，为我国古代文明和城市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被评为 1997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②偃师商城遗址在尸乡沟一带被发现，正好与《汉书·地理志上》记载商汤在偃师“尸乡”建都是一致的，也与《括地志》及《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汤都偃师为“西亳”的说法相合。多数学者都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是典型的夏文化，可分为一至四期。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了 1 号和 2 号宫殿基址，并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石器及墓葬区等。显而易见，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都城，即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古本《竹书纪年》所说太康、羿、桀皆以之为都的斟鄩，亦即《夏本纪》正义所说“《尚书》云‘太康失邦，兄弟五人须于洛汭’。此即太康居之，为近洛也”中的“洛汭”。这也与《春秋繁露》卷七谓成汤称王后“作宫邑于下洛之阳”之说相合。更重要的是，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也确实印证了《商颂·殷武》及叔夷钟铭所说汤都建于“禹之绩（迹）”或“禹之堵（土）”上。《吕氏春秋·慎大》所云商汤建国后“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这从偃师二里头遗址也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据近年来碳 14 测定的一些资料表明，郑州商城要比偃师商城晚一些，说明偃师商城应是商汤时期所建的城市。

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郑州东南郊二里岗发现的郑州商城遗址，面积达到 25 平方公里，发现有商代的房基、窖穴、壕沟、水井、墓葬、祭祀坑以及铜器、陶器、石器、骨器、玉器、蚌器、原始瓷器、习刻字骨和陶文符号等遗物。1955 年在遗址中部，又发现了一座周长近 7 公里的商代城垣。在城内北部和东北部，发现了三座大型宫殿遗址，在宫殿区东部，发现了蓄水池和石砌输水管道等设施。^③郑州二里岗文化是商王朝的前期文化，郑州二里岗遗址位于商朝疆域的中心，碳 14 测定时代在公元前 1560 ± 160 年，或公元前 1590 ± 160 年。从青铜器和陶器等出土器物的类型看，其时代处于河南龙山文化与安阳小屯殷墟文化之间。^④

① 《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 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67—68 页。

② 《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53 页。

③ 同上书，第 253—254 页。

④ 可参看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美] 张光直：《商代文明》，毛小雨译，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原版耶鲁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1999 年版；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商城遗址发掘报告》，载《文物资料丛刊》1997 年第 1 辑。

关于郑州商城，学术界有仲丁隰都说、汤都说，以及与偃师商城并为汤都的几种说法。20世纪50年代还曾在郑州商城北部和东北部的金水河、白家庄一带发现几批战国时期的陶文，已发表的11个戳印字中有8个是“亳”字。^① 邹衡肯定此郑州商城便是成汤都城。^②

到商代二里岗文化后期，商文化所波及的疆域明显扩大了。这时，东部已扩大到山东省中部，以济南大辛庄文化遗址及益都苏埠文化遗址为代表；南方已发展到湖北省中部黄陂县，以盘龙城遗址为代表；西部影响到陕西省西部的岐山县一带；北部已影响到河北省南部，以藁城台西遗址为代表。东到山东省中部，可参看《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的调查》，载《考古》1973年第5期；《山东益都苏埠屯第一号奴隶殉葬墓》，载《文物》1972年第8期。南部到湖北省黄陂县盘龙城。盘龙城遗址发现于1954年，位于武汉市北5公里处，或称为“盘土城”，城址近似方形，南北长约290米，东西长约260米；还发现了宫殿遗址1号和2号基址；作为建筑宫殿的夯土台基，南北长100米，东西宽60多米；城垣外有宽约14米、深约4米的城壕沟，应是早期的护城河。其性质与年代均与二里岗上层文化相当，属于商文化系统，可能是商代建于长江流域的一个方国。可参看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1974年度田野考古纪要》，载《文物》1976年第2期；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载《文物》1976年第2期。西到陕西省中部，可参看《陕西省岐山县发现商代铜器》，载《文物》1979年12期；《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第1册，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北到河北省南部，可参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2. 殷墟文化

殷墟文化又称小屯文化。其地在今河南安阳市西北部的洹河两岸，是殷王盘庚至商王纣之间的商代后期都城所在地，共经历了8世12王，依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共有275年。该遗址初发掘于1928年。殷墟文化遗址总面积约有24平方公里，被洹河分为南北两大部分，洹河南为宫殿区，洹河北为王陵区。宫殿区周围分布有手工业作坊、平民墓地和居址等。宫殿宗庙区以今小屯村东北地为中心，现已发掘夯土基址53座，分甲、乙、丙三

^① 《郑州金水河南岸工地发现许多带字的战国陶文》，载《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3期，第85页；《郑州白家庄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第8页。另外，近年来在郑州商城宫殿遗址中出土的陶豆豆柄、斗盘和瓮、罐肩部均发现不少“亳”字的模印文字。《郑州商城宫殿遗址发现夏商界标》，《中国文物报》1999年8月18日第1版。

^② 邹衡：《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组。甲组最早，乙组居中，丙组最晚。小屯村北有帝乙帝辛时代的商王室制造玉器的作坊，小屯村南有铸铜遗址，北辛庄南有一处帝乙帝辛时代的制骨作坊遗址，大司空村南地也发现一处较大的制骨作坊遗址，时代在廩辛康丁时代到商末。殷墟西区以孝民屯为中心，是一处多为小型墓的墓葬区，已经发掘的墓葬 939 座，可分为八个墓葬区。每个墓区分属于不同的氏族，反映了商代氏族墓地的埋葬制度。王陵区在洹河北岸的侯家庄与武官村之北，已发掘大墓 13 座，还有商王祭祀先祖的人祭坑。

殷墟宫殿遗址在今安阳市小屯村北。1928 年以来先后发掘过 20 余次，发掘面积达 2 万多平方米。小屯宫殿区现已发现 56 座夯土基址，可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基址有 10 余座，分布在宫殿区的北部，其时代可能早到殷墟文化第一期。乙组有 20 多座，多在宫殿区的中部，为殷墟文化的第二、三期。丙组有 10 余座，分布在宫殿区的东南部，主要是殷墟文化第四期。其时墙壁用版筑，房架用木柱，屋顶可能是用茅草覆盖。宫殿夯土基址现已发现 50 余座，其形制有矩形、条形、正方形、圆形、凸形、凹形等，其中最大的乙八宫殿基址，南北长约 85 米，东西宽约 14.5 米。

殷墟文化的参考资料有胡厚宣《殷墟发掘》，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 1955 年版。李济《安阳的发现和发掘记事及商代古都的复原》，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77 年版。《安阳发掘报告》第 1—4 期，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1933 年。介绍有宫殿宗庙区的小屯遗址，有王陵区的侯家庄、武官村等遗址，还有遗物、甲骨、青铜器等发掘报告、论著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 1987 年版。《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妇好墓的发掘中，出土铜器、玉器甚多。殷墟文化重要论文有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0 年版），将殷墟文化分为四期。

殷墟文化分布地区及影响地区已大大超出了古书的记载及人们想象的范围，它不仅存在于黄河中下游流域，而且发展并影响到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汉江巴蜀、甘肃东部等地区。这些方国部落不论为其盟国或臣服于殷商尚待进一步研究，但均受到殷商文明的一些影响。（1）东部已经到达山东省中部的益都县。参见《山东益都苏埠屯第 1 号奴隶殉葬墓》，载《文物》1972 年第 8 期；《山东长清出土的青铜器》，载《文物》1964 年第 4 期。（2）南部已影响到江西的清江县甚至湖南省境内。参见《江西清江县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75 年第 7 期，有大量的青铜工具，1963 年在湖南宁乡黄材附近河道中发现一件兽面纹铜卣，发现玉珠、

玉管一千多件；《湖南宁乡黄材发现商代铜器和遗址》，载《考古》1963年第12期；《湖南衡阳市郊发现青铜牺尊》，载《文物》1975年第7期。

(3) 西部在二里冈文化时期商文化的影响已到达渭水下游关中西部一带^①，甚至在二里冈上层至殷墟二期时期，商文化的影响已经到达关中西部，在陕西岐山扶风白家窑出土过商式的青铜器和陶器，被邹衡先生称之为早商文化“京当型”^②。经近10多年考古发掘，这类“京当型”商文化的遗存分布是东起泾河下游至西安，南至秦岭，西界周原、豳河沟一带，北至岐山山脉^③。泾渭中游一带，殷墟文化晚期商文化的影响已达甘肃一带，可参看《甘肃庆阳发现商代玉戈》，载《文物》1979年第2期。

(4) 西南部商文化的影响已经到达汉中城固洋县一带。在渭水河下游两岸曾多次发现商代青铜器，1955年以来到80年代初，出土各类铜器400多件，特别是铜人面、兽面极具特色。其中尊、方彝的形状、纹饰与安阳殷墟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参见《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载《考古》1980年第3期。而且商文化的影响已经到达四川彭县，见《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载《文物》1961年第11期；《四川彭县蒙阳镇出土的殷代二解》，载《文物》1962年第6期。特别是四川成都广汉一带的三星堆遗址，其青铜器既有地方特色，又有商王朝青铜器的形体、纹饰（青铜罍、青铜尊），见《中国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2000年。

(5) 北部商文化的影响已到达北京市平谷一带。1977年在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发现了一批殷商时期的青铜器。见《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载《文物》1977年第11期。这些青铜器也许是肃慎、燕亳等方国的遗物。《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商代北方的商文化的影响甚至已达辽宁一带。见《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殷代青铜器》，载《考古》1973年第4期；《辽宁省喀左县山湾子出土殷周青铜器》，载《文物》1977年第12期。这里可能是古代孤竹国之地。见晏琬（李学勤）《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载《考古》1975年第5期。

① 北京大学考古研究室化纤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发掘》，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耀县北村遗址1984年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 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③ 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337页。

三 商代甲骨文资料

1. 殷墟甲骨文简介

关于商代古文字资料，我们准备以殷墟甲骨文的介绍为主，同时也介绍一些青铜器铭文。与青铜器铭文有关的书籍，我们将在讨论西周时再介绍。现在专门介绍有关甲骨文资料的情况。殷墟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是殷代后期（盘庚至帝辛纣王）的王都之地。甲骨文是殷王室贵族占卜之后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最主要的史料。殷墟甲骨文发现于1899年，以前曾被称作“龙骨”并作为止血的药物。当时的金石学家王懿荣，由于在金文和大小篆方面造诣很深，在用药前审视药物，发现了刻在“龙骨”上的文字，由此发现了甲骨文。

殷人碰到大小事都要占卜。大至战争、祭祀，小至生育、出行、疾病、做梦等，都要向鬼神卜问。正如《礼记·表记》中所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占卜用的是龟的腹甲、背甲或牛的肩胛骨。在甲或骨的背面进行钻或凿，然后在凿处用火烧灼，甲骨的正面便呈现破裂并出现兆纹，然后卜人与王或其他大臣根据卜兆的形状判断吉凶祸福，卜完之后，便将所占卜的事及占卜的结果刻在卜兆之旁。

根据殷墟甲骨文中的内容可知，卜辞绝大多数都是商王占卜的记录，主要反映商王询问每天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以及未来一句甚至更长时间的吉凶情况。这种卜辞被称作“王卜辞”。另外，还有反映王子、妻妾以及贵族重臣活动的卜辞，这类卜辞被称作“非王卜辞”，包括“子卜辞”、“多子组卜辞”、“妇卜辞”等。

殷墟甲骨文的内容十分丰富。首先，殷墟甲骨文反映了商代世系先公先王的情况，证明与《史记·殷本纪》所记的世系次序基本上是吻合的。还有许多先公和重要大臣则是《殷本纪》及其他古文献中所没有的，如先公“河”、“岳”、“敷”、“兕”。还有一些先公，如“季”、“互（恒）”等，本见之于《天问》，但如果不是依靠甲骨文资料，这些先公也是很难被识读出来的。通过殷墟甲骨文，我们可以了解商代的官职名称及其设置情况。据殷卜辞可知商王朝中有卿史、大史、六史、四史、御史、西史、北史、巫、臣、小臣、小籍臣等众臣，军事长官有多马、多亚、多射、亚旅、师、侯、犬、多犬等。

其次，虽然殷墟甲骨文所反映的内容十分丰富，但最主要的还要数祭祀

祖先与战争，反映了商代“国之大事，在戎与祀”的情况。另外还有田猎、农业生产、出游、嫁娶、疾病、做梦等等。殷墟卜辞中常常记载商王朝对周边国家进行征伐战争，武丁时期主要是土方、兕方、犬方等，所征伐之国达40多个，因此武丁在历史上称颂为“中兴之主”。帝乙帝辛时代主要是对孟方、人方（夷方）征讨，帝辛时代对人方的战争近两年之久，所涉及地域已经达到淮水流域甚至江淮之间。

殷墟卜辞所反映的殷人的生产方式是农牧业并重。卜辞中常常可以见到商王的田猎活动，狩猎数量往往有几十、数百。而且，狩猎的动物品种也极其繁多，有老虎、狐、豕、兔、鹿、麋、兕、象等等，还有捕鱼活动。卜辞中所反映的农业生产的记述也是比较多的，其中农业生产的工具，从甲骨文中可见有耒、耜等，从考古资料中可见有石铲、骨铲、石镰、石刀等；农业生产的作物有禾、稻、黍、稷、麦等。从殷墟卜辞中常见的“求年”、“求雨”、“受年”等记述情况看，农业生产在当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商王相当关心的。殷墟卜辞中还记录了商代大量的天文气象物候资料，如星宿、月食、日食、风、云、雷、雨等天象气候的记载。另外，通过卜辞还可了解商代手工业生产、商业交通以及出游、嫁娶、疾病、做梦方面甚至医学方面的情况。殷墟甲骨文对我们研究殷商历史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一条完整的甲骨卜辞包括四个方面：

(1) 前辞（序辞）：关于卜问的时间、地点、贞人之名。

(2) 贞辞（命辞）：问辞，记贞卜的事情，即命龟之辞，是向龟甲陈述需要询问的事情。

(3) 占辞：占卜人或王或权臣根据卜兆所作的吉凶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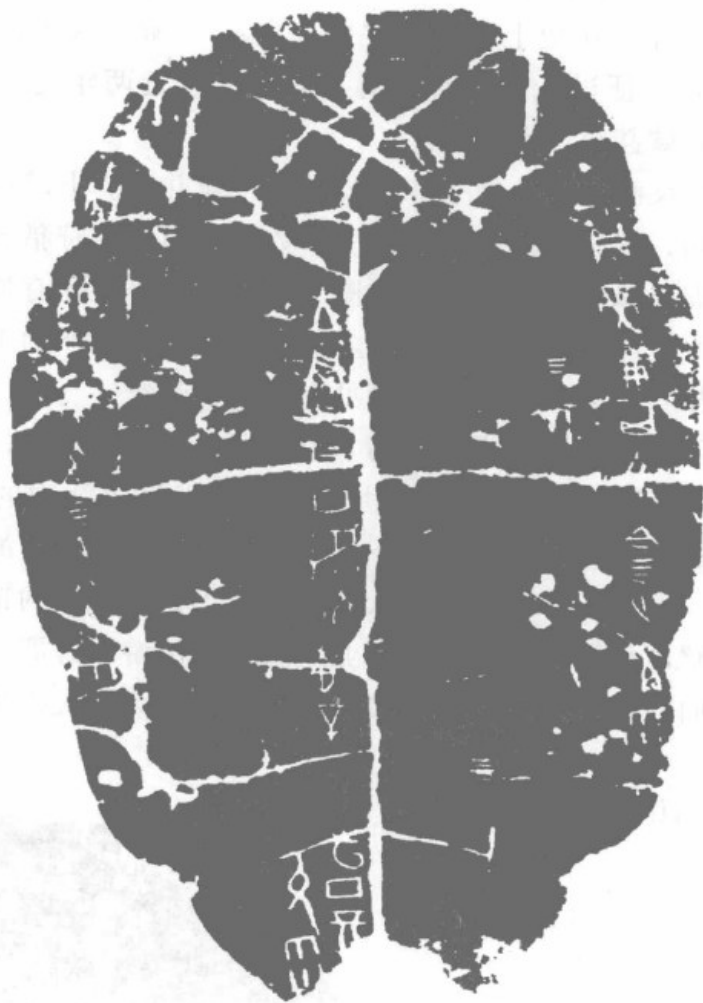
(4) 验辞：事情过后看占辞是否应验。（多数无验辞，未应验者。）有的无占辞，有的无验辞。

下面以《合集》11485片（右附图）与14138片为例，谈谈殷卜辞中前辞、贞辞、占验、验辞的排列情况（四种辞例的说明在 { } 形的括号中）。《合集》11485：“癸未



11485

卜，争贞 {前辞}：旬亡（无）求（咎） {贞辞}？三日乙酉夕，月有食，
闻。八月。{验辞}”



《合集》14138 片

《合集》14138 片：“戊子卜，彀贞：帝及四月令雨？贞：帝弗其及今四月
令雨？王占曰：丁雨，不惠（惟）辛？旬丁酉允雨。”
前 辞 贞 辞
占 辞 验 辞

2. 甲骨文主要内容

(1) 祭祀祖先

《合集》28276 片：“癸酉卜，其稔田父甲一牛？”

此为殷王廩辛、康丁时期的卜骨，是为了求丰收而祭父甲。

《合集》32087 片：“丁午贞，乙未酒高且（祖）亥，……大乙羌五、牛三，且（祖）乙羌……小乙羌三、牛二，父丁羌五、牛三，亡（无）害？”

兹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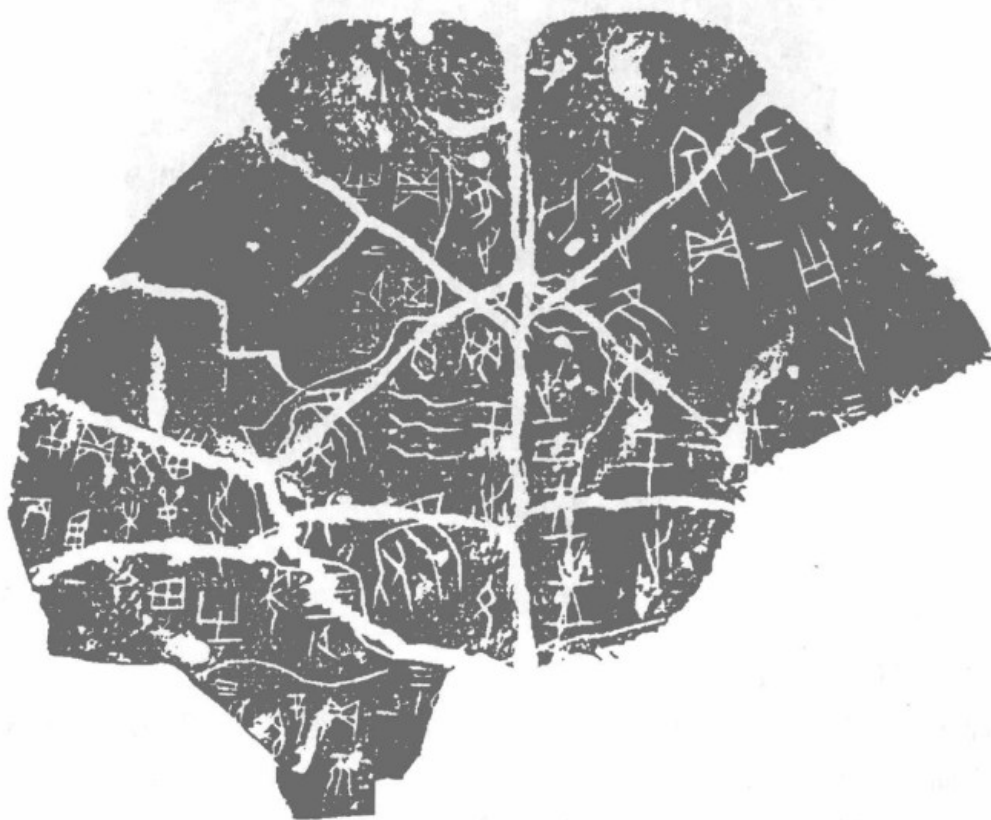
(2) 天文气象

《合集》11485片：“癸未卜，争贞：‘旬亡（无）咎？’三日乙酉夕，月有食，闻。八月。”

(3) 农业生产

殷墟卜辞常常卜问年成好坏，反映商王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合集》9572片：“庚辰卜贞：翌癸未屎西单田，受有年？十三月。”
（见下图）



《合集》9572

《合集》9742正片：“癸未卜，宾贞：我受黍年？贞：我不其受黍年？”

(4) 战争

《合集》6057正片：“癸巳卜，彀贞：旬亡（无）咎？王占曰：有求（咎），其有来嬉（艰），气（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嬉（艰）自西。沚戩告曰：土方正（征）于我东鄙，哉（灾）二邑。舌方亦侵我西鄙田。”
（见下附图）



《合集》6057 正

(5) 田猎、渔牧

商王进行田猎，其目的一是游乐，二是军事练兵，三是为了猎取禽兽以献祭宗庙。

《合集》28346 片：“王惠（惟）今日壬射沁鹿，禽（擒）？吉。乙王其田，湄日不雨？吉。”

(6) 疾病、做梦、婚娶

《合集》11506 正片：“贞：有疾自，唯有害？/贞：有疾自，不唯有害？”

《合集》17378 片：“辛未卜，彀贞：王梦兄戊，何从，不唯咎？四月。”

《合集》14002 正片：“甲申卜，彀贞：妇好冥（娩），嘉？王占曰：其唯丁冥（娩），嘉；其唯庚冥（娩），引吉。三旬又一日，甲寅冥（娩），不嘉，唯女。/甲申卜，彀贞：妇好冥（娩），不其嘉？三旬又一日甲寅冥（娩），允不嘉，唯女。”（见下附图）



《合集》14002 正

这是为武丁之妻妇好分娩占卜时间的卜辞。两个好日子未碰上，三旬又一天后的甲寅果然生了个女孩，是不吉利的，因为是个女孩。说明商代重男轻女观念已形成：生男则嘉，吉，大吉；生女不嘉，不吉，大不吉。

3. 甲骨文等古文字结构形体对研究上古社会生活的史料价值

甲骨文形体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因而，甲骨文本身也就能够反映殷商及其之前的社会历史，它是“活化石”。其形体、结构本身可作为史料来运用。这一点过去虽有实践，但并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于省吾先生指出：“中国古文字中的某些象形字和会意字，往往形象地反映了古代社会活动的实际情况，可见文字的本身也是很珍贵的史料。”于先生曾根据商代甲骨文的字形，分析了商代统治阶级蹂躏杀虐人民的暴行，并归纳为八个方面：（1）人身的蹂躏。甲骨文中有“𠄎”字，就像一人践踏在俯伏于地的另一人的脊背之上。“尼”字，甲骨文中像一个人坐于另一人的脊背之上。（2）捆绑。甲骨文的“𠄎”字，就像用绳索缚人之颈。“讯”字，右旁就像人跪形状但反缚双手。（3）械具和囹圄。甲骨文中“执”字的异体字甚多，有的像两腕受械具之状，有的像用手扼人之颈

并双手受械，有的像两腕受械具并用绳索捆绑其颈项，有的两腕受械具并用鞭子扑打其背。(4) 肉刑。甲骨文中“𠂔”（有的学者释为“劓”）字，像以刀割鼻之状。甲骨文中“馘”字，从耳从戈，就像用戈割下耳朵的形状。(5) 火刑。甲骨文中“𤇀”，即“炆”字，像在火上焚烧人的形状。(6) 陷人以祭。甲骨文中“𠂔”，为“陷”字的初文，像陷人于坑坎之中去祭祀。(7) 砍头以祭。甲骨文中“𠂔”，即“伐”字，像用斧钺砍人头之形。(8) 剖腹刳肠的凌迟之刑。甲骨文中“𠂔”或“𠂔”，“𠂔”字即古书上的“磔”字，“𠂔”字即古书上的“施”字。表示剖腹刳肠、肢解人性去祭祀。所以于省吾先生说：“从甲骨文中所反映的商代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群众的践踏和刑杀，极残暴之能事。就蹂躏人身方面来看，既践踏于人的脊背而又安坐于其上，践踏安坐之不足，还要骑在人民头上；就捆绑方面来看，为了防止俘虏或罪犯的逃亡，既缚其颈部牵之以行，而在刑讯或屠杀他们的时候，还施之以反缚；就带械者来看，不仅械其两腕，有时还扼其颈、缚其颈、击其背、笼其首、置诸囹圄之中；就肉刑方面来看，有的施之以断鼻的劓刑，有的施之以锯去右足的刵刑，而在军事上或割取左耳以献功；就火刑方面来看，既焚系累的俘虏于火上，又暴巫或燃烧女奴隶以气（笔者按：应作‘乞’）雨；就陷人以祭方面来看，既或活埋于坑坎之中，有的还执锤杵以舂击之；就砍头以祭方面来看，以钩兵断首固属常见，用斧钺砍头也是惯例；就馘、刳人性方面来看，馘为剖腹刳肠，刳（磔）为割裂肢体，其残酷已达于极点。”^① 于先生通过甲骨文字形结构分析商代刑杀百姓的历史事实，为我们树立了以文字形体结构的特点作为第一手史料去分析古代社会方面的榜样。这种分析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1) 古代的建筑

从甲骨文及金文的形体结构中可见商代住宅的建筑结构样式，如有些字表示古代地穴或半地穴式的住宅。例如：

𠂔， “出”字；𠂔， “各”字。“出”字表示人的脚趾（古以“止”表示），走出地下室或地穴；造字方法同而方向相反的则“各”字表示人脚趾走向地穴。

𠂔， “复”字，“复”是“覆”字的古体，上部表示地宫，两头有通道，下部有脚趾，表示来去的方向。这些字表示了远古时代人们的居住方式和条件，《诗经·大雅·绵》“陶复陶穴”，说明古公亶父之前人们都居住在地宫或地穴之中。地下的地穴是通过透视的表现手法表现出来的。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10页。

𠃉， “良”字。表示地下穴居的两边有通向外边的走廊地道之状，其形状也是通过透视的手法表示出来的地穴之状。

表示地面建筑的古文字有：

𡩶，此为宗庙的“宗”字，像房屋之中有祭坛之状。

𡩶𡩶， “宫”字。像房屋建筑中一间又一间的屋室相套相连。先秦时“宫”指民众住的房子，秦汉后才演变成帝王所住房屋的专称。

𡩶，甲骨文的“室”字。此字从门至声，为形声字，“宀”就像古代的房屋。

𡩶，甲骨文的“家”字。像房子中有豕猪，猪在上古是财富的象征，房子中有猪表示人有一定的家财，有家室妻子之义。

𡩶，甲骨文中“向”字。表示房子的墙上有开口，便是窗子。《说文》：“向，北出牖也。”《诗经·七月》云：“塞向墐户。”均说“向”是向北面开的窗户。古汉语中，“牖”是门旁开的窗户；“窗”是屋顶开的窗户，即今“天窗”；“向”是朝北开的窗户。为什么“向”可表示朝北开的窗户呢？这是因为古代房屋的门户多朝南开，故门旁的窗户则朝南开，名为“牖”；房子背后墙上的窗户便是“向”，便是朝北开的窗户。“向”字的甲骨文字形正好表示了这一含义。

反映高层建筑的古文字：

𡩶，这是甲骨文的“京”字，像高台上修建的亭子。

𡩶𡩶，这是甲骨文中的“高”字，像楼台式的高层建筑，下面的“口”可能是表示高层建筑的门口。

𡩶𡩶，这是甲骨文中的“郭”字，是象形字，其写法采取俯瞰式，中心为城墙形，四周为四个亭子，后来又简化为两个亭子。

𡩶𡩶，前一个是甲骨文的“享”字。其字像高台上有一个亭子，其义是在享堂祭祀祖宗。周人祭祀祖宗在宗庙之中，而殷人祭祖宗是在墓坑上修建一高台，台上修一亭子，这就叫“享”堂，在享堂之中祭祀祖宗。“享”字保留的享祀之义正好通过商代古文字可以反映出来。

(2) 战争刑罚



𠃉，这是甲骨文中的“伐”，表示用戈去砍杀人。

这两幅图文是周代金文中的“县”字（第一幅见县妃簋铭），“县”是“悬”的本字，像用绳索把人头悬挂在树木之上，即古代枭首酷刑。古文字的确十分传神肖形。

𠄎，这是甲骨文中的“取”字。“取”字本义表示古代斩获敌首后割取左耳以献功。《毛诗诂训传》云：“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曰馘。”由此可知，所割的左耳叫“馘”，是名词；割取左耳的动作叫“取”，是动词。

𠄎，这是甲骨文中的“执”字，像给人套上手枷、手铐。𠄎，此形体还表示被捉拿的俘虏或罪犯的脖子上还系有绳索。𠄎，此形表示有人用手掐住被捉拿俘虏或罪犯的头部。𠄎，此形表示被捉拿俘虏或罪犯的头上还套上的大枷。

𠄎，这是甲骨文中的“炆”字，像把人置于大火之上焚烧，用来对付仇敌，商代也用这种方式来祈雨。

𠄎，这是甲骨文中的“奚”字，像用手拉着一个脖子上套有绳索的人（或以为拉着奴隶的辫子），表示被奴役之人。《周礼·天官》郑玄注谓“有才智者为奴，少才智者为奚”，可知“奚”的身份低于奴隶。古文字的形体也反映了这一点。

(3) 社会生活

𠄎，这是甲骨文中的“祭”字。像用手拿着一块肉去祭祀，祭祀必须用最鲜的肉，所以肉上还滴下许多血点。后一字的左下方为一神示，像用手把鲜肉放置到祭坛上。

𠄎，这是甲骨文的“祝”字。像一个人在神主前跪着祝告。前一字画“口”。表示祷告；后一字张开两手，表示祈祷的动作。

𠄎，此为甲骨文中的“安”字。女人在野外是不安全的，或有野兽或有坏男人，对女性都有威胁，女人只有进入房屋之中，才能安心。

𠄎，此为甲骨文中的“族”字。把箭（矢）集中在氏族军旗之下，表示氏族的群体观念。

𠄎，即力，力、耒为一个字的异体分化，其字表示众多的人在某一区域中劳动。此为甲骨文中的“协”字，是商代集体从事农业生产劳动。

右两图为金文中的“寇”字，表示在房子底下有人手执棍棒偷袭主人的“元”，“元”就是头部，目的是为了抢劫，这是强盗抢劫行为。



𠄎，弃，表示用簸箕盛婴抛出去。周代始祖后稷名弃，《诗·大雅·生民》就说弃被抛弃在林中，逢伐木工人而被救回；被抛弃在野外冰上，鸟用翅膀保护：“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平林，会伐平林；诞寘寒冰，鸟覆翼之。”古人生孩子，或因迷信或因生活困难便加以抛弃。此字就是这种社会生活现象的反映。

𠄎， “韦”，此字中间的“口”表城邑，外部的“止”表周围有人环



绕，是包围之“围”。

左图是金文中的“监”字，在盛了水的器皿中看脸面。此字后加“金”为“鉴”，即铜镜。说明人类早期以水为镜，后来才发展成为以铜为“镜”的历史。

𠄎，这是甲骨文“为”，用手役使大象的形状。反映商代中原地区有大象，而且人类还役使大象为人服务。《韩非子》说战国时北方已无大象，所以只有用象的骨骼去想像大象。

𠄎，这是甲骨文的“羌”字，从人羊声，羌人以牧羊为生。《说文》：“羌，西戎牧养人也。”𠄎，甲骨文中还有在脖子上套有绳索的羌人。

𠄎，这是甲骨文的“汎”字，表示几案上鲜血淋漓，此字后代作“𩇛”。《说文》云：“𩇛，以血有所刳涂祭也。”表示屠宰动物并且用动物的新血去祭祀先祖。

𠄎，此字为“教”字，加上支，表示教学要用鞭子来进行——反映体罚式教育，后来私塾用尺板，在先秦时教育学生用鞭子来加以体罚。

𠄎，这是甲骨文中的“帝”字。花蒂之蒂的本字，表示“子”（果实）与木体之间的血肉联系。父王也称“帝”，表示血亲之间的血缘联系。后来夏商王朝把本部族的始祖称“上帝”，战国后宗法制解体，上帝才成为至上神。



左边甲金文的“王”字，就像一把倒立的斧钺形状，表明王权是从使用斧钺的战争与刑法中产生出来的。对内，表示法律刑杀，镇压反叛、触犯刑法者；对外，表示用于征伐战争。大汶口文化、崧泽文化后期以及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有石钺、玉钺，

大多数不是实用工具，而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西周时期周王背后有屏风，屏风上画的就是黑白相间的巨斧形状。《书·顾命》云“设黼扆缀衣”，蔡沈集注云：“黼扆，屏风画为斧文者。”《鹖冠子·博选》云：“信符不合，事举不成。不死不生，不断不成。记功而赏，权德而言。王钺在此，孰能使营？”“钺”是斧的异体字。从此篇可知，“钺”字冠以“王”，表明就是王权的象征，也是记功行赏、杀罚断狱的权力象征。

古文字形体学研究对中国古代史，尤其是远古商周时代的社会历史的研究参考价值甚大，只可惜这些大量的古文字形体资料并未引起大家的充分注

意。上举数例，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注意。

4. 殷墟甲骨卜辞著录书及其研究书籍介绍

早期甲骨著录有刘鹗《铁云藏龟》，1903年石印本，1058片，简称《铁》。其后著录卜辞最有贡献的是罗振玉，代表作有：《殷虚书契前编》八卷，1912年日本影印本，2221片，简称《前》或《前编》；《殷虚书契后编》二卷，1916年，1104片，一般简称《后》或《后编》；《殷虚书契续编》六卷，1933年，2016片。一般简称《续》或《续编》；《殷虚书契菁华》一卷，1914年，共68片，著录为当时所见甲骨刻辞中最精美者；《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著录刘铁云所遗拓片40片。罗振玉前后出版甲骨文著录书籍5部，共计拓片3437片，不仅数量多，而且精品不少。许多拓片上刻辞甚多，内容也十分重要。

甲骨文著录且有甲骨文字考释，早期有孙诒让依据《铁云藏龟》编撰的《契文举例》，1904年吉金盒著书第3集。其后，罗振玉著《殷商贞卜文字考》，玉简斋1910年版；《殷墟书契考释》，1914年出版，增订本3卷，东方学会1927年出版。王国维《戩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单行本2册。王襄《簠簋室殷契类纂》14卷，天津博物院1920年出版，1929年增订。林泰辅出版《龟甲兽骨文字》2卷，商周遗文会1921年。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14卷，待问13卷，决定不移轩1923年版。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14卷（附2，补遗1），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叶玉森《殷墟书契前编集释》，大东书局1933年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郭沫若《卜辞通纂》一册，929片，是收集当时已经出版的罗振玉《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后编》、《殷虚书契续编》、《殷虚书契菁华》，刘鹗《铁云藏龟》，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王国维《戩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等书拓本以及日本一些学者和大学所藏甲骨精选并按内容分类编辑而成的，1933年由日本文求堂出版。今有《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2卷，科学出版社出版，新近印刷为2002年。学术界一般简称《通》或《通纂》。

郭沫若《殷契粹编》二册，共有1595片，1937年在日本文求堂出版。今有《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3卷，科学出版社出版，新近印刷为2002年。基本上全是刘体智所藏甲骨，郭沫若称之为“多而精”，“殆为海内外之冠”（《殷契粹编·序》）。学术界一般称《粹》或《粹编》。这两本是甲骨文的入门书，具有很大的影响。虽有一些文字的解释至今已经过时，但仍可作为入门的向导性书籍。

1928年至1937年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

上先后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由于这15次是用科学方法进行发掘的，因此所发现的甲骨文地层关系明确，且获得了大量考古资料，为分期断代提供了十分可靠的资料。这些资料现存于台湾，已出版成书。

董作宾《殷虚文字甲编》一册（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年出版，共3942片，学术界一般简称《甲》或《甲编》；1961年屈万里为之考释著有《殷虚文字甲编考释》（历史语言研究所）。董作宾《殷虚文字乙编》（历史语言研究所）三册，上册于1948年出版，中册于1949年出版，下册于1953年出版，共9105片，学术界一般简称《乙》或《乙编》。另外，董作宾《殷虚文字外编》，一册，1955年出版，434片，学术界一般简称《外编》。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上中下三辑6册（历史语言研究所），1957—1972年相继出版。学术界一般简称《丙》或《丙编》。

胡厚宣在抗战结束后的甲骨著录有《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著录1143片，来薰阁书店1951年版；《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著录3276片，来薰阁书店1951年版；《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著录5642片，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一般简称《京津》。胡厚宣还出版《甲骨续存》3册，1955年，3753片（含摹本），学术界一般简称《续存》。四书一共著录13814片，减去重片2889片，伪刻1片，共有10924片。

新中国成立以后最主要的收获，是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安阳小屯南地发现甲骨五千多片，其中有字甲骨片5041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录出版了《小屯南地甲骨》，简称《屯南》，上下册共5分册，1980年出版，共4632片。其书上册分2分册，著录了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拓片4513片。下册分3分册，第一分册为释文，并注明是甲还是骨，还注明其时代和钻凿情况；第二分册包括各种索引（有“字词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以及拓片不够清晰的摹本，第三分册是钻凿形态的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的介绍。《小屯南地甲骨》是体例最完善、对所著录甲骨情况介绍最全面的一部甲骨著录著作。读者使用十分方便。更重要的是，这是在科学发掘下出土的甲骨，有地层关系，有钻凿形态，体例比过去完善多了。另外，编者根据出土层位等因素，肯定自组、午组卜辞属于早期，对甲骨断代有重大贡献。

《甲骨文合集》（13册），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20多位学者参加了编辑整理工作，中华书局出版，于1978年至1982年13册出齐，简称《合集》。这是一部殷墟甲骨文资料的总汇编，故称“合集”。其中包括最早出版的传世甲骨文，凡国内外已著录者皆收入，中央研究院15次发掘的甲骨皆已收入。特别是对全国存在甲骨的

单位进行了普查，拓了拓片，其中不少是未著录过的。然后去伪、去重、缀合，从15万片中选出了41956片，编成了《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按董作宾5期排列：

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

二期：祖庚、祖甲；

三期：廪辛、康丁；

四期：武乙、文丁；

五期：帝乙、帝辛。

每一期按内容分类，为四大类22小类。

(一) 阶级和国家。1. 奴隶和平民；2. 奴隶主贵族；3. 官吏；4. 军队、刑罚、监狱；5. 战争；6. 方域；7. 贡纳。

(二) 社会生产。8. 农业；9. 渔猎、畜牧；10. 手工业；11. 商业、交通。

(三) 思想文化。12. 天文、历法；13. 气象；14. 建筑；15. 疾病；16. 生育；17. 鬼神崇拜；18. 祭祀；19. 吉凶梦幻；20. 卜法；21. 文字。

(四) 其他。(限于第一期)

这种编排方式的好处是便于寻找同类型、同一专题的材料，便于从事专题性的研究(如研究战争、官吏、农业、手工业、交通等)。但优点同时又成了缺点，因一版的材料涉及面太广，如一版卜辞涉及官吏便列进去，但同时又涉及战争、军事、方域、奴隶、渔猎，做其他研究时便找不到材料，只好一片片地找。配套的有《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另外，彭邦炯、谢济、马季凡编纂有《甲骨文合集补编》，收集了《甲骨文合集》所未收的建国之后考古发掘的甲骨文新资料，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

目前甲骨文著录书籍中反映甲骨文出土资料主要有五种书籍：(1)《甲骨文合集》(及《甲骨文合集补编》)。(2)《小屯南地甲骨》(共5册)4536片。(3)李学勤、齐文心、艾兰：《英国所藏甲骨集》，上下两册，上册图版，下册是释文以及附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包括各大学及博物馆)五期12类，共2647片。(4)许进雄：《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册，共1915片，加拿大皇家交大博物馆1979年出版。(5)[日]松丸道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这五种甲骨文资料的著录基本上把近百年来甲骨文发现的内容差不多全部收录进去了。这五种甲骨著录可利用工具书来检索。姚孝遂、肖丁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该书将上列五种甲骨著录

书籍的卜辞依各书原来次序一条一条地摹写下来，并作了释文。（可利用释文，如果学了古文字后，应检阅原书拓片，因释文也有一些错误。）

出土的甲骨片很容易破碎，所以甲骨缀合便成了研究甲骨的学者的重要工作之一。王国维在1917年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时，就是把《戩寿堂所藏甲骨文字》中第1页第10片和《殷墟书契后编》中第8页第14片缀合为一片，从而发现《史记·殷本纪》上所记从上甲至示癸的次序与殷墟甲骨文不合，用缀合的甲骨文内容纠正了《殷本纪》上记载的错误。这反映了缀合工作对研究甲骨文的重要意义。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比较重要的甲骨缀合专著，有曾毅公、郭若愚、李学勤著的《殷虚文字缀合》，科学出版社于1955年出版，缀合的甲骨片有482片。1975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严一萍所著《甲骨缀合新编》，缀合甲骨片705片。1978年《甲骨文合集》，共缀合了2500片，其中新缀合的一千多片是桂琼英所作。1999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了蔡哲茂著的《甲骨缀合集》，新缀合的有361片，有拓片，有摹本，还有释文。书中还编了《〈甲骨文合集〉缀合号码表》附于书后。此表以《甲骨文合集》的号码为纲，把作者自己和过去学者缀合的甲骨片全部列于表内，还注明了缀合情况，很便于学者检索。

5. 字典、文字考释与刻辞类纂类工具书

殷墟甲骨文字典方面的书籍有：高明编著《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徐中舒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该表是为编纂《汉语大字典》做的准备工作，后独立成册。在以上两本书中，作者将甲骨金文及简帛文字都加以收集，分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和春秋战国文字。春秋战国文字包括简帛文字、侯马盟书、玺印文字、货币文字与陶文。虽然不是很齐全，却有利于初学者及一般文史学者使用。单纯收集甲骨文的字典是孙海波编著的《甲骨文编》，初版1934年，1965年在原稿基础上大加改订和增益，中华书局出版，1989年重印。正编收字1723字，附录收字2949字，共计4672字，殷墟甲骨文中文字已基本收集齐备。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李孝定编纂《甲骨文字集释》，1965年6月版。但此书未收集1949年以后内地学者的学说。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刊之五十，是一部甲骨文字字典，收集了各家释字的说法、考证，还有自己的按语。汲古书院，1967年初版，1977年重印增订本。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共4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此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吉林大学多位学者联合编著而成。《甲骨文字诂林》广泛搜集了从20世纪初至1990年前甲骨文字被发现

以来 90 年间甲骨文字考释的研究成果，作者并加以概括，提出总结性的意见，可供学习与研究者参考。

殷墟甲骨文利用起来不大方便，一些学者编纂了一些检索性的工具书，帮助学者更好地利用甲骨文资料。日本学者岛邦男编著《殷墟卜辞综类》，是一本有原字摹写有释文的索引型工具书，依据原形，并根据自然分类法用 164 个单字为部首，分 3397 条隶属甲骨文句子，依类依时排列当时所见到的 63 种甲骨文书籍资料中的卜辞句子，研究者使用比较方便。但此书用过去著录的甲骨文书籍，如需要核对原文就有一定的困难。该书 1967 年由株式会社大安出版；增订本《殷墟卜辞综类》汲古书院 1971 年出版。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3 册，中华书局 1989 年版，可作为卜辞检索卡片使用，按字找出自己需用的卜辞内容，可弥补《甲骨文合集》专题分类的不方便。该书不仅有依据殷墟卜辞原字的摹写，而且有释文，按字编排，所据资料为《合集》、《屯南》、《英国》、《怀特》四大著目集的资料，内容比较齐全。

研究史料学，我们要标清楚史料的年代、价值，还要考虑齐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说：“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详。”上面这些甲骨文著录及字典，释文总集、文字考释及刻辞类纂类工具书，基本上收集了出土甲骨文及其文字研究方面的材料，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6. 周原甲骨文

1977 年，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周原甲组建筑遗址的 11 号等坑中发现周人卜骨 17000 多片。其中有字甲骨为 292 余片，字小而细，故开始只有摹本。周原甲骨文与殷代甲骨文有同有异，其区别主要在于：首先，从字形上看，周原甲骨文被称为“微雕艺术”，字体甚小，笔画细如毫发，要在显微镜下才能看清。殷墟甲骨文虽然早期大、后期小，但还是完全可以看清楚的。其次，周人在钻凿形态、占卜方法上与殷卜辞风格不同。商人卜甲卜骨多作圆孔；周人卜骨多为圆孔，卜甲多为方孔，方孔的槽在左边，圆孔的槽在孔底。再次，周原甲骨文的文例比殷墟卜辞简略得多。殷墟卜辞辞例完整的一般有前辞、命辞、占辞和验辞，但大多数周原甲骨文只有贞辞或占辞，而且两者兼备者更少；辞例也很简单，一般只有数字，少则一两个字，最多的也只有 30 多字。另外，殷墟甲骨文往往都用干支纪日，但周原甲骨文很少用干支纪日，而是常用月相来记日，如既吉、既望等。

这批甲骨的内容涉及文王、武王、成王时代的社会生活，如祭祀、田猎、征伐等活动，是研究先周及周初社会特别是殷周关系的宝贵资料。根据

周原甲骨文内容与书体，大致可分为武王克商之前与之后两个阶段。克商之前的甲骨文记载了周文王祭祀大甲、文武帝乙的情况。周原甲骨文中“衣王”，即殷王；“周方伯”是周文王，受册命为“伯”。“王”应指受命称王后的称呼，可与史籍相印证。另外祭祀殷先王的刻辞也可与《逸周书·世俘》、《墨子·明鬼下》、《非攻下》等篇相印证。周原甲骨文中记载了周文王受封为“周方伯”，有“称中”的大典记述，有到文武帝乙宗庙祭祀成汤并祝告二母的记载，有伐蜀、伐密的记载等等。

周原甲骨文中还有不少数卦的资料，这在过去被看作“古文奇字”。这类资料过去常见之于殷墟甲骨文中，也见于青铜器铭文中，符号现已超过一百多个。所用数字有一、五、六、七、八、九，共有六个数字，组合形式一般以三个一组或六个一组。张政烺先生在第一次古文字年会上提出这是原始易卦，证明原始易卦是用数字来表示的，后来才演变成阴阳的卦爻。另外，由于商代已经存在六个数字的重卦，所以过去说周文王演周易之说就不大可靠了。张氏“数卦”之说很快得到学术界的响应。

有关周原甲骨文的研究资料可参看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这是一本综述西周甲骨研究成果的著作，也可起到一个索引的作用。另外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均有摹本和释文及考证，可参阅。徐书除摹本外，还有照片放大的图版，可相互对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曹玮编著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丛书之一的《周原甲骨文》2002年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此书正文部分以放大照片显示周原甲骨文字的本来面貌，提出H11:62等58片甲骨为非人工刻划甲骨，可帮助研究者对照照片来研究“微雕型”的周原甲骨文字。书后还将陈全方、王宇信、徐锡台、朱歧祥四位学者的研究著作制作成“周原甲骨文摹本著录对照表”和“周原甲骨文释文对照表”，并附有周原甲骨研究文章目录供学者参考。

6. 商代金文

商代金文资料不如西周和春秋时期的资料，不仅数量少，而且字数也不多。商代金文资料一般未能从西周、春秋金文中分离出来，20世纪初期，由于殷墟甲骨文研究有了大进展，于是商代金文资料也引起了学者的重视。罗振玉1917年出版的《殷文存》以及王辰1935年出版的《续殷文存》2卷，就是专门著录商代金文拓片资料的。其后罗振玉于1931年出版了《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1936年又出版了《三代吉金文存》20卷，总共收集了4800多器铭的拓片；刘体智于1935年出版了《小校经阁金文拓片》18

卷，均为当时拓片集大成之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的《殷周金文集成》，1—18期，中华书局20世纪80年代陆续编成出版。上述几部大型商周金文著录中包括了不少商代的金文资料。这些内容除了《殷文存》与《续殷文存》外，皆是与西周春秋金文资料合于一起，其内容详情在下面再作介绍。

7. 反映甲骨文研究的学术著作

王国维《观堂集林》4册，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民国商务本。分《艺林》八卷，《史林》4卷。与商史有关者两卷：见第九卷、第十卷。第九卷《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是王国维依甲骨卜辞考证商代先公先王世系、名号的重要论文，在史学上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两篇论文证明《殷本纪》的记载虽有个别失误，但基本上是可信的。《殷本纪》是依据战国时期《世本》等谱牒类书籍及诸子书中整理出来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却多有怀疑。王国维认为《殷本纪》所记成汤之前先公的名号，大致是可信的。至于汤以下先王三十王（或言二十九王），十七世，是信而有证的。王氏还认为战国时期诸子甚至是百家不雅驯之言（如《山海经》、《尸子》等）也都反映了一面之事实。王氏认为《世本》、《史记》为“实录”。第十卷是《殷周制度论》，以古文献资料结合古文字资料比较了商周制度文化的异同。他认为殷周之际出现一个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在学术界影响甚大。不过王氏论述主要在礼仪制度方面，后来学者们在思想文化、考古出土的物质文化方面均有论述，对殷周之间异同见解也不相同，可分为“迥异”说与“微殊”说。我们曾从上帝天神崇拜、思想文化、制度文化、习俗文化与文化渊源等方面详细讨论了商周文化的异同，见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此书为王氏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时所编讲义。共有五章：第一章“总论”，说明研究古史的方法；第二章“禹”，据春秋时齐国与秦国的铜器铭文，证明夏禹为古之帝王，确有其人；第三章“殷之先公先王”，此与前引王氏《观堂集林》第九卷、第十卷内容大致相同；第四章“商诸臣”；第五章“商之都邑及诸侯”。另外还有许多西周春秋时青铜器铭文的释文、度量衡制度、礼乐制度、《尚书》讲义、《说文》练习及古文字学研究论文等。这本讲义内容是王氏研究成果删繁就简的结果，有利于初学者学习。

郭沫若有关商代的研究可参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三篇《卜辞中

的古代社会》及《附录·追论及补遗》（《郭沫若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并可参看第2卷《十批判书》中《古代社会的自我批判》。郭氏是以辩证唯物史观的理论并结合古文字、古文献资料研究古代历史的第一人。作者发奋研治甲骨金文也是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寻找证据。作者的许多论点虽有武断穿凿之处，但他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史，通读甲骨文辞例有开创之功，不可抹杀。特别是郭氏于20世纪30年代作的《殷契粹编》（今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3卷）、《卜辞通纂》及《甲骨文字研究》等（分别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2卷与第1卷），不管在释读文字、通读甲骨文字及其用甲骨文证明商代历史方面，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原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补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1935年。董氏这篇重要论文首次对甲骨卜辞进行分期断代，他主持了原中研院史语所的第一次发掘，又参加了其后的14次发掘，有考古发掘的实践经验。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十项断代标准：①世系；②称谓；③贞人；④坑位；⑤方国；⑥人物；⑦事类；⑧语法；⑨字形；⑩书体。其十项标准及其他用来分期断代的五期（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期祖庚、祖甲；三期廪辛、康丁；四期武乙、文丁；五期帝乙、帝辛）虽有可商之处，但《甲骨文合集》的编撰者及今天多数学者仍然沿用^①。经董氏《断代研究例》发表后，就可大致判定每一辞每一片是何世何王之物。这样一来，学者可用出土甲骨文来深入研究殷代社会的变迁，卜辞的史料价值就增强了。

其后在甲骨文断代方面研究的主要著作，有董作宾著的《殷历谱》，1945年由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此书在甲骨文断代上提出在分期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分类、分派（提出以祖甲为界限，分旧派与新派）的研究。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梦家编著的《殷虚卜辞综述》，首先提出了所谓“文武丁卜辞”应属于武丁卜辞的说法，认为子组、自组卜辞与武丁卜辞宾组卜辞同时的看法，后来证明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另外，陈梦家试图把所有甲骨文隶属于每个商王王世，用九期来作为断代的新标准。其后邹衡在《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4年第四、五两期上发表的《试论殷墟文化分期》，通过地层关系论证了子组、自组卜辞绝对年代大体上相当于武丁时期。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出土后，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① 此文现收入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中，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小屯南地甲骨》上下册出版，午组与自组卜辞同出于一坑，更证明两组卜辞时代与宾组同时，约在武丁时代前后。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甲骨学断代的新成果，主要在“历组卜辞”的争论上。先后发表的重要文章有：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载《文物》1977年第11期；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年代》，《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李学勤《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载《文物》1981年第6期；林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李学勤《殷墟甲骨两系说与历组卜辞》，（《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等文，均主张“历组卜辞”应属于武丁晚期至祖庚时期。持有反对意见并坚持历组卜辞为第四期武乙文丁时代的学者及论述有：肖楠《论武乙、文丁卜辞》，《古文字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以及《小屯南地甲骨》前言，中华书局1981年版；罗琨、张永山《论历组卜辞的年代》，《古文字研究》第3辑等。其后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对殷墟卜辞分类、分组并依贞人来划分时代方面作出了努力，并提出了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两系说”的理论和方法，反映了当前甲骨文分期断代的新成果。

甲骨文字考释研究方面，有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杨树达《耐林廐甲文说·卜辞求义》，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这两本书现在已收入《杨树达文集之五》，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唐兰《殷虚文字记》是1934年作者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讲义，1981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中华书局1962年版。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版。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这些都是专门考释甲骨文字或以考释甲骨文字中疑难字为主的论著，尤其是后两本论著代表了甲骨文字考释研究一百多年来的最高水平，不管是初学者还是研究者都是需要认真阅读的。

另外古文字学研究的专著，有唐兰1934年在北京大学执教时，手写石印的讲义《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齐鲁书社1981年版。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是古文字初学者的简易读本，其中包括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简帛文字等方面内容。另外还有考释古文字方法及古文字的入门书目，有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些是研究古文字理论性的专著。

商代历史地理研究成果主要有：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是用卜辞资料研究殷代地理的第一本专著；其后有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艺文印书馆1989年版；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日本学者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中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台北鼎文书局1976年出版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等甲骨文通论性的论著。这些论著在殷墟卜辞中地名的确定、统计以及研究方面均有一定的贡献。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刊1945年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新版《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外一种）上、下两册；200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厚宣、胡振宇著的《殷商史》。这两部书是以殷墟甲骨文材料写成的殷商断代史性质的专著。胡氏治甲骨甚勤，方向甚专，著述颇丰。

另外，胡厚宣在为纪念甲骨文发现五十周年而作的《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中华书局1952年、1983年），辑录了1899年至1949年五十年间所有有关甲骨学的中外各种文字的专著书目与论文篇目，共计876种，分类编纂，详注出版时间和版本出处，后附有著者、篇名、编年三种检索法，是一本比较方便的工具书。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中华书局1988年版。此书比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自甲骨文发现的1899年至1956年半个多世纪甲骨文研究的成果。其书名为“综述”，但实际上是陈氏在充分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殷墟卜辞断代方面，提出了所谓“文武丁卜辞”应属于武丁卜辞的说法，认为子组、自组卜辞与武丁卜辞宾组卜辞同时；并提出把所有甲骨文隶属于每个商王王世、用九期来作为新的断代标准；在商代方国地理方面反映个人研究成果甚多，对殷墟甲骨学的研究成就及研究内容也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此书反映了在此之前甲骨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和水平，在学术界影响甚大。

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全书共分15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到第十六章为正文，又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包括甲骨文的发现年代、发现者、出土地、时代确定、甲骨文命名、甲骨学研究的几个阶段、甲骨的整治和占卜、甲骨学专业术语及甲骨文例、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甲骨的著录及收藏、甲骨学与殷商史的研究要籍、有贡献的学者及其研究特点。下篇包括西周甲骨学、周原出土的商人庙祭甲骨以及西周甲骨文研究的展望、甲骨文与甲骨书法。另外附录有4篇，包括甲骨学大事记、甲骨文著录及简目、新中国甲骨学论著目、西周甲骨论著目，也是值得学者

参阅的。

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本书编著者王宇信、杨升南、宋镇豪、常玉芝、孟世凯皆为甲骨学专家，所以能比较充分地反映从甲骨文发现到1999年之间甲骨文发现、发掘以及整理研究等各方面情况。此书共分15章，对百年来甲骨文的出土、整理、发掘、著录、考释、断代、卜辞语法、甲骨文分支西周甲骨、商代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气象历法以及甲骨学的展望作了全面的总结，是殷墟甲骨文发现以来甲骨学研究的一本学术史（单这一点上要胜过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陈氏《综述》名为“综述”，但实为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看不出学术发展过程）。其书后附有“甲骨学大事记”、“甲骨学著录目及其简称”，共123万多字。此书对甲骨学的百年研究综述不仅内容丰富全面，反映了殷墟甲骨学百年来的研究历程，而且在脚注中有书刊论文、论著索引，便于学者查索。

另外，宋镇豪、常耀华编纂的《百年甲骨学论著目》，是与《甲骨学一百年》配套的论文论著目录索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是100年来甲骨学研究著录论文、论著的目录索引，便于学者查找所需论文、论著。

宋镇豪、段志洪主编《甲骨文献集成》（共40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是一套大型甲骨文献资料文库，反映了甲骨文发现一百年来甲骨学者大部分重要的研究成果和重要的著录、相关资料。有关甲骨学方面的论著、论文甚多，但这些研究成果或为专著，或散见于海内外各种报纸、杂志中，甚至是手抄本、油印本，查找很不容易，特别是流传不广的论著、论文。而《甲骨文献集成》将百年来甲骨文的研究以及甲骨学、甲骨学史及其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择其要而汇为一编，为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



第四章 西周春秋时代

清章学诚曾说过“六经皆史”，这对于先秦文献来说，尤为如此。先秦时期文献本来不多，因此除为数不多的史书，如《春秋》及其三传，《战国策》、《世本》、《竹书纪年》外，其余如文学总集《诗经》、《楚辞》，古称子类今称哲学门类专著的诸子，如《论语》、《孟子》、《荀子》、《墨子》、《韩非子》、《孙子兵法》、《老子》、《庄子》等，皆可视作历史学的史料；此外相当今政治社会学范畴的《仪礼》、《尚书》、《礼记》、《孝经》；相当于今词典性质的《尔雅》，这些也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史料。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我们今天研究西周春秋历史所依据的文献资料，主要是十三经。这是汉代以来儒家的经典，属于四部分类中的经学，但实际上却包含了经、史、子、集的内容。两千多年来儒家翻来覆去研究这些经学资料，特别是宋以来，以“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形成的研究资料十分丰富，这是需要我们去继承的。先秦时期的经书，从汉以后形成了经学并产生了经学的各种派别，两千多年来已深入地影响到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因此不了解经书、经学和儒家的各种派别，便很难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及其重要内容。我们今天要了解汉以后的中国文化和历史，也很有必要了解先秦时期的经书。

一 西周春秋古文献书籍

1. 《尚书》

现通行的版本主要有《十三经注疏》本，阮元校勘，有中华书局和《四部丛刊》本。汉代文帝时，兴教立学，招聘儒士，征召能治《尚书》之人，但当时天下稀有。听说秦博士伏生能治《尚书》，但早已九十余，太老不可征用，便派掌故晁错前往受学《尚书》。《汉书·伏生传》载，伏生，济南人。本为秦博士，因秦焚书禁学，便将《尚书》藏于墙壁中。汉天下平定之后，便取出《尚书》，当时已失佚数十篇，在齐鲁之间教学，因为是

用汉代隶书写成，故称《今文尚书》。伏生后今文学有欧阳学与大小夏侯之学三家。

今文《尚书》有 28 篇。《尧典》（今本分出《舜典》）、《皋陶谟》（今本分出《益稷》）、《禹贡》、《甘誓》、《汤誓》、《盘庚》（今文合为一篇，古文分为上、中、下）、《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今本分出《康王之诰》）、《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此为 28 篇，但《史记·儒林列传》却说：“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世传为 28 篇，《史记》为什么说是 29 篇呢？清人朱彝尊认为今文《尚书》28 篇，加上《书序》为 29 篇。（《经义考》卷七十三、七十四）；近人陈梦家《尚书通论》（中华书局 1963 年版）认为：“司马迁时，《顾命》与《康王之诰》分类二篇，东汉时三家（即欧阳、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合为一，其故因后得《泰誓》加入，所以有归并的必要，以保持二十九篇之数。”这两种说法难以令人相信。唐孔颖达说“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总之，并云伏生所出”（《尚书》伪孔序正义）。此说大概是对的。因《史记》中就引用了《泰誓》的文字，见《周本纪》中。二十九篇包括《泰誓》，二十八篇不包括《泰誓》。但《泰誓》后佚，是因马融等人怀疑《泰誓》语言浅近，又有“举火”等文，大加怀疑，重现后便又失传了。其实此文反映了武王伐纣时“火至于王屋”，是“鹑火中”的天象，与《国语·周语下》所记“岁在鹑火”相合，是可信的。^①清人王引之父子也曾力主《太誓》（即《泰誓》）是原来二十九篇今文《尚书》之一。^②此汉本《泰誓》失传后，今本古文《尚书》中的《泰誓》无“举火”等内容，才是假的。

汉代古文《尚书》是什么时代的《尚书》呢？其文主要来自孔子壁中的《尚书》，因用古文写成，故称古文《尚书》。《汉书·儒林传》：“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汉书·艺文志》序亦云：“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

^① 王晖：《论〈书·大誓〉的天象资料及其重要意义》，《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1993 年西安“周秦文化国际学术交流会”上论文。

^② 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四《尚书下·伏生〈尚书〉二十九篇说》，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6—115 页。

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除了孔壁本古文《尚书》外，还有杜林漆书本古文《尚书》，见《后汉书·杜林传》。另外，《汉书·景十三王传》中记述河间献王刘德亦征集有《尚书》，“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可知河间献王所得也是古文《尚书》。《论衡·正说》篇也说汉宣帝时从河内女子老屋也得到《尚书》一篇，亦为古文《尚书》。

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賾所献，亦即其人伪造。共 58 篇，以合郑玄所说古文《尚书》有 58 篇的数字。其中将原今文 28 篇分为 33 篇：将《尧典》后半部分出《舜典》；《皋陶谟》后半部分出《益稷》；将原只有一篇的《盘庚》分为上中下三篇；将《顾命》后半部分为《康王之诰》，一共多出五篇。另外又编造了 25 篇，篇名或采孔子百篇《书序》之名，或采先秦古书中之名，并加上一些《尚书》逸文，造成了 25 篇。这 25 篇是：《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中、下）、《咸有一德》、《说命》（上、中、下）、《泰誓》（上、中、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伪二十五篇虽为后世杜撰，称伪《尚书》，但这也有参考资料的作用。这是因为它记集了先秦一些子书、史籍、儒家著作中所引的逸《尚书》原文，在“辑佚”方面是有些成绩的。但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书是不能使用的。可惜今天出版的许多《尚书》注本特别是《十三经注疏》本并未标明《尚书》中哪些是伪古文的篇目，导致许多青年学子因为难以分辨而误用，许多史学学科之外的学者也常常误用。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

首先怀疑古文《尚书》的是宋代学者朱熹、吴棫，理由是今文《尚书》皆佶倨聱牙，而“古文”《尚书》却文字浅顺。朱熹还怀疑到孔安国的“传”与“序”，认为文字不似西汉人所作，而似魏晋人所伪造。其后考证古文《尚书》之伪的著名学者有：明代梅鹜《尚书考异》6 卷，清代学者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8 卷（见《皇清经解》），以 128 条证据为伪古文《尚书》定了案。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32 卷、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39 卷（见《皇清经解》）、惠栋《古文尚书考》2 卷（见《皇清经解》）等，又进一步论述了古文尚书伪作问题。崔述后又作《古文尚书辨伪》，关于伪古文《尚书》造伪作假的情况更为清晰。关于古文尚书伪作的作者，

多数学者认为是东晋梅赜。但也有学者认为是皇甫谧所作，见王鸣盛《尚书后案》16卷（见《皇清经解》）；还有的学者认为是王肃伪造，见丁晏《尚书余论》1卷（见《皇清经解续》）。

下面谈谈《尚书·周书》的史料内容及其价值。

《牧誓》记周武王伐商时的誓辞，是春秋时人根据传闻追记而成，从用词看，不可能写于西周，如：有语气词“矣”、“焉”：“逖矣，西土之人”；连词用“及”：“王曰：嗟，我友邦豕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用“是”表示提宾作用，“是”作宾语，却直接放在动词之前：“惟妇言是用”、“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的句式特点，显然是春秋时的句法特点。但从上引句式特点看，也不是战国以来的。虽为春秋时所作，但史料价值极高。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利簋铭文，云“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闻夙有商”，与《牧誓》所记完全吻合。

周初八诰：《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召诰》、《洛诰》是姊妹篇）、《多士》、《多方》，是其时的实录，是研究周初政治特别是周初统治集团统治思想、政策方针的可靠资料。

《大诰》是成王、周公对诸侯及大臣宣布征讨武庚（纣王之子）及管叔蔡叔的诰命，字里行间透露了其时的形势十分危急，殷人力量在牧野大战中并未受到大挫，因周人内部不和乘机“复辟”，且有管蔡助纣为虐。这是研究其时政治形势的宝贵史料。

《康诰》载周公（或说是武王）对康叔的诰词，对殷民的统治政策作了交代：要“明德慎罚”、“敬德保民”。康叔当时任司寇，周公告诫他用刑的标准及宽严问题。这是研究周初法律制度的重要史料。

《酒诰》、《梓材》也是周公对康叔的诰命，主要是戒酒问题，明确表示在这一问题上对殷民与周人的处理方式不同。周人认为殷人亡国主要是酗酒，故对酗酒深恶痛绝，对周人酗酒者大开杀戒。《梓材》是推行“德政”的问题。上三篇从内容看，均与康叔曾任司寇之职有关，是周公（或武王）告诉康叔有关法令及执法操作宽严的尺度问题。

《召诰》、《洛诰》是成王、周公、召公之间的问答之词。表明洛邑营建的原因（先王遗志）、经过及其有关的目的意义，反映了周初营建洛邑的重大史实。新出土的何尊铭文也可证实《召诰》营建洛邑的目的、意义及时间问题。^①

^①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3—74页。

《多士》，是周公以成王命向殷民发布的诰命。《书序》：“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这是反映周初以周公为首姬周统治集团的统治思想、统治方法的重要史料。这篇诰命中周公以商灭夏受天命的历史事实证明周灭商而受天命的合理性，在诰命中周公恩威并用，表现了他作为政治家的风度与气概。

《多方》是周公以成王命对殷民及东方诸方国发布的诰命。周公指出殷亡是咎由自取，并表明周人恩威兼施的政策。这是研究周初周人与被征服的殷人及诸方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史料。

《君奭》，是周公对召公的告诫之词。《书序》：“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悦，周公作《君奭》。”这是研究周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重要而可靠的史料。但从今本《君奭》中看不出“召公不悦”的文字，而新近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中有《君奭》的异文却反映了二人的矛盾与冲突：^①

今本《君奭》作：“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时二人……”

简本《成之闻之》作：“《君奭》曰‘襄我二人，毋又（有）合才音’害（曷）？道不说之司（词）也。”

一字之差，断句不同，意思更是相反。此所引《君奭》之文与今本《君奭》在文字上多有不同，其断句也与今多数学者不同。今以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原世界书局阮刻本《十三经注疏》来看，其《君奭》篇此处的文字与断句是：“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这与《成之闻之》所引断句有一处不合，文字则有三处不合。最大的不同是今本“汝”字在郭店楚简的引文中作“毋”，其意思则完全相反，然而简本显然是对的。因为只有简本“毋又（有）合才音”，才符合下文所解释的“道不说（悦）之司（词）也”。按简本的断句“才”只能读为“在”，“音”字应依裘锡圭先生之说是“言”的误字，其句可读为“毋有合在言”——是说周召二公在言语观点方面没有相合的，反映二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是尖锐而激烈的。这里所说不悦之词，也正是《诗序》所说的“召公不说”及《燕召公世家》所说的“君奭不说周公”。依此看来，召公不悦周公，也绝不是像汉儒马融、

^①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图版见51页30片，释文见168页。

郑玄、王肃所说的，是因周公不居君位而居臣列而不悦；而正如司马迁所说，是“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引人怀疑而不悦。依此可见《君奭》的主旨需要重新理解认识。

《无逸》记载了周公训导成王的言论。周公希望成王及后来嗣王要了解耕作稼穡的艰难与小民的痛苦，不要贪求逸乐。有的学者认为《无逸》文体平顺，语言较浅，不似西周文字，“一般人都疑为晚出，可能是后人的追记”^①。从语言上看，用“则”、“厥”、“之”：“生则逸”、“此厥不听”、“厥或告之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于酗酒德哉”等句，“厥”作语气词，“之”用于主谓之间，均为春秋时的作品才出现。但此篇又不可能晚于春秋：①“在”：“昔在殷王中宗”、“其在高宗”、“其在祖甲”，这里的“在”表示初、始之义，战国以来很少见。②“肆”：“肆高宗之享国”等句子中“肆”的用法是西周春秋时的句法现象。③“于”连用：“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这些语法现象均为西周春秋时期的用法，此篇可能有其传说，至春秋时始写成。其篇不仅有思想史上的意义，反映了周公主张“无逸”并要求嗣王了解农业艰辛的思想；同时提供了关于殷周先公先王的历史及其年代学方面的数据。但其数据明显有错者，殷祖甲之后的殷王在位之年明显不对：“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实际上，依《古本竹书纪年》及出土商代甲骨文与金文所见殷后期几位殷王来看，帝乙、帝辛皆超过20年，文丁超过十年，武乙超过30年。《无逸》所提供的数据明显不对，古今很少人批评，盖是迷信今本《尚书》而不敢提出批评的缘故。

《立政》讲周初设置官员和选拔的方法与标准，也是周公对成王的告诫、建议，是研究商周官制（甚至夏代官制）及其经验教训、选拔标准的重要史料，是周初所作。

《吕刑》，《史记》作《甫刑》，记载了周穆王对吕侯的诰词，是研究西周时期刑法制度、标准及其法制观念的可信史料。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依《吕刑》之文，说明刑法产生于蚩尤之时，但刑罚苛毒，神人共怒，以至于灭亡。因此，《吕刑》也是研究刑法起源的重要资料，其文叙述了“五刑”首先为三苗所用。据李学勤先生研究，《逸周书·尝麦》篇也是周穆王时期的有关法律刑法的记载，二者可以合看（见下面《逸周书》介绍）。

《顾命》（古文包括《康王之诰》）记述成王临死时的遗嘱、其时丧葬之礼与康王即位后的诰命。其文应为实录，是研究西周初期丧葬制度、官职

^① 赵淡元：《〈尚书〉概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2集，岳麓书社1982年版。

及爵位等级制度的重要史料。

《金縢》，《书序》谓“周公作”，有的学者以为其中屡言“周公”、“公”，显然不是本人所作，是“由后人追记而成”^①。但是其篇具体在什么时代，许多学者并未详言。我们以为其作应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从“既克商二年”到“王亦未敢诮公”，成文时代盖在春秋时期；后一部分是“秋大熟，未获”到篇末“岁则大熟”，其成文时代应是在战国时代。从语言文字上可见，前一部分应不晚于春秋，例如，主谓词组之间加“之”，是春秋时期才出现的现象，西周时期并未见这种句法。但这种现象已见于《金縢》中：“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圭，归俟尔命”，“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其篇中还有“未可以威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这类句子，“可以”、“以为”也是春秋时代才出现的一种句法。但前半篇不会晚于春秋晚期，其篇中有“敷佑四方”、“兹攸俟”、“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惟永终是图”等句子，从使用“敷佑”、用“攸”作所字词组的助词、用“用”作条件复句中的连词以及用“是”作提宾的助词来看，时代不会晚于春秋晚期。另外因战国以后祭近祖为四位，而《金縢》是三位，与西周春秋同。其文是研究神权崇拜特别是祖先崇拜（祖先神赐福降祟）的重要史料，其中反映了周初周公出奔及其与周王室矛盾的史料，也大致是可信的。^②但后半篇的时代不会早于战国早期。过去虽有学者认为《金縢》近似神话，应在“子所不语之中”。当然，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不足以作为判断时代的证据。我们认为从语言文字特别是句法所用虚词来看，其时代不会早于战国之前。其篇有：“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禾则尽起”、“岁则大熟”，用“所”作所字词组的连词，用“则”作与前对举的连词，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句法现象。可见《金縢》后半篇的时代不会早于战国之前。

《洪范》据《书序》说是箕子回答周武王时所言关于治天下之大法的文章。其文与后来的阴阳五行说有联系，也有区别。它可能反映了殷人统治者的统治经验与实践，特别是重视神权统治方面与周人的情况不同。其中也包含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是一篇政治、哲学思想方面的论文。其成文年代，过去认为作于周初，近人郭沫若认为作于战国，刘节认为作于战国末年（刘节《洪范疏证》），杜勇认为作于春秋，王国维认为作于当时（即周初，

① 赵淡元：《〈尚书〉概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2集。

② 王晖：《周原甲文汝公用聘与鲁国初封地新证》，《大陆杂志》第103卷第1期，2001年。

见《古史新证》第一章)，刘起钊认为作于西周。我们认为从语言文字及其神权崇拜的特点看，应是西周时期的作品。其文是研究商周时政治哲学思想方面的重要史料。

《费誓》是春秋时鲁僖公准备讨伐淮夷并誓师于费的誓词。“费”一本又作“肸”，在今山东费县。《书序》与《史记·鲁周公世家》说是伯禽伐淮夷的誓词。但依今金文禽鼎铭文看，伯禽确实参加了伐东夷的叛乱。但其时伯禽的封地并不在今曲阜一带，与《费誓》所述时间、地点不合。近人杨筠如《尚书覈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8—439页）认为此篇为鲁僖公所作，应是对的。

《文侯之命》记载了周平王锡命晋文侯仇的典礼。（有的学者认为是周襄王赐命晋文公重耳的典礼）可以与西周金文赐命文字互相印证。

《秦誓》，传统认为“是秦穆公因不听忠臣劝谏、伐郑失败而自责悔过的誓词”。据《左传》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记载，秦穆公命三帅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伐郑，蹇叔谏，不听。秦师至崤山为晋襄公派兵伏击，损失惨重。“通过这件事，秦穆公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认识到‘询兹黄发，则国所愆’；‘惟截截善谗言（巧言），俾君子易辞’。意谓遇事多多请教老人，就可不犯错误；爱听小人的花言巧语，喜欢、亲近小人，就会使君主轻忽怠惰。……本篇是秦穆公所作，态度真诚，读后，很感动人，有史料价值。”^①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实际上《秦誓》并非罪己诏，而是尊贤使能的宣言书。其作成时代并非像《书序》所说：“秦穆公伐郑，晋襄公帅师败诸崤，还归，作《秦誓》。”而是在《左传》文公元年：“殽之役，晋人既归秦师，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败也，孟明之罪也，必杀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夫子何罪？’使复为政。”盖在此时作成《秦誓》。《史记·秦本纪》谓秦穆公在殽之战后三年将兵伐晋后作《秦誓》，但我认为可能在出兵之前所作，目的是要众将士服从孟明视的指挥。《秦誓》：“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反映任用人才时内部矛盾的尖锐复杂，过去简单地说是秦穆公的“罪己诏”是不对的，而实际上《秦誓》应是秦穆公人才政策的宣言书。^②

关于《尚书》的注本，今《十三经注疏》（一般通用世界书局影印清阮

① 赵淡元：《〈尚书〉略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2集。

② 王晖：《从〈秦誓〉所见秦穆公人才思想看秦国兴盛之因——兼论〈书·秦誓〉的成文年代及主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元刻校本)为伪《孔传古文尚书》。唐代孔颖达作的正义。应注意这当中有伪《古文尚书》，可参阅宋人蔡沈著的《书经集传》(或称《书集传》，此书近年来印刷出版的单行本较多，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以来出版的“四书五经”单行本)中凡称“今文古文皆有”者则为可靠的今文《尚书》，凡言“今文无，古文有”者则为伪《古文尚书》。

出土简帛文献对研究《尚书》的成书与流传很有帮助。近来出土发现的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篇中，就有引用《尹诰》一条、《君牙》一条、《吕刑》三条、《君陈》二条、《祭公之顾命》一条、《康诰》一条、《君奭》一条，共十条。其中《尹诰》即《书序》的《咸有一德》，属于所谓的《古文尚书》，而《祭公之顾命》则相当于《逸周书·祭公》。此外，在郭店楚简的《成之闻之》中也有引用《尚书》的情况，其中有《大禹》一条、《君奭》三条、《诏命》一条、《康诰》一条，共六条。其中《诏命》一条为逸书。这使我们看到了古本《尚书》的原貌，是很有意义的。

清人注疏整理的《尚书》，以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为佳，另外有皮锡瑞的《今文尚书疏证》，引证今文《尚书》的资料甚为丰富，值得参看。近代曾运乾《尚书正读》(中华书局1964年版)、于省吾《双剑谿尚书新证》(见《双剑谿群经新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杨筠如《尚书覈诂》(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2005年版)，都是注释或解读较佳的本子，是研读《尚书》时可供参考的重要资料。特别是杨筠如《尚书覈诂》，其师王国维为之作序谓其书：“博采诸家，文约义近，亦时出己见，不愧作者。其于近三百年之说，亦如汉魏诸家之有孔传，宋人之有蔡传，其优于蔡传，亦犹蔡传之优于孔传，皆时为之也。”^①可见王国维对其弟子所作《尚书覈诂》评价甚高。近来臧克和著的《尚书文字校诂》，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利用出土甲骨文、金文等资料可以与《尚书》文字比勘的语例，利用敦煌《尚书》古写本、历代石刻本等文字资料，利用源于唐写本的日本写本资料，并参考各注家的意见，而进行综合性的校正训释，是目前能见到的一个比较好的校正训释著作。周秉钧《尚书易解》作于1946年，岳麓书社1984年出版，亦可参阅。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出版，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这两部书在注释之外还有翻译，有利于初学者使用。

近现代《尚书》研究的代表作有陈梦家《尚书通论》，商务印书馆1957

^① 杨筠如著，黄怀信标校：《尚书覈诂·尚书覈诂王序》，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年版，增订本中华书局 1985 年出版，补充了有关的学术论文七篇。其中对先秦经书诸子引《书》的资料进行了搜集，追溯了汉代《尚书》的流传情况，对各家《尚书》的篇目及其流传进行考证，考察了《书序》的内容及其成文年代，考察了宋元以来学者对《古文尚书》的怀疑情况以及作者等内容，是“尚书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蒋善国的《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出版，此书对《尚书》的名称、篇数、整理、发现、传授、真伪、成文年代以及存亡情况进行了综合性的考证，研究《尚书》时值得参阅。刘起紘《尚书学史》，中华书局 1989 年版，订补本 1996 年版，根据时代对《尚书》的形成，在先秦时的流传、汉代《今文尚书》的传授，《古文尚书》的出现和传授以及魏晋以来《古文尚书》地位的上升、发展、疑伪、考辨定伪等情况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是“尚书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2. 《诗经》

古籍文献中多单称《诗》或《诗三百》，此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故汉代学者尊称为《诗经》。《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本为文学作品，然章学诚《文史通义》说“六经皆史”，依西周春秋时文献资料较少的情况看，此说不仅对而且十分恰当。《诗经》不仅是史料，而且是先秦时期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史料书籍之一。

《诗经》是经过周王室乐官在西周早期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期间采集，后又经孔子编选删订而成的。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共有 305 篇。风诗有 160 篇，为各个诸侯或地方的民歌，依封国或地方之名分为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邠风、曹风、豳风共 15 国风。雅诗分大雅、小雅，共有 105 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有 40 篇，是周王室、鲁国及宋国宗庙祭祀先祖的乐章。

《诗经》的史料价值有以下几个方面。①《风》，是反映西周春秋时期下层贵族和平民阶层社会生活、思想愿望、追求幸福、自由恋爱的诗篇，描述了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以及内心的愤慨不平，也反映了战争给平民带来的灾难与痛苦，是研究西周春秋社会生活史的重要史料。《风》共有 160 篇，尤其是《豳风·七月》历述劳动人民一年四季各月的生产、生活及思想感情各方面的内容，详细、生动而具体；《魏风·硕鼠》、《伐檀》反映下层劳动者对上层贵族阶层的不满。②《雅》是宫廷王室及京畿一代的歌声。“雅”《诗大序》释作“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郭店楚墓竹简》^①引“大雅”、“小雅”均作“夏”。其诗应是当时周王朝中心区域的诗

① 见《郭店楚墓竹简·缁衣》。

歌。《小雅》主要反映士大夫的生活及其思想感情。《大雅》反映朝廷与贵族上层卿大夫的生活与思想。其中有不少是反映周人先祖重大历史的史诗，如《大雅》中《生民》、《公刘》、《绵》、《文王》、《大明》分别反映周先妣先祖姜嫄、弃（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季历、文王、武王、姜尚等先公先王祖妣及重要大臣的事迹，其史料价值尤为重要。《小雅》中《十月之交》反映周幽王时日月食及地震的情况，是科学技术史的重要史料；同时也反映当时社会动荡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是研究西周末年历史的可贵资料。另外《六月》、《采薇》是反映周王室征伐玃狁、荆楚的战争的诗篇。③《颂》是宗庙祭祀所用诗篇。有《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其中《鲁颂·閟宫》反映了周人先妣姜嫄踩巨人迹孕育后稷弃的传说、成王分封周公元于伯禽于鲁，以及春秋时鲁国扩大疆域的历史，《商颂·玄鸟》、《长发》、《殷武》是反映商人起源神话与成汤建国、武丁中兴时的史诗，史料价值甚高。《汉书·艺文志》曾指出《诗经》的来源说：“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也说明了《诗经》最初收集是有其政治背景和特殊的政治功能的。另外，《诗经》的乐章在西周春秋时期对统治阶级来说不仅具有教育作用、体察民情的作用，而且还有日常生活中社交以及政治外交方面的重要作用。《论语·季氏》中孔子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就是指《诗》这种在社交以至于政治外交方面的重要作用。这种政治上的礼仪外交作用在《左传》、《国语》等书中常常可以看到。《诗经》中各篇乐章的各种礼仪外交作用可以参看王国维《观堂集林》第1册《释乐次——附天子诸侯大夫士用乐表》。

孔子是《诗经》删订者。《史记·孔子世家》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孔子删订了《诗经》，是其功还是其过？今天看来此做法不可取，因为丧失了许多古诗篇。《诗经》遭秦代焚书惨祸后独能在汉完整保留的原因，《汉书·艺文志》曾经指出过：“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此说是对的，《诗经》是因读书人人人会诵读而十分有幸地在汉初被保存了下来。

1977年8月，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了170余枚《诗经》竹简，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墓主是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阜阳汉简《诗经》是两千多年前汉初古本《诗经》，是目前所见的最早的《诗经》抄本，是十分珍贵的《诗经》研究资料。计有残诗65首，与今本《诗经》对勘，有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曹风、豳风等残片，只是未见郇风。

与今本《毛诗》多有不同，与三家今文诗也有区别。可参见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值得指出的是，200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马承源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孔子诗论》（是1994年发现的）。《孔子诗论》内容有四个方面：一是概述《讼（颂）》、《大夏（雅）》、《少（小）夏（雅）》、《邦（国）风》，这一类属于序言性质；二是议论《诗经》各篇的具体内容，通常是把数篇诗编为固定的一组进行评论，有一论二论甚至多次评论；三是单支简上的篇名是专门讨论《邦（国）风》的；四是单支简文有关《邦风》、《大夏（雅）》、《少（小）夏（雅）》的。共有31简，980多字，有60多篇诗。《孔子诗论》基本上都是孔子弟子就孔子传授《诗经》内容的追记，向我们提供了孔子向弟子讲授《诗经》的主旨、微言大义以及教育意义等内容，填补了孔子讲授“六经”内容的重大空白，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孔子诗论》的作者应是孔子的弟子，而且很可能是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之一子夏。

《诗经》有十三经注疏本，为毛亨传、东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今收入中华书局影印原世界书局阮元校刻本，附有校勘记，见上册。南宋朱熹作有《诗经集传》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单行本），清人马瑞辰有《毛诗传笺通释》32卷、陈奂《诗毛氏传疏》30卷等（见《皇清经解续》），姚际恒有《诗经通论》（顾颉刚标点，中华书局1957年版），可供参考。索引查找《诗》句可查《毛诗引得》（哈佛燕京引得），较方便。另外《韩诗外传》10卷，为西汉韩婴（三家诗鲁、齐、韩之一）撰，记载有关诗的传说，是研究《诗经》的参考资料。近人许维遹著有《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是目前最好的校释本，可参看。

近现代《诗经》研究成果也甚为丰富。有于省吾的《双剑谿诗经新证》（见《双剑谿群经新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陈子展的《诗经直解》、闻一多的《诗经新义》（《闻一多全集·古典新义》，1948年开明书店版，1994年湖北人民出版社版；还可见2002年巴蜀书社出版的《闻一多学术文钞》）等，也都是比较好的注本，值得参看。孙作云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版）是通过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考察《诗经》成书时代的社会性质、社会生活与社会特点，并通过《诗经》的资料考察了考古学、史学以及民俗学等方面的有关问题。通过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来考察论证《诗经》中提供的文化现象有刘毓庆的《雅颂新考》，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年出版；还有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周族开辟神话考》，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通过大量考古发掘的文物资料来研究

《诗经》中名物的文化内涵的有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另外，近来洪湛侯著的《诗经学史》上下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把学术史与史料学结合起来，根据两千多年来《诗》学研究的历史，分门别派，推寻特点，并加以评介，值得参考。

3. 《周易》

《周易》简称为《易》，或称为《易经》。有经上下两篇，“十翼”10篇。传说伏羲创造八卦，周文王重卦而为六十四卦。前说不大可信，而后说是有可能的。《周易》本为占卜方面的书籍，后来经过后儒的附会成为阐述阴阳家哲学思想的经典，并赋予神秘主义的色彩。《周易》卦、爻辞应是商末周初所作，其中透露出不少有价值的商周史料，如王亥之事、“帝乙归妹”之事等，但因言辞简略需要借助其他书籍才能明白其义。其成文时代应即殷周之际文王时代，初为占卜卦者经验记录的积累。《系辞下》：“《易》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马王堆帛书《易传·要》更明确地说是文王所作：“纣乃无道，文王作诤（纬）而系辞。”其价值在于反映殷末周初周人希望革命的辩证思想。其哲学思想，即易学家所谓“易”一名而三义：简易、变易与不易，但其书主要反映了“变易”的思想主张。

近些年来学术界在《周易》卦爻及筮法方面的研究有十分突出的成果。殷墟卜辞、商周金文特别是周原甲骨文中有三个一组或六个一组的数字卦（最初一些学者认作一种失传的古文字），经张政烺、李学勤、张亚初等学者研究，这是一种由数卦组成的原始筮法。可参看张政烺《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古文字研究》第1辑）、《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帛书六十四卦跋》（载《文物》1984年第3期），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81年第2期），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邢文《帛书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其中“传”的部分有《彖传》上下2篇，此为卦辞的说解；《象传》上下2篇，是卦辞与爻辞的说解，这两者是随卦辞而排列；另外《系辞》上下2篇，是阐述阴阳哲学思想的内容；《文言》一篇，是乾坤两卦的解说；《序卦》一篇，是对六十四卦序列组合顺序原因的说解；《说卦》一篇，是将八卦应用于世界上万事万物的说解；《杂卦》一篇，是将六十四卦分为每每两组组合在一起的说解。后面这6篇与前“彖”、“象”4篇，共10篇，被称作“十翼”，属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

《周易》注本，《十三经注疏》所收《周易正义》是现今通行本，其本形成在魏王弼注《系辞上》之后，晋韩康伯注《系辞上》之前，唐孔颖达作疏。今人高亨作《周易古经今注》（修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版，此书是在作者1940年所作（开明书店1949年版）基础上修订的，为较好的注本。李镜池《周易通义》，为曹础基整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李镜池还著《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年版）；于省吾《双剑谿易经新证》（见《双剑谿群经新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廖明春《帛书〈易传〉初探》（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版），可供学者参考。

古代有关《周易》的出土文字资料有：《论衡·正说篇》记述河内女子老屋发现的《易经》二篇；《晋书·束皙传》记述汲冢发现《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相同；《晋书·束皙传》记述汲冢发现《易繇阴阳繇卦》二篇，经文与《周易》略同，而《繇辞》与之不同。《晋书·束皙传》还记述汲冢发现《卦下易经》一篇，与传世本《说卦》相似但有别。

1994年5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市场购得的战国楚竹书中有战国时代《周易》，此书是迄今为止所见最古的《周易》本。出土时间和地点不明，据推测出土地应在今湖北省江陵一带。共计58简，简长44厘米，每简书写约有44字，字数共计1806字，涉及到34卦的内容。战国简本《周易》与今本《周易》有一些不同之处：每卦书写的格式是：（1）卦画，（2）卦名，（3）首简符号，（4）卦辞，（5）尾简符号。特别是文字与今本多有不同。学者们认为，战国简本《周易》的出现对解决易学研究中所谓“九六”之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证明了“九六”之称的确在先秦已经存在。战国楚简本《周易》的出土，为我们研究先秦易学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物资料，在中国易学史上的意义非常重大。特别是楚简本《周易》中出现了一组失佚了二千多年的易学符号，这些符号在马王堆帛书本《周易》中已经不存在，因而这是易学史上一件大事。可参看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周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1973年至1974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较今本完整。马王堆帛书《周易》抄写在一幅宽约48厘米、长约85厘米的丝帛上，共计93行，4900多字。马王堆帛书《周易》有经传两部分，经文除个别字残损外，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爻辞完整无缺。帛书《周易》许多地方与今本不同，六十四卦次序不同，另外文字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传世本分上经、下经，上经三十卦，以乾为始，以离为终；下经三十四卦，以咸为始，以未济为终。帛书不分上下经，以乾为始，以益为终。排列顺序严正有序，其排列方式与汉石经及传世本完全不同。另外，马王堆帛书《周易》在卦

序卦位上也与传世本有很大不同：一是帛书本《周易》的经传互相结合、密不可分。二是帛书《周易》的卦序已经包含了八卦取象的原理和观念。三是帛书《周易》的卦序充分贯穿了阴阳对立交错的观念。^①这是研究《周易》的重要新资料，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帛书本《周易》比较原始，但也有学者认为是别一种系统的传本。可参见马王堆三号汉墓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载《文物》1984年第3期；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叁），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4. 《左传》

《左传》本名《春秋左氏传》，后简称《左传》。原署左丘明著。《左传》依《春秋》体例为编年体，所记春秋历史比《春秋》多13年，《春秋》截止鲁哀公十四年，而《左传》则截止哀公二十七年。下面谈谈《左传》的成书年代、作者及其史料来源问题。

《左传》的成书年代。旧说均以为《左传》是差不多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作，其时代自然也就在春秋晚期，但今人大多不信此说。近现代研究《左传》的成书年代影响比较大的有两家：一是徐中舒，他据《左传》讲霸道，《孟子》讲王道，认为《左传》成书在《孟子》之前；并据“毕万之后必大”、“郑先卫亡”等应验和未应验的卜筮之语，推定《左传》成书在公元前375—前351年。^②二是杨伯峻，他认为《左传》成书在公元前403年之后，前389年之前。^③大致说来，《左传》成书年代在战国前期后段或中期前半段时期。

有关《左传》的作者或编纂者的几种说法。^①《左传》的作者相传是春秋末年与孔子差不多同时的左丘明。孔子在《论语·公冶长》中提到过左丘明，《史记·太史公自序》与《汉书·司马迁传》所载《报任安书》中谓左丘明写成《左氏春秋》，且在失明后写成《国语》。今天看来，这两部书成书年代不会在春秋末年，所以也不会是左丘明所作，但左丘明作为瞽史而传诵过春秋时期的许多史料倒是有可能的。^②清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认为《左传》为西汉末年刘歆所伪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也有此说。其根据是《汉书·刘歆传》说过“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由是章句义理备焉”等语。此说后又为疑古学者推崇，其实是不对的。钱穆《刘

^① 李学勤：《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见《简帛佚籍与学术史》，台北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版。

^② 徐中舒：《〈左传选〉后序——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见徐中舒编注《左传选》，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③ 杨伯峻：《春秋左传选·前言》（修订本）第1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

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7期)曾作过驳斥。③章太炎《春秋左传读》与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二认为《左传》是战国早期吴起所作,主要证据是《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吴起,卫左氏中人也。”但此说不为大多数学者信服。④徐中舒认为《左传》是子夏晚年居魏西河上失明后的述作,故称“左丘明”。(《左传选·后序》)证据亦不大可靠。⑤杨伯峻认为《左传》的作者可能受孔丘的影响,是儒家的别派。(《春秋左传注·前言》)原因是孔丘不讲“怪、力、乱、神”,而《左传》作者并未排斥“怪、力、乱、神”。我们认为《左传》一书的作者应该是战国前期后半段或中期前半段的一位儒者,至于《左传》一书与儒家或孔子的思想不合,可能不是作者的问题,而是作者所据史料的缘故。

关于先秦文献辨伪的讨论中,《左传》曾大受怀疑。然今日看,《左传》成文时代在战国早期与中期之间,史料价值是很高的,是掺和左右史记事与记言材料而写成的,许多应为原始记录。《左传》记载大国争霸的史料特别是战役的起因、双方战前准备情况及其谋略、用人的情况甚详:如鲁僖公四年的齐楚召陵之战、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三十三年秦晋殽之大战、宣公十二年的楚晋之间郟之大战、成公十六年齐晋鄆陵之战、成公二年齐晋之间的鞌之战等,反映了春秋时期大国争霸的宝贵资料。

另外,《左传》还记述了不少春秋之前的史料,涉及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少皞、尧、舜及夏商西周时代的不少传说史料。鲁襄公四年魏绛论和戎的好处时,叙述了夏代初年仲康失国、少康复国与后羿寒浞篡位的历史传说;昭公十七年郯子论少皞氏以鸟名官,叙述了上古东夷部族组织及图腾崇拜的材料;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论龙,叙述了古代豢龙氏及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官的重要传说材料;昭公十五年载晋籍谈数典忘祖并记载周初封建诸侯赐礼器的情况;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叙述了西周诸王兴衰及与诸侯的关系等等。可见《左传》不仅对春秋史,而且对其前西周、夏商及至传说时代的历史都提供了不少资料。此可参看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

关于《左传》的史料来源及其价值,从《左传》一书所见的古书看,有《周志》、《周制》、《周秩官》、《周书》、《郑书》、《商书》、《夏书》、《夏训》、《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古书,其中许多应是《左传》作者见到并加以征引的书籍。《左传》一书十分明显曾取材于《国语》。《国语》原始资料可能是各国的史官所记,许多诸侯之《语》应早于《左传》,特别是《周语》、《鲁语》、《晋语》、《郑语》等等,因此《左传》一书作者在编写时便引用不少《国语》的内容。有几个明显的例子可资证明。

一是《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曹刿谏鲁庄公入齐观社，认为是非礼之举。《国语·鲁语上》亦有此段，但《左传》简而《鲁语上》详。《左传》明显是概括了《鲁语上》的这段话使之更为简练，却把《鲁语上》中最重要的几句话简略掉了，使人读后不知“非礼”何在？而这种“非礼”的原因在原《鲁语上》中表示得十分明白：“今齐社而往观旅，非先王之训也。天子祀上帝，诸侯会之，受命焉。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臣不闻诸侯相会祀也。祀又不法，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可见《左传》庄公二十三年曹刿谏鲁庄公观社是来源于《鲁语上》。二是《左传》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关于晋文公出游十九年周游列国及归国登君位之事，取之于《国语·晋语四》且有省略，故语言更为简练。三是《左传》中记晋国时周历与夏历并用，如《左传》僖公五年，应是取之于《晋语》的缘故。四是《左传》中不收《吴语》、《越语》的有关资料，证明这二者后出，或者在战国早期至中期前段时这二“语”还未流传到中原一带。另外吴国越国有许多重要人物未收入《左传》，如范蠡、文种、勾践等人。特别是孙武，以至有人怀疑吴孙子的存在，认为《孙子兵法》是战国时孙臆所作而不是传说中的孙武所作，然山东银雀山竹书中既有《孙子兵法》，也有世人未曾见到的《孙臆兵法》，证明孙武其人确实存在。只是《左传》作者其时还未见到有关吴越的更多史料罢了。

应该指出的是，《左传》一书虽成书于战国前期后段或中期前段的时间，但许多材料却直接来自于春秋各国史官所记的原始资料。这从《左传》中所用的语言文字可证这一点。如西周春秋时文献与金文中“是”字作宾语时全部倒置，而《左传》亦如此，如“寡人是问”、“寡人是征”等；从商代到春秋时代语言中有大名冠小名的现象，如甲骨文中“丘商”、“丘雷”、“师荣”、“师喜”等，而《左传》中亦有“丘舆”、“城颍”、“城濮”、“城棣”等，均是春秋以前的语法现象，说明《左传》使用的是原始资料。

《左传》与《春秋》虽然均为编年体的断代史，且一般认为前者是为后者作传的；但前者的史料价值已远远胜过后者。《春秋》一般是以鲁国为中心，兼记他国，但《左传》则详记鲁、齐、晋、楚、郑等国的历史。《春秋》偏重于鲁国国君的活动并偏重于政治军事活动，而《左传》则广泛地涉及到鲁、齐、楚、晋、秦、郑、宋、吴、越等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春秋》仅限于春秋时的史实，而《左传》则常常追溯到春秋以前的古史，如西周史、商史、夏史、尧舜、黄帝、少皞等不少传说时代的历史，内容十分珍贵。

应该指出的是，1973年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有密切的关系。帛书《春秋事语》抄写在宽24厘米、长约74厘米的半幅绢帛上，字体是由篆书变为隶书过程中的古隶书，现存97行，共有16章。帛书《春秋事语》不避汉高祖刘邦的讳，其抄写年代大约在秦末汉初。现存16章中，只有第二章有关燕晋两国的战争不见传世文献记述，其余历史事件都见于古文献记述之中，而且还可据古文献查明其事件发生的年代。帛书《春秋事语》所记历史事实最早的是鲁隐公被杀，最晚的是韩赵魏三家消灭智伯，所记历史年代与《左传》相近。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有关。裘锡圭先生认为帛书《春秋事语》很可能是左丘明四传弟子铎椒的著作《铎氏微》^①，李学勤先生认为，帛书《春秋事语》“一书实为早期《左传》学的正宗作品，其本于《左传》而兼及《谷梁》，颇似荀子学风”^②。

《左传》与《春秋》在两汉时并不相合，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时才以传附经，合为一书，即今日所见情况。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中的《春秋左传正义》即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为今《左传》通行本。清人研究《左传》，比较有影响的是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二十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李解民点校），以及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二卷。今人注《左传》最详备的是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杨伯峻广泛收集古今各位学者关于《左传》的研究成果，并尽量吸收了考古资料以及古文字资料，反映了当代《左传》注释与研究的最高水平。另外，杨伯峻与徐提合编的《春秋左传词典》（中华书局1985年版），便于学者检索《左传》。

关于《左传》专门研究性的著述，清人用力最勤的当推清初顾栋高所撰《春秋大事表》五十卷、舆图一卷、叙论一百三十一篇，该书对《左传》的史料作了系统整理，其成绩最大者在于诸侯方国兴灭及其区域范围的变化，尤其是犬牙交错形式的描述，另外在春秋军事地理方面的总结也是很好的，值得认真阅读。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了吴树平、李解民的点校本。另外童书业的《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亦值得参考。还有，徐中舒编注的《左传选》（中华书局1963年版）也是一个很好的读本，编选内容和注释都是很精良的。

① 见《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载《文物》1974年第9期。

② 李学勤：《〈春秋事语〉与〈左传〉的流传》，《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 《春秋》与《公羊传》、《穀梁传》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也是第一部断代史，它开创了编年体的先河。其体例的特点，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作过概括：“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记远近、别同异也。”《春秋》记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共12公，242年。所记政治活动最多，有人称作鲁国的“政治简史”，以记述战争、会盟、朝聘为主，另外还记载有灾异、祭祀、婚丧、修筑城池宫室等事项。其中征伐占百分之四十，会盟占百分之二十，朝聘占百分之二十，灾异占百分之十，其他祭祀、城建、宫室、婚丧、狩猎等占百分之十。

《春秋》本为春秋战国各国史书的通称，故《墨子·明鬼下》引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齐之《春秋》等。今传世本《春秋》为儒家重要经典，原为鲁国史书，曾经孔子删订，在其中用《春秋》笔法，寓含褒贬，目的是为了打击“乱臣贼子”、“犯上作乱”的行为，表现了对西周礼仪王道社会的向往。《孟子·滕文公下》记述了这种情况：“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对此书十分重视，认为是立身扬名的不朽之作。《史记·孔子世家》云：“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春秋》作者及其资料来源问题，自古以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孔子所作。如《左传》成公十四年便说《春秋》“非圣人，谁能修之”，意谓修《春秋》者为“圣人”孔子。《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惧，作《春秋》。《春秋》者，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见《左传》的作者及孟子均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另外，《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说得更为具体：“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依《公羊传》所说，《春秋》完全是孔子所作。《春秋》所记242年历史，其中七八十年是孔子亲眼所见；父辈所见闻而传于孔子之耳的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传闻；而《春秋》之所以开始于鲁隐公元年，这是祖父辈所能听到的历史传闻，所以只能从鲁隐公元年开始。以公羊氏所说，《春秋》则完全是根据孔子自己所见所闻而编写成的历史。

而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周王室和鲁国的史记编纂而

成，此说以司马迁为代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其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此说亦可见《孔子世家》。我们以为司马迁此说是对的，孔子对《春秋》只是起了删削增补的修订作用。春秋时期各国都有史官负责书记历史，《左传》曾对《春秋》中的书法条例作过说明。《左传》隐公十一年云：“宋不告命，故不书。凡诸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这是针对《左传》隐公十一年“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而作的解释。但《春秋》经文中却没有记载此事，说明春秋时各国间的大事，不通报则史官不记载。这可说明《春秋》是鲁国的史官（可能也有周王朝及其他诸侯的史官）根据当时记述历史的条例规定书写的当代历史大事，而孔子则是以鲁国的《春秋》为主并参考周王室的史记而编成了《春秋》，但绝不可能是孔子根据所见所闻自己创作的《春秋》。《春秋》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公羊传》僖公十六年注云“曷为先言霰而后言石？霰石记闻，闻其礧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穀梁传》僖公十六年云“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竟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也”。但据古本《竹书纪年》所载的文字也是“陨石于宋五”（刘知几《史通·惑经》）。这种句式实际上在春秋之前是常见的，并不含有什么微言大义，也可见前人说《春秋》是孔子修订而成因而具有《春秋》笔法的看法也是值得怀疑的。

《春秋》今传三传，均为十三经内容。除《左传》外，还有《公羊传》与《穀梁传》。《公羊传》为《春秋公羊传》的简称，《穀梁传》为《春秋穀梁传》的简称。《公羊传》据传说是齐人公羊高所作，实际上是由公羊高口述，由曾孙公羊寿及弟子记录成书。《穀梁传》传说是穀梁赤（或作喜、俶、真等字）所作。二传主要是对《春秋》字词及含义进行阐释，即所谓对“微言大义”的挖掘，史料价值不大。《公羊传》重点论述尊王攘夷，特别强调大一统，阐发所谓的微言大义。《穀梁传》也特别强调尊王攘夷，但同时也强调君臣之别，具有一定的法家倾向。

《公羊传》与《穀梁传》虽然史料价值不大，但有的地方则补充了许多新材料。如《春秋》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灾，宋伯姬卒”。《左传》云：“宋伯姬卒，待姆也。”两书皆语焉不详。而《公羊传》襄公三十年则说：“宋灾，伯姬卒焉。其称谥何？贤也。何贤尔？宋灾，伯姬存焉，有司

复曰：‘火至矣，请出。’伯姬曰：‘不可。吾闻之也，妇人夜出，不见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穀梁传》也有同样的记载。可见《穀梁传》、《公羊传》比《春秋》及《左传》记述的史料多多了，故事的来龙去脉也清楚多了。又《春秋》襄公六年：“莒人灭缙。”《左传》襄公六年：“莒人灭郟，郟恃赂也。”其说也是语焉不详。然《公羊传》襄公五年云：“叔孙豹、郟世子巫如晋。……叔孙豹则曷为率而与之俱？盖舅出也。莒将灭之，故相与往殆乎晋也。莒将灭之，则曷为相与往殆乎晋？取后乎莒也。其取后乎莒奈何？莒女有为郟夫人者，盖欲立其出也。”何休注说：“时莒女嫁为郟后夫人，夫人无男有女，还嫁之于莒，有外孙。郟子爱后夫人，而无子，欲立其外孙。”《穀梁传》亦同。此说与《左传》说法不同，但提供的史料十分详细，却是应该重视的。

《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所作《春秋公羊传解诂》12卷，唐代徐彦作疏28卷，今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另外刘逢禄《春秋公羊何氏释例》10卷（《皇清经解》）、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皇清经解》）也值得参阅。

《穀梁传》有晋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18卷，唐杨子勋加以疏证为《春秋穀梁传注疏》20卷，今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清柳兴恩《穀梁大义述》30卷、钟文烝《穀梁补注》24卷（均见《皇清经解续》）也是比较重要的注本。

另外清代姚彦渠撰《春秋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11月第1版，1998年11月第3次印刷。其书共分4卷，卷一为世系、后夫人妃，卷二到卷四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五礼。利于学者检索查阅有关资料。

6. 《国语》

《国语》是一部与《左传》地位相当的有关春秋时代历史的重要史料，过去或称为《春秋外传》。内容有《周语》3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语》9卷、《郑语》1卷、《楚语》2卷、《吴语》1卷、《越语》2卷等一个王朝七个国家的历史记载。

《国语》作者，宋前均以为是左丘明所作，宋后疑者甚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国语》认为：“以汉人所说左丘明为近，所记之事，与《左传》俱讫智伯之亡，时代亦复相同。”现代学者认为它本为各国之“语”，不是一人一时所作，是汇编类的史书。《春秋》为记事，《国语》为记言，即所谓“左史记事，右史记言”的说法，因此《国语》又称为《春秋外传》。《国语》与《尚书》的性质相近，大约春秋时各国有“语”体式的教材。《楚语上》楚大夫申叔时说：“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经于

民也。”

关于《国语》的成书年代，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看法。笔者认为，《国语》上记西周穆王伐犬戎之时，下至韩、赵、魏灭智伯之时（前453年），历时约500多年，其成书时代大致与《左传》同，应在战国早期与中期之间。《晋语四》记齐姜对晋文公说：“吾闻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商之飨国，三十一王，《警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数？’今未半也。”依此可知，作者是晋亡之后。从晋文公出游之时的惠公至三家被周王承认时的晋烈公为16世，此正好多于前半数。此预言成功，说明作者已看到三家分晋并为周王承认，此为上限。又《吴语》记越之邻国，“南则楚，西则晋，北则齐”，为越灭吴后迁都于琅琊的形势，表明《吴语》成文在吴亡之后。《国语》中《越语》成书时代应是最晚的，《越语下》记范蠡语实为黄老之言，说明其篇成书于战国中后期。

《国语》各语的数量和史料价值不全一样。其中以《晋语》最多，《国语》共21卷，《晋语》则占9卷，几乎占了一半，而且也以《晋语》史料价值最高，时代也最早。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的记晋文公重耳出游之事，几乎是从《晋语四》中化出而简略其文。凡是《左传》中涉及到晋国的历史记述，《国语》的记载均比《左传》详尽。例如晋文公勤王，受到周襄王赐地而晋文公有请隧之事，在《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与《国语·周语中》均有记载，但两书详略却大不相同。《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云：

戊午，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欂、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

而《周语中》记述云：

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劳之以地，辞，请隧焉。王不许，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以顺及天地，无逢其灾害，先王岂有赖焉？内官不过九御，外官不过九品，足以供给神祇而已，岂敢猷纵其耳目心腹以乱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临长百姓而轻重布之，王何异之有？今天降祸灾于周室，余一人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遗物以赏私

德，其叔父实应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岂敢有爱？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创制天下，自显庸也，而缩取备物以镇抚百姓，余一人其流辟旅于裔土，何辞之有与？若由是姬姓也，尚将列为公侯，以复先王之职，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懋昭明德，物将自至，余何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与百姓何？何政令之为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请，受地而还。

比较可知，虽然《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与《国语·周语中》同记一事，但《国语》比《左传》记载详细多了。《周语中》周襄王所说大段大段的道理在《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不见了，仅仅简单地说“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这应是在原来记述的语言之上的高度概括。由此可见，《国语》特别是《晋语》比相应《左传》所记述内容的史料价值要高。《晋书·束皙传》记述说晋太康二年于汲郡魏襄王墓出土的汲冢本《国语》三篇，《束皙传》云“言楚、晋事”。今本《国语》的《晋语》九卷也多是谈晋楚争霸之事的，与汲冢本《国语》的内容和性质相似。其次为《周语》、《楚语》、《鲁语》，史料价值次之；《郑语》、《齐语》又次之，最后是《吴语》、《越语》。《国语》的特点在记言，却又与《尚书》所记训诰誓命不同，是记述了一些卿大夫、王公大臣甚至庶人（绛县之老）有思想、有性格特点的语言，其史料价值在思想史方面有重要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与战国诸子的思想是有一定关系的。

《国语》有一些史料价值是有独特性的。如《周语中》记天象与农时；《周语下》单穆公述音律及武王伐商时的天象；《周语上》虢文公述古籍礼；《鲁语上》展禽（柳下惠）述古祀典制度；《齐语》记管仲时政体改革与编户齐民制度；《晋语四》述黄帝传说时代的氏族制度；《郑语》记传说时代有功于民的神圣人物并述祝融之后的氏族分化；《楚语下》观射父述颛顼时代神权至上巫覡地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时代特征等，其史料价值是十分高的。

1987年在湖南省慈利县石板村36号战国墓中出土了战国竹简《国语》，竹简残损严重，无一完整。竹简文字内容为记事性质，以记述吴、越二国历史为主，如黄池之盟、吴越争霸等事件，大致内容与《国语》、《战国策》、《越绝书》等书的记载相同，可以与《国语》的《吴语》、《越语》作比较研究。不过，慈利石板村战国竹简《国语》目前释文还未发表。

《国语》的注本为三国吴人韦昭的《国语解》，是今通用本。今见有两

种版本，一种是附有清人黄丕烈校勘札记的“明道本”《国语》，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出版。一种是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校勘的《国语》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是据《四部备要》排印清代士礼居翻印明道本为底本，参校了《四部丛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而成。韦昭之前的汉代各家注释可参看汪远孙《国语三君注辑存》4卷。清代以来的主要注本有清人董增龄《国语正义》21卷（会稽章氏式训堂1902年版，巴蜀书社1985年版）、汪远孙《国语发正》21卷（《皇清经解续》）、徐元诰《国语集解》。徐氏《国语集解》，共有21卷，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版；中华书局2002年又出版了王树民、沈长云的点校本《国语集解》。徐氏其书成书较晚，能够网罗众书之长，注释较详，值得参考。

7. 《逸周书》

《逸周书》共10卷，原共71篇，阙11篇，有目却无正文，实际只有60篇。《汉书·艺文志》中有《周书》，班固自注：“《周史记》七十一篇。”东汉时代学者认为这是儒家整理《尚书》之后的逸篇，故称《逸周书》。晋孔晁曾为之作注，到唐代，孔注本只有45篇。除一篇《序》，有孔注者仅42篇，比唐人所见又少了3篇注。其中11篇是唐亡后为后人所补，有的学者以为是从西晋汲冢战国魏墓中出土而补入的，《隋书·经籍志》曰：“《周书》十卷，汲冢出。”其说是不对的。《逸周书》中史料价值最高者当属《世俘》，应为当时周武王克殷后所作，其用牲制度、祭祀制度皆与成王之后完全不同。其次当属《商誓》、《度邑》、《作雒》、《克殷》、《皇门》、《祭公》、《尝麦》（穆王时）、《芮良夫》，应为西周时文献，个别文字为东周时增改。其余诸篇均为春秋战国时成文的。

《逸周书》中从卷一《度训》篇到卷四《克殷》篇叙述的是周文王、武王时期的言论与事迹，反映商末的社会历史，从《克殷》到《器服》反映的才是西周春秋时期的社会历史。其中《世俘》、《克殷》记述武王克商的历史，而以《世俘》最为可信，反映了当时克商战争十分残酷：灭国50，服国652，俘虏侯小臣46，擒御车830辆，取馘77779（原记“十万”，应为“七万”之误），俘人310230。应是灭商战争的实录，与后世文献中所说武王灭商战争前徒倒戈、兵不血刃的说法大相径庭，但与古本已佚的《尚书·武成》篇所说“血流漂杵”可相互印证。《度邑》记述了周武王与周公谋划在嵩山之南的阳翟建都之事，与后世《周本纪》等书的说法不同，其史料价值很高。《作雒》记述了周公谋划并营建东都洛邑之事，并且详细记载了东都洛邑的形制与规模，可补充《尚书·召诰》、《洛诰》之缺。《王会》篇记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四方方国部落之名及其方位、物产情况。《尝

麦》篇记述了西周中期修订刑律的情况，是西周法律制度的重要文献；另外该篇还记述了黄帝杀伐蚩尤并命少昊正五帝之官的故事以及夏启五子乱国的情况。《祭公》反映了祭公崇尚“懿德”的思想主张。《职方》记述了九州物产、山川、人口及贡赋情况。

这71篇本的《周书》，东汉古文学家或称之为《周书》，或称之为《逸周书》。西晋太康二年魏襄王墓所得汲冢本《周书》，因为书名与71篇《周书》相同，唐宋书目中有的便称71篇《周书》为《汲冢周书》。宋代学者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汉书艺文志考证》以及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皆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近现代有的学者主张71篇《周书》出自汲冢书，^①有的学者认为71篇《周书》与汲冢《周书》完全不同。^②我们同意后者的看法。

其注本，清人有陈逢衡《逸周书补注》（道光五年修梅山馆刻本）与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单刻本）影响较大。今人有黄怀信、张懋镛、田旭东等人的《逸周书汇校集注》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是现代很好的注释本。黄怀信还有《逸周书校补注释》，西北大学1996年版，可参看。

8. 《穆天子传》

今本《穆天子传》有六卷，又名《周王传》、《周穆王传》、《周王游行记》。根据《晋书·束皙传》记述，《穆天子传》原只有五卷，《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有一卷，后人把这两部分合在一起，便成了今天所见六卷本。原本前有摹写的古文本，即用战国时六国文字写的，整理时有“古文”摹本，有隶定释读的今文本。现传世本中“古文”摹本已佚，只剩下“古文”二字在每卷隶定的今文之前。

《穆天子传》属西晋太康二年在汲冢竹书，盗发魏襄王墓而得。其记载周穆王出游四方，卷三与卷六记述西见西王母以及为美人盛姬死后吊丧之事，所记周穆王会见西王母并赋诗唱和可与古本《竹书纪年》呼应。从《穆天子传》所用语言文字的特点来看，其写成的时代应在战国时代，其文连词用“而”，结构助词有“所”或“之所”，应为战国时成书。另外称洛阳为“宗周”，确实不是西周时代的用法和含义。但其中的人物与史实与我们今天所见金文资料相比勘，却为西周时代的，这是战国时期的人们所无法想象的。如卷四所见“毛班”，卷五则作“毛公”，见之于西周周穆公时代

^① 朱希祖：《汲冢书考》，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② 陈梦家：《尚书通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1—295页。

的班簋铭文，且继承“虢城公”而为“毛公”，与《穆天子传》所记完全相同。卷一与卷四有“酈人”和“酈柏絮”，近来出土于山西的金文有“伻白（伯）”，应即《穆天子传》中的“酈柏”。这些情况都可证明《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又如其中所记因寒冷而迁都并在圃郑一带建园囿是可信的，尤其是西周时气候大寒而士兵在嵩山上冻伤，穆王作诗准备迁都之事尤当可信。因此与今日对西周时期气候变迁研究完全相合。战国时气温上升，故此不是战国时之人所可想像的。其中丧礼为皇后级的丧礼，亦可作为《仪礼》丧礼方面的补充。另外所记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很详细，有助于考证先秦时期的西北史地及其少数部族的分布与迁徙情况。

此书有晋郭璞注，清人洪颐煊的校刊本较佳，今有经张耘点校、岳麓书社1992年出版的《穆天子传》（古典名著普及文库，与《山海经》合刊），后附有语词索引，便于检索参考。

9. 《周礼》

《周礼》全书42卷，共分六篇：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冬官》后亡佚，汉代以《考工记》补亡。每篇先列正长官，次列副官，后属官吏及所属官员之数。各个官员首先叙述其官名、爵位等级及员数，最后叙述其职掌及责任。

《周礼》原名《周官》，又名《周官经》，王莽时置博士，刘歆改称《周礼》。旧说为周公所作，当然是不可信的。清人皮锡瑞认为是战国时人所作（《经学通论·三礼》），现代多数人认为是战国人所作。疑古者认为是刘歆伪造，此说在汉代便有今文学家的疑伪之说（《说文·序》）。现代有学者说是周王室东迁后某氏以春秋诸侯之制而作的。笔者以为从语言文字方面可知其书是战国时写成，但许多材料是来自于西周春秋时期。该书中有许多官员之名与出土的西周金文资料常常吻合，研究西周官制可以参考《周礼》一书。不过是《周礼》中的官职所负其责与西周金文中所见大致相合，但所言官职的秩位与西周金文中差异甚大，大概是战国时人参考西周、春秋时的资料并结合作者的理想以及战国时的一些制度而作成的。因此，《周礼》中所言周代的各种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官爵等秩等是不大可靠的，只能看作战国人的设想以及战国时期各种政治制度的反映。

《考工记》是春秋后期齐国官书，反映了春秋时期手工业的状况及工艺水平。当代考古学者常以此书与考古发现的新资料相比较，是先秦时期古代科技史的重要文献。

《周礼》注本，有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的郑玄注、贾公彦疏。清人孙诒让《周礼正义》86卷，是最好最全的注本，其书引证的资料十分丰富，还

可以当作索引的工具书；其书对清末以前有关《周礼》的各种学案作了系统的总结，其参考价值甚大。今有中华书局1987年版，共14册。今注本还有林尹《周礼今注今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可参考。

10. 《仪礼》

《仪礼》成书在春秋时代，是孔子采集周王室与鲁国即将失佚的礼仪编纂而成，后用作教授弟子的教材，原包括有演习的内容。周代礼仪至繁至多，《汉书·艺文志》引古语有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之说。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遗余力地整理并保存周代的礼仪制度。但经秦朝焚书之后，汉初仅存鲁国高堂生所传的《士礼》，即《仪礼》。

《仪礼》又称《礼》、《礼经》、《士礼》，共17篇。《礼经》是相对于《礼记》而言。到了晋代才称之为《仪礼》，见《晋书·荀崧传》。其中包括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礼》、《既夕》、《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其中：《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三篇属于“冠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四篇属于“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三篇属于“聘礼”；《丧服》、《士丧礼》、《既夕》、《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七篇属于“丧礼”。

《仪礼》与《礼记》不同，《礼记》讲析礼仪的意义和作用，而《仪礼》讲礼仪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仪式。《仪礼》中所说“礼”、“仪”本来有别，“礼”为规则制度，“仪”指仪态行为。《仪礼》内容包括贵族卿大夫阶层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各种礼的仪式规范，这些礼仪多数是远古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礼俗习惯，例如冠礼就是上古氏族社会成丁礼发展变化而来的，乡饮酒礼是上古氏族社会村落聚族而食的习俗演化而来，通过这些礼仪制度往往可以窥视到远古社会生活及习俗情况。其书虽是记述冠、婚、丧、祭、饮、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的著作，但也反映了政治、宗教、家族制度以及有关衣服、饮食、车舟、宫室等社会生活方面。因此其书是研究西周春秋时代礼乐制度及其社会生活史的重要史料。

汉代曾出土过鲁淹中本《礼古经》，共有56卷。《汉书·艺文志》云：“《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七十〔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这是汉武帝时出土发现于孔子故里曲阜城内淹里中的古文《仪礼》本，惜后来失佚。

值得指出的是，1959年7月在甘肃省武威县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了简本《仪礼》。武威磨咀子简本《仪礼》共有竹简469枚，可分为甲、乙、丙三种写本。(1)甲本《仪礼》共有398枚木简。原无甲本书题，但有篇题，还有篇序，它们是《士相见之礼第三》16枚、《服传第八》57枚、《特牲第十》49枚、《少牢第十一》45枚、《有司第十二》74枚、《燕礼第十三》51枚、《泰射第十四》106枚，共有7篇，共存22971字。其中《士相见》原简尾题说字数有1020字，但实存939字；《服传》原简无尾题字数，实存有字数3440字；《特牲》原简尾题说字数有3440字，但实存字数为3118字；《少牢》原简尾题说字数有2954字，但实存字数为2801字；《有司》原简尾题说字数有4880字，但实存字数为4362字；《燕礼》原简尾题说字数有3066字，但实存字数为2158字，记文305字；《泰射》原简尾题说字数有6858字，但实存字数为6145字。(2)乙本《仪礼》存木简37枚，较甲本木简短而窄。内容仅为传本《仪礼》中的《服传第八》一篇，篇题写在篇道第一、二简简背。乙本《仪礼》共存3042字。(3)丙本《仪礼》存竹简34枚，出土时残断严重。其内容为传本《仪礼》中的《丧服》一篇，篇末计字尾题为“凡千四百七十二”字，但实存1285字。对于武威汉简《仪礼》的文本，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武威汉简简本整理者认为，它与今本郑玄注的校记比较，合于今文者超过古文，当是属于今文本的系统，但也掺杂了一些古文本的读法，因而推测简本是属于西汉晚期传后氏（后仓）礼学的庆氏（庆普）本。^①而沈文倬先生认为，西汉晚期传《礼》学者只有后氏一家，大、小戴和庆氏都是出于后氏之传，他们的经本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属于今文本系统，而简本当是以今文读古文，因而是糅合今古的另一传本，沈氏称之为“古文或本”，认为今本郑玄本是来源于这个本子。^②

注释除了汉郑玄作注、贾公彦作疏的《仪礼正义》50卷（见《十三经注疏》本）之外，还有清人胡培翬《仪礼正义》40卷（见《皇清经解续》；又，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了上下二册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了三册本）为较好注本，其他还有盛世佐《仪礼集编》17卷（见《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经部》）以及徐乾学《续礼通考》120卷（江苏书局1881年版），都是比较综合之作。清代还有张惠言的《三礼图》、张尔岐的

^① 甘肃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第33—36页。

^② 沈文倬：《荀子说礼·丧服传脱文》，《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二辑；《汉简〈服传〉考》上，《文史》第24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汉简〈服传〉考》下，《文史》第25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

《仪礼郑注句读》、凌廷堪的《礼经释例》。姚际恒《仪礼通论》，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年出版了陈祖武的点校本，值得参读。另外，20世纪60年代在甘肃武威县磨咀子东汉墓出土的汉简《仪礼》，可参看196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武威汉简》，可与传世本作比较研究。

11. 《礼记》

“记”是对儒家经书经文而言，是对经文的解释说明，故《仪礼》称“经”，解释其经则为“礼记”。《汉书·艺文志》述《礼》书十三家，谓“《记》百三十一篇”，并自注云：“七十子后学所记也。”西汉时戴德从汉以前礼记中选85篇，后世称之《大戴礼记》；戴圣从中选49篇，即今所谓《礼记》。东汉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地位因而显著，唐宋时曾被列入“十二经”、“十三经”，并且以《礼记》相称。

我们认为，《礼记》是研究西周春秋历史的必读书。《礼记》尽管成书时代较晚，西汉初年编辑成书，各篇成文在战国时代，但在研究西周春秋时期政治制度、伦理思想、礼乐制度、宗法制度、祭祀制度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可以此书为阶梯，结合先秦各种文献与金文资料，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就可以进一步深入到西周春秋制度史研究之中。

《礼记》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先秦社会政治制度、礼仪制度、风俗习尚及儒家思想言论等各方面。① 涉及社会政治制度如《王制》、《礼器》、《礼运》、《文王世子》、《明堂位》等。② 周代奉行礼乐文明，故有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之说。各种礼仪制度十分丰富，如《冠义》、《聘义》、《昏义》、《奔丧》、《丧服小记》、《丧服四制》、《丧大记》、《祭法》、《祭义》、《祭统》、《乐记》等，是解说《仪礼》等礼仪规则的意义与作用的篇章。③ 有的涉及儒家的思想、言论、教育、学术、文化等，如《坊记》、《曾子问》、《学记》、《中庸》、《缁衣》、《哀公问》、《儒行》、《大学》、《仲尼燕居》、《月令》、《孔子闲居》等篇。《学记》、《经解》则是说明教育思想原理的。④ 有的涉及日常生活的礼节规定，如《曲礼》上下，《少仪》、《内则》等篇。其中《曲礼》上下篇记述了礼的定义、细节以及君臣与贵族阶级之间的礼节；《檀弓上》、《檀弓下》记述了孔子居丧及门人治丧吊丧的言行与故事；《王制》谈周王朝爵禄、赐土、朝聘、田猎、教育、养老等制度；《月令》记述了一年十二个月每月的天象、物候、节令、农业生产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礼仪活动，其中记有每月昏旦中星的位置以及每月朔日太阳所处二十八宿的位置，反映了前7世纪的天象资料；《曾子问》记述了周代丧葬、丧服等有关制度及其故事；《文王世子》记述了周初教育王子及贵族子弟的有关礼仪及有关故事；《礼运》记述了孔子追溯原始

社会的大同时代与夏商周三代的小康社会的不同及其发展，是研究早期国家起源的重要资料；《礼器》记述了虞夏商周四代不同礼仪器物的异同及其制度的变迁；《郊特牲》记述了周代祭祀天地的大礼礼仪用品及有关礼节，也反映了周代大礼的原始性及返本归朴现象；《内则》记述了周代妇女的家庭守则及家族长幼之礼、尊老敬老礼仪制度；《玉藻》记述了官僚贵族服饰仪容等各种内容；《明堂位》记述了夏商周三代明堂制度及有关礼仪；《丧服小记》记述了丧服及有关礼仪随宗族亲疏关系的远近之别而产生的差别；《大传》记述了宗法制度、大宗小宗之别以及尊宗敬宗之义；《少仪》记述了贵族阶级一般饮食起居及出聘应对问答的有关礼仪；《学记》记述了周代及其虞夏商等不同时代学校教育制度以及教学方法；《乐记》记述了周代音乐的原理、礼仪作用及教育作用，此篇可以结合《国语·周语下》中单穆公与伶州鸠所论乐律及《吕氏春秋》中《仲夏纪》及所属各篇《大乐》、《侈乐》、《适音》、《古乐》与《季夏纪》所属各篇《音律》、《音初》、《制乐》、《明理》以及《史记·律书》、《乐书》等篇结合起来阅读；《杂记》上下记述了官僚贵族服丧、吊唁祭祀及其平民一般的丧葬礼节制度；《丧大记》记述了棺槨殡仪制度及居丧礼仪制度；《祭法》记述了虞夏商周四代郊禘礼仪及其周代宗庙祭祀制度、庙数之制；《祭义》记述了祭祀、孝道的意义与敬老尚齿的规定及意义；《祭统》记述了祭祀活动中各项礼仪的规定及其作用；《经解》记述了“六经”的教育作用与礼仪在治国中的中心作用；《哀公问》记述了鲁哀公与孔子就礼仪、修身、尊天有关方面的问答之词；《仲尼燕居》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论述礼乐的重要意义；《孔子闲居》记述了孔子及弟子子夏论述礼乐的重要作用；《坊记》记述了君主及其上层统治者修身养性、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中庸》记述了中庸之道、治理国家的九种方式以及治学方法；《表記》记述了孔子关于君子修身治国品德修养方面的语录；《缙衣》记述了孔子遍引各种古籍文献来论证君子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奔丧》记述了周代奔丧、吊唁各种礼仪规定以及具体形式；《问丧》记述了丧葬期间子女亲戚哭丧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礼仪规定；《服问》记述了治丧期间子女亲戚由于亲疏远近的不同而具有丧服方面的等差区别；《间传》记述了由亲属关系的不同而具有丧服式样的差别及其轻重区别；《三年问》记述了三年之丧的道理；《深衣》记述了深衣之制的式样及其原因；《投壶》记述了燕饮投壶礼节的有关规定及其运作方式；《儒行》通过鲁哀公与孔子之间的问答之词，记述了儒者的行为举止、衣食住行以及品德修养方面的特点；《大学》记述了儒家有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以及经济财政政策方面的思想主张；《冠义》记述了冠礼作为成

年礼的具体规定和意义；《昏义》记述了婚嫁仪式的具体规定、意义以及男外女内、男尊女卑的思想说教；《乡饮酒义》论述了古代乡人在一定时间内聚会饮酒礼仪的运行方式、意义以及尊长养老习俗；《射义》论述了古代定期举行射礼礼节的具体做法及其意义；《燕义》论述了君臣宴会的仪式及其作用；《聘义》论述了聘问交往的有关礼节及其作用意义；《丧服四制》记述了周礼丧服期间恩、理、节、权四种制度的作用和意义。

《礼记》与《周礼》、《仪礼》过去有“三礼”之称，均为郑玄作注。张舜徽《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说：“三礼之中，须先看《礼记》，因其文辞条畅易于索解。”这大致是对的，但其原因不仅是这“文辞条畅”一个方面。《礼记》内容十分丰富，从郑玄为《礼记》作注后，《礼记》地位越来越高，唐宋之后其地位超过《仪礼》，原因不仅仅是《礼记》通俗易懂，而重要在于《礼记》内容涉及面太广。因《仪礼》仅仅是士大夫至诸侯阶层关于冠、聘、婚、娶、丧、祭等方面的礼仪规定，而《礼记》则不但对这些礼仪制度的意义与作用进行了解释，而且从时代来说，常常是虞、夏、殷、周进行比较；从阶层看，上至天子，下至诸侯、卿大夫、士以至庶人都进行比较说明；从内容看，不仅有礼仪制度、日常生活的仪式，还有政治制度、学术思想、文化教育方面的内容。如《礼运》篇孔子说到“天下为公”的原始社会“大同”时代与“天下为私”的“小康”三代时期的比较；《玉藻》与服饰文化有关；《内则》谈到儒家思想及周代社会妇女应遵守的礼仪规范等等，这些都是《仪礼》体例所难以企及的，《礼记》地位上升是理所应当的。

《礼记》的成文年代大多数在战国时代（成文年代在西汉时代的也有，如《王制》等）。但其礼仪制度绝大多数符合周礼内容，许多内容本身就是从《周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中摘录或总结出来的，如《祭法》中说到虞夏商周所行的“禘、郊、祖、宗”的内容便与《论语》相近，但也混入了战国秦汉的一些内容，如“宗法制度”中祭祖所谓“天子九祖，诸侯七祖”与西周春秋时期不同。^①又如服丧制度中夫对妻子对长子服丧一年的记述，则与《左传》、《墨子·非儒下》所说丈夫为妻、父为长子服丧三年说法不同。显然《礼记》中说法是根据战国后变化了的礼制去说周制，是不对的。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中有《缁衣》篇，足证《礼记·缁衣》为战国中期以前的作品；另外郭店楚简中有《六德》篇引用《礼记·丧服四制》中的语句，说明《礼记·丧服四制》应早于《六德》，亦应

^① 王晖：《商周文化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321页。

是战国中期之前的作品。^①

《礼记》的本子，今有《十三经注疏》本，为郑玄注、孔颖达疏。四书五经本的《礼记》为陈澧作注，称《礼记集说》，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的单行本。杭世骏《续礼记集说》100卷（浙江书局1895年版），汇集了宋到清初诸家之说。朱彬《礼记训纂》49卷（见《四部备要》，中华书局1996年出版了饶钦农的点校本），清孙希旦《礼记集解》是清人整理其书的重要成果，今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上中下三册，可参阅。近代从社会学方面研究《礼记》的重要著作有李安宅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的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再版，也可参看。

12. 《大戴礼记》

《大戴礼记》是小戴戴圣叔父戴德所编选的，原有85篇，现存39篇，其中有不少古礼旧闻的资料，而所记孔子、曾子等思想言论的篇章最多，是研究早期儒家特别是曾子思想学说的可贵资料。所收《夏小正》是我国现存历法时令书篇中最早的，汉儒认为是夏代流传下来的文献。《礼记·礼运》载孔子之语：“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郑玄注认为“夏时”为夏代四时之书，即当时所存的《夏小正》。司马迁《夏本纪》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其篇记载了十二月中各月的天象、动植物物候及农业时令耕种收获的情况。其书时代不一：其时代上限至少在西周以前，下限应至西周春秋。如记夏历五月“初昏大火中”，则是西周之前的天象。其书所记地域不一，西可能至山西陕西一带，东南至淮河流域。所记夏历七月多雨，非山西陕西则无此情况；其书记述了淮河流域的物候，则是西周夏禹后人封在杞县一带的情况。另外《五帝德》和《帝系姓》等篇保留了上古传说时代世系的口传资料，是《史记·五帝本纪》主要依据的资料，应当重视。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内礼》^②，现存竹简10枚，完整的4枚，残缺的6枚。其内容与今本《大戴礼记·曾子立孝》有着密切的关系，有许多文句大致相似，但《大戴礼记·曾子立孝》有一些删改，可知二者有渊源关系。过去学术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大戴礼记》是汉人的作品，但依战国楚竹书《内礼》来看，它虽经后人删改，但为先秦古籍无疑。

^① 李学勤：《郭店楚简〈六德〉的文献学意义》，《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文论丛》特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图版第69—82页，释文第219—229页。

其注本以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为优，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了王文锦的点校本。

13. 《管子》

《管子》，《汉书·艺文志》列于道家，《隋书·经籍志》之后均列入法家，近现代学者一般都认为其书成书于战国时代，可能出自稷下学派的学者之手，其中包含儒、道、法、兵、农、阴阳等六家的言论思想，可谓杂家。原为564篇，经过刘向整理后有86篇，现存75篇。其书有不少内容记述了春秋桓公时代管仲的思想言行，特别是称霸之前的政治经济方面的方针政策，见于《大匡》、《中匡》、《小匡》、《小问》、《小称》、《主政》等篇，与《国语·齐语》及《左传》中齐桓公时代的许多史实相应，可起一定的补充作用，其史料价值是值得肯定的。

《管子》的内容可划分为五个方面：（一）反映用法家法术思想的内容。这一类有《牧民》、《形势》、《权修》、《形势解》、《立政》、《立政九败解》、《乘马》、《版法》、《版法解》、《五辅》、《八观》、《法禁》、《重令》、《法法》、《问》、《君臣》上下、《小称》、《四称》、《势》、《正》、《七臣七主》、《禁藏》、《入国》、《九守》、《桓公问》、《任法》、《明法》、《明法解》、《正世》等30篇。（二）反映管子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有《侈靡》、《治国》、《度地》、《地员》、《臣乘马》、《乘马数》、《事语》、《海王》、《国蓄》、《山国轨》、《山权数》、《山至数》、《地数》、《揆度》、《国准》、《轻重甲》、《轻重乙》、《轻重丁》、《轻重戊》等19篇。这19篇是《管子》一书的核心部分，反映了管子的经济思想，反映春秋时期齐国称霸成功的历史背景，这些与《国语·齐语》中的记述遥相呼应，虽然《管子》写成较晚，但一定是有根据的。（三）讲军事兵法的部分。这一部分有《七法》、《兵法》、《地图》、《参患》、《制分》、《九变》等6篇。（四）讲阴阳五行黄老哲学思想的部分。有《宙合》、《枢言》、《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水地》、《幼官》、《幼官图》、《四时》、《五行》、《轻重己》11篇。（五）其他有关管子生平事迹的杂记，共有9篇。《大匡》、《中匡》、《小匡》是讲管子的生平事迹；《戒》、《霸形》、《霸言》、《小问》等讲管子辅助齐桓公称霸的事迹；《弟子职》讲侍奉老师执弟子礼的情况；《封禅》已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定法》所言“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肯定了物质生活资料与礼仪道德的关系，具有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史观思想，贾谊《论积贮疏》、《史记·货殖列传》对此十分称道。《牧民》反映了古代重德保民思想。《白心》、《内业》、《心术上》、《心术下》四篇反映了战国中后期稷下黄老之学的思想主张，《水地》等篇还反映

了稷下黄老之学的精气说，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论著。

《管子》注本有洪颐煊《管子义证》8卷（传经堂丛书）；唐尹知章注、清戴望校正的《管子校正》，收入中华书局版的《诸子集成》第五册中；集众家注释之大成者为郭沫若、许维遹、闻一多《管子集校》2册，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是近代《管子》研究的代表作；于省吾《双剑谿管子新证》（见《双剑谿诸子新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亦值得参阅。

14. 《论语》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汉代有《齐论语》22篇、《鲁论语》20篇及孔宅所出古文《论语》20篇三家，今独存《鲁论语》10卷20篇。后孔子后人孔安国用以教授子弟，始名为《论语》。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认为《论语》编定者可能是曾参的学生，开始著笔在春秋末年，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①宋代以来，《论语》作为“四书”之一，是科举考试的主要教材之一，也是青少年的必读书目，实际上被用作古代知识分子个人思想修养的教科书，因此此书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资料。《论语》可以结合《史记·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来读。

《论语》是研究先秦思想史特别是早期儒家和孔子思想最主要也是最可靠的资料，所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多为实录性质。其篇目有《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20篇。《论语》一书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语录体的结集，所论述的问题比较分散。《论语》大体包括有孔子的克己复礼、治国以德的政治主张，提倡仁者爱人的伦理思想，宣扬并相信天命却“不语怪力乱神”、对鬼神抱有怀疑主义的态度。《论语》更多地反映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主张启发教育，主张多闻阙疑，主张学与思结合、学与问结合、“温故而知新”的学习方法，主张启发式教学、举一反三、因材施教、诲人不倦的教育方式和教育态度。另外，《季氏》反映了孔子对战争的态度和主张；《为政》、《颜渊》反映了孔子有关治国思想和政治主张；《八佾》是研究周代礼仪的宝贵资料；《乡党》反映了孔子言行修养以及生活起居的习惯；《先进》是研究孔子弟子的重要资料；《宪问》、《卫灵公》反映了孔子对古今人物的评价及其仁人志士的立身准则。但《论语》中的孔子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页。

也不是圣人，而是一个平常人。《阳货》记述以费反叛的公山弗扰召唤孔子而孔子打算去的故事，以及佛肸请求孔子参与其对抗晋赵简子的军事战争的故事，有人怀疑这些材料，但是孔子因不是圣人自然也会犯这种错误的。这一错误反映了孔子恢复周礼的愿望十分坚定，想借助某种政治势力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政治见识未免糊涂。这是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也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材料。

定州八角廊汉简本《论语》是1973年在河北定州八角廊村西汉中山怀王刘脩墓中出土的汉墓竹简之一。出土的汉墓竹简中有《论语》等古文献资料。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西汉中山怀王刘脩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即公元前55年，所以它的抄本年代应在公元前55年之前。定州八角廊汉简《论语》有620多枚，残简甚多，可以录成文字的有7576字，不足今本《论语》的二分之一。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时代较早，保留了经过历代传抄并多有改变的今本《论语》所没有的语言文字现象，其价值十分重要。可参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出版。

《论语》注本有阮刻《十三经注疏》校勘本，为魏何晏集解，宋邢昺作疏。清人刘宝楠有《论语正义》，收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诸子集成》之中。近人杨树达于1942年写成《论语古义》一书，早期为湖南大学石印本讲义，后来修订补充为《论语疏证》，195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列入《杨树达文集之十六》出版。杨伯峻有《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后附有《论语词典》，便于学者查找语词出处。另外，四书五经注本为朱熹的《论语集注》，但朱熹集注本同时也反映了宋代儒家的思想认识。程树德于1942年脱稿的《论语集释》40卷，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是反映《论语》研究集大成之作。所引书目680种，内容分为10类：有考异、音读、考证、集解、唐前古注、集注、别解、余论、发明、按语。作者在学术上不分学术宗派，尽量全面引述，最后还以按语的形式提出作者自己的观点，是一部搜罗丰富、注释详尽的《论语》注释考证的集大成之作。

15. 《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是以短篇故事的形式记述晏婴相齐景公的事迹、言行和思想，可作为研究春秋晚期齐国历史特别是晏婴的参考资料。过去有的学者怀疑《晏子》为伪书，但1972年山东省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有《晏子》竹简，除缺一篇外，其余七篇皆有，文字亦与今本大致相同，可知今本大致在

西汉前期已流传于世,^①表明过去疑伪者认为《晏子春秋》是“六朝人伪作”的说法不能成立。另外,过去有的学者认为该书成书于汉初或秦统一六国之后,现在看来都有些偏晚。1977年安徽省阜阳双古堆汉墓也出土了《晏子》残文,该墓葬时代为公元前163年,距秦始皇统一六国仅有50余年,五十多年要成书并广泛流传,是不大可能的。唐柳宗元曾认为此书是墨子学派的齐国学者所著,所言是有道理的。有人认为其成书年代已到秦朝,但我们认为其书大约是战国晚期齐国学者所著。

《晏子春秋》涉及春秋末期齐国政治事件、社会制度的变革、田氏代齐的种种迹象,许多历史人物、事件,均通过小说故事的形式表达出来,是研究春秋末期齐国历史以及晏子思想言行的参考资料,可与《左传》、《史记·晏婴列传》等书篇合看。当然晏子的一些传说故事不免有夸饰的成分,不可全信为真实的历史。

《晏子春秋》注本有今人吴则虞的《晏子春秋集释》,中华书局1962年版。其书文字核正可看于省吾《双剑谿晏子春秋新证》,见《双剑谿诸子新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16. 《司马法》

依《史记·司马穰苴传》可知,《司马法》一书编著于战国中期齐威王时期。其书并非专记一人之兵法一人之思想,而是战国中期以前司马兵法的集大成之著述。司马穰苴与齐景公、晏婴同时,但并非其人著作。故今所见《司马法》中的田制、兵制皆有二种,就是其书非一人一时之著述的明证。可以说,它是古代许多军事思想与战略战术的总结。但也有学者认为,《司马法》原为周之政典与军法,到战国初年已散乱,齐威王时令诸大夫追论古司马兵法而成。《司马法》原有百五十五篇,现有今本与辑本两种。^②

《司马法》可看田旭东《司马法浅说》,其中有《司马法》今本及逸文的分析,并附有校勘记。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17. 《世本》

《世本》原有十五篇,不是一人一时所作,但最后可能是楚汉之际的学者进行了整理修订。其书性质主要是记载黄帝至战国帝王诸侯及卿大夫家族世系、谥号、名号。刘向《别录》说:“《世本》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录黄帝以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凡十五篇,与左氏合也。”

《世本》内容除了《别录》所言是帝王诸侯卿大夫的世系谱牒之外,还

^① 罗福颐:《临沂汉简概述》,载《文物》1974年第2期。

^② 田旭东:《司马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有《居篇》谈三代及后代诸侯都邑的迁徙情况，《作篇》谈物质文明的发明创造史，如工具、武器、器物、车舟、服冠等事物的发明史，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

《世本》的传本甚多。据我所知，至少有四种，最早说是春秋时，最晚的到楚汉项羽刘邦之时。①班固《汉书·艺文志》说：“《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可知班固引刘歆《七略》所见本子时代仅至于春秋时。②成书于战国晚期赵人。《史记·赵世家》集解引《世本》云：“孝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生今王迁。”依此可知南北朝刘宋时裴骃所见《世本》有战国末期人所续内容。③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见本终于秦末：《史通·正史》云：“楚汉之际，有好事者，录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终乎秦末，号曰《世本》，十五篇。”篇数未变，但时间至秦末，故《史通》推测成书于楚汉之际。④南北朝颜之推所见本则有燕王喜、汉高祖等人，颜之推明确说是后人所掺。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引《帝王世纪》所谓其书为“左丘明所书，而有燕王喜、汉高祖。……皆后人所羸，非本文也”。

《世本》亡佚于北宋，南宋高似孙曾辑佚，题名《古世本》。清人辑佚《世本》工作成绩斐然，有张澍、王谟、秦嘉谟、陈其荣、孙冯翼、王梓材、茆泮林、雷学淇的辑本，以雷本与茆本最佳。1959年商务印书馆将上述清人八家辑本合在一起，成《世本八种》出版，读者翻检甚便。

18. 《史记》中有关西周春秋时期的古史资料

首先，《史记》中关于先秦秦朝时古史资料最有价值者有《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等篇。后二者依据《秦纪》而成，前四者的史料多数已不可见，尤应重视。自《殷本纪》所记商代先公先王世系庙号等情况为殷墟甲骨文证明以来，说明其史料自有来源，依此推测《夏本纪》、《周本纪》也有一定的文献依据。其次，《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主要据《春秋》、《左传》等书中的资料制成表的形式，虽便于检索浏览，但史料价值则逊于《春秋》、《左传》、《国语》等书籍。

再次，《吴太伯世家》、《齐太公世家》、《鲁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卫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晋世家》、《楚世家》、《越王勾践世家》、《郑世家》、《孔子世家》等，这些世家可分西周春秋两段，前段资料比后段重要，因前段的古书多已亡佚。后段则多据《左传》、《国语》等书，引用时应以《左传》、《国语》为主，以这些“世家”的材料为辅。《鲁周公世家》所记西周时代鲁国各公的在位年数

(除伯禽之外),可能是依据鲁国《春秋》的资料编写而成,是研究西周年代学的宝贵资料。《孔子世家》及《仲尼弟子列传》是研究早期儒家的宝贵资料。

19. 《越绝书》

《隋书·经籍志》认为《越绝书》一书的作者是子贡,《崇文总目》谓伍子胥作。依照这些说法则其书成书时代甚早,然其书目并不见于《汉书·艺文志》。古代学者也有说是东汉初袁康所作,成于建武二十六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据原书的《末叙》中的度词隐语,判定“以去为姓,得衣乃成”是袁字,“厥名有米,复之以庚”是康字,“禹来东征,死葬其疆”表明作者是会稽人,“文词属定,自于邦贤”,表示校定者与作者为同郡会稽人;“以口为姓,承之以天”为“吴”,“楚相屈原,与之同名”为平字。合起来则为会稽袁康作,吴平校正文字,此为定论。《越绝书》,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末年人袁康著、吴平校正,二人同为会稽郡人。其书《内经》二篇,还有《内传》、《外传》,以记吴越历史为主,时代自尧、舜、禹、商、西周直到春秋晚期,而以叙述春秋晚期的历史事实为主。其书保存战国以来旧文传说甚多。《计倪内经》、《清糴内传》、《内经九术》、《外传枕中》为政治思想史的资料;《外传》中《记宝剑》风胡子讲到兵器的发展过程由轩辕氏石兵、黄帝为玉兵、禹为铜兵而至“当今之时”的铁兵时代:“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此文中风胡子所言战国以前的石、玉(新石器)、铜、铁四种兵器的进化及其时代,与现代考古学上所使用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器、铁器的四个时代完全吻合,说明这些传说资料的文字记载虽晚,但是是有历史根据的,是很可信的,绝非巧合。轩辕(此说中与黄帝非一人)、神农、赫胥时代为原始氏族社会时代,使用旧石器打制武器;黄帝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酋邦时代,其时已使用磨制的新石器时代的武器;禹为夏代的开国君主,铜器的制造传说也是始于禹启,而今考古发现也可证明铜锡合金的青铜兵器也是在夏代初期;铁器始于春秋,而作为兵器盛行于战国,可知这些资料时代虽晚,却十分宝贵。今注本有张宗祥《越绝书校注》,商务印书馆1956年版,可参看。

20. 《吴越春秋》

东汉早期赵晔撰。其书的内容先吴后越,并以编年形式记述的。其内容与正史《史记》、《左传》、《国语·吴语》、《越语》的内容大致相同,但叙述更为详细。也有不同于这些史书上的内容,可作为补充与参考。赵晔把各种古书及传说中有吴越的事迹集中加以叙述,虽近于“小说家言”,然其

书史料丰富，对正史有补充作用。

周生春著《吴越春秋辑校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不仅有原文校勘，还收集了其书的异文、佚文，是比较好的辑校本。

21. 《古史考》

《古史考》是三国时蜀国谯周所撰，原有25卷，现今只有辑本。其书主要属于历史考证，是为补充《史记》所载先秦史料不足之缺憾而广为搜集古文献而成的，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参考书籍之一。原书久佚，今有黄奭辑本见《黄氏逸书考》；章宗源辑本见《训纂堂丛书》，孙星衍辑本见《平津馆丛书》。

22. 《帝王世纪》

《帝王世纪》原有10卷，又称《帝王世家》、《皇王世纪》或《帝王世说》，晋皇甫谧撰。其书是记述帝王世系、年代、事迹以及有关典章制度方面的书籍。《帝王世纪》卷一为开天辟地到三皇，卷二为五帝时代，卷三为夏代，卷四为商代，卷五为从周先祖后稷到周赧王，卷六为秦代，卷七到卷八为前后汉代，卷九为曹魏，卷十记述天文星野、历代垦田、户口数目等典制方面的历史。其内容多采自经传图纬以及诸子杂书，虽然驳杂亦不可全信，但记录了《史记》及《汉书》所不载的有关历史，特别是有关传说时代的历史，足资借鉴。有关天文星野、都邑、垦田、户口等记述，是诸多古文献所阙而不载的，更值得我们重视。

《帝王世纪》宋代后便失佚了，清代宋翔凤、顾观光、张澍等均有辑本，其中宋翔凤《帝王世纪集校》辑本较为详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以宋翔凤《帝王世纪集校》辑本以及钱保塘续补并考异为基础，由刘晓东校点出版。

23. 《路史》

《路史》为南宋罗泌撰写，共有47卷。《路史》一书的《前纪》叙传说时代三皇至无怀氏历史；《后纪》叙述太昊至夏桀时期历史；《国名纪》记述上古至东汉时期部族、国家、姓氏、谱系及其地理方面的历史；《发挥》、《余论》多是作者个人关于古史的意见、分析和考证。引证取材比较驳杂，除了先秦儒家的经书、战国秦汉诸子外，还引用谶纬之书。不过其书所引用的许多宋代以前的古书不少已经亡佚，特别是记述春秋之前的古书资料亡佚更多，再加上《路史》还有许多考证性的工作，因此其书的价值在《帝王世纪》之上。今有《四部备要》和《丛书集成初编》等本，可参考。

24. 《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

《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是清代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

六朝文》的前两集，这两集收录了秦代以前有关历史、文学、宗教、语言等方面的研究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严可均在搜集古文献资料、考辨古籍真伪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他善于从大量的史料中检索出秦以前的古文献。所检索的古文献资料有金石碑刻、杂记、古注、经疏、笔记、类书甚至佛教、道教的有关文献资料，既有鸿篇巨制，也有片言只语，然后根据古代历史人物的先后次序进行排列。不仅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也很有实用价值。1999年商务印书馆分册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把《全上古三代文》和《全秦文》合为一册出版，审订者为许少峰、苑育新。

25. 《绎史》

《绎史》为明末清初人马驥作，共160卷。此书所收史料上至传说的“太公”时代，下至秦朝末年。基本把先秦至秦代文献资料集中起来进行重新编纂，所收集先秦史资料十分丰富，查找资料较为方便，有的至少可起到索引作用。此书把隋以前有关先秦文献资料几乎囊括无遗。其书体例是先按时代分为四大段：太古、三代、春秋、战国（包括秦代）及外录五部分；然后每段再按纪事本末体来叙述。引述资料往往是整段、整节、整篇地抄写原文。同事类下，把他认为是较为可信的史料列为正文，然后用小字附录认为可供作参考的有关史料，可见作者对史料的时代和价值也很考究。《别录》有十卷：①天官；②律吕通考；③月令；④洪范五行传；⑤地理志；⑥诗谱；⑦食货志；⑧考工记；⑨名物训诂；⑩古今人表。先秦史中所涉及问题，基本都收录齐备了，是具有创新性的，是适宜于史学研究的。该书取材范围除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因古代学士皆熟读，未收入其中）之外，其余先秦时著述基本都收录进去了。

马驥《绎史》搜罗资料比较全面，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资料加以比较考证、搜集、编排，取舍史料比较严谨，按可信程度向读者介绍不同的史料。而且对每一历史阶段的相关资料加以罗列、编排之后，还加以详论。其中不乏较为深刻的见解。其书缺点有三：一是对先秦史料的真伪虽有辨析，但是不精不严，因作者处于明末清初，故有时代局限；二是除《左传》记有某公某年外，其他书名下不记篇名，难以核对引用；三是“四书”未列于书中，《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中许多重要史料被排除在外，特别是《孟子》的史料未列入其中，是一缺憾。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四库全书》原书序号影印精装四册出版。另外尚有中华书局2002年版，共十册；齐鲁书社2001年版。

二 西周春秋时期金文及其他考古资料

1. 西周时期重要的金文资料

研究西周史与殷商史一样困难，原因之一是文献资料很少。20世纪以来，全国各地尤其是陕西、河南、山西等省出土的青铜器资料特别多，1949年以来所发现的青铜器铭文更具有可贵的史料价值。这些金文资料是当时人们用语言文字记录历史的真迹，是周代社会生活与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礼仪制度等各个方面的实录，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为西周史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资料。不少青铜器铭文很长，少则几个字，多则几百字，如毛公鼎多达497字，完全可以抵得上《尚书》中的一些篇章。

西周金文中有不少铭文记述了西周时期政治、军事以及诸侯分封等等大事件。武王伐商后的第七天所铸利簋铭文记周武王克商的干支为甲子朝，与古文献资料如《牧誓》、《克殷解》、《世俘》、《周语下》记载吻合；而且在陕西临潼出土的利簋铭文，记载了周武王伐商事件，与《尚书·牧誓》、《史记·周本纪》、《逸周书·世俘》、《国语·周语下》等书篇的记述征商事件也是吻合的；另外有岁星出现，与《国语》所说“岁在鹑火”之说合，对周武王伐商的年代有重要的断代作用。武王时期的天亡簋（又名大丰簋）铭文，78字，记述了周武王灭商后到嵩山“天室”举行祭天仪式，并祭祀上帝及周文王，助祭人就是天亡，有的学者认为天亡就是太公望。周成王五年的何尊铭文122字，记载着武王营建洛邑的遗志，与《逸周书·度邑》篇相合，成王时迁居洛邑，则为史书所未载。建国后出土于洛阳的令彝铭文对研究周初史事、官制制度等关系甚大，其铭文所提到的卿士寮与太史寮反映了西周时期主管政治军事事务与主管文官事务两大官职系统。周康王时期的俎（或释作“宜”）侯矢簋铭文，记述了改封虞侯矢为俎侯，并赐给他土地、山川、人民以及器物的情况，是研究吴国早期历史的宝贵资料。周穆王时期的班簋铭文，有190字，记载了周穆王命令毛伯接替虢城公的官职，率领王师及诸侯盟军去征伐东夷的史实；并立即改称为“毛公”（有的学者认为“毛伯”与“毛公”是二人，是不对的），毛班表示要努力辅佐周王，作好天下四方的表率；班簋铭文中还记述了班为父亲加谥号为“大政”，这是证明西周周穆王时期已有谥法的最可靠证据，也是目前能证明谥法产生时代的最早的资料。又在扶风发现的鞮簋和五祀鞮钟，周厉王之名为胡，鞮通胡。周厉王出现在铜器上，为铜器断代及周厉王时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西周晚期儻匜铭文记诉讼判案事，为研究西周刑法史的好

材料。

西周金文中记述了西周时期周王室已有固定的军队编制。南宫柳鼎铭、盩方尊铭、禹鼎铭有“西六师”的记载。关于“殷八师”或“成周八师”未见于古文献之中，仅见于西周铜器铭文中。如禹鼎铭、小臣詵簋有“殷八师”，召壶铭有“成周八师”，盩方尊铭有“八师”的记载。禹鼎铭“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盩方尊铭文谓周王命盩“用司六师王行、参有司：司土、司马、司工。王令盩曰：藉司六师暨八师艺”；召壶铭“王呼尹氏册令（命）召曰：更（赓）乃祖考作冢司土（徒）于成周八师，……”；小克鼎铭“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遯正八师之年”等等。盩被周王授权统帅六师，管理三有司，并管理西六师与殷八师的事务；召被周王任命为成周八师的“冢司徒”，召的职务大约是管理六师驻地的土地资源。西周金文中反映了西周时期的军队有师氏、虎臣、司马、冢司马、走马等军职官员。师瘠簋铭文记述周王命内史吴册命师瘠云：“先王既令（命）女（汝），今余唯申先王令，令女（汝）官司邑人、师氏。”师事簋铭云：“王乎（呼）乍（作）册尹克册命师事曰：备于大佐，官司丰还（通寰，县也）左右师氏。”师虎簋铭载周王册命师虎云：“载先王既令乃祖考事啻（嫡）官：司左右戏繁荆。今余唯帅井（型）先王令，令女（汝）更（赓）乃祖考啻（嫡）官：司左右戏繁荆。”“戏”依《说文》是“三军之偏也”，可知师虎主要是统领左右两支偏师。师克盨盖铭云：“令女（汝）更（赓）乃祖考藉司左右虎臣。”师兑簋铭云：“王乎（呼）内史尹册令师兑，疋（胥）师馘父，司左右走马、五邑走马。”可知虎臣、马队亦有左右之分。西周时期，军队所有这些师氏、偏师、虎臣、走马等军职官员，均由周王亲自任免、调遣。

有关西周时期战争征伐方面的情况在西周金文中也是常见的。西周早期的小孟鼎铭文记载了孟率领军队讨伐鬼方并大获全胜，两次战争总共捉拿戎狄酋长3人，获馘5069，俘虏敌军13081人（不计模糊不清的第2次战争），俘马104匹、车130余辆、牛355头、羊38只，可见战争规模相当宏大。战争胜利后，在周庙中杀俘献祭并欢庆宴饮。西周晚期或簋、多友鼎铭文记讨伐北戎严允（猃狁）的战争；禹鼎铭文记禹率领西六师、殷八师伐南淮夷而获胜的战争，都有补于西周历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长安出土的西周晚期“多友鼎”（参见《人文杂志》1981年4期）记载多友讨伐猃狁的事实。西周时期的金文也反映了西周确实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丰伯簋铭文说“王命益公正眉敖。益公至，告。二月眉敖至，见，献臯”，反映的少数部族眉敖被征伐且臣服的史实。师事簋铭文说“王曰：师事，令

女（汝）羞追于齐……敬母（毋）败绩”，日本学者白川静认为这与文献中所说周夷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是同一事件。^①多友鼎铭文谓“唯十月，用严（猷）狃放（方）兴，广伐京师，告追于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于京师。’武公命多友逵（率）公车羞追于京师”。西周王朝正是凭借着强大的军事优势南镇淮夷荆蛮，北控戎狄獫狁。西周金文驹父盨盖铭文记述了周宣王十八年率领军队南下讨伐南淮夷，“至，夷俗坠不敢不敬畏王命，逆见我，厥献厥服。我乃至于淮，小大邦亡（无）敢不都具逆王命”。鞅钟（又称宗周钟）为周厉王所做之钟，其铭文追叙说周昭王时南国戡子（濮子）来“陷虐我土”，王率军迎击并攻伐其都，戡子（濮子）只好派使者“来迎昭王”，“南夷东夷具见二十又六邦”。铭文反映的南征荆楚、淮夷与北伐獫狁、戎狄的战争都是在奉周王之命而行，正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绝好证明。另外，从西周金文资料看，西周王朝已经具有一定的军事立法。师旂鼎铭记载说，师旂因为属下不随他跟王去征伐方雷，在芳地伯懋父曾捉拿其属下，许三百镒而免刑。但这笔罚金一直没有交纳。后师旂便派僚友把此事告到伯懋父那里，伯懋父说本应放逐这些不随右军出征之人，现虽不放逐，但必须如数把罚金交给师旂。后来师旂让中史记载此事，并把判词铸于彝器之上。

西周时期金文反映了南淮夷与其他诸侯方国一样，负有向成周交纳贡赋蓄积品的义务。若不交纳，周天子则派兵进行征讨用刑。兮甲盘铭文说：“王命甲政司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南淮夷，旧我帛晦人，母（毋）敢不出其臽、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母（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令，则即井（刑）扑伐。”可见南淮夷与其他诸侯方国一样，负有向成周交纳贡赋蓄积品的义务。虢伯簋铭文云：“唯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至，告。二月眉敖至，见，献臽。”“臽”为有颜色有花纹的高级丝织品，是南淮夷本应承担的供品，未交纳则王命征讨，臣服后来朝见周王并交纳贡品。驹父盨铭文云：“唯王十又八年正月，南中（仲）邦父命驹父即南者（诸）侯，率高父见南淮夷厥取厥服。至，夷俗（欲）坠，不敢不敬畏王命逆见我，厥献厥服。我乃至于淮，小大邦亡（无）敢不到具逆王命。”这里把周天子的威令及南淮夷在南征大军压境之下不得不服命、称臣、进贡的情形描写得淋漓尽致。这些足以说明《周语上》所说“蛮夷要服”、“要服者贡”是有史实为证的。

有关西周赐土赐民的分封制、土地交换买卖、土地纠纷等资料在西周

^① [日] 白川静著，袁林译：《西周史略》，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104页。

金文中也常常可见。西周中期虢簋铭文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西周井田问题的宝贵资料，铭文说“虢拜稽首，休朕甸（宝）君公白（伯）易（锡）厥臣弟虢井五，量”，同时也提供了在宗法关系之下以井田分封子弟的重要资料。周穆王恭王时期的卫盂、五年卫鼎铭文，记述了西周贵族间土地交易之事，对研究西周经济史关系甚大。周康王时俎侯矢簋记述了康王把俎地的土地民人赐封给矢的情况。周康王时大孟鼎铭文记载了周王赐封孟疆土与民人的情况：“易（锡）女（汝）邦司四白（伯），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锡）夷司王臣十又三白（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其中前者“人鬲”属于“邦司四伯”，应属国中之民；后者“人鬲”属于“夷司王臣”，应属野中之民。周康王时邢侯簋铭文云：“王令荣暨内史曰：舍井（邢）侯服，易（锡）臣三品：州人、重人、庸人。”所赐给邢侯州人、重人、庸人三类，应是以所封之地的土著居民作为邢侯仆庸臣民的。

另外一些铭文则反映了贵族阶层是因事功而授封采地田里，如遣尊记载周王赐封遣采地；敌簋记载了周王赐敌百田；贤簋记述公叔赐贤百亩田；永孟铭文记周王锡永田地之事，可与克鼎铭文相比。这些金文都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宝贵资料。此外柞钟铭文记中大师令柞“司五邑佃人事”，涉及到土地劳动者的身份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另外，西周金文还反映了西周时期，周王通过册命周王室主要大臣之佐或者册命公侯伯的左右大臣的册命仪式，来达到控制诸侯方国及周王室主要大臣的目的。师寰簋铭文云“王乎（呼）尹氏册命师寰：易（锡）女（汝）赤舄、攸勒，用楚（胥）弭白（伯）”，可知师寰是辅佐弭伯的大臣。善鼎铭文云“王曰：善……今余唯肇申先王令，令女（汝）左右隳侯，监鹵师戍”，可知善是辅佐隳侯的大臣。同簋铭文云“王命同差（左）右吴大父司易（场）、林（廩）、吴（虞）、牧……世孙孙子子差（左）右吴大父”，可知同是辅佐吴大父的大臣。鬲季鼎铭文云“王易（锡）赤环芾（绂）……曰：用左右俗父司寇”，可知鬲季是辅佐俗父任司寇之职的大臣。上述金文中受命者虽为某一侯伯的辅佐之臣，或为某一要臣的左右助手，却都是要经过周天子的策命，其目的就是为了便于周王直接控制这些诸侯或周王室的主要大臣。

西周金文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西周年代学与族谱谱牒方面的宝贵资料。最有意义的器物是周恭王时期的墙盘铭文，有284字，盘铭前半歌颂文、武、成、康、昭、穆及时任天子恭王等七位王的功德，后半记微氏家族自高祖、烈祖、亚祖、文考乙公至史墙五代的史实，说明武王灭商以

后，“微史刺（烈）祖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寓于周”，表明墙的曾祖原系微国史臣，降于武王，以后可能世为史官，故自称史墙。史墙之子名伯疾，有不少钟铭，反映了周夷王、寿王时的不少史实。1986年在陕西安康井沟、老君观之间出土的史密簋铭文，记载了周孝王东征的历史事实。特别可喜的是，2003年元月陕西省眉县杨家村发现了西周青铜器窖藏，其中迷盘铭提到的周王有文王、武王、康王、昭王、穆王、夷王、厉王以及当时天子，即时王宣王。这是研究西周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另外，迷盘铭还叙述了迷的家族单氏八代世系：单公、公叔、新室仲、惠仲盞父、零伯、懿仲、龚叔、迷。这是研究西周年代学以及谱牒世系的重要资料。

西周金文资料还提供了西周宗族组织与宗法制度方面的资料。西周中期虢簋铭文十分清楚地反映了宗法制度中君统与宗统的结合问题，铭文说“虢拜稽首，休朕匚（宝）君公白（伯）易（锡）厥臣弟虢井五，量。……虢弗敢望（忘）公白（伯）休，对扬白（伯）休，……”其文既称其兄为“朕匚（宝）君公”，相对应的则是称自己为“厥臣”，这种君臣关系正是对君统而言；铭文又称其兄为“公白（伯）”、“伯”，相对应的则是称自己为“弟虢”，这种宗法内部的长幼排行正是对宗统而言。这就是说，从君臣关系看，对兄长称“朕宝君公”，既反映了身份地位，又反映了爵位。西周昭穆王时代盞尊铭文中盞还说“王弗望（忘）厥旧宗小子”。可见盞对周天子来说是小宗，而周天子则是大宗。盞方尊铭文说“天子不（丕）假，不（丕）其万年保我万邦”，另一件盞驹尊铭文说“王丕（通‘丕’）下（假），不（丕）其迈（万）年保我迈（万）宗”。同样是盞的铜器，一说“万年保我万邦”，一说“迈（万）年保我迈（万）宗”，可知“万邦”就等于是“万宗”。“万邦”是从行政区划而言，“万宗”则是从宗法关系而言。对周天子来说，诸侯诸邦就是诸多的小宗。另外，琯生簋铭文说“对扬朕宗君其休，用作朕刺（烈）祖召公尝簋”。称召公为“烈祖”，称召氏为“宗君”，称“宗”表明了宗统关系，而称“君”则表明了君统关系。

20世纪及21世纪初在西周政治中心区（即古之所谓周王畿之内）发现最大的青铜器群有六处。

一是1929年洛阳一带的西周青铜器群。在洛阳东北出土令彝与臣辰的两组铜器，而过去也曾在此地出土过保尊及保卣（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一）（二），《考古学报》九册、十册，1955年），是研究周初历史的宝贵资料。

二是长安一带的丰镐遗址区的西周青铜器群。^①1961年在长安张家坡发现青铜器群，其墓葬及铭文、先祖庙号（亚字）显然是属于殷文化类型。

三是陕西扶风岐山一带的周原地区的西周青铜器群。这一带是周人发祥地，是西周贵族群聚之地，所以其地出土的青铜器群甚多。这些青铜器多为西周晚期经济灾害或政治动乱之时挖掘而窖藏的青铜器物。如1960年在扶风齐家村发现了几父壶、中伐父甗、中义钟、中友父簋等青铜器群，1975年在岐山县董家村出土了裘卫铜器群。1975年在扶风庄白西周墓中出土了伯或青铜器群，1976年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了微氏家族铜器群等（可能是周厉王或幽王前后窖藏的）。

四是90年代以来在山西曲沃县曲村北赵村西南天马的西周青铜器群。曲村遗址发现西周至春秋早期大规模的晋侯墓青铜器群，达几十件之多。不仅确证天马——曲村遗址为早期晋都，而且还能修正和补充历史文献记载，是西周考古的空前大发现。特别重要的是，北赵青铜器中有晋侯名号，多数可与文献（如《史记·晋世家》）相互对照。有不少铭文提供了历朔干支可供推算西周年月。特别是晋侯苏编钟，钟铭有300多字，所记铭文中有关年、月、月相、干支俱全，给西周年代学及月相研究提供了十分可贵的史料。这一组青铜器序列，为西周中晚期中原一带青铜器树立了一个标尺。

五是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的西周青铜器群。在1956—1957年发掘时出土一个“虢季子段”的青铜鬲，而过去宝鸡出土过西周晚期宣王时的虢季子白（伯）盘（清道光年间宝鸡虢川司附近出土）与虢季子组器，可证虢季与西虢有关系，《水经·渭水注》引《太康地记》，谓西虢在周平王东迁时随之迁至于上阳，上阳即今三门峡。可推知上村岭虢国西周时为今宝鸡一带的西虢，而随周室东迁至今陕县上村岭一带。1990年上村岭墓地M2001出土四十余件青铜器上均有“虢季”的铭文，进一步证明了三门峡的虢国来自于西虢（参《光明日报》1991年1月8日第1版）。90年代的发掘又发现了M2001、2006、2009等墓，出土青铜器甚多。关于墓葬年代，学术界意见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全为西周时期的，有的认为多数属于春秋，也有一些属于西周晚期的，是属于虢季一族的，从宝鸡一带迁来。过去曾出土的虢季子白盘，是记述了虢季子与严（狝）狝交战并取得重大战功。值得注意的是虢有三虢，西虢在宝鸡，为虢季族；北虢在今三门峡一带，北虢为

^① 《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窖穴》，文物出版社1965年版。在丰镐遗址的考古发现不仅取得大量墓葬及窖藏的青铜器资料，也获得了西周时期房屋建筑方面的资料，特别是客省庄及与马王村之间的大型建筑遗址。

虢仲族，宝鸡虢季族被秦消灭后余人亦迁到这一带；还有东虢，在河南郑州之西一带，为虢叔一族。这三虢均为军事战略要地，东虢为黄河与济水之间的交通要道，可阻止东南夷和北狄的入侵；三门峡一带的北虢在今潼关之东的交通要道，是东西交通险要；宝鸡一带的虢国处在宝鸡一带，是西北戎狄入侵关中的交通要道。正因这三处均是交通要道，所以政治、经济实力并不强大的三虢反而常在周王室担任卿士的要职，原因就在这里。

六是2003年元月在陕西省眉县杨家村发现了西周青铜器窖藏。这次共出土27件器物，皆有铭文，最长者有372字，是1949年以来发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字数最多的。四十二年逯鼎有2件，记载逯率军讨伐殳豸获胜后受到周宣王赏赐的事迹；四十三年逯鼎有10件，记载逯受宣王册命的情况。这批青铜器多是周宣王时的标准器，对西周年代学以及月相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载《文物》2003年第6期；又载《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

考古发现具有铭文的青铜器资料对西周王畿之外各诸侯国的研究，亦提供了不少宝贵资料。

宝鸡強国墓地。80年代在宝鸡纸坊头发掘的1号墓、竹园沟墓地、茹家庄墓地，共发掘墓葬27座，车马坑2座，马坑4座；出土強国文物遗存很丰富，尤其是青铜器雄伟奇特，甚为罕见。強国遗存与西周时西南、西北地区的青铜文化关系密切，表现了中原文化与巴蜀文化之间的联系，反映了古国古族的民族关系与文化交流，意义十分重大。已出版的卢连成、胡智生著《宝鸡強国墓地》上下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对強国墓出土的文物资料作了详细的介绍。除了介绍上述发掘的全部考古材料外，其书在《绪论》中对茹家庄居住地址和濛峪沟墓地出土遗物也作了一些介绍。

北京琉璃河燕国国君墓地及其青铜器群。1986年在北京房山琉璃河1193号墓出土的克罍、克盃，其铭文记述了周初燕国分封的重大史事，可证燕的第一代君主便建都于北京一带，铭文自称“鄠侯”，说明周初封国有的确实很远（载《考古》1990年第1期）。这对北京地理沿革历史提供了十分可贵的史料。1974年、1975年发掘出土的堇鼎、伯矩鬲，也证明燕封国在北京一带。

西周曲阜鲁国故城。1977—1978年在曲阜发掘了曲阜鲁国故城。发掘者认为此即西周初年鲁国第一代鲁侯伯禽受封的曲阜故都。其发掘报告据考古发掘探讨了西周时鲁都的布局，并通过甲、乙两组墓葬在墓制及随葬品上的不同，提出土著居民与姬周文化及族属存在的差异，对研究西周墓葬制度及其多元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已经出版的《曲阜鲁国故

城》(齐鲁书社1982年版)对考古发掘的曲阜市区鲁国故城情况作了详尽的介绍,可参阅。

其他诸侯方国出土的青铜器资料。①柞国与柞伯簋。20世纪90年代在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发现了柞伯簋,作器者柞伯为周公之子,柞国的第一代国君。过去并不知周公之后柞伯封于何地,柞伯簋出土于平顶山应国墓地,可知其封地也应在河南平顶山一带。②江苏丹徒出土的俎侯矢簋与吴国早期历史。俎侯矢簋1956年出土于江苏丹徒,其中谈到锡土地、锡人民的分封情况,也谈到矢原为虞国(吴国),后改封到俎国,故称俎侯。过去学者以出土地望认为俎国远在江南的丹徒一带。经考证,应在山东与江苏的交界处,江苏苏北加口一带,此地春秋称柎邑。①俎侯矢簋铭文说:“易(锡)在俎王人十又七生(姓),易(锡)奠(甸)七白(伯)。”俎侯矢所受封的民人既有土著贵族,也有商王甸中贵族,加上受封者,便形成了周初封建诸侯的新特点。在受封之地上形成周人贵族统治者、被征服的殷贵族及遗民、土著的贵族与居民三合一式的新格局,打破了以纯粹血缘关系来划分的社会政治组织,而形成了一种以地缘关系来划分其臣民的新型社会政治组织类型,其政治意义与历史意义相当重要。③卫康叔始封地与康侯铜器。《史记·卫康叔世家》索隐引宋忠云:“康叔从康徙卫,卫即殷墟定昌之地。”《周易·晋卦》有“康侯”;康侯鼎铭有“康侯丰(封)”;作册彘鼎、康侯刀、康侯斤、康侯矛等铜器铭文中均有“康侯”;特别是沫司徒逯簋铭曰:“王来伐商邑,诞令康侯鄙于卫。”②出土的金文资料与文献资料均可证卫国始祖康叔初封不在卫而在康。康叔初封的康在何地呢?《水经·颍水注》说:“颍水又东出阳关,历康城南。”《路史·国名纪》卷五:“康,《姓书》:康叔故都在颍川。”刘起钎先生据顾祖禹、江永等人的说法,推定康国在今河南禹县,③是可信的。关于卫国的考古资料,最主要的是1932—1933年在河南浚县辛村发掘的卫国康侯墓地资料。见郭宝钧《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

西周青铜器的特点。西周早期青铜器与商代比较接近,可以说直承商代雄浑、厚朴、繁华的纹饰特点,往往显现出一种神秘诡异的带有神话动物的花纹。西周青铜器的特点:①铭文增长,内容多样,记述了不少重大的历史

① 王晖:《西周春秋吴都迁徙考》,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②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第33—35页。

③ 刘起钎:《周初的“三监”与邶、庸、卫三国及卫康叔封地问题》,《历史地理》第2辑,1982年。

事件。②西周中期种类有了比较大的变化。酒器类减少或消失，如觚、尊、卣、角、爵等逐渐减少。乐器增多，这时钟出现了，纹饰简化，并出现图案化，流行带状花纹。从字体上看，波磔减少了，遒劲雄厚的字体风格逐渐消失了，而字体整齐化的玉箸体出现了。③西周后期，文字完全整齐化，行款横行竖排皆行列规整，进展为玉箸体，应即传统所说的“大篆”体，亦即籀体。而这时实用器盛行，簠、盨、匜等均为新器类型。

2. 春秋时期出土重要文字资料及考古遗址。

安徽寿县蔡昭侯墓出土文物。1955年在安徽寿县蔡昭侯墓中出土了春秋蔡国蔡侯诸多青铜器与吴王光（阖庐，夫差之父）鉴等器，揭示了蔡国的衰亡史及与吴国的交往，是研究春秋末期吴楚及蔡国历史的重要史料。

春秋秦都雍城遗址。秦都雍城的考古发掘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81—1984年在马家庄一号大型建筑基址的发掘，1977年至1984年在南指挥村附近秦公陵区一号大墓的发掘，对了解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公室墓葬制度及其社会组织、等级制度的状况有很大的作用（《凤翔秦公陵园钻探与试掘简报》，载《文物》1983年第7期；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载《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山西侯马出土的春秋晋国赵氏家族盟书。关于侯马盟书的年代，大致有三说：一、战国初期（唐兰）；二、春秋末期（张颌）；三、春秋中期（李裕民）。我们认为可能属于春秋末期。春秋时期各国诸侯之间、诸侯与卿大夫之间经常有盟誓，名为载书。侯马盟书像是春秋末期晋国赵氏家族内部的盟书，都是用朱笔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盟主是赵氏，有的名嘉，也有作“子赵孟”的。盟书大意是盟主和同盟者之间的誓约，共同讨伐敌人。被讨伐的有“赵尼及其子孙”，还有先氏等。盟书中两次提“中行寅”，即荀寅，所以这盟书很可能反映了赵鞅与荀寅、范吉射之间斗争的历史事实。这批盟书已编为《侯马盟书》，由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可供参考。

另外，1980年至1982年河南文物研究所发掘了河南温县武德镇西张计村东周时盟誓遗址，出土了四千五百多片石圭、石简、石璋，其上有盟誓文字。这些被称之为“温县盟书”，其内容和体例与侯马盟书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重要的是所出盟书许多盟辞有“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朔辛酉”的纪年，对推定温县盟书及侯马盟书的年代和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见《文物》1983年第3期）。

湖北随县曾国曾侯乙墓有铭青铜器群，其时代在春秋至战国早期。《春秋》及《左传》上记载只有一个随国，并无曾国，于是学者称之为“曾国之谜”。曾国是否随国，至今有异议。但如果没有金文资料的发现，我们便

不会知道春秋至战国初还有一个曾国的存在。曾侯乙墓共出土随葬品 15400 件，而出土的青铜礼器达 117 件。其墓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是出土了大批的乐器，乐器共有 125 件，乐器保存完好，品类齐全，不少乐器前所未见。这对先秦音乐史的研究帮助很大。特别是编钟多达 65 件，上下有三层；上两层悬挂石磬四组 32 件。编磬、磬匣上都有铭文，总计 4000 字，错金钟铭达 2800 字。编钟隧部与鼓部标明音乐之名，而且有乐律铭文，记载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乐，表示曾国、楚国与晋国律名的变化关系，经测定完全符合。另外曾侯乙墓出土的文字资料还有 240 多支竹简，6600 多字，详细记录了丧葬仪式所用的车马兵甲，有助于考察当时的丧葬制度。可参看湖北博物馆编的《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 1989 年出版。

3. 金文著录书籍简介

商周金文是第一手的史料，为当时人铸刻真迹，史料价值很高，反映的历史内容可信，不容怀疑。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序言》说：“现在只就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来说，篇幅短长，由一两个字到几百个字，都真实的具备了当时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某一方面或多方面的史影。如果先通过文字上的考证，体会各个铭文的意义，再进一步作综合性研究，结合遗迹与遗物，结合契文与文献，相互证发，它是会向我们说话的，有些铭文还有年月日可稽，这都能够补填商周史大部分的空白，它是最新鲜最可靠不过的宝贵史料。”^① 于氏此言诚是，商周金文是研究商周史极可宝贵的史料。下面我们对周代金文作些简介。

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开始于北宋时代。最早开创金石之学的是宋仁宗时的刘敞，他首先把自家所藏 11 件古器摹铭文，绘图像，刊于其石，命名为《先秦古器图碑》，不过已失佚。他的《先秦古器记》提出了研究古代器物之法，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金石学专著。其后有欧阳修《集古录跋尾》10 卷，可参看《四部丛刊》集部的《欧阳文忠公集》；吕大临《考古图》10 卷，成书于 1092 年，是现存最早的也是较有系统性的古器物图录；王黼《宣和博古图录》30 卷，1123 年。上后两部书所收录的古器物都有图形，附有考释，并著了器物的比例、款识、大小及容量重量，还注明了古器物的出土地点与收藏处。南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20 卷，写成于 1144 年，其书将金文分为夏、殷、周、秦、汉几类，还试图解读铭文。此外，还有王厚之的《复斋钟鼎款识》、王隸的《啸古堂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无名氏《续考古图》等书。为宋人所发现的商周金文资料，是最早全

^① 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文著录的书籍，只是不为拓本，而为摹刻，故有失真之处。

到了清代，元明一度衰退的金石学再次复兴。清初有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6卷，乾隆年间御修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和《西清续鉴乙编》四书，共收录清宫所藏铜器多达4000余件，不过其中伪器甚多。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法帖》10卷，1804年成书，此书注重收录铜器、铭文拓片并作了考证与释文。道光末年徐桐柏《从古堂款识学》16卷，1886年问世，著录并考释了360多器；清末吴式芬《捭古录金文》3卷，1895年成书，考释铜器1300多器；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30卷，1899年成书，亦考释铜器1300多器；吴大澂《说文古籀补》14卷，1884年成书，依据《说文》部首整理铜器铭文；孙诒让《古籀拾遗》3卷，1888年成书，致力于纠正薛尚功、阮元等人的错误。

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片》18卷，1935年成书，此书与罗振玉著录的金文拓本为其时集大成之作。罗振玉1931年著有《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还有《三代吉金文存》20卷，原1937年自印本，中华书局于1983年有影印本。《三代吉金文存》是现代学者在《金文总集》与《殷周金文集成》出版前所使用最广泛的本子，收集了民国时期至20世纪30年代初传世青铜器的铭文资料，这部书是罗氏晚年精心制作的作品。他早年即留心于古文字资料，凡甲骨金文、简牍、石刻、货币、金印、陶文、碑帖等，精心搜集、鉴别，乐此不倦。1936年罗氏将毕生所藏金文拓片编辑成书，影印出版，过三年罗氏便去世了。此书是20世纪30年代一部质量较高的金文合集，为其后学者研究金文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全书收商周青铜铭文4800多篇，传世拓本大部收藏其中。拓片精良，鉴别严格，印制也尽善尽美。但其书也有缺点，有关器形、出土地、著录原书、收藏情况皆未说明，亦无铭文考释。另外其书也有个别错误及伪片，可参看中华书局影印本书后所附孙稚维《三代吉金文存辨正》一文。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金文汇集、著录与释读中，依据出土地进行分类是一个特色。柯昌济《金文分域编》，余园丛刻第2种，1935年成书。《金文分域续编》，新新印书局，1937年成书，此书不仅依据出土地点分类，而且也根据编年进行分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新出金文分域简目》，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其书所收1949年以来至1981年底公开发表的各种殷周至战国时期的金文资料，均是依据出土地点收录；每项发现都是先标明地点、年代和性质（窖藏、墓葬或个别铜器），再简述其出土情况和资料来源，并进一步将所出有铭文的铜器逐一列举；另外后面还附录了同出无铭铜器的情况和有关的参考文献。这些都是有助于研究者根据地域来研

究金文分布情况的。依各器出土地点进行著录的还有：黄濬《邶中片羽》初集、二集、三集，1935—1942年，著录了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孙海波《新郑彝器》（1938年影印本）与关百益《郑豕古器图录》12卷（1940年），这两书著录了20世纪30年代在河南新郑出土的青铜器。刘节《楚器图释》，国立北平图书馆，1935年，著录了湖北寿县出土的青铜器。徐乃昌著有《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著于1936年。

于省吾《双剑谿吉金图录》，1938年影印本。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收器616件。其书收录原则，是《三代》（即《三代吉金文存》）没有收录的，则收录之，凡与他书重复者，多是作者认为拓片精度超过他书才收录。^①因此《录遗》所收录的金文拓片一般都比较精良，值得学习研究者参阅。

建国后青铜器及其铭文著录的书籍有：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编《寿县蔡侯墓出土文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山东文物管理处、山东省博物馆编《山东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藏青铜器图释》，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王献唐《黄县冥器》，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上海博物馆编《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中国古青铜器选》，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1至4册），文物出版社，1979—1984年；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编写组《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编《山西出土文物》，1980年；山东省博物馆编《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3年版；吴镇烽《陕西金文汇编》上下二册，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

台湾严一萍编《金文总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83年12月版。编辑宋到1983年6月所出土先秦铜器铭文，共有8000余篇，是比较齐全的金文著录书籍，遗憾的是此书见之不易。《金文总集》兼收个别铅器、金银器和铁器的铭文，但数量少。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的《殷周金文集成》，1—18册，中华书局1984年始出，1994年出齐。收集所有传世与发掘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拓片，精选善

^① 对这一点于老说：“常常有人问道，你所稀罕的拓本，顶长的有多少字？我对这样问法，便不以为然，当然愈长愈好。可是我认为已经著录的固然应该珍视，而未著录的，哪怕是一两个字，或与已著录的同文而点画有些出入，并不削弱我的重视性，自称：‘多年来对于墨本的爱好与搜寻，曾不遗余力。’因为它或多或少的对于我们研究上都能有些启发。”（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序言》）

拓，去伪存真，以器类编排，以字数多少为序，收器多达万件以上，是目前商周金文集大成者。其书的特点和去处有以下几个方面：①金文资料基本齐备。②对传世品的器物 and 铭文去伪存真，剔除伪器，对前人著录中的错误作了校正。③文字说明简明扼要，同时又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有关参考资料。④编排方式，以器类为纲，按字数从少到多编排。⑤关于器物的年代、国别和同组、同坑关系等项，分别在各个分册的文字说明和全书末尾的辅助索引中加以解决。⑥收录的金文资料，包括殷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各类器物，年代下限到秦统一以前。依此可见，这一套金文总集体例也是比较完善的。《殷周金文集成》所收商代至秦统一前铜器铭文共 11983 件，除铜器外，还兼收了数量很少的铅器、金银器和铁器铭文。与过去出版的金文集录相比，《三代吉金文存》和《商周金文录遗》收器合计 5447 件，《殷周金文集成》增多 1.2 倍；台湾曾出版《金文总集》和《商周金文集成》二书各收器 8000 余件，《殷周金文集成》增多三分之一以上。故其书是目前所见金文集录最多最全的一套书。2001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张亚初编著的《殷周金文集成引得》，此书不仅有《殷周金文集成》的释文，还有其书的引得检索。按照《殷周金文集成》出现的单字收集排列所有出现在其书中金文铭文句子，可依照金文笔划进行检索。这些释文及其各种青铜器器铭文字的引得对引用《殷周金文集成》的资料是十分方便的。

另外，对流落海外的青铜器，建国前后也均有著录。建国前著录的有容庚《海外吉金图录》2 卷（1935 年），陈梦家《海外中国铜器精华》第 1 集（1946 年）。建国后著录的有陈梦家编《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 1963 年版。巴纳、张光裕编《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台湾艺文印书馆 1978 年版。李学勤、艾兰《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文物出版社 1995 年版。

西周春秋金文文字考释的专著。杨树达著有《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中华书局 1997 年版。此书是杨树达考释研究青铜器铭文的专著，全书共有 381 篇，分析解释 314 件铜器铭文。杨氏自言平生喜为经史诸子校勘之学，私独好高邮王氏所著书，并以王念孙校书之法治铜器彝铭，“每释一器，首求字形之无悞，终期文义之大安，初因字以求义，继复因义而定字。义有不合，则活用其字形，借助于文法，乞灵于声韵，以假读通之”（《积微居金文说·自序》）。此书是研究青铜器铭文的重要工具书。

有关青铜器铭文研究的书籍有：郭沫若的《金文丛考》、《金文韵读补遗》、《金文余释》、《金文余释之余》、《器名考释》、《金文续考》，今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 5 卷，《金文丛考补录》今收入《郭沫若全集》考

古编第6卷之中。美籍华人张光直等著《商周青铜器与铭文的综合研究》，发表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62辑，1973年。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李学勤《四海寻珍》，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故宫博物院编《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蔡运章《甲骨金文与古史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高明《高明论著选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吴镇烽《考古文选》，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懋镕《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上述考释青铜器铭文的论著皆可参读。

青铜器铭文资料索引式的工具书有孙稚维《青铜器论文索引》，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此书收录了1982年以前发表的各种论文集和报纸杂志上有关青铜器和金文研究的中文论著论文，译文酌情选录。吴镇烽的《金文人名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此书是汇集了传世与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共5228条，人名词头用字1562个，分别依笔画加以编纂，并依据铭文和文献记载，对每个人名作了简单的介绍，具有比较方便的索引作用。

下面再介绍一些有释文有断代的金文著录书籍。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原科学出版社1958年增订本。今改由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出版，分上下两大册；亦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7、8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此书有图，有释文也有考证，以年代排列，是研究西周春秋时代历史的珍贵资料。此书是作者在1933年于日本所出《两周金文辞大系》初版基础上增订许多新资料新考释而成。作者对历代相传与近代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作了系统的整理，在数以千计的铜器铭文中，选择了有重要史料价值的铭文加以考释。作者先考定年代，辨别国别。对西周铜器，以铭文本身为依据，参验字体、辞例、事件、形制与花纹确定王世与年代，考定周铜器160多件。对东周时代铜器，据铭文以反映的国别，分为30多国，每国之下依时代先后排列，共列器160余件。另外，作者对西周青铜器的铭文作了历史与社会方面的分析研究，对西周时代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初学者也可将其书作为入门书阅读，其书有释字、分析字形与历史方面的研究分析，值得仔细阅读。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此书是唐氏多年来对西周青铜器进行综合研究的成果。只可惜作者初稿未完成便谢世了，后由其子唐复年整理出版。唐氏此书与郭氏《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相近，以西周王世年代排列诸器。此书在王世之中还加了周公摄政七年的一节，在正文部分，有拓片，有释文及考释。释文比郭氏更详，考释文

字更严格。但由于未完成，给人虎头蛇尾的感觉。在书后一部分增加了两个附件，附件一系作者于1976年初撰写本书前所作的目录及释文。其中武王至昭王穆王时代的一部分已见于正文，余下的包括穆王时代的另一部分和共王、夷王时代部分均列入，另外历年已发表的个别青铜器铭的考证与意释，也按相应的时代转录进去了。附件二是列入附件一的目录中但未作释文者，以及厉王以后部分器物名称，这也是按历年发表的论文中所涉及的青铜器名摘录入相应的部分。《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既可以作为研究西周历史与文化的资料，也可以作为初学入门向导书籍去学习阅读。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一）至（六）；（一）《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二）第十册（1955年）；（三）、（四）、（五）、（六），即1956年1期—4期，但未发表完，只到周孝王时代，后面则没有了。陈氏断代与郭、唐有同有异，只是无拓片（个别有），但释文较详，还有不少专题研究，如穆王“长由盃”后附有《兼论早期钟的发展》、《附记玉戈铭》等。另外，对铭文原著录及出土、收藏与背景情况有比较详尽的介绍。此系列断代论文可作为资料引用，也可作学习金文的参考阅读教材。此连载西周铜器断代内容，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学者整理，由中华书局以《西周铜器断代》为名分上下册于2004年出版。

日本学者白川静《金文通释》1—56辑，白鹤美术馆志，1964—1984年出版。此书也是对西周金文作系统考释与研究的专著。其书将西周金文按王世排列，对同一王世的金文则按同人、同族、同国别、同官职来集中排列各器铭文。东周器铭则分为西北、中土、东土、南土四部分，每部又按国别排列各器铭文。而且对每一器都注明了有关时代的各种说法、出土地点、收藏情况、著录书名以及考释论著的索引，全书末还附有金文词语的索引，是目前最方便查阅使用金文资料的专著。

刘启益《西周纪年》，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论西周纪年，下编论西周铜器断代。作者是以青铜器类型研究、铜器铭文所记月相、出土青铜器的“共生关系”，作为其青铜器断代方法的三要素来进行研究的。

从考古学方面对青铜器的实测、纹饰、器型、铭文释义及其考证、拓本等进行研究，早期有容庚《武英殿彝器图录》（1934年），1941年他在《燕京学报》专号第17辑发表了《商周彝器通考》，容庚、张维持还撰著了《殷周青铜器通论》，发表于《考古学专刊》丙种2，1958年。近年来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著《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此书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成果之一。此书注意收集西周铜器中比较典

型的资料，如西周高级贵族大墓发掘出土的铜器，保存情况较好的西周青铜器窖藏，传世铜器中的成组铜器，零星出土和传世品中的标准器，一些有重要铭文的铜器，特别是年月历日四要素齐全的铜器，从上述五类铜器的图像资料中，选取比较常见的器类，有鬲、簋、尊、卣、壶、方彝、盘、钟 11 类的 352 件标本，像田野考古报告那样，逐类按其形制进行详细的分型、分式。例如簋类青铜器分为五型：圈足簋、旌簋、四足簋、三足簋、高足簋，等等；再根据形制和纹饰的差异，将各型器物分为若干式。然后，逐件说明标本形制和纹饰的特点，出土地点、现藏处、尺寸、铭文内容及其与其他器物关联情况，以及它们的大体年代。此书是西周铜器断代最新、资料挑选最好的一本铜器年代学论著。

春秋时除金文、侯马盟书外，在文字资料方面还有石刻文字。唐代出土于今凤翔之畦原的秦石鼓文，韩愈曾写诗歌颂石鼓文的文字。石鼓文刻在十个鼓型的圆形石头上，一石一首诗，共十首合为一组。其内容主要为狩猎渔牧活动，时代约在春秋晚期，也有学者认为是战国时代的秦国刻石。其早期的拓片文字考释及研究可见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另外郭氏还著有《诅楚文》研究，今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 9 卷，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另外研究周代金文资料，清代一些经典的文字训诂方面的成果以及工具书也是需要学习参考的。例如阮元的《经籍纂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以及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 1993 年版），都是需要参阅的重要工具书。特别是近年来由宗福邦、陈世铤、萧海波主编的商务印书馆 2003 年出版的《故训汇纂》，吸收了《经籍纂诂》之长，但除了经史子集故训之外，还扩充到近代笔记和佛经注释，其内容比《经籍纂诂》多四倍；而且编排体例比《经籍纂诂》合理，既有音序检索，也有部首检索，比《经籍纂诂》依《佩文韵府》编排一韵一部的编排检索起来方便多了。



第五章 战国秦朝时期

前已讲过战国文献有《竹书纪年》、《世本》、《楚辞》等，前两种为比较纯粹的历史学资料类；后一种为文学史的史料，但也提供了传说时代及西周春秋以及战国时的有关史料。下面介绍战国时代的古文献资料。前面已介绍过一些内容或人物属于西周或春秋时期，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文献；本章则主要介绍内容、人物及成书皆为战国时期的文献。还特别要介绍一些过去被怀疑是伪书，而通过新出的秦汉简帛资料证明怀疑错了的战国文献资料。

一 战国时期的古代史著和现代史著

1. 战国时期专门性史学论著的产生、繁荣及其史著四体说

《孟子·离娄下》记孟子之语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梲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所言是对的，专门性的史学论著是春秋时期才兴起的。虽为初起，但呈现出了一时的繁荣之状。尽管缺乏鸿篇巨制，但著史者之多却是后世难以比拟的——因秦汉以来除了皇室责令史官著史外，地方政府和私人著史一般是犯禁的（除个别情况）。然而春秋战国诸侯方国纷纷著史，故为时虽不长，而为数却不少。《庄子·天下》篇说“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可见战国时期“旧法世传之史”甚多。如晋之《乘》，楚之《梲杌》，鲁之《春秋》，另外《春秋》也是各国史书的通称。《墨子·明鬼下》谓其时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隋书·李德林传》及《史通·六家》均引《墨子》篇有《百国春秋》；《史通·六家》引汲冢《璣语》中有记太（文）丁时事的《夏殷春秋》；还有记晋献公十七年之事的《晋春秋》，等等。说明在战国时流传的诸侯百国的《春秋》是很多的。

然而春秋战国时期专门性的史学著作种类也不少，并不限于春秋一类。以笔者所见，其时史著大致可分为四类：春秋类、世系类、古史志类、记言

体史记类。《国语·楚语上》申叔时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韦昭注说“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世，谓先王之世系也”，“语，治国之善语”，“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五帝之书”。上述五类用来教育王公大臣及贵族子弟的历史教科书，可归纳为四类：1. 春秋类。此即我们今天仍能看到的鲁国《春秋》一类，战国时魏国的《竹书纪年》也属于这一类。不过各国名称不一，楚国称《梲杌》，晋国称《乘》，鲁称《春秋》。《左传》文公十五年载宋华耦说“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此“诸侯之策”就是春秋时期各国的《春秋》一类史书。2. 世系类。此即《世本》之类的史书。3. 古史志类。“故志”是专记前代兴衰成败的书，《逸周书·史记》及《左传》成公十五年子臧所引《前志》、文公二年所引《周志》、昭公元年子产所引《故志》均是此类。4. 记言体史记类。“语”和“训典”可归为一类，其区别是“语”是先王时代王及众臣的“治国之善语”，而“训典”是传说五帝时的帝与众臣的“治国之善语”。前者如《国语》、《春秋后语》及《尚书》的《周书》、《商书》、《夏书》，后者如《尚书》中的《尧典》、《舜典》、《皋陶谟》。《庄子·齐物论》谓“《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把春秋类、世系类、古史志类三种史著并列，说明三种史书作用虽有区别，地位却相当。

这四种都是专门的史学类著作，虽然类别不同，但都是为了达到历史的教育借鉴作用而作的：“春秋”类史书是为了“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世本”类史书是为了“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专记前世成败的古史著述——“故志”，是为了使后人“知废兴者而戒惧焉”；而专记历史人物言语的“语”与“训典”，是为了“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以及明德行义的。只是这里所说的“故志”与记言体史记类“语”与“训典”，还未引起学术界的充分认识，在此有必要作些探讨。

2. “故志”：春秋战国时的古代史著

笔者认为，《春秋》之类的史书由于是以“天时纪人事”，也就是以年、季节（春夏秋冬）、月、日记人事，实际上这就是近似“实录”性的现代史，是以“耸善抑恶”来“戒劝其心”，“惩恶而劝善”（《左传》成公十四年），是用来“道名分”的（《庄子·天下》）。《世本》与“故志”则相当于古代史，《世本》是专门为贵族阶层编纂的宗族谱系。刘向称《世本》是“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录黄帝以来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故

志”类是“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的史籍。“故志”类史书是中国古代特殊的、仅见于先秦时期的一类史书，其编写体例是独特的，其教育目的是鲜明的。

《墨子·非命下》说“昔纣执有命而行，武王为《太誓·去（太子）发》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上，皆无之。……’”古籍中“记”与“志”音同而通用，《墨子》中的“商周虞夏之《记》”以及《左传》文公六年史佚所引《前志》应与《楚语上》中的“故志”类相近。商周虞夏均有《记》，可知这类古史类的史记内容不少。仅《左传》中所引就有不少，如《左传》成公四年有《史佚之志》，成公十五年有《前志》，昭公元年有《故志》。但这种《志》的内容多是警句、训言或某种道德信条：

《左传》成十五年子臧曰：“《前志》有之曰：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

《左传》襄四年：“君子曰：《志》所谓‘多行无礼，必自及也。’……”

《左传》襄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左传》昭三年鲁穆叔引《志》曰：“能敬无灾。”又曰：“敬逆来者，天所福也。”

《左传》昭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

从表面看这种警句训言根本不像古史类史记的内容，而实际上这类警句训言正是从大量古史事实中概括总结出来的。《国语·楚语上》楚大夫范无宇对楚灵王使者所说的下一段话正好可说明这一问题：

其在《志》也，国为大城，未有利也。昔郑有京、栢，卫有蒲、戚，宋有萧、蒙，鲁有弁、费，齐有渠丘，晋有曲沃，秦有徵、衡。叔段以京患庄公，郑几不克；栢人寔使郑子不得其位；卫蒲、戚寔出献公；宋萧、蒙寔弑昭公；鲁弁、费寔弱襄公；齐渠丘寔杀无知；晋曲沃寔纳齐师，秦徵、衡寔难桓、景。皆志于诸侯，此其不利者也。

从上可见，《志》所说“国为大城，未有利也”正是从春秋时期诸侯各国所

经历的大量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来的。这段引语“故志”类史记的体例，先写警句训语名言，然后印证历史事实。这种警句训言的背后是历史的沉痛教训，甚至是血的代价，其分量是沉甸甸的，古人面对着这种警句训语是不敢忽视的。这类《故志》还有一些是由盲人代代口耳相传下来的“口传史料”，到春秋战国时才由学者写成文字成书的。《国语·晋语四》子犯引《瞽史记》曰“嗣续其祖，如谷之滋”，这是春秋战国时学者把瞽盲代代相传古史资料记录而成为《瞽史记》的。不过，春秋战国的载籍中对这种《故志》的记载都是不完整的，多为只言片语。

《庄子·天下》篇说“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可知战国时期“旧法世传之史”甚多。春秋战国时期的史学著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春秋类，二为世系类，三为古史志类。遗憾的是，这类故《志》都已经散佚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逸周书·史记》：

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惊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闻，信不行，义不立，则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乱，皮氏以亡。谄谀日近，方正日远，则邪人专国政禁而生乱，华氏以亡。好货财珍怪，则邪人进，邪人进，则贤良日蔽而远，赏罚无位，随财而行，夏后氏以亡。严兵而不仁者，其臣慑。其臣慑则不敢忠，不敢忠则民不亲其吏，刑始于亲，远者寒心，殷商以亡。乐专于君者，权专于臣。权专于臣则刑专于民，君娱于乐，臣争于权，民尽于刑，有虞氏以亡。奉孤以专命者，谋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挟德而责数日疏，位均而争，平林以亡。大臣有锢职哗诛者危。昔者质沙三卿，朝而无礼，君怒而久拘之，哗而弗加，三卿谋变，质沙以亡。外内相闲，下挠其民，民无所附，三苗以亡。弱小在强大之间，存亡将由之，则无天命矣，不知命者死。有夏之方兴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国亡。嬖子两重者亡。昔者义渠氏有两子，异母皆重，君疾，大臣分党而争，义渠以亡。功大不赏者危。昔平州之臣，功大而不赏，谄臣日贵，功臣日怒而生变，平州之君以走出。召远不亲者危。昔有林氏召离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礼，留而弗亲，离戎逃而去之，林氏诛之，天下叛林氏。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专事，强力而不信其臣，忠良皆伏，榆州氏伐之，君孤而无使，曲集以亡。昔者有巢氏有乱臣而贵，任之以国，假之以权，擅国而主断，君已而夺之，臣怒而生变，有巢以亡。斧小不胜柯者亡。昔有郟君啬俭，减爵损禄，群臣卑让，上下不临，后郟小弱，

禁罚不行，重氏伐之，郟君以亡。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贤，自以无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乱，民无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犯难争权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争权，林氏再战而胜，上衡氏伪义弗克，俱身死国亡。知能均而不亲，并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贵宠，力钧势敌，竞进争权，下争朋党，君弗能禁，南氏以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内争朋党，阴事外权，有果氏以亡。爵重禄轻，比口不成者亡。昔有毕程氏，损禄增爵，群臣貌匱，比而戾民，毕程氏以亡。好变故易常者亡。昔阳氏之君，自伐而好变，事无故业，官无定位，民运于下，阳氏以亡。业形而愎者危。昔谷平之君，愎类无亲，破国弗克，业形用国，外内相援，谷平以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无已，诛战不休，并兼无亲，文无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于独鹿，诸侯畔之，阪泉以亡。佞而无亲者亡。昔者县宗之君佞而无听，执事不从，宗职者疑发大事，群臣解体，国无立功，县宗以亡。昔者玄都贤鬼道，废人事天，谋臣不用，龟策是从，神巫用国，哲士在外，玄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无位，惠而好赏，财屈而无以赏，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美女破国，昔者绩阳强力四征，重丘遗之美女，绩阳之君悦之，荧惑不治，大臣争权，远近不相听，国分为二。官室破国。昔者有洛氏，官室无常，池圃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休，农失其时，饥馑无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

《逸周书·史记》篇一开始便说：“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惊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言之，朔望以闻。”“遂事”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解为“往事”是对的。这就是说周王^①清晨起床想起往事，甚为震惊，便选择往事中最重要的以为戒备，让左史戎夫在每月的朔望日来读。《逸周书·史记》篇历述古代诸侯方国部族的灭亡之事，有皮氏、华氏、夏后氏、殷商、有虞氏、平林、质沙、三苗、扈氏、义渠氏、平州、有林氏、曲集、有巢、有郟君、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毕程氏、阳氏、谷平、阪泉氏、县宗、玄都、西夏、绩阳、有洛氏等方国氏族覆灭的情况及其原因。所举灭亡原因有“宫室破

^① 今本《竹书纪年》谓周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记”，《逸周书·史记》篇亦有“左史戎夫”，可知应为周穆王之时。但依其文有“义渠氏”，“义渠氏”亡于战国，以此看，此篇大概写于战国时期。

国”、“美女破国”、“文武不行者亡”、“贤鬼道，废人事天”、“佞而无亲者亡”、“武不止者亡”、“业行而悞者亡”、“好变故易常者亡”、“爵重禄轻，比口不成者亡”、“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知能均而不亲，并重事君者危”、“犯难争权疑者死”、“久空重位者危”、“斧小不胜柯者亡”、“召远不亲者危”、“功大不赏者危”、“嬖子两重者亡”、“大臣有锢职哗诛者危”、“谄谀日近，方正日远，则邪人专国政”等等。这些都是对亡国亡族者原因的很好的总结，其目的就是“知废兴者而戒惧焉”，“人求多闻善败以监（鉴）戒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使后来者避免重蹈覆辙，人们对历史也就更加重视了，人们评论历史、以古喻今、以史为鉴的风气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就形成了。

看来《韩非子·亡征》篇与《逸周书·史记》是有源流关系的。如《逸周书·史记》云“昔者玄都贤鬼道，废人事天，谋臣不用，龟策是从，神巫用国，哲士在外，玄都以亡”，《韩非子·亡征》云“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逸周书·史记》云“佞而无亲者亡。昔者县宗之君佞而无听，执事不从，宗职者疑，发大事，群臣解体，国无立功，县宗以亡”，《亡征》云“很刚而不和，悞谏而好胜，不顾社稷而轻为自信者，可亡也”；等等。《韩非子·亡征》的内容与《逸周书·史记》相比虽有所增加和字句的修改，但仍可以看出前者继承后者的内容甚多。

3. “语”与“训典”：春秋战国时期的记言体史著

《国语·楚语上》楚大夫申叔时说“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也”，其实“训典”类性质与“语”体相似，只是“训典”类时代甚早，且皆为上古圣王先臣所言，而为人特别看重罢了。因此韦昭注谓“语”是“治国之善语”，而谓“训典”是“五帝之书”。不过，“训典”类不限于五帝时期。例如《逸周书·常训》篇有“允德以慎”，“慎微以始，而敬终不困”，《左传》二十五年引此称《书》；《逸周书·程典》篇有“于安思危，于始思终”，《左传》襄公十一年引此称《书》；《国语·郑语》记有关褒姒孕育及出生的神话而称《训语》，韦昭注云“《训语》，周《书》”；《左传》襄公四年记有穷后羿兴亡之事而称《夏训》；等等。可知记载传说中五帝及夏商周时代以言为主的史籍都可以称作“训”或“典”。

“语”与“训典”之所以被称作记言体史著，是因为这类史著记言常常是伴随着历史事件而出现的。《国语》是战国初期学者汇编春秋时代各国之《语》而成，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之语，其语多为士大夫之上的贵族阶层所言，但也有下层村夫之语，如《国语·晋语五》

记梁山崩后伯宗乘传车遇绛人之老所说一席话。这些记言体的诸国之《语》，是与历史记事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故应视为历史著作。这是因为这种记言体的诸国之《语》，是专职史官笔录而成的。《礼记·玉藻》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公羊传疏》卷一引《六艺论》谓“《春秋》者国史所记人君动作之事，左史所记为《春秋》，右史所记为《尚书》”；而《汉书·艺文志》则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两家说法中对左史、右史的行事记载截然相反。但无论如何，西周春秋时期记言史官与记事史官是分开的。记言的《尚书》类和记事的《春秋》类的都是史官的作品，均为历史著作无疑。

记言的《尚书》类和记事的《春秋》类在春秋战国之交汇合为一，这就是《左传》体。《史通·载言》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左传》之中，所引之语不但长，而且多，与后代的史书截然有别，显然是融合了记言体史著的内容而形成的特点。

二 战国秦朝时期的古文献资料

1. 《战国策》

《战国策》即战国时期士阶层的策略与说辞，也就是士大夫阶层游说国君的说辞，或为互相辩难时所言治国思想及政治军事策略。直到战国后期以及秦汉之间，有些学者据其说辞的性质或国别编定成书简，给游说之士提供学习揣摩的资料。但这时其书名并不固定，刘向《别录》在整理这些资料时发现这些书简的名称甚多，并不固定：“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刘向把这些皇室中秘所藏的这些简册编校成书，取名为《战国策》，并按国别分次排列，共有十二国别。今本有：《西周策》一篇；《东周策》一篇；《秦策》五篇；《齐策》六篇；《楚策》四篇；《赵策》四篇；《魏策》四篇；《韩策》三篇；《燕策》三篇；《宋卫策》一篇；《中山策》一篇。今本共12国33篇，刘向所校定的《战国策》也是33篇。但据宋代曾巩《战国策校序》言，据《崇文书目》言其时已阙11篇，曾巩四处访书于士大夫之家，才把33篇的书目补充完整。但是，刘向编定的《战国策》内容并未将战国时诸国策士的策略说辞全部囊括无遗。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发现了这种策士的说辞及策略言

行，主要是记载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等人书信、说辞的古佚书，由整理者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共 27 章，17000 多字，与《战国策》性质相同。其中有 11 章与《战国策》及《史记》的文字相同，其他 16 章则为《战国策》所无的古佚书，是刘向等学者在皇室中秘所未曾见到的，这是研究战国历史的新资料。可参看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整理《马王堆汉墓帛书·叁〈战国纵横家〉》，文物出版社 1976 年版。

这批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新资料，为我们提供了苏秦为燕反间和发动合纵攻秦的可信史料，学者们用这些资料来订正了《史记》及《战国策》中所载苏秦、苏厉、张仪的时代之误。唐兰考证编订出《苏秦事迹简表》，确定苏秦活动时间为公元前 312—284 年。杨宽也据帛书改写了《战国史》，他说：“今本《战国策》中所载张仪、苏秦游说的史料，真伪参半。1973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其中第一部分我们可以据此鉴别《史记》和《战国策》中所有苏秦史料的真伪。”（杨宽：《战国史》（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6 页）

《战国策》的作者，清人牟默，近人金德建、罗根泽等学者认为是楚汉之间的蒯通所作。主要理由有：一是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索隐谓刘向本《战国策》有《蒯通说韩信自立》一篇，此篇文字今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蒯通以相人之术暗劝韩信背刘自立：“相人何如”，“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而韩信曰：“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背义乎？”韩信不忍心背叛。此为原《战国策》中的《蒯通说韩信自立》文，今本已佚。其二是《史记》、《汉书》中说蒯通（本为蒯彻）曾为《隽永》八十一首，《史记·田儋列传》说蒯通“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汉书·蒯通传》谓蒯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亦自叙其说，凡八十一首，号曰《隽永》”。但现代大多数学者认为《战国策》本来不是一人一时所作，大概刘向所校《长书》、《短书》、《短长》是蒯通《隽永》，但说全为蒯通所作则非。《隽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最主要的史料。其价值在于：从周定王十六年（前 453 年）到秦二世元年（前 209 年），有 245 年多。《史记》述写这期间的史料，主要依据的是《战国策》。依宋王应麟《汉志考证》说《史记》采自《战国策》史料的有八九十事。所以《汉书·司马迁传》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

《战国策》是东汉高诱作注。版本有二：一是南宋姚宏本，一是南宋鲍彪本，今二本并行而多用姚本，姚本是校正并续注（高诱注只剩10篇），清黄丕烈重刻此书，附校刊札记3卷，便于使用。鲍本整理时，重订内容而合为10卷并加新注。鲍本详于姚本，但妄改文义，谬误较多。今有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战国策》，以姚本为底本，汇集有鲍、吴等人注文及黄丕烈的《战国策札记》，标点出版，并附有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释文，资料较全。另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有诸祖耿的《战国策集注汇考》（上中下）三册，是目前所见各种《战国策》注本中注释资料最为详备的一种，值得研究者参考。另外，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巴蜀书社1986年版；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的《战国策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也可参看。

2. 《墨子》

《墨子》相传是墨翟所作。其书确有墨翟的作品，也有墨子弟子的作品，如《公输》、《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等12篇，其书各篇章写作年代不一，大体在战国初期到中期之间。《墨子·备城门》、《备高临》等篇是研究战国军事战争特别是战争防御技术的重要资料，另外《墨经》也是研究逻辑学、哲学认识论以及科技史的最宝贵的资料。这方面谭戒甫编著的《墨经分类评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是最好的注译本。

《墨子》介绍了不少关于夏商西周春秋时代的史料，《墨子》引用史实的典型做法不是自叙历史，而是直接引用古书特别是古代《尚书》中的原文作证据，这是十分可贵的资料。《墨子》引书甚多：《夏书》、《夏箴》、《禹书》、《殷书》、《汤说》、《周书》、《周颂》等，先王之书《豎年》、《相年》、《术令》、《禹书·总德》篇。许多书今已不存。墨子所见古籍甚多，与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观念不同。他说“吾见百国《春秋》”并虔诚地相信而加以引用。《墨子·贵义》中讲了一件事：“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弦唐子见而怪之，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七十）土，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由此可见他对古书的喜好程度。如《非命上》、《非命下》、《非命中》引《太誓》的资料，另外还有《仲虺之告》、《三代不〔百〕国》、《召公之执命》等也被引用，《明鬼下》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这些书多已亡佚，便成为今日研究文献及其夏、商、西周及春秋时代的宝贵资料。《墨子·明鬼下》及《非攻下》叙述周武王克商后分了殷人的祭器并祭祀殷人先祖的说

法，正好在周原甲骨文中得到印证，说明其说有征，是很可宝贵的史料。^①

1957年1月在河南省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出土楚简《墨子》，共出土竹简148枚，共存470余字。经过整理，这一组竹简原来是一部竹书，记述的是一篇周公与申徒狄的谈话短文。其中保存字数最多的两枚竹简与《太平御览》卷八〇二中一段儒墨对话形式的《墨子》佚文“周公见申徒狄曰：‘贱人强气则罚至’”的内容、语气一致。同时，竹简文字中有一些明显是《墨子》中的语气，如“贱人”、“尚贤”等。因此李学勤先生认为这组竹简很可能就是《墨子》的佚篇。^②

《墨子》的注本最好的是清人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现收在中华书局版《诸子集成》第四册之中。《墨子》一书过去不受学者重视，脱误错字极多，但也较好地保存了古本面目。《墨子》中有许多古字而读错的地方，孙氏有古文字基础，改正错字，十分精当，许多校勘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其经验是值得总结的。于省吾《双剑谿墨子新证》（见《双剑谿诸子新证》，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清毕沅校注、吴旭民标点的《墨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亦值得参阅。

3. 《庄子》

《庄子》是战国中期（约前369—前286年）庄周及其弟子所作，是先秦时期道家学派的主要著作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有52篇，今现存33篇，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学术界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的作品，而外篇与杂篇是庄周弟子与庄周学派的作品。庄子继承老子的思想，认为世界的本源是“道”，“道”是神秘而不可知的精神实体；其认识论是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主张虚无主义的人生观；主张“绝圣弃智”，毁弃一切物质文明，回到原始社会人畜不分的原始社会；并揭露和批判了统治阶级的残忍和各种社会阴暗面，对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以及法家的刑法都进行了批判。《庄子》一书也包含了战国时期特别是诸子各家的有关资料。《庄子·天下》篇批评了当时诸子百家的学说，并论述了各家的学术渊源关系，与《荀子·非十二子》一起被学者视作研究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学术史的重要资料。

1988年出土于湖北江陵张家山136号汉墓的张家山汉简中有《庄子·

① 王晖：《周原甲骨属性与商周之际祭礼的变化》，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② 李学勤：《长关台竹简中的〈墨子〉佚篇》，《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盗跖》^①，现存44枚竹简，原有自题篇名作《盗跖》，字迹比较潦草，内容完整，有1692字，记述孔子见盗跖之事，应是今本《庄子·外篇·盗跖》。汉简本《盗跖》与今本《庄子·盗跖》只有第一章很相似，余则差别比较大。另外1977年出土于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汉初竹简有《庄子·杂篇》，现在存有竹简8枚，无书名篇名，其中1枚见传世本《庄子·外篇·则阳》，1枚见《让王》，6枚见《庄子·外篇·外物》篇。与传世本相比，汉简本《外物》文字简洁精炼，与传世本差别比较大。

中华书局出版的《诸子集成》第三册收有清人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和郭庆藩注的《庄子集释》，可以参阅。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有两部书的点校单行本，便于初学者参阅。

4. 《商君书》

《商君书》是研究战国法家学派的代表作，记述了战国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言行。有的学者认为是战国末期秦国法家托名商鞅而作，但大部分是研究商鞅思想和事迹的重要史料，《史记·商君列传》主要是依据此书而写成的。《汉书·艺文志》法家类有《商君》29篇，然今本只有24篇。其中绝大多数篇章是论述农战、军功、法治、政治、经济、君权、兵家等政治军事方面的问题，第1篇《更法》、《壹言》反映了商鞅变法的主张与思想；《垦令》、《农战》、《说民》、《算地》、《开塞》、《徠民》等反映了商鞅重农思想及其相关的改革措施；《去强》、《错法》、《刑约》、《赏刑》等反映了商鞅重视刑法的法治思想；《战法》、《立本》、《兵守》、《靳令》等反映了商鞅重视军事的思想及其方针政策；《外内》、《君臣》、《禁使》、《慎法》、《定分》等反映了商鞅加强君权统治手段的主张和策略。

中华书局出版的《诸子集成》第五册收有严万里校正的《商君书》，可以参看。

5. 《孟子》

《孟子》是孟子弟子所记孟子言行的书籍，是儒家的重要史料，其中涉及到战国中期的许多历史资料。《孟子》所述传说时代的资料，尤其是三代及尧舜时代的资料十分丰富。其书史料主要价值有二：（1）关于周代制度、土地制度，尤其是井田制，说得最全也最充分。学术界对此或以为是孟子的理想，或以为周代实际存在（我以为是实际存在的）；周室班爵禄制（五等爵制度），也是《孟子》说的最全最明确，过去许多学者怀疑，现经考古古文字资料证明，应该说是存在的。夏商西周劳役地租与实物地租“贡”、

^①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载《文物》1992年第9期。

“助”、“彻”制度的区别，在《孟子》中也是十分详细的。(2) 记述实行禅让制的尧舜时代及由禅让制向世袭制转变的古史传说。《万章》上下等篇历述关于尧、舜、禹、启、丹朱、益、伊尹、周公特别是舜的惊险故事、伊尹的传说、百里奚的传说、伯夷、柳下惠的故事；从周室班禄制度到齐景公虞人维护礼制的故事，其历史资料十分丰富。《告子》篇历举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等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从苦难中发迹的故事，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阐述人在艰难困苦环境中锻炼成长的思想，千百年来成为仁人志士的座右铭。

值得注意的是，新近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中有一部分，有学者认为是《子思子》，亦即孔子孙子孔伋的著作。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郭店楚墓竹简的作者当不会晚于孟子。通过郭店楚墓竹简可见从子思到孟子儒学发展的链环，为研究孟子思想的来源及其新发展情况提供了新资料。^①

东汉赵岐为《孟子》作注，宋人作疏，收入阮元刻《十三经注疏》中。清人焦循有《孟子正义》，收在《诸子集成》中，中华书局版。另外，朱熹的《孟子集注》，收入“四书五经”中，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单行本。《孟子》一书的译注研究成果以《孟子译注》最具盛名，此书1960年北京中华书局初版署名“兰州大学中文系孟子译注小组著”，1962年上海第三次印刷署名“杨伯峻编著、兰州大学中文系孟子译注小组修订”，是一种比较好的译本，也是注释简明的普及读物。近现代《孟子》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的有杨化之编的《孟子研究集》（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3年版）、朱迁献的《孔孟研究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及《论孟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吴康等人的《孟子思想研究论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以及孔孟学研究丛书编委会主编的《孟子研究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值得参看。

6. 《荀子》

荀子是先秦大儒之一，是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其书来自荀子及其学生之手，是先秦思想学术史的重要史料。其书涉及面十分宽广，大致说来，《劝学》、《修身》、《性恶》、《君子》、《不苟》、《荣辱》、《非相》是谈治学与个人修养方面的内容；《非十二子》、《仲尼》、《儒效》三篇反映了荀子儒家思想观念及学术思想，不仅分析批判了它嚣、魏牟、陈仲、史鳅、墨

^① 李学勤《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及《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均见《中国哲学》第20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兼谈郭店楚简的思想史意义》，同上；等等。

翟、宋钲、慎到、田骈、惠施、邓析等各家各派的思想，并且对后儒子思、孟轲的思想也进行了批评；《王制》、《富国》、《王霸》、《君道》、《臣道》、《致士》、《议兵》、《强国》八篇反映了荀子政治思想、富国强兵特别是建立中央集权化政治体制的主张措施；《天论》、《正论》、《礼论》、《乐论》是关于人生哲学思想、礼乐制度的政治作用方面的认识。《荀子》中列举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等先公先王的历史事迹，并主张“法后王”（不是今王），而是相对的周代之王——即文、武、周公、成王。特别是《儒效》篇谈到周初周公摄政称王、武王伐商的资料，周初分封方国 71 国、姬姓多达 53 国等重要的历史史料十分重要。另外《成相》、《解蔽》等篇涉及到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如：夏桀、末喜、斯观、关龙逢；殷纣、妲己、飞廉、微子启；成汤、伊尹；文王、吕望；唐鞅、载子；奚齐、申生；鲍叔、宁戚、隰朋、管仲；召公、吕望、周公等等，并对诸家作了批判：墨子蔽用、宋子蔽欲、慎子蔽法、申子蔽势、惠子蔽辞、庄子蔽天等。而《成相》篇所言历史人物与故事更多，上至尧舜夏商时代，下至春秋时代。如“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天乙汤，论举当，身让卞随举牟光，□□□□，通古贤圣基必张”。其文所提供先商时代迁徙的资料十分可贵。另外，《宥坐》、《子道》、《法行》、《哀公》等篇记述了孔子、子路、曾子、子贡、颜渊等儒家代表人物的言行思想，是研究儒家早期思想的可贵资料。

《荀子》注本，有唐杨倞注本 20 卷，见《四部丛刊》之中。清王先谦作《荀子集解》20 卷，今收入中华书局版的《诸子集成》第 2 册中。另外，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第 1 辑收有沈啸寰、程贤点校本《荀子集解》，1988 年版。于省吾《双剑谿荀子新证》（见《双剑谿诸子新证》，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 年版）。近人梁启雄作《荀子简释》，中华书局 1983 版，亦可参阅。

7. 《韩非子》

作者韩非，战国末期韩国贵族，荀卿弟子，是战国末期法家集大成者。西汉时刘向校定中秘古籍时把韩非一生所写的十多万字编定成书，定名为《韩子》，共 55 篇。到唐代韩愈也称《韩子》，为了以示区别，便把韩非的书称为《韩非子》。

《韩非子》一书主要是韩非作的，阐明了韩非复古变法，利用势、术、法等手段加强中央集权制，旗帜鲜明地、不遗余力地维护王权，主张改革，反对旧制度及儒墨家的思想主张。如《孤愤》、《五蠹》、《内储说》、《外储说》、《说林》、《说难》、《定法》等篇，据《史记·韩非列传》记载说，秦

王嬴政看到这些书，感叹不已，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把中央集权化的思想理论化、策略化，迎合了战国后期君王集权化统治以及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秦国统一天下的需要，因此韩非子的法家思想成为盛极一时的显学。

不过，《韩非子》一书也不是全为韩非所作。据容肇祖《韩非的著作考》^①研究，其中也有法家、道家、纵横家掺入的部分内容。（1）《有度》篇说到荆、齐、燕、魏四国之亡。韩非死后，六国都不曾灭亡，齐最后灭亡（前221年），其时韩非已死12年，怎么可能知道齐国的灭亡呢？（2）《初见秦》与《存韩》内容不一致，前者主张破坏合纵而亡韩，后者又劝秦存韩，显然《初见秦》不是韩非作的。它却与《战国策·秦策》中张仪说秦王的话全同。后者《存韩》的后半部全部是李斯之言。（3）《解老》、《喻老》、《主道》、《扬权》都类似道家之言而误入《韩非子》之中。（4）《饰令》篇与《商君书·靳令》篇相同，《有度》篇与《管子·明法》篇相同，《奸劫弑臣》的末节与《战国策》中荀卿答春申君书的话相同。上述分析是有道理的，可见《韩非子》这些篇章有其他各家掺入的内容。

《韩非子》不仅是研究韩非法家思想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是研究战国时诸子思想的宝贵资料。比如《显学》篇指出了战国时期儒墨两大显学及其分化的情况：“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子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其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后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韩非指出战国时期儒、墨为显学而且“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的说法，为今日研究这两种学说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其次，《韩非子》也为研究战国时期社会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如《五蠹》篇谈到儒侠对战国富国强兵的主要政策——“耕战”的破坏因素；《五蠹》篇还谈到有巢氏、燧人氏时的社会生活情况，是研究原始社会的宝贵资料；《有度》篇讲到“司南”，即指南针、指南车的雏形，是科学史上的宝贵资料，可知我国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利用磁石来指示方向了。

清代学者研究《韩非子》的主要成果，为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二十卷，现收入《诸子集成》第五册中。今人陈奇猷所著《韩非子集释》，中

^① 见《古史辨》第4册下。

华书局 1958 年出版，所引述古今注释资料详尽，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的介绍也不少，是《韩非子》最重要的注本。

8.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又称为《吕览》或《吕子》，是战国末年秦国相国吕不韦纠集其门客而写成的一部包含多家思想的杂家论著。全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总共 26 卷。但古本以览、论、纪为序。其中《有始览》缺佚一篇，其书每篇一题，体例比较整齐，保存也很完整。

《吕氏春秋》与西汉刘安纠集宾客而为《淮南子》的情况相似，保留了当时大量古书的内容，只是《吕氏春秋》在秦始皇焚书之前，所见古书更多。有许多是先秦古书的佚文，因此可以说《吕氏春秋》是一部战国晚期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例如《至味》篇，引述了古佚书《伊尹》的许多内容，因此汉代学者引述其文，或称之为“伊尹曰”，或直称之为《伊尹》书。最后四篇《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记述后稷之言，应是农家学派的著述。正如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序》所言，该书“采老子、文子之说”，“汇儒墨之旨，合名法之源，古今帝王、天地名物之故”，正合《汉书·艺文志》所说“兼儒墨，合名法”的杂家论著的特点。据近人研究，《吕氏春秋》160 篇中发挥儒家学说的有 26 篇，发挥道家学说的有 17 篇，发挥法家学说的有 43 篇，发挥墨家学说的有 10 篇，发挥名家学说的有 5 篇，发挥阴阳家学说的有 2 篇，发挥纵横家学说的有 10 篇，发挥农家学说的有 4 篇，小说家的有 1 篇，兵家学说的有 1 篇。

《吕氏春秋》一书引述夏商周三代以及古史传说时代的史料很多，特别是这些史料的原著多数已经失佚，所以其书保存了先秦失佚古书的大量史料，很值得我们关注。

汉代高诱注、清代毕沅新“校正”本《吕氏春秋》收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诸子集成》第六册中。今人注释校正《吕氏春秋》当推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分上下两册（学林出版社 1984 年版），陈书以《吕氏春秋校正》为底本，广泛搜集元明及日本刻本 10 余种以及唐宋以来类书引文，详为校核，引用前人校说 120 余家，皆附录于原文之下，并有附加按语。特别是引甲骨金文以及出土文物资料对其书作了补充说明，也有不少。故此书很值得学者引用参考。

9. 《天问》、《离骚》

《天问》、《离骚》是《楚辞》中的两篇。《楚辞》为西汉末年刘向整理编辑的中秘所藏、楚国屈原及其弟子与汉代文人所写《离骚》体而成的集子，东汉王逸为之作注而成《楚辞章句》。该书史料价值很高的是屈原所写

的《天问》与《离骚》，其中《天问》更是首屈一指。《天问》为四言诗，又间以五言、六言、七言。诗中提出了170多个问题，但只问不答（唐柳宗元曾作《天对》以回答《天问》）。诗作开头是记述创世纪式的神话传说，然后历述夏、商、西周、春秋时期许多令人惊心动魄、但留下无数谜团的历史传说故事，不少为历史研究的珍贵资料。其中关于夏、商、西周的历史记述既可与文献典籍互相印证，亦可与出土甲骨文、金文资料相互印证。特别是上20世纪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以为《天问》中“该秉季德，厥父是藏，胡终弊夫有扈，牧夫牛羊”中的“该”便是甲骨文中的“王亥”，为上甲微之父；“季”为王亥之父；而又有“恒秉季德”，认为此“恒”即甲骨文的“王恒”，古文献中亦仅仅见于《天问》之中。“季”虽见于甲骨文，为殷人先祖，但在文献中仅见这一例，由此可知《天问》所述历史传说的史料价值在先秦史研究中日益看好，原因正在于其书蕴含众书皆不载的远古秘史，却正好与甲骨文相呼应得到印证。另外，《天问》中还有许多历史谜团至今仍吸引着不少学者去解读去破译。

《离骚》据《史记·屈原列传》载楚怀王听信上官大夫谗言而不信用屈原，屈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其诗历述彭咸、高阳、尧、舜、桀、纣、鲧、启、五子、羿、浞、浇等远古时代的历史及其夏代初年失国内乱以及夏桀、后辛亡国情况，有娥氏佚女与高辛、汤与摯（伊尹）、禹与咎繇，说（傅说）与武丁、吕望与周文王，宁戚与齐桓等传说故事，所谓贤臣与明君君臣遇合的历史传说，为研究历史提供了不少可贵的史料。

东汉王逸有《楚辞章句》注本及研究较好的有孙作云《天问研究》，中华书局1989年版；《楚辞今注》，汤炳正、李大明、李诚、熊良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可以参阅。另外，游国恩主编、金开诚补辑的《离骚纂义》，排比历代各家之说，然后以己义断之，值得参阅。游国恩还主编有《天问纂义》一书，写作方法与《离骚纂义》同，该书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10. 《战国史料编年辑证》、《战国史系年辑证》

《战国史料编年辑证》，杨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此书是作者五十多年来的考证成果。作者采用编年的方式将有关战国历史的传世文献和竹简、帛书、瓦书、金文、石刻文字等考古资料结合起来，作综合的分析考证，力求达到去伪求真。对研究战国历史是很有实用价值的。此书可以和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一版，1998年增订本）结合起来阅读。

《战国史系年辑证》，缪文远著，巴蜀书社1997年出版。此书以古本

《竹书纪年》、云梦秦简《编年记》、马王堆三号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为依据，以《史记·六国年表》和《资治通鉴》的《周纪》、《秦纪》为线索，逐年排列战国时史实，先列原始文献及有关出处，次陈古今学者的观点看法，作者的看法则用按语注明。对战国的历史大事以及年代学的有关问题作了比较详尽的考证，值得读者和研究者参考。

11. 秦朝的古文献资料

真正属于秦王朝的古文献资料很少，这是因为秦朝的历史太短，其属于秦朝的文献资料也是屈指可数。主要是《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白起王翦列传》、《蒙恬列传》、《封禅书》等篇。近几年秦文化的研究逐渐形成高潮，秦兵马俑、阿房宫遗址等考古遗址的发掘以及出土的大量秦竹简帛书的问世，才出现这种研究的热潮。有关秦国、秦朝简帛资料我们下面再作介绍。

三 从战国秦汉简帛资料看战国文献的年代问题

下面我们结合出土简帛文字资料，谈谈战国古文献的年代及其近现代古书疑伪过头而存在的一些问题。

1. 《老子》

又称《道德经》，是研究老子及道家思想最主要的资料。过去学者均认为其书是和孔子同时又略早于孔子的老聃所作，近代以来，关于老子的年代成了问题，作者也成了问题。《古史辨》四下、六下收集有关《老子》辨伪论，总结了《老子》成书有春秋末年至战国末年的各种说法。郭沫若也曾以为《老子》作者为楚人环渊。而日本学者的研究，则把《老子》一书的成书定在秦汉之际或汉初。如武内义雄认为，《老子》成书在秦汉之际。（《老子原始》，弘文堂1926年版）；津田左右吉则认为成书在汉初（《道家思想及其发展》修订版，岩波书店1939年版，见《津田全集》十三）；木地英一则认为，其书是以战国道家老聃的言论为主，在汉代才加工编成的（《老子的新研究》，创文社1959年版）。^①

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甲乙本，与传世本不同的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马王堆三号墓下葬年代在文景之间，而抄本更在之前。《老子》甲本

^① [日] 山根幸夫编：《中国史研究入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田人隆、黄正建、那向芹、吕宗力译，田人隆审校。

字体较早，不避汉高祖的讳（邦），抄写时代应在高祖即位之前；乙本避高祖讳，抄写可能在汉文帝时代。这样《老子》成书于汉初、楚汉之际或整理成书在汉代的说法便不攻自破了。而新的出土古文字资料则为《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提供了更好的资料。近年来出土的湖北《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中也有《老子》的抄本，可见《老子》的成书年代盖在前300年之前。另外一些语言文字也不尽相同，这使我们可以看到《老子》发展变化过程中不同于今本的早期写本情况。

但是《老子》成书的时代可能要远早于此。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老子》乙本前有《黄帝书》（或称《黄帝四经》）四篇，与《老子》在文字内容方面有共通之处，《黄帝书》的《道原》篇所讲的道，显然与《老子》一脉相承，可以说是对《老子》道论的引申注释，《老子》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此即为《道原》开端一段的张本。可知《老子》应早于《黄帝书》。唐兰先生曾推定《黄帝书》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马王堆出土〈老子〉正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李学勤先生认为《黄帝书》所称引的《老子》，必须再早上一个时期，也就是说不会晚于战国早期。^①这些出土文字资料推进了《老子》成书年代的研究。

2. 《孙子兵法》与《孙臆兵法》

《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两本简书同时发现，这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我国学术界的一件盛事：它彻底解决了过去一直存在的关于这两部书的悬案。《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兵书略》谓春秋吴国孙武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七卷”，又谓他的后人齐孙臆有《孙臆兵法》，因后者早已亡佚，故导致了后来的许多问题。有人认为，现存的《孙子》是孙武写出之后经孙臆修改过的；有人说，孙武《孙子兵法》实际上就是孙臆写的，二人实为一人；还有人说，孙武是虚构出来的，因其名不见《左传》，《史记》始见。而清人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就进一步说传世本《孙子》是伪书，原因有二：一是孙武名不见《左传》；二是《史记》谓《孙子》有13篇，而《汉书·艺文志》却说有82篇，为何后反多于前？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既有篇名与传世的宋刻本《十一

^① 李学勤：《〈老子〉的年代》，《李学勤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家注孙子》基本相同的《孙子兵法》，也有《孙臆兵法》^①，为这场众说纷纭的争论画上了句号。同时也证明《史记》记载是正确的，孙武、孙臆确为二人，也证明《汉书·艺文志》的说法不错：《孙子》兵书有两本：一本是传世的春秋吴国孙武及其弟子编著的《孙子兵法》，另一本是战国齐孙臆及弟子编著的《孙臆兵法》。

3. 《鹞冠子》

《鹞冠子》一书各书著录及相传的差异很大：《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说仅有一篇，《隋书·经籍志》说有三卷，韩愈《读鹞冠子》说有十六篇，而今传世陆佃注本为三卷十九篇。自唐代柳宗元作《辨〈鹞冠子〉》认为是后人袭用贾谊《鹞鸟赋》而作的伪书之后，学者多从之。梁启超作结论说，这是全伪无疑者。^② 而从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老子》乙本帛本前的古佚书《黄帝书》等篇来看，可知其书实非伪书。《鹞冠子》书中有庞焕、庞煖，从而可肯定鹞冠子活动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10年至前260年之间，^③ 陆佃说鹞冠子“著书初本黄老，而末流迪于刑名”，这是对的。帛书有《黄帝经》^④ 与《老子》甲乙本，可证明汉初盛行的黄老之学来源于楚国，而《鹞冠子》与帛书《黄帝书》以及《淮南子》、《越语》等书篇，应是长江流域思想文化的产物。^⑤ 另外《鹞冠子》所记官名有令尹、柱国，都是楚国专有官名；而《鹞冠子》全书语言特点也是楚地；而《汉书·艺文志》也说鹞冠子为“楚人，居深山，以鹞为冠”。依此看来，不是《鹞冠子》袭用了贾谊《鹞鸟赋》，而是《鹞冠子》为南方作品而广泛流传于南方，贾谊为长沙王太傅时，见到此书并在《鹞鸟赋》中袭用了一些文字。^⑥ 《鹞冠子》一书是先秦文献无疑。黄怀信著《鹞冠子汇校集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是目前较好的汇注本，可参阅。

4. 《文子》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认为传世本《文子》是全伪而肯定无疑的，这也是疑伪派的普遍看法。因为《汉书·艺文志》说文子为“老

① 《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等竹简的简报》，《文物》1974年第2期。

②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

③ 李学勤：《马王堆帛书与〈鹞冠子〉》，载《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

④ 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⑤ 李学勤：《新出简帛与楚文化》，见《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34页。

⑥ 李学勤：《新出简帛与楚文化》。

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但传世《文子》记述却是文子问老子。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发现的竹简本《文子》，提供了古抄本在流传过程中附益改写的一个典型事例。据定县汉墓竹简本《文子》来看，简本《文子》多记平王与文子的对答，同《汉书·艺文志》。而今本《文子》，只是把平王问文子改成文子问老子，其他一仍简本旧貌。可见传世本《文子》大部分是真的，梁启超等人斥之全伪，就太冤枉了。

王利器《文子疏义》（中华书局2000年版），其书不仅吸收了清代学者校勘、注释与研究《文子》的研究成果，还注意吸收了近现代特别是建国之后学者校注和研究《文子》的新成果，并且也注意以新出竹简文字资料的《文子》来校读，是一部比较好的注释校勘本。

5. 《六韬》

《六韬》不见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始见，题吕尚撰。不过《汉书·艺文志》儒家类有《周史六弢》。但多数学者不同意《艺文志》儒家类《周史六弢》就是传世本《六韬》；有的认为《六韬》为秦汉人作品，也决非吕尚所作。清姚际恒等人肯定传世本《六韬》为伪作，因为文字内容俚鄙、浅薄（《古今伪书考》）；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认为是绝对伪书。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大批竹简中有《六韬》，可知传世本《六韬》为先秦古籍无疑。

6. 《尉缭子》

《尉缭子》也遭到了这样一种被认定为伪书的不公平待遇。姚鼐就认为其书不能“论兵形势”；反杂商鞅刑名之说；是杂取众说而成的伪书；^①有的学者认为其书开头笔法是模仿《孟子》中见梁惠王的问答；^②甚至作结论说梁惠王时并没有尉缭其人，^③而梁启超也把《尉缭子》列为全伪，“绝对决定者”^④。然而，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一大批竹简中就有《尉缭子》。银雀山汉墓为汉武帝初期的墓葬，而这些出土兵书对汉初几个皇帝的名字邦、盈、恒、启、彻都不避讳，可见抄写的时代应在汉统一天下之前。这样看来，《尉缭子》确为先秦古籍。而通过对《尉缭子》的考查，可证确为梁惠王时代尉缭的作品。《尉缭子》所引证的历史人物最晚的是战国前期吴起，而以提及吴起次数最多，事件也最详；^⑤而且《尉缭子》屡言

① 姚鼐说，见张心激《伪书通考》，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② 姚鼐说，见张心激《伪书通考》。

③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香港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494—495页。

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58页。

⑤ 何法周：《尉缭子初探》，刊《文物》1977年第2期。

“世将”，此与《孟子·梁惠王下》讥刺“世臣”用意同。因为春秋末年到战国早期是世袭贵族和平民知识分子竞争政权最激烈的交替时代，战国中期以后，所有诸侯几乎都没有世袭贵族在高位了，上层高官差不多全由出身寒微的士人取代。因此，《尉繚子》对“世将”的讥议，正反映了士人向贵族争夺政权的战国早期的时代背景。^①依此看来，《尉繚子》一书应看作是梁惠王时尉繚或尉繚弟子的著述。

四 战国秦朝时期的出土文字资料

1. 中山国文字资料

1974—1978年在河北省平山县三汲公社发现的中山国铜器、铜版古文字资料是战国时代最重要也是最长的金文资料。其中中山王罍方壶有铭文450字，中山王罍鼎469字，中山嫡子盗圆壶铭文204字，兆域图450余字。中山国历史短促不详，《战国策》中有《中山策》一卷，但所述历史是有限的。但中山国青铜器铭文为研究中山国历史的兴衰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文中提到中山国曾讨伐燕国子之篡位的历史，中山“开启封疆、方数百里，刺（列）城数十，皮（破）敌大邦”的历史是一段辉煌灿烂的历史。但古书因中山国灭亡甚早而没有一点记述，而这些出土的中山国古文字资料使我们得知古书上未记载的战国中期中山国的历史，也使我们知道了中山国何以称“王”、跻身于战国十二大国之间的原因。这也为研究中山国在战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等方面提供了宝贵资料。另外《兆域图》反映了中山国的国王及王后的墓葬制度，证明《周礼·春官·冢人》关于“掌公墓之守，辨其兆域而为之图”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也是可信的，为研究战国时代诸侯国君的墓葬制度提供了可贵的图文资料。可参看《文物》1979年第1期发表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试谈战国时期中山国历史上的几个问题》、《平山墓葬群与中山国的文化》、《平山中山王墓铜器铭文的初步研究》等文。

2. 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是目前出土最早的古代帛书，全文文字900多字，内容丰富，是研究战国时期楚国思想文化与楚文字的重要史料，特别对研究先秦神话尤其是创世纪神话是极为可贵的资料。中国古代创世纪神话多见于古

^① 郑良树：《论〈孙子〉的作成时代》，见《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8—59页。

书上的片言只语，无系统无规律，且时代大多较晚（如《淮南子》），而子弹库帛书反映的创世纪神话中，有创世神，有时空观念，逻辑结构比较严密。把它和《山海经》、《尚书·尧典》羲和四子分驻四方及甲骨文中四方风和四方神名结合起来研究，可见一个比较完整的神话系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以红外线照片的先进技术对其拍照并重新隶定文字，认出了原来看不到或模糊不清的字，也纠正了一些错误的识字，于是也推进了楚帛书的深入研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李零著，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3. 望山楚简、包山楚简

望山与包山楚简为研究战国时代楚社会文化特别是卜筮、祭祀、祈祷制度提供了宝贵资料。

望山一、二号墓为战国中型楚墓，简文内容分别为卜筮祭祀祈祷与遣策文字。望山与包山楚简简文均记有卜筮的年月日、墓主、墓主先祖与某些楚先王之名，以及贞人与贞卜程序等方面的内容。

望山楚简简文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卜筮方面，有的是有关墓主的仕进职官及日常事务，有的是有关墓主疾病吉凶方面的卜筮。从简文反映的内容来看，墓主邵固当时患有心脏病，不能饮食，还有脚骨病、头痛、胸痛等病。其二是祭祀祈祷方面，主要是为墓主邵固治病驱邪而进行的。祭祀祈祷的对象有柬大王（楚简王）、圣王（楚声王）、邵王（楚悼王）等楚先王，先君有东宅公、王孙噪等，并有后土、司命、大水（即大江之神）、山川、行（道路）等鬼神，祭祀的物品主要有佩玉、酒食、白犬、牛、羊、马、猪等。祭祷方式有举祷、赛祷、馈祭、月馈等。

包山楚简是1987年出土于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规模较大，其墓大概下葬于楚怀王十三年，即公元前316年。墓主为楚国左尹，系昭氏（邵氏）家族。随葬竹简中文书不少，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制度（如土地制度）、卜筮、祭祀祈祷甚有作用。其中祭祀的对象有太、蚀太、社、后土、地主、野地主、宫后土、宫地主、司命、行、宫行、东陵连器、殇东陵连器、殇、大门、司祸、大水、二天子、楚先老童、祝融、鬻熊，等等，祭品有四类：玉饰、衣冠、酒食、牺牲。

望山楚简资料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大中文系编《望山楚简》，中华书局1995年版。包山楚简资料可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4. 睡虎地秦墓竹简

“睡虎地秦墓竹简”，又简称之为“云梦秦简”。1975年至1976年考古

工作者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 12 座秦墓，其中 11 号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共计 1100 多枚。这批秦简按内容区分，有秦法律文书 600 多枚，《编年记》53 枚，《语书》14 枚，《为吏之道》51 枚，《日书》423 枚，总计文字近 4 万，字迹大部分清晰可辨，字体为秦隶。竹简时代早晚不同，大致可定为秦昭王到秦始皇三十年所作。睡虎地秦简资料可参看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所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

秦法律文书简可分为五类：第一类为《秦律》，共 202 枚，内容是秦国政府所规定的关于农业、粮仓、货币、贸易、徭役、置吏、军爵和手工业生产等方面的各项制度。第二类为《效律》，共 61 枚，内容主要是检查核校官吏的职责，特别是对军需物资的规定尤为详尽。第三类为《秦律杂抄》，共 42 枚，内容比较庞杂，有官吏的任免，有游士入秦的各项规定，有户口登记制度，有军队的训练、战场纪律、捕盗及防禁等事宜。第四类为《法律答问》，共 211 枚，内容主要是以问答的形式，对秦律中的主体部分即刑法进行解释。第五类为《封诊式》，共 98 枚，内容主要是“治狱”过程中下级官吏向上级所传各种爰书的辞例，也就是办理案件中要遵循的文书格式。《编年记》共 53 枚，逐年记载了自秦昭王元年（前 306 年）至秦始皇三十年（前 217 年）部分重要军事行动和某些重大事件，同时也记载了墓主喜的生平及有关事项。《语书》共 14 枚，是秦始皇二十年（前 227 年）南郡守腾为维护封建法律、巩固秦政权在南郡地区的统治所颁发的一件重要文告。《为吏之道》共 51 枚，内容庞杂，主要是统治阶级宣扬的一套从事政治活动的经验与处世哲学。《日书》共 423 枚，所记内容，都是关于预测吉凶的迷信习俗。云梦秦简为我们提供了秦国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一些具体情况，其中以刑法最多，也比较成熟，同时也含有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立法等内容。它是我国西汉之前保存条文最多、内容最丰富、时代最早、有系统的定型成文法典。它的出土弥补了中国古代法制史上战国秦朝的一段空白。

5. 郭店楚墓竹简

郭店楚墓竹简是近 20 多年来影响中国学术界最大的一件事，不少学者认为郭店楚简“不仅要改写经学史和儒学学说史，而且要动摇中国学术思想的不少有关定论”^①。郭店楚简现存 804 片，约 13000 多字，全部为学术著作。除古本《老子》外，还有《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

^① 庞朴：《初读郭店楚简》，载《历史研究》1998 年第 4 期。

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二、三、四。其中，《鲁穆公问子思》谈到了子思，可见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的关系。《缁衣》篇本见之于《礼记》，其文过去就有为子思所作的说法。《唐虞之道》记述尧舜禅让之说，过去有学者认为孟子谈禅让是学墨家的，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太一生水》属阴阳学派的文献，是较早的有关宇宙论的文献。《性自命出》与《六德》谈到性命之学的问题，使我们看到了性命之学由曾子、子思到孟子之间的传承关系。《穷达以时》所言天人之学（与董仲舒不同）的情况，而且还提供了有关尧、舜、邵繇、姜太公吕尚、管仲、孙叔敖等人的历史传说资料，许多不见于古籍，是值得重视的。另外郭店楚简让我们见到了真正的古文经，即引用了古文《尚书》的内容。特别是古本《老子》更使我们大开眼界，因为一些重要内容与今本不同，特别是开头甲组“绝智弃卞（辨）”、“绝巧弃利”、“绝伪弃诈”与今本《老子》不同，今本作“绝仁弃义”，似乎道儒势不两立，矛盾冲突尖锐，而郭店楚简古本《老子》并无这种冲突。这些资料对我们研究经学、儒学史等方面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史料。《郭店楚墓竹简》，荆门市博物馆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当前对这批郭店楚简的研究成果有：李零著《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伟著《郭店竹书别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刘钊著《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廖名春著《新出竹简试论》，台湾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丁原植著《郭店楚简儒家佚籍四种释析》，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涂宗流、刘祖信著《郭店楚简先秦儒家佚书校释》，台湾万卷楼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均可参阅。《中国哲学》第20辑《郭店楚简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与第21辑《郭店楚简与儒学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是郭店楚墓竹简的研究专辑，第20辑收入了杜维明、庞朴、李学勤等学者30多篇论文，第21辑收入了李泽厚、姜广辉等学者23篇论文，值得研究者参阅。

6.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

上海博物馆数年前从香港购藏了一批战国竹简，共计1200余支竹简，35000余字，内容包括《周易》、《孔子诗论》、《性情论》、《絳衣》、《子羔》、《孔子闲居》、《彭祖》、《乐礼》、《曾子》、《武王践阼》、《子路》、《四帝二王》、《颜渊》、《乐书》、《卜书》等80余种古籍。目前已经出版的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马承源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1月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马承源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马承源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马

承源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马承源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版）。参考资料可看朱渊清、廖名春《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及《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1册包括《孔子诗论》、《紂衣》、《性情论》。《孔子诗论》是孔子讲解分析《诗经》的诗旨及其作用的记述资料，这些记载包括了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孔子论《诗经》言论，还有一些不见于《诗经》的古诗。楚竹书《紂衣》即今本《礼记·缁衣》，但与今本《缁衣》在内容与文字方面出入较大，不仅章节数目不同，次序先后排列也完全不同。可依据简本《缁衣》以及郭店楚墓竹简《缁衣》校勘并恢复原本《缁衣》的面貌。《性情论》与郭店楚墓竹简中《性自命出》内容相近，反映了早期儒家有关性情与礼教思想的认识。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2册包括了《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从政》甲乙篇、《昔有君老》、《容成氏》等篇。《民之父母》记载了子夏向孔子请教怎样才能算作“民之父母”而提出的五个问题，孔子一一都作了回答。《民之父母》的内容也见之于《礼记·孔子闲居》和《孔子家语·论礼》，可参读。《子羔》记述了子羔与孔子问答尧、舜、禹及契、后稷的身世、起源及其降生的传说故事。《鲁邦大旱》记载了鲁哀公十五年发生大旱，哀公就向孔子请教抗旱的对策，孔子十分明确地提出需要重视刑德之治，但不必向山川之神灵瘞埋圭璧币帛以祈雨。后来孔子还向子贡分析这种抗旱之策的道理。《从政》甲乙篇记述了孔子分析了从政者应具备的道德品质、修养水平以及行为规范。《昔有君老》记述国君自衰老到死亡期间太子朝拜的行为规范。《容成氏》为我国由部落联盟阶段向早期国家转变的情况提供了可供追溯演变之迹的宝贵资料。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3册包括有《周易》、《中弓》、《亘先》、《彭祖》。(1) 上博战国楚简本《周易》与今本《周易》有一些不同之处：每卦书写的格式是：①卦画，②卦名，③首简符号，④卦辞，⑤尾简符号。文字与今本多有不同。学者们认为，战国楚简本《周易》的出现对解决易学研究中所谓“九”、“六”之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过去学术界认为《周易》中每爻用“九”、“六”为汉人所加，先秦没有“九”、“六”之称。而成书于战国中期的上博楚简本《周易》证明了“九”、“六”之称的确在先秦已经存在。另外楚简本《周易》使我们看到了《周易》中曾经使用但后来已经失传的一套独立的符号系统，并兼有红黑两色，这既不见于其他出土文献，也不见于传世本的《周易》之中；还有楚简本《周易》阳爻

用“一”表示，而阴爻用“八”表示，这既与传世的古文献不同，也与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周易》不同。表明后世的阳爻“一”是从汉字数词“一”变化而来的，后世阴爻“--”是从汉字数词“八”变化而来的。这为研究先秦时期的易学发展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宝贵资料。(2)《中弓》所记述内容，为传世古文献资料所未见。中弓即仲弓，为孔子弟子。《中弓》记述仲弓为季桓子家宰后问政于孔子的师徒对话。(3)《亘先》反映了先秦宇宙起源论思想以及早期名家思想，有的学者以为是黄老学派思想，是不对的。(4)《彭祖》反映了早期黄老学派养生长寿的思想。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4册包括有《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旼》、《柬大王泊旱》、《内豊（礼）》、《相邦之道》、《曹沫之陈》等篇。(1)《采风曲目》反映的是楚国历史上某一时期流行的或有意编成的歌曲曲目，所记歌曲篇名除了《硕人》见于《诗经·卫风》外，其余则查不到文献记录。这些歌曲曲目表明楚国乐官对采风而来的各种曲目音调传承的重视。采风记载用宫、商、角、徵、羽等音律名称来作为这些音乐史料的标目，是前所未见的，也是极其珍贵的。(2)《逸诗》残简共2篇，没有篇名。楚竹书整理者认为，按以完整诗章的首句名篇来看，其一可名为《交交鸣鳶》；另一篇诗章不够完整，以诗意名篇，可称为《多薪》。《交交鸣鳶》的内容是歌颂“君子”“若玉若英”的品性和“若虎若豹”的威仪。《多薪》是歌颂兄弟二人亲密无间的关系。(3)《昭王毁室》记述了一件史籍未载的楚昭王轶事。其文大意说楚昭王新建成宫室，但一穿丧服的人说其父尸骨就埋葬在新建宫室的台阶之下，于是昭王命令毁弃新建的宫室。(4)《昭王与龚之旼》叙述楚昭王为玨宝的一件轶事，楚昭王起先不愿见龚之旼，但大尹了解事实后告知昭王，楚昭王才见了龚之旼。但其内容有所缺失，不能完全通读。(5)《柬大王泊旱》记述了战国早期楚国简大王病疥及楚国大旱的故事，反映了民本思想。(6)《内豊（礼）》反映了早期儒家对孝道、忠君思想的认识，其中许多内容与《大戴礼记·曾子立孝》等篇章相似，但也有不同。过去学术界认为《大戴礼记》曾子十篇成书于汉代的说法以此可见是不对的。与后世不同的是，此篇反映的父子、兄弟、君臣关系是双向的互动的，不是单向的忠孝思想，从此可见孟子反叛恶君思想的来源。(7)《相邦之道》记述孔子与子贡问答为君相邦之事，反映了儒家君权思想、爱国爱民的仁德之心。(8)《曹沫之陈》的曹沫即《左传》庄公四年的曹刿，古书上又写作“曹翻”、“曹昧”，其内容是记述鲁庄公与曹沫问对之事，开头是论政，后面是论兵，标题以“陈”（阵）名篇，反映此文是以战争为主。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5册包括有《竞建内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季庚子问于孔子》、《故成家父》、《君子为礼》、《弟子问》、《三德》、《鬼神之神明》、《融师有成氏》。(1)《竞建内之》是本篇第1简背后的原书篇题。本篇记述了鲍叔牙和隰朋二人借日食预示齐国有兵祸之灾之际，规劝齐桓公行先王之法，才能去灾除祸。其中隰朋引述殷代高宗武丁祭祀时发生雉鸟鸣叫的现象，其臣祖己进行解释的故事，这对于理解《尚书·高宗彤日》的历史背景是很有帮助作用的。(2)《鲍叔牙与隰朋之谏》记述了鲍叔牙与隰朋向齐桓公进谏要谨记夏商亡国的历史教训，善待百姓，远离小人，不用刑于老弱，要从国家的利益考虑问题，于是齐桓公亲自去进行祭祀。(3)《季庚子问于孔子》中“季庚子”就是古文献中的“季康子”，本篇记述了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谈了治国兴鲁的看法，首先引用了春秋时期三位出色辅政大臣管仲、孟子余（赵衰）、臧文仲的言论来说服季康子；接着，孔子用“举贤”、“同仁”、“无私”、不听谗言、不忘“曲成”、不忘“国泰民安”对季康子进行了开导。在此文中孔子提出了“信之以德”的治国思想，要求君子玉言、慎行、敬德；而且在此文中出现了管仲、孟子余（赵衰）、臧文仲的异名以及重要的治国思想，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4)《故成家父》所述与春秋中期晋国三郤有关，“故成家父”即郤犨，所记历史与《左传》、《国语》有的相同有的相近，但也有不同者。其文是站在反对栾书、赞同三郤的立场上来记述事件经过的。(5)《君子为礼》记述了颜渊等孔子弟子向孔子问礼，孔子以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回答，与《论语·颜渊》所述相近，但所说礼的仪表比《颜渊》更为详尽具体。(6)《弟子问》记述了孔子与弟子宰我、颜渊的问答之词，以及颜渊与子由、子羽与子贡之间的对答之词，问答的内容比较广泛。(7)《三德》中“三德”是指天德、地德、人德，即简文中所说“天供时，地供材，民供力”，君王为政就是要重视并处理好这三方面的关系。(8)《鬼神之神明》是讨论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的问题。简文整理者以为是《墨子》佚文，记述了墨子与弟子或他人的对话。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此文提出鬼神有所不明的问题，反映了对鬼神的怀疑态度，与墨子学派完全信服的态度是不同的，可能反映的是早期儒家的思想。(9)《融师有成氏》记述了祝融氏之师有成氏的一种失传的与军事战争有关的神话故事，可惜内容已经残缺不全。

7. 云梦龙岗秦简

云梦龙岗秦简是1989年从云梦龙岗六号秦墓中出土的一批秦代简牍。其内容为秦代法律文书，与1975年云梦睡虎地秦简相近，只是时代略晚于

睡虎地秦简。然从睡虎地秦简到龙岗秦简，自然可见二者之间的法律继承关系与演变关系。其内容分为《禁苑》、《驰道》、《马牛羊》、《田赢》、《其他》5类。《禁苑》为云梦等地作为秦代禁苑禁止人们在其中猎狩等活动及其责罚的法律条文，比睡虎地秦简具体多了，详细多了。《田赢》内容比较接近睡虎地秦简《田律》；《驰道》是专为驰道的畅通无阻建立的法律，近似今天高速公路的有关规章制度。为研究秦代的法律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可参看《云梦龙岗秦简》，刘信芳、梁柱著，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8. 秦武王二年为田律木牍

1979年，在川、甘、陕三省交界处的青川县城郊郝家坪五十号墓中发现了墨书写的木牍两件，共计121字。内容是秦武王二年十一月己酉朔日，“王命丞相茂、内史郾，□□更修《为田律》”^①，这是研究战国时期秦国土地制度、阡陌划分和田地分界形制方面的可贵资料。

9. 甘肃放马滩秦简

秦简整理小组《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释文》，载《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放马滩秦简内容有放马滩地图及文字记、《日书》甲，《日书》内容有月建章、建除书、亡盗章、人月吉凶章、择行日、男女日、生子章、禁忌章，还有《墓主记》。放马滩秦简时代在战国末至秦王政元年（前246年），约三十年的时间。

比较睡虎地秦简（下简称“《睡》简”）与放马滩秦简（下简称“《放》简”），可知二者时代虽近，但内容不同，“《放》简少而简略，《睡》简多而复杂”。实际上反映了两个地区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秦人重政治轻鬼神，而楚人重鬼神轻政治，鬼神观是非常严重的，这就是两部日书的最大特点。为此可以说，《放》简是纯秦日书，《睡》简是纯楚日书，尽管有秦的成分，但主体不同于秦，它代表的秦代楚人的思想。”（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考述》，《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载《文物》1989年第2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放马滩秦简《墓主记》是秦昭襄王三十八年的一则志怪小说故事：有一个叫丹的大梁人，刺伤人后自杀，又弃市后掩埋。三年后，丹复活过来，满四年，能听到狗叫鸡鸣，能像正常人吃饭，然后谈了一些鬼以白茅致富，以及鬼所害怕担心的事情。这是一则十分有趣的志怪小说，与《搜神记》相似，是目前所见很早的志怪体小说（李学勤：《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载《文物》1990年第4期）。

^① 于豪亮：《释青川秦墓木牍》，见《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

10. 湖南龙山里耶秦简

2002年4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址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已经探明古井数座，清理完毕的有两座。在一号井（J1）的第五层到第十六层出土了大量的简牍，其中少数是战国楚简，绝大多数是秦简，共有36000余枚。秦简的埋藏应是秦末动乱之时随意弃置的，是秦代县一级的官署档案。

里耶秦简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文书、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简文涉及的区域有秦代的内史、南郡、巴郡、洞庭郡、苍梧郡等。其中洞庭郡等资料从未见于文献记载，可补文献之缺。秦简简文的纪年有廿五年至三十七年以及二世元年、二年，可知这批竹简是秦始皇及秦二世时代的遗物。我们以前根据古文献的记述，认为中原中央王朝对湖南地区，特别是武陵山地的有效管理是从西汉初年才开始的。但由湖南里耶简牍的文字记载可知，从秦代就对湖南的迁陵、酉阳、沅陵、益阳、零阳、临沅等地进行了十分有效的管理。通过众多的有关县乡基层政权的记载，可使我们了解秦王朝行政的具体运作情况。根据简文所记年、月、日、地名、职官、事件及办事具体时刻的有关简洁完整的记载，秦政权严格、高效的管理体制可见一斑（可参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载《文物》2003年第1期）。

里耶秦简的出土和整理为研究秦代历史地理、历法以及探讨秦国兴起、强大以至于统一天下的原因，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并将极大地丰富我们对秦代政治经济制度的认识。

五 有关先秦史料的汉代简帛资料

有关先秦时期史料不甚多的汉代简帛资料，在后面汉代部分介绍，这里只介绍与先秦史料有关的汉代简帛资料。

1. 阜阳汉简

1977年，在安徽省阜阳县双古堆一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竹简，基本上是西汉初期的。这批汉简内容主要是抄录古代的典籍，清理出十多种古籍，包括《苍颉篇》、《诗经》、《周易》、《年表》、《大事记》、《杂方》、《行气》、《相狗经》、《辞赋》、《刑德》、《日书》等。如抄录《周易》之文，有300多枚碎片，抄《苍颉篇》简文（李斯作），已整理了100多枚碎片。内容有：《年表》简文，上起西周下至汉代；《杂方》简文，是有关医

药的；《作务员程》简文，是讲器物制作的；有《相狗经》抄录及辞赋简文等。发掘简报见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局《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8年第8期；竹简内容简介，见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简介》，载《文物》1983年第2期；抄录《苍颉篇》简文，见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苍颉篇》，载《文物》1983年第2期；有关古《诗经》资料，见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诗经》，载《文物》1984年第8期；还可参看胡平生、韩自强编著的《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这批汉简是古文献校勘学的宝贵资料。

2. 长沙马王堆汉简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中，连续出土了汉代竹简、木牍共600多枚，其中遣简简文410多枚，医书简文有200多枚。分为两卷，其中一卷与《黄帝内经》近似。3号墓东边箱57号漆盒内出有帛书，除个别外，均无篇题。大致为26件，仿《汉书·艺文志》分类可分为：（1）“六艺”类。《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2）“诸子”类。《老子》甲本，附佚书三种、《九主图》、《黄帝书》与《老子》乙本；（3）“兵书”类。《刑德》甲、乙、丙种；（4）“数术类”。《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木人占》、《符策》、《神图》、《筑城图》、《园寝图》、《相马经》；（5）“方术”类。《五十二病方》附佚书四种：《胎产书》、《养生书》、《杂疗方》、《导引图》。（6）图类。《长沙国南部图》、《驻军图》。帛书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内容，学术价值十分重大。从史科学角度看，有许多古籍，不仅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佚书，汉代司马迁、刘向、班固等学者，大概也都未见到过，如《相马经》。对古代文献的校勘整理，对古代史内容的丰富，均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其发掘报告见《文物》1974年第7期。并可参看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册，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壹），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古地图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叁），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

墓帛书·五十二病方》，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导引图》，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3. 临沂银雀山一号、二号墓竹简

山东临沂以银雀山、金雀山木椁墓及其出土的简册最受学术界的重视。二山紧靠临沂县城的南墙，已发掘汉墓十余座，是西汉前期的竖穴木椁墓，银雀山 1、2 号墓出土的竹简学术价值特别高。银雀山 1 号与 2 号墓出土竹简 4900 多枚，包括《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墨子》等先秦古籍。简文墨书为隶字，字迹或端正，或潦草，不是出于一人的手笔。《孙子兵法》简书 300 多枚，13 篇都有文字保存，已见篇名与宋刻本《十一家注孙子》本基本相同。《孙臆兵法》440 多枚，字数 11000 字以上。可肯定的有 15 篇。如《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等，另外 15 篇未提孙子，但据内容、文例、书体，也应为《孙臆兵法》，如《十阵》、《十问》、《略甲》、《客主人分》、《善者》、《五名五恭》等。《孙子兵法》与《孙臆兵法》不同：《孙子兵法》13 篇多言兵要；《孙臆兵法》（据《汉书·艺文志》说有 89 篇，图 4 卷）则有一部分论阵势，论将略。后者继前者兵法思想并有所发展。这二书同时被发现，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一件大事，因出土彻底解决了两部书一些疑案，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为研究孙武、孙臆在军事史上的贡献及其军事思想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史料。

银雀山汉墓竹简发掘报告可参看《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臆兵法〉等竹简的简报》，载《文物》1974 年第 2 期；《临沂汉简概述》，载《文物》1974 年第 2 期。竹简整理资料可参看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八开线装本，文物出版社 1975 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臆兵法》，文物出版社 1975 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文物出版社 1976 年版；张震泽《孙臆兵法校理》，中华书局 1984 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载《文物》1985 年第 4 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骈宇騫《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春秋校释》，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4. 定县汉简

1973 年，在河北定县 40 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简牍，竹简炭化成块，残损严重，经整理，共有以下几项内容：《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五

义》、《保傅传》、《太公》、《文子》、《日书·占卜》等。这批竹简文字对研究早期儒家思想弥足珍贵，同时对于辑佚、校勘、订正儒家古籍，也提供了珍贵资料。特别是《文子》等竹简书籍对重新认识传世本《文子》的成书时代及其真伪问题提供了宝贵资料。其整理情况如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81年第8期；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墓出土竹简简介》，载《文物》1981年第8期；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儒家者言释文》，载《文物》1981年第8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可参看。



第六章 两汉时代

一 两汉史料概述

两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此时，政治上长期统一和相对稳定，社会经济长足发展和一度繁荣。这些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出现了司马迁、班固、董仲舒、王充、司马相如等一大批史学、哲学和文学大家，他们的著述及观点对当代和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西汉司马迁著述的《史记》，开创了通史性的纪传体史学论著的体例，东汉班固著述的《汉书》，开创了断代史性质的纪传体史书的体例，从此创造了两千多年来正史史书的典范、楷模。这些正史成为研究两汉史极其重要的史料。再者，魏晋时期及以后各个时期对两汉的总结及追述之作，也丰富了两汉史的内容。除此之外，简牍、石刻、瓦当、印泥、金石等考古资料也是两汉史研究不可缺少的特殊历史材料。

两汉史史料，从其类别看，主要有两大类，即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这两部分与先秦史料和魏晋隋唐以后的史料相比，有它自身的特点：

第一，汉代的古文献资料远远比先秦时期要丰富得多。关于这一点吴树平先生曾有过论述，体现在：1. 史料范围扩大，种类增多；2. 出现了史学巨著；3. 纪传体是秦汉史史料最重要的体裁；4. 秦汉的重要史料基本上由私家修纂。吴先生对秦汉史料的总结，意见是珍贵的。陈高华、陈智超等先生所著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三章“秦汉史史料”的概况部分就引述了吴先生的观点。^①

第二，文献资料较其以后各代要少得多，而且是十不存一，保存下来的史料都有不同程度的传写的错讹，使用起来常常要做辑佚和校订的工作。林剑鸣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指出，对于秦汉史料，应做以下工作：①对于文献史料要展开对基本史料的整理、注释、标点，史料的辑佚辨伪和研究；史

^① 吴先生的观点见于陈高华、陈智超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料工具书的编纂。②对于考古资料，要整理和公布详明、系统的报告；对简牍、帛书、陶文、金文和其他铭文等一切有文字的资料公布释文，以及对已有释文进行校订的工作；对简牍、帛书的研究。①高敏先生也认为秦汉传统文献史料奇缺，而且有讹、衍、脱、漏的缺点，以至于难以拜读，所以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文字记载和非文字材料来补充其残缺，印证其已有材料和订正其讹误。他又认为最有史料价值的出土资料为简牍。②

第三，其他诸子子书与诗赋以及地下出土的文物和文字资料，与先秦时期同一类资料相比，显然已经成为辅助性的资料了。因为汉代出土的古文字资料虽然不少，但其多数资料是汉代抄写并埋藏在汉代的墓葬之中，涉及内容及成书年代不是汉代的，而是先秦时期内容和先秦时期的作品。

以上三点是秦汉史学者对秦汉史料多年研究的甘苦之言，笔者是赞服其说的。由于以上观点距今已有二三十年的时间间隔，这时期考古的新发掘，研究方法的新探索，对史料学有了一些新的变化，总结如下：

其一，就文献学而言，林剑鸣先生所提出的基本史料的整理、注释、标点，经过海内外学者的努力，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见于正文，此不再赘述），但并非十全，加之秦汉简牍的出土，对旧文献的证伪工作和整理工作更加艰巨。台湾学者吴福助、陈文豪对云梦秦简的整理和考证，对陈直《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的校释，李解民先生对《史记》倒文的研究，体现了现代学者对旧文献的校释成果。虽然，现在来看，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才能大功告成。

其二，史料工具书的编纂，由于电脑的广泛应用已基本解决；而史料的辑佚、辨伪和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其三，就史料的系统性、完整性而言，传世的史料是不可取代的，应予以重视。多年来，存在对于传统文献资料的忽视，令人忧虑。两汉文献史料，实际上包含着丰富的信息，于此正确的解读就会于史学研究有重大创获。如1999年8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就是多年来关于秦汉经济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如该书的主编林甘泉先生所说的：“对原来研究成果比较多的领域，不但要尽可能吸收已有的成果，而且要力争有所突破，有所进展；对一些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要着重多下些工夫；对秦汉封建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自然和社会环境，要尝试作新的探讨。”可见，深入解读文献

① 林剑鸣：《中国古代史导读》，文汇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史料的史学信息，同样会在研究中有大的突破。当然，这种突破首先是建立在对文献相当熟悉，对于前人的考订、释补、解读有全面的了解的基础上的，这一方面田余庆先生是典范；其次，是引入新的史学方法，从而对传统文献深入解读，这一方面可借鉴的为李开元、陈苏镇、阎步克诸先生的近期之作。

其四，考古资料的发现，确实推动了两汉史的研究，但必须注意与文献资料的有机结合。王国维先生早就提出了“二重证据法”，史学界也很注意文献与考古的结合。杨家湾汉兵马俑、尹湾汉墓简牍、汉景帝阳陵、徐州狮子山汉墓及徐州兵马俑、西安西郊相家巷的秦汉封泥、广州西汉南越王御苑遗址及各地东汉墓室等的发掘清理和资料的公布，大大地丰富了两汉史的研究内容。它们对汉史的研究价值，不只是资料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视野的开拓和思路的启迪。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各擅其长，均有丰硕成果。但事实上，从20世纪史学研究的路子及方法看，两者结合并不和谐紧密，呈现出时断时续的特征。二三十年代伴随甲骨文、金文、汉简和敦煌文书等几大考古的发现，秦汉考古学著作应运而生；五六十年代，特殊的政治气候使得考古沉寂而文献学一度昂首挺胸；七八十年代的考古似乎更垂青秦汉史研究。近一二十年在这方面有了新的开拓，取得新的进展，但幅度不大。这里特别强调的是汉代考古成果的整理与发表相当迟缓，令人有口上称是但却不可期之感。

最后，加强史学研究者素养的培养。近年来史学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文化史、社会史的兴起和壮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史料的要求就突破了文字，进一步注重于画像石、画像砖、帛画、俑、考古遗址、出土器物的考察。一方面要求史学工作者注意结合传统文献与考古发掘，另一方面也要求史学工作者具备文字学、文书学、考古学甚至美学等方面的素养。

基于以上几点，本章在写作过程中，除了对旧有史料全面占有之外，对20世纪学者在两汉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文献的重新整理、辑佚、校勘、辨伪及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汇编等论著，尽可能地全面收集介绍，特别是对80年代以后两汉史研究方面的新成果、大成果，给予重视，力求达到全而新的目的，为两汉史研究提供更新更全面的资料。

二 两汉文献资料

两汉史的文献资料范围较广，种类也多。根据清人姚振宗《后汉书·艺文志》著录，东汉共有史部书一百九十六部，其中绝大部分属于两汉史。

东汉以后，又有不少人致力于汉史的撰述，增加了汉史史籍的数量。遗憾的是这些史籍流传下来的却很少。本部分收集包括流传的原本及后人辑佚本共五十余部。从分类看，经史子集四部皆有；从体例看，不仅有纪传体、编年体史书，而且还有杂史、起居注、载记、史钞、史评、故事、职官、仪制、刑法、杂传记、地理、谱系、簿录等类别的史籍，其中纪传体史书和子书是两汉史研究最基本的史料；从内容看，包括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科技、宗教、哲学、文学、法律、地理等各个方面。为了便于学习和研究查阅，本章对重要史籍予以介绍。

1. 《史记》

西汉司马迁撰。130卷。司马迁，字子长，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出生于左冯翊夏阳（即今陕西韩城市）。武帝征和二年（前90年）去世，终年五十五岁。关于司马迁的生卒年代史学界有几种说法，参阅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①、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②、程金造《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③、郑鹤声《司马迁生年问题的商榷》^④、施丁《司马迁行年新考》^⑤等学者论著。此处取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之说。据司马迁自述，他的先辈自唐虞至商周，世代皆为史官、天文家。虽从八世祖司马错到祖父司马喜，一度中断，其父司马谈又做了汉武帝初期的太史令。司马谈既通经学和百家言，又熟悉史事，热心著书，他的《论六家要旨》，对战国六大家思想的优劣作了评述。尤其是他推崇的黄老思想，对司马迁影响极大。在司马迁早年父亲就安排他从董仲舒学《公羊春秋》、从孔安国学《尚书》，注重培养其史识。公元前110年，司马谈临死前，把写作一部“天下之史文”的任务交给了司马迁。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作了太史令。他乘职务之便，在皇家图书馆整整搜集了五年的资料，到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便正式开始撰述《史记》。公元前98年，因李陵之祸入狱，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完成了《史记》。

《史记》写成后，司马迁自题名为《太史公书》（见《太史公自序》），也许是因为书中所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与当

①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观堂集林》卷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 郭沫若：《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6期。

③ 程金造：《关于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司马迁与史记》（“文史哲”丛刊第三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

④ 郑鹤声：《司马迁生年问题的商榷》，附于《司马迁年谱》，商务印书馆1956年重版本。

⑤ 施丁：《司马迁行年新考》，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时统治者所提倡的尊经思想不合的缘故，没有流传于世。^①班固《汉书·杨恽传》记载，到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才公开了它，当时称其名为《太史公记》。改称为《史记》则是东汉末年以后的事。东汉荀悦《汉纪》中有：“司马迁愤而作史记”之语，蔡邕《独断》、应劭《风俗通义》、高诱《战国策注》也都提到《史记》之名。今人陈直经过大量史实考订，撰成《太史公书名考》一文，^②确定《史记》之名开始于东汉桓、灵之际，大多数学者赞同此说。

《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汉武帝天汉年间。全书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字，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记事遵循详今略古的传统，略于先秦，详于秦汉；尤其是汉初百年，用功最力。一百三十篇中，有六十六篇属于汉初史料，对于研究汉武帝以前的西汉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历来受学者重视。20世纪70年代，曾对《史记》中关于汉初一百年的事件和人物的几十篇章的真伪有过争论。吴德明等人提出，这些篇章曾由于不知晓的原因失传了，它们是在3至4世纪依据《汉书》的相关部分逐字对应重建的。^③这种观点，被大多数学者所否定，许多学者经过大量史实对比考订，认为《史记》在司马迁之后，内容有被人窜入的痕迹，汉代初期的篇章是《史记》原有的。《汉书》武帝之前的部分，恰好是抄写《史记》而成的，进一步肯定了《史记》重视写当代史的成就。

《史记》本纪中，涉及汉史的有六篇：《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吕后本纪》、《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和《孝武本纪》，这六篇基本上是以帝王为中心记载的历史。《项羽本纪》主要记述了楚汉战争时期的大事。项羽虽非帝王，亦称本纪，是因为秦亡之后，项羽“封侯，政由羽出，号称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处于实际上的统治地位，所以司马迁为其立了本纪。《高祖本纪》至《孝景本纪》四篇，着重记述了汉兴七十年间，汉朝日益强盛，社会逐渐安定的情况。《孝武本纪》通篇文字基本上是从《史记·封禅书》中移植过来的，因为其内容与司马迁所写的几篇本纪不同，裴骃《集解》引张晏说认为是褚少孙的补作，阅读参考时多加注意。

《史记》十表，其中七篇谱列秦汉史事，由于表这种形式的限制，记事

①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陈直：《太史公书名考》，载《文史哲》1956年6月号。

③ 吴德明：《史记与汉书文献的相对价值》，载于《戴密微先生纪念论集》卷2，1974年。

内容显得简略。唐代史评家刘知几在论修史时认为史表无大用，使得有些学者不看重表。实际上史表的创始，正是《史记》体例的一大特点，有其他部分所不能代替的作用。各表记事，经纬分明。《秦楚之际月表》起陈涉发难，迄刘邦称帝，详著月表以表现五年间天下嬗变的剧烈变革时代。从秦亡（前207年）至两汉统一是五年，但月表溯及陈涉发难（前209年）。《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分类条析，次序井然，表现了大一统的时代特点。表中，有关人物的年表，可与列传互相参照，也可以补充其他部分记载之不足。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汉王三年（前204年），代太尉冯解敢以地降汉，为雁门太守，“以特将平代反寇”，于八年（前199年）被封为阏氏侯。他死后，冯安、冯遗、冯胜之、冯代嗣侯，于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国除。关于阏氏侯，《史记》中仅此一见。

《史记》有八书，司马迁对礼、乐、兵、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个方面各以专题论列。《平准书》是武帝以前两汉经济专篇，概述了西汉初年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过程，重点讲述了盐铁政策和钱币制度。汉武帝时有名的杨可告缙即载于本篇。《河渠书》记载西汉的河渠水利。《封禅书》以较多的篇幅叙述了汉统治者祭祀天地诸神和名山大川的迷信活动，主要落笔在对汉武帝笃信神仙、受方士愚弄的揭露和讽刺上。《天官书》和《历书》是天文学和历法专篇，保存了我国古代天文学和历法学的一些珍贵资料。

《史记》世家三十篇，专门记载楚汉战争与汉史的有十三篇。《楚元王世家》、《荆燕王世家》、《齐悼惠王世家》、《梁孝王世家》、《五宗世家》、《三王世家》记载了当世刘姓宗室王。其中，楚元王至齐悼惠王是高祖吕后所封，梁孝王为文帝之子，五宗诸王为景帝之子，三王为武帝之子。《萧相国世家》、《曹相国世家》、《留侯世家》、《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记载了当世将相封王称侯者。以上诸世家对了解汉初大封同姓王和异姓诸侯的情况有重要参考价值。《外戚世家》以专题形式记载皇室外戚。《陈涉世家》详细记述了陈胜领导的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大起义，资料集中，是了解这次农民起义的主要史料。世家是记分国诸侯的，司马迁为陈涉立世家，体现了他的进步历史观。

《史记》列传七十，分专传、合传、类传、附传四类，其中以很大篇幅对汉武帝之前西汉的重要人物生平事迹做了记载，保存一些与当代重大历史事件和典章制度息息相关的史料。《张耳陈余列传》至《田儋列传》六篇，

叙楚汉战争时期人物。《樊郤滕灌列传》至《季布栾布列传》六篇，皆叙辅汉功臣义士。《袁盎晁错列传》至《扁鹊仓公列传》五篇，叙文景时代忠勤于王室的人物。《吴王濞列传》至《韩长孺列传》三篇，叙景武之际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李将军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二篇，叙伐匈奴的专题人物。《平津侯主父偃列传》、《淮南衡山列传》叙武帝时的人臣传记。《儒林列传》专记儒家代表人物的学术活动和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的传授过程。《酷吏列传》关于崇尚严刑峻法的官吏的传记，把以酷烈著名的郅都、宁成，善于治狱的张汤、王温舒等，都收于传记中。《汲郑列传》记汲郑古朴耿直而不喜儒，武帝倡儒学而多用酷吏，司马迁用这样强烈的对比来讽刺武帝的政治。《游侠列传》记载了“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侠义之士，可以看出这一势力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货殖列传》是经济专篇，保留汉及以前一些有关各地物产、农业经济、手工业和商业的史料。“重农轻商”是战国以来统治者一直推行的经济政策，到汉武帝时期，此政策得到推行和发展，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算缗告缗，“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司马迁研究商人的活动，为商人立传，体现了进步思想和进化历史观。另外，《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集中保存了我国少数民族和与我国相邻国家的一些史料。这些史料，比较系统完整，而又较为原始，对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史记》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司马迁以自传形式，谈了自己的家世和编写《史记》的原因，同时也概述了各篇的内容，是《史记》研究不可缺少的原始史料。

从西汉建立至太初年间约百年的史事，在《史记》的本纪、表、世家、列传中占半数以上，八书中亦是汉事居多，足见司马迁对本朝史的研究用力之勤。

《史记》史料来源情况。司马迁能够写出这样一部贯串古今三千年历史的伟大著作，首先得归功于对史料的掌握和慎择。《史记》的史料十分丰富，其来源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①先秦典籍和当世流传的著作。司马迁做过太史令，掌管皇家图书馆的图书，这些书大多收藏在皇家图书馆里，即所谓“石室金匱之书”。汉武帝很喜欢收藏书籍，多次下令全国，征求图书，并在宫廷里设了几个藏书的地方，司马迁以其特殊的身份，对这些藏书完全有机会看到，并加以搜集和利用。②档案文书。《史记》中有关秦汉之际的历史，许多内容都是依据档案文书写成的，如《曹相国世家》、《樊哙列传》等所记战功，若是没有档案资料可资依据，要写出那样精确的数字是很难想

象的。对汉初档案如诏令、记功册等司马迁都能见到，并且用作写史的资料。如《惠景间侯者年表》中说：“太史公读列封至便侯”；《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说：“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儒林列传》中说：“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又《三王世家》中全录封策原文，保存了“汉廷奏覆颁下施行之式”。^③重视运用亲身见闻和实地调查的材料。秦汉史事，对司马迁来说，是近现代史，当时记载有缺，因此多赖见闻。《史记》中秦以来至汉初近百年历史的撰写，主要依据耳闻目睹的活资料。如《项羽本纪》赞中说：“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说：“苏建语余曰：‘……其为将如此’”；《太史公自序》中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这是得于所闻。《李将军列传》中说：“吾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游侠列传》中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这是得于所见。《张释之冯唐列传》中说冯唐之子冯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酈生陆贾列传》中说：“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这是得于交游。《淮阴侯列传》赞中说：“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这是得于实地调查。这些从见闻和实地采访所得的材料，其价值往往甚过于有形文字记载，它不但可以补充书面史料之不足，订正旧日载籍之谬误，并且增强了《史记》内容的真实性。

司马迁在掌握了丰富的史料以后，并没有为史料所役使而随便引用，凡是所采录，他都经过认真的分析和选择，淘汰那些无稽之谈，对可疑的则存疑，或者兼载各种不同说法，修史态度认真而审慎，比较尊重历史事实。司马迁写汉初历史，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在《史记》中，他记事能做到“不虚美，不隐恶”^①。在《平准书》和《孝武本纪》中，对当朝皇帝汉武帝，他不仅对其统治时期，西汉的繁荣、强盛和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进行了歌颂，同时对其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和耗费大量金钱搞封禅、求仙药及巡游天下的行为进行揭露批判。记人又能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②。项羽和刘邦是两个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在《项羽本纪》中，对项羽那种叱咤风云、气盖一世、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进行了歌颂，同时对其坑杀秦卒、分封诸侯、刚愎自用以及专重武力等，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和尖锐的批评。并没有因为同情喜欢项羽而对其弱点加以讳饰。刘邦是西汉王朝的

① 范晔：《后汉书·班彪附固传赞》，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② 刘知几：《史通·惑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开国君主，但在司马迁笔下，他是一个怯懦无能、残酷无情、贪财好色、诛杀功臣的皇帝，这从《项羽本纪》、《留侯世家》、《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中都可以看得出来。但在另一方面，司马迁对于刘邦在楚汉战争和建立西汉王朝中所起的作用还是加以肯定，并承认他比项羽机智而多谋。司马迁对当代历史据事直书的修史精神与修史态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情况，提高了《史记》的史料价值。因此，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曾经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①。

司马迁撰《史记》的宗旨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达到“述往事，思来者”的目的。^② 记事上起黄帝，下到汉武帝时期，是古代第一部大书，也是当时系统研究古史的唯一史书。就史识而论，他能普遍注意到社会各方面的事，并不是给帝王宰相看的政治史，其学识在班固之上。而且司马迁是纪传体的开创者，能够把先秦以来的史体综合起来，作成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大著作，为研究汉以前的古代历史提供了系统可靠的材料。如《殷本纪》所载商代世次，经过近几十年来对甲骨文的研究，有人统计，合于殷墟甲骨卜辞者有百分之七十，证明《史记》可信。推之《夏本纪》，虽无实物可以证明，亦必然有其正确性。《十二诸侯年表》把周召共和以后的中国历史年代完全确定排列出来，这是古代史上极重要的材料。《楚世家》中的楚侯逆、楚王顛都与传世铜器的铭文相符合。汉兴将相大事年表，所记大市、立谷口邑、立阳陵邑等，在《汉书》中均无记载。《史记》所包含的材料，绝大部分是研究中国古代所必需的材料，这是《史记》的优点所在。当然《史记》在材料引用上也有欠缺。春秋战国时期，司马迁排比史实，大量参考先秦典籍，由于史料来源不同，《史记》中对同一件事，本纪和列传，世家和年表彼此抵牾的现象不少。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专挑《史记》相互矛盾之处，用本书证本书，用力很深，可以参考。另外，司马迁所参考的许多史籍如《春秋》、《左传》、《国语》、《国策》、《世本》等目前都能见到，所以引用时，最好查阅相关的第一手资料。对汉武帝以前的西汉史，可参照对比《汉书》相关内容，以达到正确使用资料的目的。

除上面的史料部分外，阅读《史记》还应注意后人的添补之处。《史记》记事约止于武帝太初、天汉之际（前104—前97年）。不知何因，《史

①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②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记》的一百三十篇中，曾缺十篇，故西汉后期，有许多人添补《史记》，使得书中出现了多处叙述司马迁卒后之事的现象。补得最多的是元帝、成帝时期的博士褚少孙，他所补部分，大致开头用“褚先生”。此外，有名可考者不下十余人，据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所记，有刘向、刘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鲁迅先生对此也有同论，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道：“于时续者纷起，如褚先生、冯商、刘歆等。”所以今本《史记》错乱之处颇多。如《历书》附载《历术甲子篇》，自太初元年到成帝建始四年；《楚元王世家》叙宣帝地节二年之事；《齐悼惠王世家》叙成帝建始年间之事；《公孙列传》后附有平帝时太皇太后的诏书和班固《汉书》的赞语，这些事都远非司马迁所能见到。又如《田叔列传》中有把附注混入正文的情形，在利用《史记》作史料时，应明了这一情况。

《史记》流传之后，为其作注的很多，其第一家注释是东汉延笃的《史记音义》^①。以后又有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东晋徐广、南齐邹诞生的《史记音义》等。隋唐时注家更多，如隋柳顾言的《史记音义》，唐刘伯庄的《史记地名》、李镇的《史记义林》、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今存有三家，裴骃《史记集解》80卷，司马贞《史记索隐》30卷，张守节《史记正义》30卷，人们习惯上称作“三家注”。它们各有特点：《集解》博采儒家经书和诸史，广引前人旧说，着重释义；《索隐》采摭众家旧注，音义并重，补充、纠正《史记》叙事疏误之处颇多；《正义》用唐代的经疏体例注《史记》，其中保存许多司马迁依据的原著资料、古代佚书、古文字，又多征引古地理著述，有的一条注文多至千余字，引书达九种之多，保存了一定的史料价值，是当时《史记》注的集大成之作。这些注释原本以单行本问世，大概在北宋与南宋间与本文《史记》合刻。

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其中日本最为突出。日刻本正史《增订史记评林》（东京株式会社汲古书院，1972年）据明治二年鹤牧藩版本，附长泽规矩也的解题，有一定的价值。泷川资言（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②，其体例以日本官私所藏各旧写本，钩稽异同作校字，引录三

^① 陈直：《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中国史学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② [日]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10册），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刊行会，1932—1934年；艺文印书馆1956—1960年再版。

家注以来有关典籍约 120 余种，其中中国学者著作 100 余种，日本学者著作 20 余种，自盛唐至近代，随《史记》正文择拾缀集，或加审辨说明。在考证方面，采摭众家、搜罗宏富，系统地介绍了 1200 年来诸家解说，大大减小了学者搜检群书的烦劳，是研究《史记》必备的参考书。其明显的不足就是忽视了以金石文字助证《史记》研究的论著和近代学人的论著。还有在辑录张守节《正义》佚文时，省略了出处。而水泽利忠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① 总合本文和三家注为之一一补注，又据 20 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加以细密的校勘，增辑《正义》佚文 200 多条，对于《考证》移录三家注若干张冠李戴的错误，也予以订正，可以说是《史记》校勘的集大成版本。池田四郎次郎《史记补注》(3 册)，^② 也考证了史实注释，校勘了文字，补注周详。

历代对《史记》研究校补考订的著作也很多，清代成果最为卓著。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慈铭的《史记札记》2 卷（北平图书馆印刷本）、梁玉绳的《史记志疑》36 卷（中华书局 1981 年版）、邵晋涵的《史记辑评》10 卷（上海会文堂书局本）、郭嵩焘的《史记札记》5 卷（商务馆本）、林伯桐的《史记蠡测》（修本堂丛书本）、崔适的《史记探源》8 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等。此处介绍几部重要之作：

《史记志疑》将司马迁作《史记》时援引的《诗》、《书》、《左传》、《国语》、《战国策》、《吕氏春秋》、《楚汉春秋》等书，与史文对照；又据先秦诸子及《风俗通义》、《白虎通义》、《越绝书》、《说苑》、《新序》、《论衡》、《韩诗外传》等与史相证，主要刊正《史记》年数的讹误。同时也对三家旧注关于音义、诠释的错误予以指出，虽然有些论断不能让人信服，但对研读《史记》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史记探源》是崔适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而撰成的。书中称赞《史记》是“《五经》之橐龠，群史之领袖”^③，给《史记》非常高的地位。他认为《史记》本属今文经，因刘歆窜乱，杂有古文经；又认为刘歆伪造《左传》，凡《史记》中出于《左传》的内容，也都是刘歆所窜入；甚至还说《史记》中有二十九篇为后人所补和妄人所续。书中许多说法，发前人未发，可作为一家之言。另外，此书对《史记》作了较为仔细的校阅和辨证，所举勘误例句，基本上都很中肯，可供研究《史记》者参考。

① [日] 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② [日] 池田四郎次郎：《史记补注》(3 册)，明德出版社 1972、1975、1979 年版。

③ 崔适：《史记探源·要略》卷一，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另外，以文物证史之新方法研究《史记》的成果，首推现代学者陈直先生的《史记新证》。此书在《史记会注考证》、《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之外，对《史记》加以诠释考订，其材料多取于考古各方面。如殷代则用殷墟甲骨文，西周则用铜器铭文，秦汉则用居延、敦煌简牍、权量、汉铜器、漆器、陶器以及封泥、汉印、货币、石刻等出土文字，以证实司马迁之记载。^① 有学者分析，书中新证 759 条，其中 413 条应用了考古资料，占到总条数的 55%。^② 李学勤先生评价说：“正是（他）把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从而取得丰富的成果。”^③ 他旁搜远绍，不偏重音义，是研究《史记》的重要参考著作。

据统计，历代以来研究《史记》的学者达两千余人，留下的论著 300 余部，论文 3500 余篇。当代《史记》研究总成果占两千多年来历代《史记》研究成果之半，成绩煌煌。^④

20 世纪《史记》的研究论著：80 年代之前，关于《史记》研究的有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略》1 卷（学术丛编）；钱穆《史记地名考》，香港太平书局 1962 年版；朱东润《史记考索》，香港太平书局 1962 年版；马持盈《史记今注》，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日本人内藤湖南《史记——史书的出现》，载于《中国史学史》，清水弘文堂 1967 年版；竹内照夫《司马迁史记入门》，日本文艺社 1975 年版。这些著作都可参考学习。80 年代以来，《史记》研究的成果十分卓著，有一定的学术特色且值得参考的论著有：施丁等《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肖黎《司马迁评传》，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张大可《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吴汝煜《史记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刘乃和《司马迁与史记》，北京出版社 1987 年版；聂石樵《司马迁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丘述尧《史记新探》，台北明文书店 1992 年版；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韩兆琦《史记通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杨燕起《〈史记〉的学术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王子今《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早期史学的人类学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赵生群《〈史记〉文献学丛稿》，

① 陈直：《史记新证自序》，见《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 页。

② 黄留珠：《论陈直先生的〈史记〉研究》，见《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第 1 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③ 李学勤：《陈直先生其人其事》，《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 页。

④ 张大可、安平秋等：《史记研究集成》卷二《史记通论》，华文出版社 2005 年版。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1995 年和 2000 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司马迁与华夏文化丛书”推出了比较集中的《史记》研究成果，第一批 11 种：杨生枝《司马迁教育思想述略》，韦苇《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陈桐生《史记与今古文经学》，张强《司马迁与宗教神话》，程世和《史记伟大人格的凝聚》，徐兴海《司马迁的创造思维》，霍有光《司马迁与地学文化》，俞樟华、张大可《司马迁一家言》，施丁《司马迁行年新考》，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第二批 6 种：吴守贤《司马迁与中国天学》，韩兆琦《史记题评》，吕培成《司马迁与屈原和楚辞学》，徐日辉《史记八书与中国文化研究》，赵安启、王宏涛《史记与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惠富平《史记与中国农业》。这套丛书，对于《史记》研究有较宽泛的学术覆盖面，学者和研究者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到适当的学术引导。^①

21 世纪以来，《史记》研究走向了高潮，建立了“史记学”的学科体系，^②同时出现了许多研究及总结性著作，其中张大可等主编的“中国史记研究会丛书”《史记研究集成》14 卷，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5 年版；韩兆琦先生编著的《史记笺证》8 卷，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是史记研究的集大成著作，诚可有益后学。

《史记研究集成》历时十年完成，是《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融贯古今《史记》所有的研究成果，按类分册，突出当代，并对精粹著作详加介绍。参编本书的十五位作者大多为《史记》研究专家，保证了这套书具有高（高品位）、精（精华录）、尖（尖端前沿）的质量，可以用“融古今中外于一编，聚当今时贤于一堂”来概括。除此之外，这套书还做到了工具性、资料性、学术性的统一，具有实用价值与收藏价值。

《史记笺证》历时十余年，注释详尽、资料宏富，全书约 580 多万字，新作的注释为原文的十倍。全书收集了中国宋代以来以明代凌稚隆《史记评林》、清代梁玉绳《史记志疑》为代表的大量研究成果，也收录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最后附以自己的按断，是继“三家注”之后的最好的《史记》注本，被许多学者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史记》研究新作，是研究《史记》不能缺少的参考书。中国《史记》学会会长安平秋先生评价此书有四大长处：一是《史记笺证》对当前通行本（包括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史记》原文的文字讹误和标点失当做了校正，据统计，全书多达 200 余处；二是在有依据地尊重传统解释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了近百年来新

① 王子今：《20 世纪历史文献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09—310 页。

② 张新科：《史记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的研究成果，对传统解释中的不当之处做出辨正，对过去解释模糊不清之处提出了有见地的新说；三是注重运用近一百年在中国新发现、新出土的文献和文物为《史记》做注释，以考订、验证《史记》原文所叙述的史实，即将王国维先生所倡导的治学“二重证据法”应用到了《史记》注释中去；四是收集、引证了古今人物对《史记》和《史记》中人、事的评论，使注释更坚实、更鲜活。^①

《史记》现在最早的版本是二十五史所收的北宋仁宗景佑监本，但正确而又可信的版本是南宋庆元年间建安黄宗仁所刻、明代王延喆翻刻的震泽王氏本。四部丛刊所收由近人张元济辑，商务印书馆1936年刊行的百衲本较佳。百衲本中有六十三卷是宋庆元时建安黄善夫刻本，其余六十七卷用明震泽王氏本配齐，震泽王氏本是依据黄善夫本翻刻的，一向也称为善本。明代曾将凌稚隆《史记评林》等三家注与许多评论合刻刊行，称评林本，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2002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刊印了《史记评林》（精装6册）。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标点本《史记》（10册）是目前国内最好的版本，由顾颉刚先生等分段标点，中华书局编辑部整理加工，最适宜学习和研究《史记》者使用。

《史记评林》是明代凌稚隆编辑的一部历代评论和阐发《史记》的集大成之作，近百年来一直没有刊印。编者对《史记》主要做了以下几种工作：（1）辑集了中国历代名家对《史记》所载史事的见解，不但网罗了评论《史记》的专著，如宋倪思《班马异同》、明杨慎《史记题评》、柯维骐《史记考要》、茅坤《史记钞》、王维楨《史记评钞》、茅瓚《史记评抄》等，而且对历代名家单篇之作也广泛采录。（2）补充《史记》记事。《史记》援引史书记事简略处，编者每每依据原书进行增补。（3）引征百家之书对《史记》记事进行印证和阐发。（4）对《史记》文义、段义、字义进行注释。本书刊刻形式是每页下部刊刻《史记》原文和裴骃、司马贞、张守节三家注，上部刊刻编者文字，上下对应，极便阅读。清人李光缙曾在凌氏《评林》基础上增补，日本有井范平补标，台北地球出版社影印本，1981年版。这次印刻的凌氏《评林》包括了李氏的增补。此书的出版，给读者提供了一部学习和研究《史记》的大型全新著作。

工具书目的书籍有：（1）索引方面：①《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47年版。②《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此索引所收发表论文截止1937年。③《史记索引》，香港中文大学

^① 安平秋：《史记笺证序》，《史记笺证》（纪，壹），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崇基书院远东学术研究所 1963 年版。④钟华编《史记人名索引》，中华书局 1977 年版。(2) 研究著作的索引有：①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合编《中国史学论文索引》(1957 年) 中《史记》部分。②徐兴海主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论著专题索引》(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收录了历代对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成果，在 40 多种资料索引的基础上，增加了 1988—1993 年的论著，按专题编排，每个专题中又按年代先后排序，有目录之功效。全书收录专门著作 236 部，论文及评述 3300 余篇，不仅有国内学者的成果，还介绍日本、韩国、朝鲜、中国港台学者的研究成果，书中对重要论著有提要，对论文集所收篇目有列目简介。此书是近几年来有关司马迁和《史记》研究最全的索引。文后有著者索引，查阅十分方便。③池田四郎次郎《史记研究书目解题》(明德出版社 1978 年版) 是一部综合性书目和解题之作。

2. 《汉书》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班固撰。120 卷。班固，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 年），卒于汉和帝永和四年（92 年）。《后汉书》称他“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异”，受其家学影响较深。班固的父亲班彪是个史学家，曾著《后传》六十余篇，以续补《史记》。彪卒，班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①，被人告发私作国史，打入监狱。弟班超上书力辩，明帝亦得班固所撰史草，重其才，命他做兰台令史。兰台是皇家藏书之地，图籍甚富。后转迁为校书郎，典校皇家藏书，为写作《汉书》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永平中受诏完成其父所著书，潜精积思二十余年，一直在撰写《汉书》。班固在政治上追随外戚窦宪，后窦宪在政治斗争中失势自杀，班固受到牵连，被捕入狱。和帝永和四年死在狱中，终年六十一岁。当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和帝下诏其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完成了《天文志》。可见《汉书》不是成于一人之手，而班固则为最重要的一人。汉书最后成书已是和帝永元年间了，上距班彪撰《后传》已历五十年之久。班固对西汉高帝、惠帝、高后（即吕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 12 世 230 年历史，“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这句话概括了《汉书》的内容、结构和思想。在内容上，它包含了西汉皇朝的全部史事，记事起于汉高祖刘邦元年（前 206 年），止于王莽地

^① 范曄：《后汉书·班彪附固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皇四年（23年），首尾完整，始末清晰；在篇目上，首创《百官公卿表》、《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和《艺文志》，在文化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在结构上，它把《史记》的“本纪”省称为“纪”，“列传”省称为“传”，又改“书”为“志”，取消“世家”，把汉代勋臣一律编入传。

《汉书》史料来源，以武帝时期为分界，可划为前后两部分。

（1）武帝以前，因《史记》已有完整记载，绝大部分用《史记》原材料，不足以充分表现《汉书》的史料特色。如果把《汉书》与《史记》材料作一番对勘工作的话，从中可以发现，班固移《史记》入《汉书》，也经过了一番加工整理，增加了一些新材料。归纳为三个方面：①增加传目。《史记》没有惠帝纪，惠帝事迹略见于《吕后本纪》，《汉书》则在《高后纪》之前增立了《惠帝纪》。《史记·孝武本纪》割裂《封禅书》敷衍成篇，班固另写了《武帝纪》，提供了新的史料。另外《汉书》还增立了几篇人物传记，如《吴芮传》、《赵隐王如意传》、《赵共王恢传》、《燕灵王建传》、《景十三王传》、《苏武传》等。还把《史记》附入别人传中的传，抽出来另立新传，如《蒯通传》材料采自《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及《淮阴侯列传》；《伍被传》材料录自《史记·淮南王传》，把张骞从《卫青列传》抽出后另立《张骞传》，把李陵从《李广列传》抽出，另立《李陵传》。当然也有人争辩说，两部著作的有些地方都存在相反的写作过程——《史记》中有些早已佚失的卷已被现有的文本所补充，这些文本是根据《汉书》的相应部分编成的。^①②增加事实。《汉书》不仅增立了《惠帝纪》，还记载了一些重要内容。如惠帝元年，“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赐民爵，户一级”。三年，“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夏五月，立闽越君摇为东海王。”七月，“南越王南佗称臣奉贡”。四年三月，“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六年，“令民得卖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诸如此类涉及一代制度和政策的大事，《史记·吕太后本纪》均无记载。把《汉书》与《史记》相同的篇章加以对读，也会发现《汉书》可补《史记》的地方很多。《汉书·文帝纪》记载：“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而《史记·孝文本纪》文帝五年无记事。又文帝七年记载：“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十二年记载：“三月，除关无用传。”都不见于《史记·孝文本纪》。另外用《史记》旧传名称，增加事实。在《韩信传》、《楚元王传》、

^① 伊夫·埃尔武厄（吴德明）：《〈史记〉和〈汉书〉的相对价值》，载《戴密微先生汉字文集》，巴黎，1974年版，第55—76页。

《萧何传》、《王陵传》、《淮南王传》、《李广传》、《卫青传》、《公孙弘传》中，也增加了部分史事。③增补文章。《汉书》于文学之士的传中，多载其文章，很多是《史记》原来所没有的。卷四十八《贾谊传》增加了“治安策”；卷四十九《晁错传》补入了“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贤良策”；《路温舒传》增收了“尚德缓刑疏”；《贾山传》增补了“至言”；卷五十一《邹阳传》收入了“讽谏吴王濞邪谋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增加了“贤良策”；卷五十二《韩安同传》记载了韩安同与王恢论伐匈奴事。这些文章的内容，或关系经国大计，或涉及用人之道，或牵连边疆政策，或表现一人政治思想，都是有用的第一手材料，如果班固不收入《汉书》中，可能后世就失传了。

(2) 武帝以后部分，《汉书》的史料主要来源于父班彪之书和其他记载。①班彪的《后传》。班彪“略论”说：“迁之所证，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他撰“后篇”，就是补写武帝以后史事。《史通·正史》篇也说彪以为“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感众，不当垂之后代者也。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①。班固《汉书·叙传》也说：“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可见，班氏父子都是把撰述重点放在武帝以后的史事方面。班彪撰述，在班固《汉书》中还有痕迹可寻。如《汉书·元帝纪》赞云：“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应劭注：“元、成帝纪皆班固父彪所作，臣则彪自说也。外祖，金敞也。”《成帝纪》赞：“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晋灼注：“班彪之姑也。”这是班彪原文的证据。此外，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赞均有“司徒掾班彪曰”六字，这三个传当然也是班彪的原书。②其他记载。从《汉书》所引史料及书籍看，他不仅参考了其父《后传》，而且也参阅了有关汉史方面的其他记载，如《汉书·艺文志》所载春秋类《汉著记》有一百九十卷，颜师古注以为“若今之起居注”。依颜师古之言，《汉著记》是极为重要的史料。又有《汉大年纪》五篇，也列春秋类，汉人诗赋、议奏、诸子百家、天文历法之事，《艺文志》所收不少，这些都是他写《汉书》不可缺少的资料。又如：《五行志》采董仲舒、刘向、刘歆之说，《艺文志》用刘歆《七略》删要以成，这些都著于本志的序文。还有，《汉书》列传中多载重要文章，大都从流传的篇籍中搜集而来，如《司马迁传》所收的《报任安书》就是很重要的史料。又《王莽传》长达四万多字，记载完整且详细，若没有翔实史料是无法写出来的。

① 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汉书》后半部分不仅史料充分，来源广泛，而且就史料的原始性、系统性和完备性来说，在现存西汉史料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其史料价值更在其他书籍之上。

《汉书》有十二纪、八表、十志，凡百篇，后人作注时，因感有的篇帙过大，把篇幅长的划分为上下卷，或上中下卷，共成一百二十卷。它的每一种体例都反映了一系列的相关内容，武帝、昭、宣、元、成、哀、平诸纪，提纲挈领，包罗万象，用编年形式反映了武帝之后西汉皇朝的国政大事。对诸帝王的重要诏令，记载尤其详细。如《元帝纪》中，汉元帝在位十七年（前49年—前33年），记载了十九道诏令，字数超过了全篇的二分之一。分析各诏令，可以看到元帝时已险象丛生：公卿大夫骄奢淫逸，“缘奸作邪，侵削细民”，加上天灾频仍，赋敛繁重，农民“困于饥馑”，“流散道路”。诏令基本上反映了西汉统治者无力回天，政权即将崩溃的大势。

《汉书》有八表，包括《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王子侯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这八表对《史记》有关汉代诸表既有继承，又有许多发展。前五篇表史料有限，用处不广。其新创的《外戚恩泽侯表》是《外戚传》的姊妹篇，它揭示西汉诸后家援引古例而获封侯，以致势力“渐广博矣”，从而违背汉初“无功不侯”的法度，造成外戚在西汉皇朝政治生活中的非常作用。《百官公卿表》同《史记》的《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有很大不同，是职官制度与职官年表的合璧，也属于《汉书》的新创，是八表中最为重要的一篇。它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讲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包括各种官职的设立、沿革、权限、属官、秩次等，这一部分，开后代“正史”百官志或职官志的先河。下卷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表，记载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全表篇幅不大，却把西汉二百余年的官僚制度和卿相的变迁条理井然地展现出来。《古今人表》也是《汉书》的首创，所列人物，按时代先后和九个等级入表，上起伏羲，下至陈胜、吴广，以接汉代人物。班固之所以以人为表，目的在于“显善昭恶，劝戒后人”，这从“九等之序”看得十分清楚。这表篇帙不大，但非“穷极经传”而不可着，足见班固用力之勤；同时也反映了班固极端正统的思想。《古今人表》只收古人，不收汉代人物的做法，也招致后人的批评。

《汉书》十志，包含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它们对《史记》八书有继承，又有许多发展和新的创造。其中，《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为《汉书》所创。《刑法志》系统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汉代律令规定，意在说明“刑

法不可废于国”，反映出西汉皇朝统治不断加强国家职能的进程。《五行志》是十志中篇幅最长、分量最重的，共分五卷，汇集了董仲舒、刘向、刘歆治《春秋》，推衍阴阳学说，论说祸福的各种说法，也囊括了其他阴阳家的看法，是一篇西汉思想史史料。志中以大量篇幅记载天象、吉凶，意在证“天人之道”，但它也记载了日食、月食、星体变异和各种自然灾害，具有科学史的价值。《地理志》记述了大一统国家的疆域规模和地理沿革，同时还详细记录了各地经济、人口、文化、风俗，记载的范围不止西汉一朝故事，还有南海诸国的情况。这篇志，一向被人们看作研究西汉历史地理必不可少的史料。《艺文志》著录了当时存世的书籍，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班固采用了刘歆《七略》的形式，弃其《辑略》，取《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以成《艺文志》，对先秦到西汉的学术著作分门别类作了系统的著录。同时，又在每一类目录之前，以言简意赅的文字，将各类学术源流及特点作一综述，所以成为研究西汉时期目录学和学术思想的一篇难得史料。如果参照《汉书·儒林传》的内容来印证，我们便可以对西汉以经学繁荣为主要特点的学术情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另外，《汉书》改《天官书》为《天官志》，改《平准书》为《食货志》，改《封禅书》为《郊祀志》，改《河渠书》为《沟洫志》，合《史记》的《礼书》、《乐书》为《礼乐志》，合《律书》、《历书》为《律历志》，这些都是根据西汉社会的实际情况加以更改。在这六篇志中，《沟洫志》和《食货志》较为重要。《沟洫志》系统地叙述了秦汉时期水利建设的沿革，其中收录了贾让《治河三策》一文，为我们保存了一份珍贵的古代水利资料汇编。《食货志》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言“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研究西汉经济十分重要的史料。

《汉书》七十列传反映了西汉一代由上至下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的活动，特别是武帝中期以后的每篇人物传记，就是有关该人的基本史料。班固《汉书》中的人物，大多是统治阶级中的上层人物，这些人的言论和行迹，往往透露出当代社会某一方面的重要内容，不少将相名臣的传记照录了一批重要的奏疏和文章。明代人凌稚隆在《汉书评林·汉书总评》中引虞舜治之语批评《汉书》说：“孟坚所掇给以成一代之书者，不过历朝之诏令，诸名臣之奏疏尔。”^① 这种看法是欠妥的。相反，后世学者认为，《汉书》中所摘引的大臣的奏疏，正是其价值所在，它原原本本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情

^① 凌稚隆辑：《汉书评林》100卷，明万历九年凌稚隆刻。

况。如《李寻传》主要是由李寻游说王根之辞和上给哀帝的一简奏疏组成。奏疏长达二千多字，以陈说灾异为名，从天道和历史上反复表明了他反对外戚干预政治、巩固皇权的主张。劝说哀帝“抑外亲，选练左右，举有德行道术通明之士充备天官，……以辅圣德，保帝位，承大宗”^①。哀帝初立，有抑制外戚之意，李寻的奏疏正是针对哀帝的想法而发的，它对于了解哀帝继位之后，皇权与外戚的斗争，是一篇具体生动的材料，与《汉书·外戚传》相辅相成。班固不仅以单传、合传的形式着重个别反映了历史人物，还仿照《史记》设立类传，从不同角度记述许多相关的人物或事物，有《儒林传》、《循吏传》、《酷吏传》、《货殖传》、《游侠传》、《佞幸传》、《外戚传》七篇。《儒林传》记述了一大批儒者的生平、师承关系及学术渊源流派，内容比《史记·儒林列传》丰富。《循吏》、《酷吏》、《游侠》、《佞幸》四传，是《史记》同类传记的续篇，补进了汉武帝之后的一些人物。但是《游侠传》立传标准却与《史记》不同。在传中，司马迁以同情、歌颂的口吻记载了朱家、田仲、剧家、郭解等行侠仗义的布衣之侠，而班固除了对他们记述外，还把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等一些结宾客、广交流、有权势的人归于游侠之列，一并斥责为“背公死党”之徒，与司马迁初衷相违背，表现出了其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正统思想。《货殖传》是班固为商人所列的传记，形式和内容基本取自《史记》，没有太大史料价值。《外戚传》是《汉书》新创的类传，记载了自汉兴至孝平时期西汉皇后外戚的事迹，并把它置于《元后传》和《王莽传》之前，寓意很深。元后即元帝皇后王氏，是王莽的姑母，她经历元、成、哀、平四世，“为天下母”六十余年中，王家势力膨胀，“五将十侯，卒成新都”，她虽以“汉家老寡妇”自居，不愿以国玺授王莽；但又无力挽回现状，以致王莽篡汉，建立新莽政权。《外戚传》结合《元后传》是了解西汉外戚势力消长变化的重要资料。

“孝平之世，政之莽出。”西汉后期，王莽以外戚身份篡夺汉政权，改国号为新，称帝十几年。按理应该立本纪记述王莽新朝政权的存在，但班固为了交代“光武中兴”之所由来，极力否认王莽的王统地位，斥责其新朝为僭伪政权，只立传记以记其事。《王莽传》是《汉书》中篇幅最大的传记，班固记述时，开始用汉纪年，之后用新莽纪年，完整地记载了两汉之际的一段历史。《王莽传》是研究王莽新朝政权最为完备的史料。

《汉书》继承了《史记》为少数民族立传和记载邻国历史的优良传统，对西汉边境少数民族和邻国历史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书中设有《匈奴

^① 班固：《汉书》卷11，中华书局1962年版。

传》、《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和《西域传》。《西域传》是在《史记·大宛列传》的基础上创立的，班固搜集了许多新资料，扩大了区域范围，增加了国别数目，共计有五十一国，记事与汉王朝相始终。传中叙述了西域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国都所在，距离汉朝的里数、户口数、军队情况，也记载了匈奴在西域进行战争的历史以及汉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同时对安息、大月氏、大夏、犁靬、条支等中亚、西南亚国家的历史也作了记述。因而，它不仅是研究我国古代民族历史的珍贵史料，也是研究亚洲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宝贵资料。《匈奴传》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增加了五分之三的内容，记载自远古至更始末年匈奴社会的发展状况，以及与汉王朝错综复杂的关系，首尾完备，是研究匈奴早期历史极为重要的资料。西南夷、南粤、东粤以及朝鲜诸传，班固也全都作了补充。其中西南夷传的部分材料与《史记》比，增加将近一半的内容，是研究西南亚等古民族史的重要文献。

班固也作了《叙传》，此法模仿于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也立于全书最后一篇。《叙传》主要叙述了班固的家世和其生平事迹，同时也阐述了诸篇的主旨和撰作原因，是研究班固其人和《汉书》的基本史料。

《汉书》破司马迁的“通史”，以100卷的篇幅，80余万字的文字，全面集中地反映了西汉王朝的历史，首创了断代史体例，在史学编纂方法上有重要的地位。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秦末农民起义，楚汉战争人物，西汉政权建立和天人关系等记述上，其史识却远不及司马迁。《史记》中，司马迁为陈涉作《世家》，并赞扬其“初作难，发于涉”；为项羽立《本纪》，肯定了他们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而《汉书》对其二人立《陈胜、项籍传》，从史识优劣看似乎有很大不同，但从史料角度来说，《陈胜、项籍传》同样保存了秦汉之际群雄逐鹿、不相统一的天下大势和若干年间的重要大事，这一点在读《汉书》时一定要注意。

《汉书》问世以来，久传不衰，腾誉学林。但由于此书蕴义宏深，加上班固喜用古字古训，给人们阅读造成了困难。从东汉起就有人为其作注，最早的是桓帝时的延笃，但未流传下来。现存东汉人注解的《汉书》，以应劭、服虔两家最古。到唐以前，前后出现三十家《汉书注》。唐代颜师古，在服虔、应劭、晋灼、臣瓚、蔡谟五种注本外，又增加荀悦《汉纪》、崔浩《汉纪音义》、郭璞等二十三家，删繁补略，参以己说，对唐以前各家注释评较得失，进行了改正讹误、通顺文句、考据补漏和注音释义的工作，是清代以前《汉书》注的最高成就。其后，又有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昭《汉书辨疑》22卷、王念孙《读书杂志》16卷、李慈铭《汉书札记》、朱一新《汉书管见》等。民国王先谦作《汉书补注》120卷，旁搜远

绍，采摭剪裁六十余家，集前人之大成。^① 自古及今，《汉书》注解主要以颜、王二注为最完备。此外清人周寿昌著《汉书注校补》56卷，主要对版本、字句校勘，文字注释，史事考订；清人沈钦韩的《汉书疏证》36卷，主要是考订名物、正谬补缺、通畅事理；今人吴恂《汉书注商》^②以训诂音韵见长。此三部注本，对《汉书》研究也有一定参考价值。近人杨树达著有《汉书窥管》（科学出版社1955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再版），采集前注，订讹纠谬，有很大启发性。今人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同《史记新证》一样，主要引用汉简、铜器、漆器、陶器以及封泥、汉印、货币、石刻等各种材料以证《汉书》所记载史事及制度，很有资取价值。论述史汉异同的有宋人倪思《班马异同》、近人郑鹤声《史汉研究》（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等著作。现代人的研究成果首推陈其泰先生的《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8月北京第2版）全书共九章，结合班固的家世和经历，论述了《汉书》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人文主义特征，成功的著史格局，弘扬实录精神，关心民生，保存珍贵的文化、学术资料等。行文流畅、视角新颖，尽现原典之精华，启迪后人之深思。

《汉书》校补考订，清代成果最为显著。不仅对全书综合研究，而且对重要篇目专门考证。《汉书》的艺文志是了解当时的古书书名、篇目卷数、作者等情况的唯一著作，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刑、数术、方技六略。各略又分为若干门类。这种形式以后成为正史艺文志、经籍志的体裁。参考书有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10卷，清代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6卷、《汉书艺文志条理》8卷，^③ 民国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1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等。地理位置对于了解当时人文、自然地理方面的情况是极为珍贵的，清代学者在这方面研究《汉书》的成果不少，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6卷，徐松《汉书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王绍兰《汉书地理志校注》2卷，汪远孙《汉书地理志校本》2卷，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10卷，杨守敬《汉书地理志补校》2卷，汪士铎《汉志释地略》等都是有影响的著作。^④ 陈家麟、王仁康编的《汉书地名索引》（中华书局1991年版），对查阅古今地名十分便利。梁玉绳的《汉书人表考》

① 王先谦：《汉书补注》，收入《国学基本丛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吴恂：《汉书注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③ 均见《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本。

④ 均见《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本。

对汉书人物有一定的补充作用。此外由金少英集释、李庆善整理的《汉书食货志集释》（中华书局1986年版）对汉代的土地制度及赋税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汉书》目前最好的版本，是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平装全十二册。它以王先谦的补注本作底本，参校其他较好版本，只收颜注，对其错简文字予以纠正，便于阅读。

《汉书》研究也有一些重要的工具书可资参考：①《汉书及补注综合引得》，台北哈佛燕京学社1966年版。②黄福鑫编《汉书索引》，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远东学术研究所1966年版。③庄鼎彝《两汉不列传人名韵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④王恢编《汉书地理志图通检》，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⑤魏连科编《汉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年版。

3. 《后汉书》

此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120卷，包括十纪、八志三十卷及八十列传。记载了从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即帝位，至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汉亡，共一百九十五年的史实。其中纪、传作者是南朝刘宋时学者范曄，志的作者是晋代学者司马彪。

范曄，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省淅川县）人，生于东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死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范曄出身官僚世家，出继从伯父范弘之，袭封武兴县五等侯。沈约《宋书·范曄传》记载，“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卷六十九）。^①东晋末任宋武帝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刘宋建国后，累官秘书丞、新蔡太守、尚书吏部郎等。元嘉元年（424年），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曄向以文才自负，曾说“观古今著述及评论，太少可意者”；既贬官不得志，于是广集学徒，在《东观汉记》等诸家有关东汉史著的基础上，撰写《后汉书》。纪传部分写成后，他曾自赞“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元嘉中，历任镇郡长吏、下邳太守、左卫将军、太子詹事等职。元嘉二十二年（445年），有人告发他与孔熙先等密谋拥立刘义康作皇帝，于是以谋反罪被下狱处死。《宋史》卷六十九和《南史》卷三十三有本传，但传中多诬罔之词。清代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为之辨析，可与史传参阅。范曄写《后汉书》是从公元424年开始的，《宋书·范曄传》说：“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原计划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百篇；凡《汉书》所有诸志，他都计划具备。本传中就有记载，“欲遍作诸

^①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

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但纪传著成，即被杀害。据《后汉书·皇后纪》李贤注引宋沈约《谢俨传》说：“范曄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曄败，（俨）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又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蔚宗十志，其篇名可言者，百官志见《后妃纪》，礼、乐、舆服志见《东平王苍传》，天文、五行志见《蔡邕传》”^①。这是从范曄本人之言和范书本身可以证明原计划中有做这些志的准备。今之所见志是南朝梁刘昭注《后汉书》时，因范曄曾称赞过西晋人司马彪的《续汉书》，遂取其八志以补范书之缺，故今仍称此志为《续汉志》。

司马彪，字绍统，晋高阳王司马睦之长子。少笃学不倦，然好色薄行，不得为嗣。由此不交人事，专精学习，博览群籍。据《晋书·司马彪传》载，司马彪撰写《续汉书》的理由是：“汉氏中兴，迄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譙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②。由此可知司马彪当初所撰并非仅志30卷，只是因为八志被补入范书而保留了下来，今存的八志也被称为《续汉书志》。又著有《九州春秋》10卷，《庄子注》21卷，《战略》（《隋志》作《兵记》）20卷，集4卷。

《后汉书》史料来源丰富。东汉本朝史自汉明帝下诏班固等撰作《世祖本纪》之后，到范曄之前，代有撰述。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范曄著书之前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书一出，诸家《后汉书》则日渐消沉，逐渐散佚。后来除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保存下来以外，其余都已不存。清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述略》与《隋书·经籍志》说法略有不同，认为有十八家之多。兹列主要的十家，以供参阅：

①《东观汉记》，刘珍等撰。刘珍，东汉蔡阳人，字秋孙，曾任谒者仆射、卫尉等。邓太后临朝时，曾命其校订东观诸书，并作建武以来名臣传，参与撰修《东观汉记》。《隋书·经籍志》说该书143卷，注云：“起光武记注至灵帝，长水校尉刘珍等撰。”《旧唐书·经籍志》作127卷，《新唐书·艺文志》则作126卷，又录1卷，撰修过程及明清时辑本见其后的《东观汉记》条。此书是东汉官修史书，魏晋以来修撰东汉史书者，主要素材都取自《东观汉记》。

① 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见《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本。

② 房玄龄等：《晋书》卷82，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②谢承《后汉书》。谢承，三国吴山阴人，字伟平，其书《隋书·经籍志》作130卷，注云：“无帝纪，吴武陵太守谢承撰。”《旧唐书·经籍志》作133卷。《新唐书·艺文志》作133卷，又录1卷。可见记载小有出入。此书至马端临作《文献通考·经籍考》时已亡。

③司马彪《续汉书》。《隋书》、《旧唐书》“经籍志”均作83卷，《新唐书·艺文志》作83卷，又录1卷，今存志30卷。

④华峤《后汉书》。华峤，字叔骏，平原高唐人。《晋书·华峤传》说：“峤以《汉纪》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会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观秘籍，遂就其诸。起于光武，终于孝献，一百九十五年，为帝纪十二卷，皇后纪二卷，十典十卷，传七十卷及三谱、序传、目录，凡九十七卷。”又说十典未成，其子畅成之。刘知几认为诸家后汉书“推其所长，华氏居最”。此书《隋书·经籍志》仅载17卷，注云：“本九十七卷，今残缺，晋少府卿华峤撰。”而新旧唐书两志均作31卷。今亡。

⑤谢沈《后汉书》。谢沈，山阴人，字行思，时人谓其才在虞预之右，成帝时官著作郎，撰《后汉书》100卷。《隋书·经籍志》作85卷，注云：“本一百二十二卷，晋祠部郎谢沈撰。”新旧唐书志均作“一百零二卷，又外传十卷”。今亡。

⑥袁山松《后汉书》。袁山松，诸书或作袁崧，扶乐人。所撰《后汉书》，《隋书·经籍志》作95卷，注云：“本一百卷，晋秘书监袁山松撰。”《旧唐书·经籍志》作102卷，《新唐书·艺文志》则云：“袁后汉书一百一卷，又录一卷。”今亡。

⑦薛莹《后汉记》。薛莹，字道言，竹邑人。其书《隋书·经籍志》：“《后汉记》六十五卷”，注云：“本一百卷，梁有，今残缺，晋散骑常侍薛莹撰。”新旧唐书均作薛莹《后汉记》100卷。

⑧张莹《后汉南记》。《隋书·经籍志》作45卷，注云：“本五十五卷，今残缺，晋江州从事张莹撰。”新旧唐书两志均作五十八卷，今亡。

⑨张璠《后汉纪》。此书《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书两志均作30卷，今亡。袁宏《后汉纪·自序》云：“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可见张书的价值是很大的。

⑩袁宏《后汉纪》。袁宏，字彦伯，小字虎，扶乐人，袁山松族叔。因不满当时已出的几种《后汉书》，继荀悦《汉纪》著《后汉纪》三十卷，其书今存。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称“世言汉中兴史者，惟袁范二家而已。”另外，还有南朝宋刘义庆撰的《后汉书》。新旧唐书两志把其书放

在华峤之前，作 58 卷，今亡。

范曄删削众家后汉史，在材料整理上博采诸家，在《后汉书》中，他把《东观汉记》和华峤的《汉后书》称为“前史”。还有许多他没有提到的书名，如《党锢传》，可能来自司马彪《续汉书·党锢传》；其循吏、酷吏、宦者、儒林、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类传可能来自谢承《后汉书》之同名的类传；其“六夷”传包括东夷、南蛮、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等，可能是分别参考了谢承、司马彪、华峤三家后汉史中的有关内容。而范曄在整理材料中对历史人物传记的编次上，更多地受到袁宏《后汉纪》“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的影响。可见，诸家后汉史，为范曄成书从材料上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加之范氏善于剪裁，记事又繁简得当，故超越众家，后来居上。南朝梁时刘昭说：“范曄后汉，诚跨众氏。”（《后汉书注补志序》），唐代刘知几也说：“范曄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参见《史通》的《书事篇》和《补注篇》。）因此《后汉书》隋唐之际，在原先民间流传的所谓“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中，终于替代了《东观汉记》的地位，成为“三史”之一，盛行于世。范曄《后汉书》一经流行，除袁宏《后汉纪》之外的诸家《后汉书》逐渐消沉，至于散佚。东汉时期各类人物的事迹和风貌只保留在范曄的《后汉书》之中，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足见其价值之高。

《后汉书》有帝后纪十卷，前九卷是东汉诸帝纪。东汉有十三位皇帝，其中有四位在位时间较短，故范曄作本纪时，没有像《汉书》一样一帝设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后附殇帝，《顺帝纪》后附冲、质二帝，《灵帝纪》后附少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两得。九卷帝纪，以编年提纲挈领，包举了东汉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纪的最后一卷是《皇后纪》。范曄改变了《史记》、《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东汉章帝以后，有六个皇太后临朝执政，范曄这样改动，符合东汉皇后临朝称制的历史事实。掌权的外戚如窦宪、邓鹭、梁冀、何进等则另有专传。

《后汉书》有人物传记八十，是全书内容最多的一部分。范曄为人物立传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不仅为公卿将相写传记，而且还根据东汉社会特征创立传记。《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加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这些列传既是新创，又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东汉中叶以后，王朝势力逐渐衰弱，加之皇

帝大多年幼称帝，外戚和宦官交替把持政权。桓帝、灵帝之时，宦官专政，郡县遍置中宫子弟，鱼肉百姓，民不堪命，政治极端腐败黑暗。朝中的正义之臣和太学生联合起来，抨击朝政，党祸大兴，许多正直的大臣都以结党的罪名被杀。另外，东汉宦官多参与朝政，杀戮大臣，是党锢之祸的主要制造者。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东汉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范曄根据这些史实，创立了《党锢传》和《宦者传》。《文苑传》记文学之士，《后汉书》中有张衡、马融、蔡邕等专传，所以又增文苑一目，记杜笃、傅毅，以至赵壹、祢衡等二十二人，反映了东汉文风之盛。《独行传》记治行卓著的人物，反映了东汉时代没有政治势力的知识分子，要获得乡评世誉，进入仕途，非有耸人听闻的为人所不能为的行动是不行的。《逸民传》记述了东汉时期脱离当时政治斗争，隐居不仕，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传中指出，这些受统治阶级礼遇甚厚的“逸民”，其实多为沽名钓誉的人物，统治者对他们征、聘、召、赐，目的不过是想以这些戏剧性的手法，达到“举逸民天下归”的效果，反映了东汉政治的虚弱一面。《列女传》是范曄在刘向所立列女传的启发下增设的，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现。《后汉书·列女传》共有十七人，立传的标准是“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传中有择夫重品行而轻富贵的桓少君，博学多才的班昭，断札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著名才女蔡琰等，范曄这种打破封建伦理道德而重才行的观点，在古代史学家中是很少见的。《方术传》专记当时阴阳占卜，事涉神仙怪异之人及科技人物。东汉时期，迷信盛行，光武及其诸帝笃信图讖，为了反映当时实际情况，范曄特立此传。唐刘知几在《史通·书事》篇中批评说，此传“言为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玉之玷”^①。其实，范曄立此传，主要是对迷信行为及其做法进行批评揭露。

以上诸类传，是范曄所新增，除党锢方术传外，其余均为后来史学家所取法。清人邵晋涵在《江南书录》评价说：“东汉尚气节，此书创立《独行》、《党锢》、《逸民》三传，表彰幽隐，搜罗殆尽”；“所增《文苑》、《列女》诸传，诸史相沿，莫能刑削”，使缘乎东汉历史的体例获得了超越时序的永恒的史学价值。

《后汉书》依据《汉书》之法，为人物立传时，大量抄录重要奏疏和论著，保存了东汉一大批有价值的材料。如《崔寔传》载其《政论》一篇；《桓谭传》载其《陈时政疏》和《言图讖疏》；《冯衍传》载其《说廉丹》和《说鲍宣》二书；《王符传》载其《潜夫论》中五篇；《仲长统传》载其

^① 刘知几：《史通》（内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乐志论》和《昌言》中的《理乱》、《损益》、《法诚》三篇；《张衡传》载其《客问》一篇、《上陈事疏》一篇和《请禁图讖疏》一篇；《蔡邕传》载其《释海》一篇和《陈施政所宜七事疏》一篇；《左雄传》载其《陈政事疏》一篇；《荀爽传》载其《对策》一篇；《荀悦传》载其《申鉴》大略等等。这些短篇论著及奏疏，涉及东汉各方面，是研究东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珍贵材料，且对后代社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实用价值，若不是《后汉书》附带记上，恐怕就散佚无存了。

此外，《后汉书》还很重视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研究，书中立有《东夷传》、《南蛮西南夷传》、《西羌传》、《西域传》、《南匈奴传》和《乌桓鲜卑传》六传。东汉时期，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密切，如班超出使西域及中亚七十多个国家，加强了西域和汉王朝的联系；匈奴民族分裂后，一部分与汉民族杂居出现了民族融合，这些都在诸传中有反映，六传保存了东汉民族史、外交史大量重要资料。

《后汉书》志部分，是南朝梁刘昭为范书作注时，取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补入的，有《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和《舆服志》，共为三十卷。八志中除《百官志》和《舆服志》是司马彪独创外，其余六志都是对前史诸志的继承和发展，对了解东汉的社会风俗和政治制度有一定的价值。《律历志》是在刘洪《律历》的基础上撰作的，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主要记“律准”和“候气”，中卷讲东汉时期历法专家对历法的论述，下卷记历法，反映了东汉人制历的科学水平。《礼仪志》记载在重要节令、祭祀及丧事中君臣应践行的仪式。《祭祀志》是《汉书·郊祀志》的续作，主记东汉皇帝祭祀神灵之事。《天文志》记载东汉的天体变异情况，上溯自王莽新政时期。《五行志》取法《汉书·五行志》而成，主要记载自然界的异常现象和社会生活中的怪异之事，并把人事与这些变异现象穿凿附会，从中可以看出东汉时期的迷信之风。其中，部分自然现象的记载，对研究当时自然灾害有参考作用。《郡国志》改《汉书·地理志》而来，主要记东汉时期郡国行政区划、沿革、人口及各地物产、风俗等，是研究东汉历史地理必不可少的史料。《百官志》五卷，主要记载东汉时期中央和地方两级官制的大体情况，是研究职官制度的重要材料。《舆服志》具体叙述了东汉时期等级制度的车服沿革和样式，是研究东汉车制和服制的有用资料。但是司马彪所撰“志”中没有《食货》、《沟洫》、《刑法》和《艺文》等，使有关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失于记载，反映了他历史观的局限，所以清人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述略》中说：用司马彪《续汉书》八志补范书之缺，“未足弥

范氏之憾”。

刘昭虽然把八志从《续汉书》中抽出补入范书，但纪传部分和志往往各自单行。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年），判国子监孙奭奏请合刻两书，朝廷准许，后由马志方合刻行世，流传至今，成为“二十六史”之一。

《后汉书》与《史记》、《汉书》相比有其独到的特点：（1）虽取法《汉书》采用断代史记东汉一朝史事，但在编撰技巧和内容思想上有自己的独创，他为东汉皇后立本纪，为党人、宦者、逸民、列女等立类传，客观反映了东汉社会的特征，也为以后史学家提供了研究人物，处理史料的新方法。从全书所传人物看，他立传是以“贵义德、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行”^①为宗旨，把“节义”作为衡量历史人物的条件，网罗社会上的各类人物，拓展了纪传体史书的叙事范围。加之范曄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简而且周，疏而不漏”^②，比较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东汉的历史。另外，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范曄《后汉书》所载史料就更为珍贵。（2）《后汉书》特别重视史论。范曄采用论赞的形式明文评论史事，把史论作为重心，成为《后汉书》的一个特点。司马迁、班固和陈寿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明文评史，只是具体名目不同。《史记》称“太史公曰”，《汉书》为“赞”，《三国志》曰“评”。“论”、“赞”在《后汉书》中的重要性远在前面三书之上，因为范曄不但利用这种形式评论史实，还对某一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综述，从几个方面反复地进行分析，对本传起到题解作用。《后汉书》的“论”一般是指纪传后面的论，差不多每篇都有一首或一首以上。论中又有序论，也称作序，是在《皇后纪》和杂传的前面。论多是评论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有时也采取讽喻或感慨的形式。赞在每篇纪传后面都有一首，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韵语写成，或概括史实，或另发新意，多可补论的不足。赞的语言凝练，用意很深。如从《光武帝纪》到《献帝纪》的赞，概括了东汉建立、发展和衰亡等不同阶段的政治大事。把九首赞合起来看，简直是一篇用韵语写的东汉政治史略。在《胡广传》中，作者写了一个以苟合取容又无可短长的官僚的升迁史，赞曰：“胡公庸庸，饰情恭貌。朝章虽理，据正或桡。”透露了作者对这类人物的指责和义愤。范曄曾讲过，他编纂《后汉书》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这样明确地提出写史为政治服务，可以说是历史

①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台北艺文印书馆1964年版。

② 刘知几：《史通·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上的第一人。因此,《后汉书》中褒赞了大量的勤政爱民者。如《循吏列传》中记传卫飒时,赞其人“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记传王景时,历数其修渠治水、教民耕作蚕织等政绩,赞其勤政爱民;记传王涣时,写其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清正廉明,善断案,“曲尽情诈,压塞群疑,又能以谲数发佞奸伏……”又如在卓茂、鲁恭、魏霸、刘宽等传记中,赞其治行卓著;杜根、刘陶、李云等传记中,赞其仗义直谏;班超、梁谨等传记中,赞其大智大勇,立功西域,这种赞扬表现了对王权秩序和国计民生的维护。(3) 编撰思想注重“通古今之变”。范曄在很多序、论中,打破朝代的断限,尽量地把某一历史现象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果描述清楚,力图有所归纳。虽然,他所找到的事物内在联系大多是肤浅的,甚至有的是错误的。然而,这种从历史形势发展上论述古今变异,总结历史发展规律的史学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党锢列传》序中,详细地论述了从春秋到汉末士风的变迁:战国时期重计谋、尊说士,因而诱导很多人饰巧驰辩进行钓利;汉高祖文礼简阔,引起人们的轻死重义,怨恚必仇;武帝崇尚儒学,又出现了党同伐异的纷争;到桓灵之际,主荒政谬,宦官当权,则造成清议的流行。他认为,“上好则下必甚,矫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表明范曄看到了某些历史现象向矛盾的对立面发展,他企图用“理”来概括说明。在《党锢列传》序中,范曄还用四组矛盾的事物来比喻党锢问题所面临的矛盾,阐述了作者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在过去的史书上是极少见的。(4) 以文采著称于世。其中的序论和赞尤为突出,作者曾自诩为“奇作”,比之于《过秦论》。文章风格趋向骈体,写人叙事,简明周详,生动感人。且收录了大量的东汉的散文、辞赋、诗歌。学者们誉为兼有一代文章总集的性质,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后汉书》由范曄、司马彪两人的著作合成,故今本《后汉书》的注,也由两部分组成:纪传部分出自唐章怀太子李贤等人手笔,志部分由南朝梁刘昭所作。范曄所撰的《后汉书》没有“志”,当时人已感到是一种缺陷;行世约五六十年后,到南朝梁时,刘昭即“集后汉同异以注范书”,惜其诸志未成,又据范曄“遗书自序,应遍作诸志”的计划,乃移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三十卷,“注以补之”,附在范书后面,以相配合。^① 刘昭的注侧重说明或补订史实异同,类似裴松之《三国志注》。唐时,高宗儿子章怀太子李贤召集张大安、刘讷言等人,于上元二年(675年)开始注范书,他们参考前代所撰有关东汉诸史书和南朝梁王规的《续汉书注》,刘昭、吴均的

^① 姚思廉:《梁书·刘昭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

《后汉书注》等，前后历时六年，撰成《后汉书注》九十卷。李贤等人的注侧重字句的注释，比前人的注大有进步。虽说有许多错误、冗杂和疏漏的地方，仍不失为清代以前《后汉书》注本的权威性著作。李贤等人的注流传于世后，刘昭所作的纪传部分的注就失传了，只有志的部分仍然是刘昭的原注。

清代学者在《后汉书》的注释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以惠栋的《后汉书补注》24卷（台北艺文印书馆1966年版）和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120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最为著名。《后汉书补注》初名《训纂》，后定名《补注》，主要是补刘昭、唐李贤的注。其体例仿《三国志注》援引诸家后汉史书，详细作注，对引文列出处，间或加按语，以抒己见。《后汉书补注》比李贤注又前进了一步。清末王先谦在惠栋书的基础上，加引诸家考证语，撰成《后汉书集解》120卷。此书不仅详细校核了《后汉书》的版本，而且勘合纪、传异同，纠正记载中的讹误，对名物、典章制度也作了较详细的诠释，是《后汉书》注本中的最佳著作，但不如他先出的《汉书补注》功力之深。此外，清人沈钦韩的《后汉书疏证》30卷^①和周寿昌的《后汉书注补正》8卷，也可资参考。《后汉书疏证》以考订名物、正谬补缺、通畅事理见长，地理部分疏证尤详。沈钦韩撰《后汉书疏证》时，惠栋已撰成《后汉书补注》，因惠氏稿本当时未刊行，沈氏未能见到，所以沈书与惠书“各抒其所得”，故各有所长，可互相参正。《后汉书注补正》主要是纠正唐李贤注本之失误，补充惠栋补注所未涉及的问题和失误之处，共有考订二百余条。

范曄《后汉书》没有志，司马彪八志中又无《艺文志》，后人在这两部分做了大量补订工作。补作《艺文志》的主要著作有：清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1卷、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4卷、姚振宗《后汉书艺文志》4卷、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等。补表者主要有：明末清初万斯同的《历代史表》的《后汉书》部分，即《诸王世表》、《外戚侯表》、《云台功臣侯表》、《宦者侯表》、《将相大臣年表》、《九卿年表》等；宋熊方的《补后汉书年表》，清人诸以敦的《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钱大昭的《后汉书补表》8卷，黄大华的《东汉中兴功臣侯世系表》、《东汉皇子王世系表》，华湛恩的《后汉三公年表》，练恕的《后汉

^① 沈钦韩：《后汉书疏证》，收于《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正史卷27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六卿年表》。另有钱大昭《后汉郡国令长考》1卷,^①近人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这些志、表对东汉史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后汉书》史实考订的著作主要有:钱大昭的《后汉书辨疑》[11卷2册,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广雅书局刊本],李慈铭的《后汉书札记》(7卷,线装影印本,1套2册,原书藏于北平北海图书馆),何若瑶《后汉书注考证》等。而王先谦不仅对钱大昕、钱大昭、沈钦韩、周寿昌等人之精说脱遗甚多,而且如李慈铭《后汉书札记》竟被忽略不用。今人戴蕃豫《稿本后汉书疏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弥补了王先谦《后汉书集解》的不足。关于《后汉书》的版本,还可参阅东海大学图书馆特藏组谢莺兴所撰的《馆藏〈后汉书〉版本考略》一文,发表于2002年7月《东海大学图书馆馆讯》上。

清代对《后汉书》的辑佚工作也很有成就,著名的如姚之骅《后汉书补逸》一书。此书为刻本,共21卷,其中辑《东观汉记》8卷,谢承《后汉书》4卷,司马彪《续汉书》4卷等。可惜孙志祖补辑谢承《后汉书》5卷,未见传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天游教授的《八家后汉书辑注》(上、下二册),该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八家《后汉书》进行了辑佚校注,为研究东汉历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对《后汉书》研究有帮助的工具书有:①《后汉书注释综合引得》,哈佛燕京学社编1966年台北版。②日本藤田丘善编《后汉书语汇集成》(共三册),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学院1960年版。③李裕民编《后汉书人名索引》,中华书局1979年版。

目前《后汉书》通行版本为1965年中华书局排印出版的校点本全十二册,校勘较细。

4. 《东观汉记》

《东观汉记》,初名《汉记》,是一部东汉官修的本朝国史。因主要在洛阳南宫保藏图籍的东观撰成,故有其称。编纂大约始于永平五年(62年),明帝命班固、陈宗、尹敏、孟异等共撰《世祖本纪》。班固又撰开国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和载记28篇,此为本书之初撰。安帝时刘珍、李尤、刘驹馥等人继撰建武永初间的纪表和名臣、节士、儒林、外戚四传,所以古代皆以刘珍列于撰者之首。嗣后伏无忌、黄景等又奉命撰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和单于、西羌传及地理志。汉桓帝时边韶、崔寔、朱穆、

^① 钱大昭:《后汉郡国令长考》,见《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55年重印本。

曹笃、延笃等续著孝穆帝纪、崇帝纪、顺烈帝纪、皇后传、百官表、顺帝功臣表等，此书初具规模。灵帝又命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等又增加灵帝纪及十志、二十四列传等四十二篇，累计 143 卷。因董卓之乱，全书未能最后完成。断限上起光武，下止灵帝，基本反映了东汉一代史事。在范曄《后汉书》问世之前，有相当大的文化影响，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极受读书者的重视。现存辑本有 24 卷。

此书体例一如《汉书》，纪、表、志、传俱全，又首创“载记”。载记一日记王常、刘盆子、樊崇、吕母、隗嚣、王元、公孙述、延岑、田戎等事。这些人，或为“群盗”，或为“叛臣”，故以“载记”记之。《东观汉记》原有志 10 篇，多出于蔡邕之手。现在仅知有律历、礼、乐、郊祀、天文、地理、朝会、车服八篇，记载了东汉时期的各种制度。朝会、车服二志是其新创。其“载记”和志目，对后来纪传体史书的撰写有一定的影响。

《东观汉记》是当代人修的当朝史，史料价值较高，为后来各家《后汉书》提供了翔实材料。晋人华峤撰《后汉书》以之为本，南朝刘宋范曄撰《后汉书》又以华书为本，范书流传后，《东观汉记》才逐渐被取代。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东观汉记》原有 143 卷，唐中叶以后逐渐散佚，北宋时存 43 卷，南宋时仅存 8 卷，元朝以后全部散佚。清人姚之骊辑集佚文 8 卷。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吸取姚之骊成果，又从《永乐大典》及其他诸书中搜出《东观汉记》遗文，辑成今本《东观汉记》24 卷。包括帝纪 3 卷，年表 1 卷，志 1 卷，列传 17 卷，载记 1 卷和佚文 1 卷，刊入《武英殿聚珍丛书》。此书虽为原书中很小一部分，但其中保存了《后汉书》中所缺载的资料，加之记事出于当代人之手，所以，对东汉史研究仍有重要价值。近人从《文选》李善注中辑出《东观汉记拾遗》，从《后汉书》李贤注中辑出《东观汉记》，均收入《辑佚丛书》。此外，《四部备要》、《丛书集成初编》、《国学基本丛书》中均收有《东观汉记》辑本。

现代学者对《东观汉记》研究贡献最大的属吴树平先生。他在清人辑录成果的基础上，重新翻检了大量古籍，新得遗文数百条，又利用各种资料比勘互校，订正了前人的若干错误，每条遗文又都注明了出处，对人物事迹的编次也更为合理，是《东观汉记》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目前最有参考价值的本子。^① 另外，吴先生曾经发表数十篇论文全面讨论《东观汉记》的编撰、流传及影响，其成果均收入在他的《秦汉文献研究》中，^② 学习或研

① 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② 吴树平：《秦汉文献研究》，齐鲁书社 1988 年版。

究者可查阅。

5. 《七家后汉书》

此书是清代汪文台所辑的七部《后汉书》佚本，学者对它的评价是辑书较全面，辑文最丰富，且编目有序，出处周详，考辨精当，颇有益于读者。全书共21卷，其中包括：吴谢承《后汉书》8卷（原书130卷），晋薛莹《后汉记》1卷（原书100卷），晋华峤《后汉书》2卷（原书97卷），晋司马彪《续汉书》5卷（原书83卷），晋谢沈《后汉书》1卷（原书122卷），袁山松《后汉书》2卷（原书95卷），佚名氏《后汉书》1卷等。以上史著为范曄《后汉书》所据，大多数原文已不存在，只有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凡30卷与范曄《后汉书》本纪、列传合刻得以流传。与此同时，清人姚之骅辑、孙志祖增订《谢氏后汉书补逸》6卷，黄奭辑录的薛莹《后汉记》1卷，华峤《后汉书注》1卷，谢沈《后汉书》1卷，袁山松《后汉书》1卷（均收于《汉学堂丛书》），王谟辑《袁山松郡国志》（汉唐地理书钞）等佚文的资料可与范曄《后汉书》相参照，供研究东汉史使用。

周天游对汪文台辑《七家后汉书》进行整理，疏略误漏之处予以改补，并详加校记。^①重新整理《七家后汉书》的目的在于，一则可以使世所鲜见的清代辑佚学经典之作，得以广为传播，以供历史文献学研究者参考；二则可以存异文，令读者取与他的《八家后汉书辑注》。周先生从《后汉书》注、《续汉志》注、《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文选》注等文史之注中，以及《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种种类书中，辑出历史学者对汪《七家后汉书》及晋张莹《后汉南记》55卷八家后汉书的注，认真汇辑，重加整理，排比于一书。搜罗宏富，涵盖面广，为研究东汉历史及《后汉书》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②

另外，郑鹤声《各家〈后汉书〉综述》（载《史学与地学》第1期，1926年12月），余嘉锡《辨谢承〈后汉书〉传本之有无》（载《经世日报》，1946年9月11日，《读书周刊》第5期），周天游《汪文台辑华峤〈后汉书〉补正》（载《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韩杰《华峤〈后汉书〉三议》（载《思想战线》1988年第6期），吴树平《范曄〈后汉书〉与华峤〈后汉书〉》（《秦汉文献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吉书时《七家〈后汉书〉佚文可补范书之缺》（载《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等论，从文献角度提供了重要价值，可作参考。

^① 汪文台辑、周天游校：《七家后汉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6. 《三国志》

西晋陈寿撰。65卷。《魏志》30卷、《蜀志》15卷、《吴志》20卷。《三国志》记事，以历史时期的特点为准断限，不为王朝年限所约束。陈寿考虑到三国的形成和黄巾起事有密切关系，因此，其叙事不从曹丕建立魏国开始，而从汉灵帝末年开始，上溯了将近40年。同时《三国志》成书又较范书早，故被编入的大量后汉末年史事，可以和范书所载相互对照比勘，是研究后汉史事的重要材料。

《三国志》撰成后，当时人认为“铨叙可观，事多审正”，但“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而且“纰缪显然，言不附理”的地方很多。（引文见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因此，宋文帝初，裴松之就奉诏为《三国志》作注，于元嘉六年（429年）完成。裴松之作注时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订和考订上，他鸠集传记，增广异闻，凡陈寿所不载，而事宜存录者，无不收入。或同说一事，而词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者，并皆抄纳，析以己意，解其是非。据统计，裴注所引各家史著达二百一十种，注文内容超过陈寿原书数倍。所引各书，十分之九以上早已亡佚，赖有裴注，还可见到概略。因此裴注不仅开创了注史新例，而且对研究三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研读《三国志》的参考书，以卢弼著《三国志集解》为佳。此书仿王先谦《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体例，汇集了历代学者对《三国志》和裴注的研究成果，对《三国志》正文和裴注作详细的校勘、注释、考证，可谓集《三国志》研究之大成。《集解》除汇集前人之说外，还详述己意。凡对前人之说有不同者，或前人未有注释者，卢氏都加按语辩驳或补释。卢氏为杨守敬弟子，尤善地理，故该书地理部分，用力特多，贡献最大，是《集解》中的精华。

今人对《三国志》的研究成果也颇丰，如缪钺等著《三国志导读》（巴蜀书社1988年版），刘琳译注《三国志选译》（巴蜀书社1988年版），吴金华著《三国志校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苏渊雷主编《三国志今注今译》（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田余庆、吴树平主编《三国志今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也可参阅。

7. 《汉纪》

东汉荀悦撰。30卷。荀悦，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早年丧父。家贫无书，但刻苦为学，博闻强记，所见篇牋，一览多能诵记。12岁时，便能讲《春秋》。性格沉静，尤好著述。汉灵帝时，宦官专权，士人多退身穷处，不与宦官合污，荀悦也趁此托病隐居。后被辟举为镇东将军曹操府供事，不久又迁黄门侍郎，与荀彧和少府孔融侍讲宫中，有文史才华，

为献帝所赏识，累迁秘书监、侍中等职。据《后汉书·荀悦传》记载，荀悦编书是奉汉献帝之命。当时，汉献帝“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汉纪》序也对此有记载：“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许昌，以镇万国，外命亢辅，征讨不庭，内齐七政，允亮圣业，综练典籍，兼览传记，其三年，诏给事中秘书监荀悦抄撰《汉书》，略举其要，假以不直，尚书给纸笔，虎贲给书吏。悦于是约集旧书，撮序表志，总为帝纪。”荀悦接受了皇帝命令后，一是简化《汉书》，二是改纪传为编年，自建安三年（198年）开始，以纪传体《汉书》为基础，经过三年时间，于建安五年撰成一部断代编年体史书《汉纪》。后来，为与袁宏《后汉纪》相区别，又改称《前汉纪》。

荀悦在《汉纪·序》中开宗明义地宣称，他写此书的目的是要汉献帝等统治者了解所谓“天人之际，事物之宜”，从历史的现实中，学会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明确认识，以及应付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办法。所以他在写书前首先提出了著述五原则，“立典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很明显，荀悦希望以《汉纪》启发献帝重振朝政。

《汉纪》是以《汉书》为基本材料缩编而成的，所以它与《汉书》一样，起始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止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记231年的历史。全书共30卷，以十二纪为主体：《高祖纪》4卷，《惠帝纪》1卷，《高后纪》1卷，《文帝纪》1卷，《景帝纪》1卷，《武帝纪》6卷，《昭帝纪》1卷，《宣帝纪》4卷，《元帝纪》3卷，《成帝纪》4卷，《哀帝纪》2卷，《平帝纪》1卷，而以王莽当政时事附于《平帝纪》之后。其主要内容正如荀悦在书序中所说：“凡《汉纪》：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纪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之遗事。”荀悦作《汉纪》，取材范围没有超出《汉书》，只是将班固书中各志、传、表中的材料按时代先后加以剪裁删略，编排在帝纪之内。但在编著过程中，特别注重史论，书中常以“荀悦曰”的形式加以申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史学思想。如文帝十三年六月诏“除民田租”一事，班固等多只以惠政而加称颂；而荀悦则尖锐指出当时“豪强富人占田逾制，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倍，豪强之暴酷于亡秦”，客观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又指出：“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自豪强。”可谓精辟之论。又如批评汉武帝修陵墓之说，也颇为可取。从篇幅来说，全

书文字仅 18 万左右，不及《汉书》的四分之一，但《汉纪》并非是泛泛地抄录《汉书》而成，它不仅蕴含着编著者的思想、史识及驾驭能力和文笔才华，也偶有增补史实的地方。如西汉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铜马的事迹，就比《汉书》记载较为详细；又如卷二十六汉成帝永始元年记载的谏议大夫王仁疏，卷二十九汉哀帝元寿元年侍中王闳谏，《汉书》都没有记载。同时，《汉纪》还可校补《汉书》的脱文。如孔安国献古文经书，因巫蛊之祸未立学官之事。《汉纪》成帝河平三年（前 26 年）记曰：“孔安国献之，会巫蛊事，未列于学官。”而《汉书》的《艺文志》、《楚元王传》似皆缺“官”字。尽管《汉纪》取材于《汉书》，但荀悦运用了新的叙事方法，将东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民族关系等重要史迹有机融为一书，简明扼要，向有“词约事详”之誉，甚至“历代褒之，有逾本传”^①。两千年来，与《汉书》并行于世。

《汉纪》查阅方便，可作为初读《汉书》的入门书。

《汉纪》的研究与其他早期史学文献比较，论著数量相对较少。清人钮永建有《前汉纪校释》3 卷（《南菁札记》）可供参考，傅增湘《校〈汉纪〉书后》（《图书馆学季刊》第 1 卷第 1 期，1926 年 3 月）是发表较早的以《汉纪》研究为主题的论文。王子今先生在《20 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第八章中，^② 提供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刘隆有、李书兰、区建华等学者在《汉纪》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查阅。

《汉纪》自北宋天圣年后，已无善本。今见版本通常有和《后汉纪》合刻的《两汉纪》（上、下册，中华书局 2002 年版），附有清人蒋国祚《两汉纪字句异同考》1 卷（万有文库），也有《四部丛刊初编》本、《四部备要》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几种，其中以《四部丛刊》影印的明嘉靖年间刊本为较佳。

8. 《后汉纪》

东晋袁宏撰。30 卷。袁宏，字彦伯，东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幼年丧父，家中生活比较清苦。但他能刻苦学习，很早就以文思敏捷、文章华美而著称。任过大司马桓温府记室，“专综书记”。后经谢安推荐，出任东阳（今安徽天长县）太守。一生著述较多，如《后汉纪》、《三国名臣赞》、《东征赋》、《咏史诗》和《竹林名士传》等。除前两部仍现存于世外，其他都已失传。《后汉纪》是其代表作。

^① 刘知几：《史通·二体》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

^② 王子今：《20 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54 页。

《后汉纪》体例仿荀悦《汉纪》，是一部编年体东汉史，记事起于淮阳王刘玄更始元年（23年），讫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十一帝纪198年的史事。袁宏编写《后汉纪》时，范曄的《后汉书》还未问世，社会上流传的关于东汉史的著作有好多种，如《东观汉记》、谢承的《后汉书》、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和谢沈的《后汉书》等。袁宏对这些已出的后汉史书都不满意，认为其“烦秽杂乱”，记事阙略，互有出入。于是他选择各家东汉史之长，并吸收了《汉山阳公载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以及各郡耆旧先贤传等几百卷的材料，以编年形式撰成此书。历时八年，后来又见到张璠《后汉纪》，于是据以增补东汉末年事，成《后汉纪》三十卷。这部书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又经认真考订选择，内容广博。全书以8卷的篇幅记光武约40年的历史。以光武帝事业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综述吕母、赤眉、新市、平林起义军的始末，以及王莽的覆灭、群雄的兴败，又叙述了东汉开国功臣们的生平及战绩，头绪繁多而有条不紊，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关系错综而无纷乱之感，清楚地交代了东汉兴国逐一历史事件。后六卷写黄巾起义以来，董卓当权、群雄混战、曹操得势、赤壁之战以致曹魏代汉，叙述是繁简得当，脉络清楚。其中光武事和灵、献帝事，篇幅占全书一半以上。内容上这种轻重详略安排，反映了作者着意写出东汉皇朝的兴起和衰亡。袁宏《后汉纪》在史料和观点方面，均有《后汉书》无法代替之处，可与《后汉书》相互补充和参证。

清人钮永建《后汉纪考释》3卷，是对《后汉纪》较早的考订和注释。目前作为参考的较好本子是周天游的《后汉纪校注》，1987年12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历经数年，三易其稿，总结了《后汉纪》100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其书的排印多有错误，孟素卿《评〈后汉纪〉校注》（载《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已列举错误之处，参考时要相互对证。

荀悦的《汉纪》和袁宏的《后汉纪》因性质体例相近，内容分量也相当，故后世多将二书合刊，称《两汉纪》。版本以与《汉纪》合刻、附清人蒋国祚《两汉纪字句异同考》1卷的万有文库本为好。

9. 《楚汉春秋》

《楚汉春秋》由西汉陆贾著。原书9卷，今已佚。《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附记“楚汉春秋九篇”。本注：“陆贾所记。”《后汉书·班彪传》记载：“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九卷，《新唐书·艺文志》与之相同，而《旧

《唐书·经籍志》却记有二十卷，不知何因又多出十一卷。到《文献通考·经籍考》已不见著录，说明其书在南宋时已亡佚。今本为《史记》及其他逸文辑录而成，仅存1卷，内容是秦末汉初天下英雄豪杰为推翻暴秦而群起逐鹿中原的故事。其中西楚霸王项羽、汉王刘邦及汉初三杰萧何、韩信、张良等，皆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英雄人物。作者陆贾原是楚国人，为刘邦的开国功臣之一，曾两度出使南越。他既参与了当时政治活动，又对秦汉之际的历史有一定研究，所记楚汉间史事当为第一手可靠材料。《汉书·司马迁赞》说司马迁《史记》述楚、汉间事“专据此书”。有些记载不见于《史记》、《汉书》，如刘邦、项羽与樊哙、萧何之间的关系，《楚汉春秋》却有大量记述，《史记》、《汉书》中很少提及，对了解汉初主要人物有很大帮助。

《楚汉春秋》辑本主要有：①清人洪颐烜辑的《楚汉春秋》1卷本较佳，收入《问经堂丛书》^①。但纰缪亦不少，如《太平御览》六九六带部引“北郭先生献带于淮阴侯”等语，而误“献带”为“献策”；吴王濞司马迁《史记》记为列传，而洪氏引《史记·吴王濞世家》，诸如此类的错误散见于书中。参考引用时要注意。②清人黄奭辑的《楚汉春秋》1卷，收入《汉学堂丛书》^②。③清人茆泮林辑的《楚汉春秋》1卷，该书最后附《疑义》，进行解题和考证，收入《十种古逸书》、《后知不足斋丛书》、《槐庐丛书》、《龙溪精舍丛书》等丛书内。

上面所介绍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东观汉记》、《汉纪》、《后汉纪》、《楚汉春秋》等都是记载两汉历史的纪传体和编年体基本专著。这些著作绝大部分出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与晚出的汉史著作相比，史料翔实、可靠，内容丰富，又多系政治史，是两千余年研究汉史的基础和主要依据。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九一卷六十八《汉记》部分，由唐代汉史专家刘昫主撰，条理晰分，史料翔实，有许多参考之处。

除此之外，还有记载两汉政治思想、经济、军事、职官制度、法律制度、宗教思想，以及哲学和自然科学史等许多专门性文献，对两汉史研究有一定的帮助。

10. 《西京杂记》

《西京杂记》署名刘歆，从宋以来就有人对此书作者提出怀疑，历来被视作“伪书”。晋葛洪辑佚文2卷，宋以后又增辑为6卷。学界以为《西京

^① 《问经堂丛书》十八种三十一卷，清孙冯翼编。清嘉庆刻本，多收清人辑佚书。

^② 黄奭辑：《汉学堂丛书》，光绪十九年（1893年），黄澧集成刊本80册，辑佚书270种。

杂记》为伪书，如余嘉锡《西京杂记提要辨证》^①，洪业《再说〈西京杂记〉》（收入《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及今人程章灿《〈西京杂记〉的作者》（载《中国文化》第9期，1994年），均认为《西京杂记》为晋人葛洪伪托刘歆之名所作。从辑文内容看，书中记载了西汉时代首都长安的宫室、苑囿、舆服等制度、杂事，尤其是对未央宫、昆明池、上林苑等情况记述颇详，对研究西汉都城长安的历史地理极为珍贵。《四部丛刊》和《汉魏丛书》均收录此书。清人孙诒让《西京杂记校》^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通行本为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本子。

11. 《三辅黄图》

又名《西京黄图》，简称《黄图》。著者不详。始著录于《隋书·经籍志》，仅称1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3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作2卷，今本为6卷，疑南宋苗昌言校刻时所分析。清代各刻，皆依从之。原本有图，久经散失，如叙未央宫及沧池、冰池，皆引有“旧图曰”，昆明池引有“图曰”，王莽妻亿年陵引有“旧本曰”，皆其明证。今本《黄图》，晁公武定为六朝时梁、陈间人所作，程大昌定为唐肃宗以后人所作。嗣后多依晁说，题为六朝无名氏作品。今人陈直先生认为今本为“中唐以后人所作”（见陈直《三辅黄图校证》序言）。从内容上判断，此书可能始作于汉代，自魏晋至隋唐不断补充而成。全书共分为三辅沿革、三辅治所（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咸阳古城宫、汉长安故城、秦汉风俗等三十六项，专记秦汉都城的建设，而以汉都长安为主。所载长安城及其周围的布局、宫殿、馆阁、苑囿、池沼、台榭、府库、仓廩、桥梁、文化设施、礼制建筑等，条分缕析，最为详备，是研究古代都城，特别是研究汉都长安最重要的历史文献。

《三辅黄图》的版本很多，有苗昌言本、元致和本、陈继儒本、吴管本、毕沅本、邓传安本、孙星衍本等。民国以来的版本有三：（1）张宗祥《校正三辅黄图》，校勘认真，对旧本中的错讹有不少纠正。（2）陈直《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以张氏《校正三辅黄图》为底本进行校勘，并“取证于其他古籍”，改正了旧本中不少错讹脱衍之处，同时又采用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特别是他“至秦二十年，于西京殿阁之遗址，陵墓之留存，屡加访问”而得的调查材料，对正文加以疏证，大多十分精当。（3）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吸收前人

^①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七，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② 孙诒让：《札逢》卷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的研究成果，特别是陈直的注文大部采用，并征引《史记》、《汉书》、《水经注》等有关长安的文献及考古、调查资料。作者同时对与本书有关的遗址、遗迹进行考察和踏勘，取得许多宝贵资料，对文献记载作了必要的补充和订正。例如：秦步高宫的位置本书所记笼统，作者在渭南县城西南 14 公里的张胡村东，发现了秦宫殿夯土台基、图画纹瓦当、回纹铺地砖等，对照《水经·渭水注》的记载，确定其为秦步高宫遗址。2005 年 6 月，何先生又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三辅黄图校释》，经过十年的精心研磨，考订疏释，愈为精审，是目前较好的一个读本。

12. 《风俗通义》

简称《风俗通》，东汉应劭撰。原书 30 卷，今存 10 卷。应劭生活于东汉灵帝、桓帝年间，博闻强记，著述甚丰。除撰《风俗通义》外，还撰有《中汉辑录》、《汉官仪》、《礼仪故事》等，共 11 种，136 篇。又曾集解《汉书》。就其所著各书内容而言，应劭特别熟悉两汉典章制度，后人对此亦特别推崇，认为汉代“朝廷制度，百官仪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记之”。

《风俗通义》内容有《皇霸》、《正失》、《愆礼》、《过誉》、《十反》、《声音》、《穷通》、《祀典》、《怪神》、《山泽》等，附录一卷，与应劭“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的思想相一致。如他自己所说：撰写《风俗通义》的目的，“在辩风正俗，观微查隐，于时流风轨，乡贤行谊，皆著为月旦，树之风声，于隐恶扬善之中，寓责备求全之义”。因此全书主要以记述历代风俗礼仪为中心，上至考察古代历史，下至评论时人流品。每卷各有序，卷内列目，书中多加按语，考察由来，评论是非，阐发作者之旨，以便起到移风易俗即厚民风而正国俗的作用，对当时的社会风俗和迷信思想颇有批判，是了解汉魏间社会习俗的重要资料。书中还有关于乐器的专篇，记载了各种乐器的制作者和形制，是研究乐器史难得的重要史料。对于山河薮泽的专门记录，在研究历史地理时足供参考。一些关于神异鬼怪的片段后为志怪小说《搜神记》所取材。范晔论本书时指出，应劭“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所以书中涉及的范围很广，从许多侧面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和文化思想面貌。另外，书中记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对其他西汉史史料，也有匡谬补阙之用。

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李昉等奉命编《太平御览》时，曾大量抄录《风俗通义》各篇文字，说明宋朝初年本书还完帙。但至宋神宗元丰年间，已散佚过半，故苏颂校本书，只剩 10 卷，形成今日的 10 卷本。苏颂校书时，以官私两本互校，并重新编排为 10 卷。据其《校〈风俗通义〉序》，知现存 10 卷的次序并不相连，《皇霸》第一，原为首篇；《正失》第二，原为第

六；《愆礼》第三，原为第八；《过誉》第四，原为第七；《十反》第五，原为第九；《声音》第六，原为第十三；《穷通》第七，原为第十五；《祀典》第八，原为第二十；《怪神》第九，原为第三十一；《山泽》第十，原为第二十四。其余 20 篇，苏颂所记为：《心政》、《古制》、《阴教》、《辨惑》、《析当》、《恕度》、《嘉号》、《徽称》、《情遇》、《姓氏》、《讳篇》、《释忌》、《辑事》、《服妖》、《丧祭》、《宫室》、《市井》、《数纪》、《新秦》、《狱法》。其中《徽称》、《情遇》、《释忌》三篇，陆心源《顾仪堂集》《〈风俗通义〉篇目考》作《秽称》、《恃遇》、《释忘》，其他 17 篇完全相同。这 20 篇在原书中的次序，苏颂没有说明，它书也未言及，故现今无从考知。

本书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元大德本。明、清两代有关《风俗通义》的刻本迭出，但就版本系统而言，都源于大德本。至于已佚 20 篇，自清代钱大昕以降，学者不断从事辑佚，冀望能复其观，但所辑纰缪者仍多。

此书今收于《汉魏丛书》、《古今逸史》、《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等之中。后世研究、辑佚、校订《风俗通义》的著作很多，清人卢文弨《群书拾补》中辑有《风俗通义校正逸文》1 卷多条，系十一卷补之所逸，中有“女娲造人”、“李冰斗”等神话，皆为首见于记录者。另有顾怀三《风俗通义佚文》1 卷（见《小方壶斋丛书》第 2 集），孙诒让《风俗通义校》（《札迻》卷 10），张澎辑并注《风俗通姓氏篇》2 卷（《丛书集成初编》）等可参考。日本刻本有明钟惺评万历三年刊本。

今人吴树平的《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和王利器的《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 1981 年版）为最佳参考版本。二书均有标点，颇便阅读，前者附有人名及引书索引方便检索，后者校注较详。此外刘昉的《风俗通义·独断·人物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1991 年版）也有借鉴之处。索引有中法汉学研究所 1943 年编的《风俗通义通检附风俗通义》，检阅十分方便。

13. 《独断》

东汉末期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蔡邕所撰。蔡邕，字伯喈，《后汉书》称其精通经史、音律、天文，善辞章，著述有 104 篇，后人辑有《蔡中郎集》。《独断》是其重要著作，共有 2 卷，主要是对前古及汉代的典章制度、品式称谓等进行了较为详细地考证和辨析，约有数百条之多，是目前考订汉代及汉代以前的风俗、礼仪、典章制度等史实的重要文献。近两千年来，影响颇大。《独断》原书已不可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独断》二卷，汉蔡邕撰，王应麟《玉海》谓是书间有颠错，嘉祐中余择中更为次序，

释以己说，故别本题《新定独断》，择中之本今不传。然今书中序历代帝序末云，从高祖乙未至今壬子岁，三百一十年。壬子为灵帝建宁五年。而灵帝纪系末行小注乃有二十年之事，又有献帝之谥，则决非邕之本文。盖后人亦有窜乱也。”^①这说明通行本并非全都是蔡邕原文。

目前常见的版本较多，从源流讲，多半出于明弘治本，而弘治本实源于宋淳熙本。近人张元济曾为《独断》作过版本考订，并进行了校勘，指出“传者，有百川学海、古今逸史、汉魏丛书诸本，是为明弘治癸亥（1503年）刘逊所刊，卷末淳熙江都吕宗孟跋，与百川本同，盖同出一源。但彼此亦互有殊异。”丛书之外，又有《蔡中郎集·外集》本。清末许翰曾为其作过校勘记，义例严整，法度井然。从卷目讲可分为两组：（1）2卷本，见于《崇文总目》、《文献通考》和《玉海》；（2）1卷本，见于《古今逸史》和《说郛》。清人卢文弨的校注本较好。许翰和张元济的校勘工作为后人的阅读、考订、整理这一古代典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14. 《古今注》

西晋崔豹撰。3卷。崔豹，字正熊，《世说新语》刘孝标的注中说崔豹字正熊，可能是“正熊”之误。今本《古今注》有3卷，《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也著录为3卷。其类目为“一舆服，二都邑，三音乐，四鸟兽，五虫鱼，六草木，七杂注，八问答释义”，都与现在传本相同。从书中对各类事物的解说来看，涉及汉代的内容较多，解释也有一定的根据，并非随便猜测，尤其是舆服、都邑、音乐、草木、问答释义等篇，对了解汉代社会习俗、制度及对动植物的认识，提供了重要依据。

传世的《古今注》有好几个旧本，大体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影印的明正德嘉靖年间芝秀堂的覆宋刻本，二是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明正德嘉靖间《顾氏文房小说》所收入的本子，这两个本子在文字上异同颇多。另外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明万历时吴管《古今逸史》本子和明末何允中刻《广汉魏丛书》本子，则多同于《顾氏文房小说》本。现今最新本是由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所焦杰校点的本子，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5. 《华阳国志》

东晋常璩撰。12卷。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东南）人，生于东晋明帝初年，自幼勤奋好学，善习史籍，青年时代已成为蜀中有名的学士，逢賸人李特流民起义，常璩同往。李雄在巴蜀建立大成政权，常璩被

^①（清）永瑤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

封为散骑常侍，是皇宫主管巴蜀史典和甯民史料的史官，被晋朝史学家孙盛称为“蜀史”。桓温灭李氏（347年），以常璩为参军，随至建康。他的《华阳国志》撰成约在永和十一年（355年）之前。

全书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刘焉、刘璋）志、刘先主（备）志、刘后主（禅）志、大同（晋统一）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共12卷。该书以地理志、编年史及人物志三者结合的形式，记述公元4世纪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西南三省以及甘肃、陕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人物，书中包含不少政治经济、郡县沿革、古代氏族等方面重要史料，如巴蜀古代史事，诸葛亮征南中经过，各民族历史、传说、风俗等，尤其是对道教五斗米道创立的全过程记载得最为翔实。先贤、后贤志及士女目录等所收西汉至东晋益、梁、宁三州（今四川及陕西、汉中、云南一部分）人物近四百人，皆可补正史之不足。有人评价说：“《华阳国志》其实就是一部最早最完善的道教五斗米道初创的史典，它的巴志、汉中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中，用极大的篇幅记载了耨人的祖居和迁徙发展的历史，耨人的鬼巫崇拜，张道陵入蜀川北，向耨人学习鬼巫，创立道教，耨人因信奉五斗米道而迁徙追随张鲁建立五斗米道政教合一政权。耨人李特用五斗米教建立成汉政权数十年。如果你详细研究就会知道，《华阳国志》是中国及世界最早的一部道教史，它对道教初创时期的研究有决定性的作用。”^①《华阳国志》撰成后，在当时无论是江左，还是中原，备受重视。范晔著《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曾大量采取其文，后来崔鸿著《十六国春秋》，郦道元注《水经》，刘昭注《后汉志》，凡涉及西南史地者，无不尽量吸收《华阳国志》的成果。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历代书志均加以著录。任乃强先生认为“其开我国地方志创造之局，有如《史记》至于我国史籍”^②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华阳国志》的版本很多，北宋有元丰元年戊午（1078年）吕大防成都刻本，南宋有嘉泰四年甲子（1204年）李某的邛州刻本，原本均已佚。明清而下，翻刻传抄者更多。如丁杰、李调元、惠栋、何焯、顾广圻等学者都曾校《华阳国志》，今存各种本子大约有三十种。前几种多限于版本对照，独顾氏则广取有关史籍与《常志》参校，订讹补缺，所得较多。嘉庆十九年（1814年）两淮都转盐运司使廖寅重刻并为序，现藏题襟馆，为诸

① 蔡运生：《〈华阳国志〉中国最早的道教史》，载《中国道教》，2000年第5期。

②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本之冠。现代学者注释该书的也不少，重要者有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和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其中《华阳国志校注》一书，在文字校勘上，主要以廖刻题襟馆本作为工作本，参校张佳胤刻本“张本”、刘大昌刻本“刘本”、吴涓古今逸史本“吴本”、“何本”、“李本”、何允中《广汉魏丛书》及李调元《涵海》“涵本”、《四部丛刊》影印钱谷抄本“钱本”、愚忠堂抄本“愚本”、山水源头抄本“山本”诸本告成。其资料丰富，考证翔实，对研究《华阳国志》及古西南史地十分重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亦以清廖寅题襟馆本为底本，校以现存所有版本，参考大量有关典籍，进行校勘、标点、辑补、注释，附加论述及绘图。其标点和辑补，均反复斟酌，极见功力。其校释、附论和插图，对书中涉及的我国西南地区的地理沿革、历史事件、人物事迹、民族形成、经济发展、土风民俗、物产资源等方面及古西南地区同内地的关系、古西南同印度的文化交流等，作了详细的阐述，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尤其是整理过程中，纠正了《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史书及其各注的若干错误，对研究西南史地，探讨西南地区民族发展史和地区经济发展史等，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上述《西京杂记》、《三辅黄图》、《风俗通义》、《独断》、《古今注》和《华阳国志》等著作，是研究汉代社会风俗、礼仪和长安附近及古西南地理、形势的重要史书。

16. 《西汉会要》、《东汉会要》

《西汉会要》70卷，《东汉会要》40卷，合称两汉会要，均为南宋徐天麟撰。两书各立十五门，分别记述两汉的典章制度等事。《西汉会要》十五门为帝系、礼乐、舆服、学校、运历、祥异、职官、选举、民政、食货、兵、刑、方域、蕃夷。《东汉会要》亦分十五门去其学校、运历、祥异，而增文学、历数、封建。两汉会要的内容是徐天麟根据班固《汉书》、范曄《后汉书》及有关东汉制度方面的史籍分类编辑而成，今天前史俱在，这两种会要不能当史料书用。但徐氏编辑时，每条史料均注明出处，查检十分方便，所以二书是研究两汉史很好的工具书。从两书本身比较，《东汉会要》胜于《西汉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的精装标点本《西汉会要》、《东汉会要》是最通行的版本。

17. 《三辅决录》

东汉赵岐撰，由《后汉书·赵岐传》末尾注录自序所知。主要评论汉代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地区的官僚贵族，因所评人物均已死，褒贬可定论，故称其名为《决录》。晋挚虞注。原文已佚，清张澍辑有佚文

二卷，收入《二酉堂丛书》。另清黄奭辑本一卷收于《汉学堂丛书》、茆泮林辑本一卷及补遗一卷收于《十种古逸书》。

18. 《三辅旧事》

此书是清人张澍根据《三辅黄图》、《太平御览》、《北堂书钞》、《长安志》等书所辑而成，书中保存了秦汉时代咸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宫殿、桥梁建筑和长安城内的情况以及一些掌故的资料，对研究秦汉都城有重要价值。现行本有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影印的《二酉堂丛书》本。

19. 《三辅故事》

清人张澍所辑，书中保存了西汉时长安及其附近地区宫殿、楼台、池苑等资料。如武帝时上林苑中有许多池沼，见于记载的有昆明池、镐池、祀池、麋池、牛首池、蒯池、积草池、东陂池、当路池、太一池、郎池等。其中昆明池是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所凿，在长安西南，周长40里，列观环之，又造楼船高十余丈，上插旗帜，十分壮观。据《史记·平准书》和《关中记》，修昆明池是用来训练水军。据《三辅故事》：“昆明池三百二十五顷，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刻石为鲸鱼，长三丈。”又载：“昆明池中有龙首船，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凤盖，建华旗，作濯歌，杂以鼓吹。”在池的东西两岸立牵牛、织女的石像。上林苑中不仅天然植被丰富，初修时群臣还从远方各献名果异树2000余种。可见对研究西汉都城很有帮助。

以上三书是清人张澍所辑的三部佚书，内容都是关于汉代三辅地区的人物及旧事，史料虽零星不全，但价值较大，可作为阅读史籍时的参考。三书均收入《二酉堂丛书》中。^①

20. 《汉官七种》

《汉官七种》，均为散佚的古籍，由清人孙星衍所辑，10卷。收入《平津馆丛书》、《汉学堂丛书》、《知服斋丛书》、《丛书集成初篇》等丛中。其所辑诸书为：

《汉官》1卷。作者及成书年代不详。《隋志》作5卷，宋时仅存1卷，旋即亡佚。今所见佚文唯存《续汉书·百官志》注中，内容侧重于公卿员吏的人数及品秩，并附记诸郡郡治距京师的里程数。

《汉官解诂》1卷。原名《小学汉官篇》，为建武年间新汲令王隆撰，有3篇。此书为童蒙书性质，“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比较广泛。后汉中期重臣胡广深谙官制仪

^① 张澍辑：《二酉堂丛书》，道光元年（1821年）刻本。

式，有“万事不理问伯始”之誉。他看中《小学汉官篇》，并亲自为之作注。胡注补正《汉官篇》虽称精要，难言其详之弊，故书名随之改易为今名。此为何以原文较少保存，而胡注传世较多的原因。

《汉旧仪》2卷，《补遗》2卷。后汉议郎卫宏所撰，原书有4卷。此书所言范围较广，不仅言及官制，且大量涉及礼制，如籍田、宗庙、春桑、酎、祭天等礼仪。所以隋唐史志多将其列入仪志类。又因其所载官制较详，故自《直斋书录解题》始，称此书为《汉官旧仪》，清四库馆臣辑本亦据以为目。此书是《汉官七种》中史料价值较高的一种。

《汉官仪》2卷，原为10卷。后汉军谋校尉应劭撰。汉献帝迁都于许昌时，旧章湮灭，书记罕存，应劭于是缀集旧闻，而作此书。汉官诸书中，此作最为系统，佚文史料价值亦最高。此书在史注和类书中或称《汉官鹵簿图》，或称《汉官名秩》，又作《状人纪》，疑皆为其书的篇名。

《汉官典职仪式选用》1卷。简称《汉官典职》，或《汉官典仪》。原为2卷，后汉卫尉蔡质撰。杂记官制及上书谒见仪式。

《汉仪》1卷。吴太史令丁孚撰。因《新唐书志》称其作《汉官仪式选用》，故有人以为与蔡质之作本为一书，但据《续汉志书·百官志》所引，当自为一书，仅较他书简略，流传不广，鲜为人知。

孙星衍还辑有叔孙通《汉礼器制度》1卷，故有人将之与上述六种合并，称为《汉官七种》。

以上七种书早已散佚，经孙星衍辑佚成《汉官七种》，是汉代官制最原始最丰富的系统记述，虽皆非完篇，但仍可帮助我们了解西汉的各级官僚机构、分官设职的具体情况和每一官职的员数、职权、沿革、俸禄等。与《汉书·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互相参看，更能体会出七书记载的史料在研究两汉官制及其他制度方面的作用。

《汉官七种》的辑本，除孙星衍辑本外，尚有元代陶宗仪辑应劭《汉官》1卷，仅16条，且无出处。清四库馆臣辑卫宏《汉官旧仪》及《补遗》共4卷，辑本体例较严谨，辑文也较丰富。然其据《永乐大典》所辑2卷，与史注及其他类书参校考订，未免不足。而《补遗》部分草率收兵，脱漏较多。又清代王仁俊辑《汉旧仪》、《汉官仪》各一条。而黄奭之《黄氏逸书考》则全取孙辑，唯增案语一句，其他无所发明，刊刻疏略，复增舛讹，最不足取。相比之下，孙辑优点有四：一为辑书全，二为辑文多，三曰出处详，四乃考辨较为审慎。其所以如此，除孙氏本人功底较深外，取资于章宗源辑本，并延请严可均以预其役，是至关紧要因素。而漏引、误引，亦屡有发生，用时不可不慎。

现在学习或研究可参考由周天游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的《汉官六种》（其中无王通的《汉礼器制度》1卷）。此书对《汉官》至《汉仪》六种东汉时陆续成书的关于汉代官制仪式的著作佚文，进行了标点校对及考证，对研究汉代制度有一定的意义。周天游《汉官六种》点校时，采用的版本为：陶宗仪辑本用清顺治三年宛委山堂刊说郛本；四库馆臣辑本用浙江书局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孙星衍辑本用清嘉庆中兰陵孙氏刊平津馆丛书本；王仁俊辑《汉旧仪》，用上海图书馆藏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稿本；王仁俊辑《汉官仪》，用上海图书馆藏经籍佚文稿本。周氏吸收清人辑佚的成果，同时选择各辑本的本，以初刻本为原则，无初刻本才选用晚出佳本，因此，是目前较好的一个版本。

索引式的工具书有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编的《汉官七种通检》，1962年出版，查阅十分方便。有关汉代制度的著作还有：宋王应麟《汉制考》4卷，收于《学津讨原》；清陈树镛《汉官答问》5卷，收于《振绮堂丛书》；清强汝询《汉州郡县吏制考》2卷，清孙诒让《汉旧仪校》，收于《札迻》等。

21. 《汉律考》

此书共8卷，是民国时期程树德从正史以及逸文中集录有关史料而成，收于《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年版。另外，关于汉律的论著还有：清杜贵墀《汉律辑证》6卷，张鹏一《汉律类纂》1卷、《两汉律学考》1卷，民国沈家本《汉律摭遗》22卷^①等。这些著作均可与史志互证利用。

在两汉文献中，子书不仅表述了各家思想，而且在政治、经济、宗教、风俗、科技等方面，都为研究两汉史提供了十分丰富的史料。西汉建国之初，总结秦亡、楚败、汉兴的经验教训是主要议题，《新语》和《新书》是其代表作。之后出现的《新序》、《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论衡》、《潜夫论》、《金匱要略》、《九章算术》、《太平经》等，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两汉的思想与文化。

22. 《新语》

西汉陆贾撰。原书23篇，今本12篇。陆贾，楚国人，从文献记载看，他是一个既有纵横家，也有儒家，又有新道家特点的人物。《汉书·高帝纪》云：“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陆贾造《新语》。”《史记·陆贾传》曰：“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

^① 沈家本书稿：《沈寄蓀先生遗书》乙编本，中国书店1959年版。

事诗书？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 12 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好其书曰《新语》。”《正义》引刘向《别录》云：“新语二卷。”班固论列刘向父子所校书为艺文志，而贾书乃有 23 篇，对《新语》没有著录；刘歆《七略·诸子略》儒家有《陆贾》23 篇。后人认为其中包括有 12 篇的《新语》，陆贾著述较多，留存下来就《新语》一书。陆贾作《新语》，《史记》、《汉书》、《论衡》等书都有记载。然自隋、唐志及崇文书目相承皆只 2 卷，至王应麟著《玉海》，言“今存于世者，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资贤（当作“质”）、至德、怀虑才七篇”，则此书至宋末又阙其五篇。故《文献通考》备录汉化儒家诸书，独遗《新语》，一定是当时没有见到全书。而清本钱序乃云“篇次至今不讹”，又谓：“秦、汉之书传至于今无讹妄，如此者亦鲜。”^①可见元、明以来才搜集编辑而成。今本《新语》有上下两卷，包括《道基》、《述事》、《辅政》、《无为》、《辨惑》、《慎微》、《资质》、《至德》、《怀虑》、《本行》、《明诚》和《思务》十二篇，主要内容是讨论治国之术。从书中所表现的思想看，陆贾兼述儒道两家之学，既强调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又倡导道家的清静无为而治。如在此书中，陆贾指出，“事愈烦”是“天下愈乱”的根源，只有无为而治，顺民之自然，才能做到不言而信，不怒自威。他这种既信奉儒家，又崇尚道家的作为，为汉代学术思想开了先路，是研究陆贾思想和汉初历史及学术思想的重要史料。

今本《新语》有后人改窜，以致有人疑其为伪书，未免失之偏颇。目前较好的读本是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 1986 年版。此书除上下两卷 12 篇外，有附录：《新语佚文》、《楚汉春秋佚文》、《书录》、《史记汉书陆贾传合注》。《新语》版本以清人宋翔凤校本较好。

23. 《新书》

又称《贾子》，西汉贾谊撰。10 卷。贾谊，洛阳人，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博学多才，能文善辩，年十八已能精通诸子百家之学术，二十多岁就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任太中大夫。贾谊提出一系列的改革主张，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远见和才能，但遭到一批元老重臣的反对。在他们的谗害

^① 王谟：《汉魏丛书识语》，清乾隆南昌王谟刻《汉魏丛书》本。

下，贾谊被文帝贬为长沙王太傅，后迁为梁怀王太傅。他的才能得不到施展，一直闷闷不乐。在怀王不幸坠马而死的第二年，他也去世了，时年33岁。贾谊的成就主要在于政论散文，如《过秦论》、《陈政事疏》、《论积贮疏》、《权重》、《大政》、《修政论》、《辅佐》、《劝学》及《道德说》等数十篇；其政治思想的特点之一就是眼界阔大，正如明人李梦阳所评论“宏识巨议”（《贾子序》），周廷用所谓“其才雄，其志达”（《刻贾太傅〈新书〉序》）等等。西汉末刘向赞扬说：“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①，并将贾谊作品编为《新书》十卷。贾谊的思想，体现在《新书》之中。在施政主张上，主张削藩、抚边、务本、铸钱；哲学思想，承认万物是由天地、阴阳二气自然产生的，且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永无休止；在政治思想上，强调德治教化、民为邦本，而最重要的是实行礼教。故《新书》是研究汉初历史和贾谊思想的重要资料。

贾谊的政论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诸子略儒家类有“《贾谊》五十八篇”，诗赋略有“贾谊赋七篇”。根据明正德九年（1515年）黄宪序说，他于“书肆中得贾太傅《新书》抄本，凡若干卷”。今本《新书》自南宋淳熙年间版刻后，三百余年间到正德时由“版刻数十片和抄本凡若干卷补刻而成”。也有十卷五十八篇，《问孝》、《礼容语上》两篇有录无书，实际只有五十六篇。有的刻本篇数有出入。清人姚鼐在《辨贾谊新书》说：“贾生书不传久矣，世所有云《新书》者，妄人伪为者耳。”卢文弨在《书校贾谊新书后》认为：“其规模节目间，要非无所本而能凭空撰造者”，“魏晋人绝不能为”。清人对《新书》作者、篇目内容有异议，《四库全书总目》中认为“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评论比较公允。

关于“《贾谊》五十八篇”，现代学者的研究更为清晰。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说：“残。本传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钱大昭云：‘今《新书》止五十六篇。’阙《问孝》、《礼容语上》二篇。章炳麟曰：‘贾生书引用左氏《内传》、《外传》极多，而其中《道术篇》、《六术篇》、《道德说篇》，正是训诂之学，有得于正名为政之学者也。’《春秋左传读叙录》，卢文弨《贾谊新书》校本，刘师培《贾子新书校补》俱善。”^②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又说：“按：《隋志》载《贾子》十卷，《录》一卷。《旧唐志》则云九卷。其称《贾子》则同。《新唐志》始称《贾谊新书》十卷。清《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著录《新书》十卷，《提要》云：‘汉贾谊撰。

① 班固：《汉书·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②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

原本五十八篇，今佚其三篇。多取《汉书》谊本传之文，割裂章段，颠倒次序，而加以标题，殊脊乱无绪。疑旧本残缺，好事者取本传所载，离析其文，以足五十八篇之数，不可谓真出谊手也。’今书阙卷五《问孝》一篇，卷十五《礼容上》一篇，存五十六篇。”^①

今存《新书》，其中间或有后人之作，但大多数仍为旧作，内容丰富。有的分析秦亡的原因，目的在于以秦为鉴，有的表达作者以民为本的思想，有的论述当权者必须爱民的道理，有的论述诸侯王问题，有的论述地域区划和徭役负担问题，有的论述社会经济问题，书中的《道术》、《六术》、《道德说》还论述了汉王朝的统治道术。《宗旨》、《数字》是有关治安之策。总之，《新书》所论述的内容都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大问题，对研究西汉初期社会问题和贾谊的政治思想有极大的意义。但是，引用时一定要慎择史料。

此书收编于《汉魏丛书》、《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等。另有清俞樾《贾子平议》2卷（《春在堂全书》或《札迻》），刘师培《贾子新收斲补》2卷附《佚文辑补》1卷^②等。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贾谊集》，把贾谊的《新书》、奏疏、文赋汇为一书，颇便利用。目前已经有吴云、李春台《贾谊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和王洲明、徐超校注《贾谊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问世。2000年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新书校注》，由阎振益、钟夏校注标点。其附录五《集评》及附录六《资料》，收集有关贾谊评论及有关资料，可供研究贾谊者参考。

24. 《淮南子》

西汉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所编著。今存21篇。成书年代大约在景、武之间。刘安，汉高祖刘邦少子淮南厉王刘长之子，刘长死后，袭父爵为淮南王，因谋反于公元前122年自杀。据史籍记载，王族刘安喜欢读书鼓琴，厌倦皇室盛行的歌舞游猎，又想积阴德，流芳百世，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创作，采百家之长，故此内容庞杂，近乎一部“先汉学术史”。高诱《淮南子·叙》中有“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之说。^③此书为汉初黄老学派著作，《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载《淮南子》内21篇，外33篇。《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中说：“作《内书》21篇，《外书》甚众，又为《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

① 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0—111页。

② 《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

③ 刘安：《淮南子》，《诸子集成》第7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说有内篇 11 篇，外篇 33 篇。高诱《淮南子注·叙》说《淮南外篇》共 19 篇，可能是因为后汉末年《外篇》已部分散失。所谓《内书》、《外书》、《中篇》应是刘向校书时划分、编定的。《内书》原名《鸿烈》，是流传至今的《淮南子》，侧重讲述道家理论；《外书》或《外篇》多是“杂说”；《中篇》主要讲神仙方术。《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淮南毕万术》当即《外书》或《外篇》中的一章。然而流传下来的只有《内书》21 篇，即现在的《淮南子》，又称《淮南鸿烈》或《鸿烈》。鸿，广大也；烈，光明也，意即包含了光明宏大之理。

《淮南子》全书撰述宗旨，为“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道论至深，故多为之辞以抒其情；万物至众，故博为之说以通其意。”“故著书二十篇，则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换句话说，是用来整治道德，规划人世之事，向上考察天道的变化规律，向下研究大地的万事万物，建立一套适应大一统的新兴国家的需要，贯通天、地、人，统一人们的道德规范，而实现治国安邦的独特的理论体系。

全书最后一篇为《要略》，是作者的自序和对各篇的提要。概括全书以阐明宗旨，“言道”与“言事”，即掌握自然界的规律与考究社会历史变化规律，此外，还综述了各家思想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具有很高的价值。这从前二十篇内容中可以看出：《原道训》规划了天地四方，探索了万物形成的规律；《俶真训》探求自然界起始终结的变化规律；《天文训》探索宇宙演化和形成问题；《坠形训》论地理；《时则训》论四时；《览冥训》论自然界与人类之间内在的规律性；《精神训》论人的生命中精神和形体的关系；《本经训》讨论治理国家要解决根本常法问题；《主术训》论国君统治天下之道；《繆称训》称引物证，借助同类事物，来摒除谬误的异说；《齐信训》以万物各有长短，论要承认事物的多样性；《道应训》阐述“道”是万物的本源，又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总规律；《汜论训》阐述作者的历史观；《诠言训》阐明精微之言；《兵略训》论军事辩证法；《说山训》、《说林训》是解释自然、人世中诸多事理；《人间训》论如何处理人世间的各种相互关系；《修务训》勉励人们努力从事事业，为济救万民而立功；《泰族训》是全书的总结，集中论述了自然规律和人事关系，并把它归结到“道”这个总规律之中。总之，《淮南子》把宇宙、天地、四时、社会、人生、形神、政治、军事、经济、察辩等全部包容了进去，是汉初一部综合性的著作，也是一部集道家之大成的著作。梁启超先生曾说：“《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

流也。”^① 胡适也曾经说：“淮南之书是一个大混合折中的思想集团。这就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的‘道家’。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② 其实，《淮南子》中对各个学派的发展和学术成果分别给以适当的肯定与批评，如“儒者之学”、“纵横修书”、“刑名之书”及“商鞅之法”等，具有极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同时对了解西汉文景时期中央与地方同姓王之间的矛盾斗争有帮助。

最早为《淮南子》作注的是东汉学者许慎，但今已散失，仅存佚文 8 卷，见于高诱注本之中。通行的旧注本是东汉高诱注，据其所写序言，本文和注也合称《淮南鸿烈解》。以《淮南子》之名见于《说郛》、《二十二子全书》、《诸子集成》等；《淮南鸿烈解》之名则见于《汉魏丛书》、《百子全书》、《四部丛刊》。其后直至明代，不见深入的研究专著，仅有支零的批语、点评传世。清人对《淮南子》的关注则远盛于前代，其贡献主要在于考据之功。许慎注本到清代有孙冯翼辑本，收于《问经堂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有清钱塘《淮南子天文训补注》（崇文书局），王念孙《淮南子内篇杂志》22 卷、《补遗》1 卷（见于《读书杂志》），刘台拱《淮南子补校》1 卷（见于《广雅书局丛书》），俞樾《淮南子内篇平议》4 卷（见于《诸子平议》），民国梁启超《淮南要略书后》（见于《饮冰室合集》）。今人刘盼遂《淮南子许注汉语考》、马宗霍《淮南高注参正》是研究许注、高注的力作。于省吾《双剑谿淮南子新证》4 卷^③、于大成《淮南子校释》对《淮南子》作了新的考证与校释。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21 卷（商务印书馆 1923 年版）和刘家立的《淮南内篇集证》21 卷（中华书局 1924 年版）是 20 世纪前半期较有影响的校勘本。刘氏尚有《三余札记》，其中有《淮南子》校补 169 条，《淮南子逸文》29 条，可供参考。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将之收在《淮南鸿烈集解》之后，作为附录，颇便查考。杨树达的《淮南子证闻》7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张双棣的《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是最新的《淮南子》研究成果。陈丽桂的《〈淮南子〉研究八十年》（载林徐典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下册，中华书局 1995 年版）一文，可大致了解学术界对《淮南子》研究的现状。陈广忠《淮南子译注》是 2000 年以来第一部今译今注本。国外学者对《淮南子》研究也有一定成果。日本学者仓启武四

①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史学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69 页。

② 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929 页。

③ 于省吾：《双剑谿诸子新证》，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郎的《淮南子考》对许注、高注及宋、明、清及近代《淮南子》研究作了全面性总结，内容翔实，脉络清楚，颇有影响。其中何宁的《淮南子集释》附《日本淮南子书录》，可见20世纪日本学者研究《淮南子》专书计12种[中华书局（上中下三本）1998年版]，也可参考。郑良树著的《淮南子斟理》（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9年版）反映了台湾的研究成果。

25. 《春秋繁露》

西汉董仲舒撰。17卷82篇。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景县董故庄）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的著名大师。少年时专治《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潜心钻研孔子学说。曾任江都（今江苏扬州）相和胶西王（今山东高密西南）相。汉武帝时，召试天下贤良文学之士，他以“天下三策”相对，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要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采纳，开此后二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他的学说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封建神学体系。他将天道和天道相附，论证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还提出“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其思想主要体现在代表作《春秋繁露》中。《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可见《蕃露》本是篇名，与《玉杯》、《竹林》等独立成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始见著录，皆注“十七卷”。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北宋《崇文总目》开始怀疑其书并非本真。据《汉书·董仲舒传》所举著作篇目，《清明》一篇本今书所无，又唐宋诸书有关引文，今书亦多不见。由此可知，《春秋繁露》原书已佚，今传本系后人重新搜集、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是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春秋繁露”一词的含义并未能确定。依据南宋《中兴馆阁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不过通常此书名按字面意思简单地被理解为“《春秋》繁多之露”。

《春秋繁露》通行本由82篇构成，其中有三篇（第39、40、54篇）原文已不存在；各篇的形式、内容以及写作时间都不相同。大多数是对《春秋》中的术语、事件和段落作出解释和说明，此外也说明其所含的道德和政治思想与认识到的宇宙观之间的关系。第1—6、23、25、28、30、46篇写的是董仲舒的答对，它们要么是有关具体学说的解释，要么是对批评者的

答复；第71篇是董仲舒对一名朝廷官员提出的有关郊祀问题的问答记录；第32、38篇是董仲舒作为顾问对诸侯王咨询问题的作答记录，第73篇采用了颂的形式，因而与其他篇章极不相同。全书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第1—17篇），第17篇相当于跋。这些篇章对于从《春秋》中的事件所衍生出的伦理和政治教训形成了一套相对说来简单明确的分析，不仅提到了《春秋》中所讲的事件，而且把这部著作作为整体加以提及，提到了它的写作目的及大意。第二部分（第18—82篇）理论性更强，与第一部分侧重点的不同或导致一些人怀疑它的可靠性，或导致认为它们与前面17篇没有关系，把前17篇所论述的人之间的小宇宙与天地、阴阳、五行、四时之间的大宇宙关系进行了直接对比。在这里，天被视为是利用事物来体现它的意志的，昭示给自然界的科（分类，范畴）代表了天道，而且万事万物的本质关系也体现了天的意志。在大多数情况下，天地、阴阳被用以作为等级制的及互补的关系和力量的模式；五行描述了专门化的职能；四时则设置了空间、时间和顺序上的格局，即随着太阳在天空中方位的变化，四时也依次更替。总之，《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政治哲学著作，推崇《春秋公羊传》，发挥“春秋大一统”之旨，阐述了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天人感应说为核心的哲学—神学理论，宣扬“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伦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统循环的历史观，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书中所涉及《春秋》内容的地方不多，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单纯地解说《春秋》、《公羊传》的，也包含董仲舒的哲学和政治理论，比《公羊春秋》走得更远。但是《春秋繁露》仍不失为公羊学的一部重要著作，不仅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重要资料，对于研究封建社会儒家正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及整理《公羊传》，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注本很多，清卢文弨校《董子春秋繁露》17卷附录1卷，收入《抱经堂丛书》中，序言写于1785年，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同时兼采赵维垣（1532年进士）写于1554年序的本子及程荣（1447—1520年）《汉魏丛书》本与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四部备要》重印了卢文弨本，并收入了一个与该著作有关的大多数序言和评注的附录。另有清俞樾《春秋繁露平议》2卷（收于《诸子平议》，上海书店据商务旧版1988年影印）；孙诒让《春秋繁露校》（见《札迻》，中华书局1989年版）；清凌曙著有《春秋繁露注》（收于《皇清经解续编》，南菁书院本）。之后苏舆又著《春秋繁露义证》17卷、首1卷、考证1卷（长沙刊，1910年），对凌曙注有所补正，注释最详尽；民国刘师培《春秋繁露斟

补》3卷，附校勘记1卷、逸文斟补1卷^①等。索引有1944年中法汉学研究所编撰的《春秋繁露通检》，方便易行；刘殿爵、陈方正编《春秋繁露索引》，收入《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26. 《盐铁论》

西汉桓宽撰。10卷60篇。桓宽字次公，河南上蔡人。汉武帝时，因国用不足，采纳桑弘羊的主张，在各郡县实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虽然促进了经济繁荣，但却得到富豪贵族的反对。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昭帝召集各地贤良文学（儒官）之士等六十人和丞相车千秋、御士大夫桑弘羊及其属吏，围绕武帝实施的盐铁专卖、榷酤、均输、平准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存废，展开了大争论。贤良文学之士认为在郡县实行盐铁酒榷均输，是与天下之争，不合务本抑末之策，提出废止盐铁专卖；桑弘羊则认为盐铁专卖关系国家财政与边防安全，主张不可废止，要继续执行。会议结果，是废除全国的酒专卖及关内盐铁专卖。次年，桑弘羊受燕王之变的牵连，被霍光族诛。至宣帝时，桓宽根据盐铁会议记录将争论的情况用对话的形式推衍增广为十卷六十篇，取名为《盐铁论》，目的是想“究治乱，成一家之法”。

据《汉书·车千秋赞》，盐铁会议是有记录的，桓宽的《盐铁论》就是取材于会议记录，对这次政治经济政策讨论会作了详细记述。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篇《本义》至第四十一篇《取下》记载盐铁会议的正式辩论，第四十二篇《击之》至第五十九篇《大论》记载会议后的余谈，最后一篇《杂论》是全书的后序。内容广泛，不仅涉及当时政治、社会、经济政策，而且还涉及到贤良文学与桑弘羊的施政方针及思想，是了解中央和地方对立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西汉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和思想史的重要史料。

《盐铁论》收于《汉魏丛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目前通行的本子主要有：郭沫若的《盐铁论读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王利器的《盐铁论校注》10卷附录2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王佩诤《盐铁论札记》，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马非百《盐铁论简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杨树达《盐铁论要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等。

27. 《太玄》

又称《太玄经》，西汉扬雄撰。今本10卷。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善辞赋，闻名于时。一生著述丰富，《太玄》和《法言》是其重要的哲学著作。《太玄》形式完全模仿《周易》，每首有九赞，作八十一首，目的

^① 《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

要把他所认识的关于宇宙的根本原理表现出来。书中以神秘的“玄”作为天地万物的本质，构筑了一个关于天地万物生成的学说，相当于《周易》的“易”，但却丧失了《周易》中保持其思想活力的最基本的因素和精神，基本的思想倾向是唯心的。《太玄》也有其合理之处，在“天命”问题上，肯定人为的作用，显示了唯物论倾向；在社会发展问题上，认为新事物与旧事物有联系又有区别，具有辩证因素。书中对社会流行的神仙之术和弥漫一时的谶纬迷信加以批评，在当时非常地难能可贵。

晋范望的《太玄经注》，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收在《四部丛刊》中。又有《集注太玄》十卷，前六卷宋司马光撰，后四卷许翰撰，收在《四部备要》中。清人陈本礼撰《太玄阐秘》刊入刘世珩编刊《聚学轩丛书》，共5集，60种，光绪年间刊。

28. 《法言》

扬雄撰，13篇。是模仿《论语》的语录式著作，每卷30条左右。最后有一篇《自序》。其撰作的起因，据《汉书·扬雄传》记载，是他看到战国诸子诋毁孔子学说，司马迁作《史记》是非标准与孔子也不尽相同，时人也常常以此向扬雄请教，他便把对一些问题的问答编辑成书，称作《法言》。全书设学行、吾子、修身、问道、问神、问明、寡见、五百、先知、重黎、渊骞、君子和孝至等十三节，以问答形式分别对一些重要问题解答。虽然简单，很少论证，但言简意赅，极具针对性、批判性、战斗性。书中包含了对宇宙认识的理性精神及对尚智的倡导、对仙道迷信的批判、对社会弊端的揭露，以及关于学习道德、人性、政治等等问题的见解，具有启发作用。全书基本倾向于尊崇孔子、信奉儒家，反对谶纬迷信。《汉书·扬雄传》说：“自雄之歿，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然篇籍具存。”可见，扬雄的《法言》比《太玄》在当时社会更有声誉和影响。不论二书谁兴谁衰，都是研究扬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不可缺少的基本史料。晋李轨的《扬子法言注》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收入《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6年版）。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诸子百家丛书》中有单行本。传世的还有《纂图互注扬子法言》，晋李轨、唐柳宗元、宋宋咸、吴昞、司马光注，后人习惯称“五臣注”。清代著名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孙星衍、孙诒让、俞正燮、俞樾等都对《法言》进行过考订和研究。至于注释，当推近人汪荣宝的《法言义疏》，此书注释较为详备，1933年排印本改名《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将之收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由陈仲夫进行点校。近人刘师培的《扬子法言校补》和《法言补释》对以前的校注有重要的补充作用。今人李发舜等点校的《方言笺疏》（中华书局

1991年版)和韩敬《法言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是目前较好的参考书。

29. 《新序》

《新序》原书30卷,现存10卷,是西汉末年汉朝宗室、大学者刘向收集或编写的一部远至舜禹、次及于周秦以至刘向当世,古人的种种嘉言善行等道德说教性的轶事和历史传说的汇编。全书分为杂事、节士、善事、刺奢四类,共有166个条目。绝大部分条目都是对早期哲学或历史著作中的材料摘录后加以转述或直接照抄而成,如《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史记》、《战国策》以及《春秋三传》、《庄子》、《荀子》等。书中前九卷的历史故事基本集中在春秋时期。最后一卷《善谋》篇,完全是汉代故事,着重讲述楚汉之际到汉武帝时期西汉的善谋之士和重要历史大事,涉及人物有陈余、张耳、张良、萧何、韩信、酈食其、主父偃等,是研究汉初百年历史的史料之一。《新序》的思想基础是儒家学说,书中所强调的统治者必须为人正直、要多听民众意见和留心贤能及有德之士的建议,对后世影响较大。尤其是记事简明,寓意较深,文笔生动,耐人寻味,故论者认为可供研究汉代文学、散文学者参考。另外,该书采自百家传记成书,所见之事,谬误不少,作为史料引用时,应注意查阅所引原书。

《新序》在北宋曾巩校理时,已残缺三分之二,仅存10卷,被收入《天一阁丛书》、《子书百家》和《龙溪精舍丛书》之中。清人卢文弨有《新序校补》(见《群书拾补》,收入《抱经堂丛书》),辑录了其佚文。注本有张国铨《新序校注》(成都茹古书局1944年版)、卢元骏《新序今注今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赵善诒《新序疏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赵仲邑《新序详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等,其中赵注是最详最新之成果。另外,许素菲的《刘向新序研究》,是《新序》研究的重要著作,也可参考。

今人校理《新序》,除上述各家外,尚有卢元骏《新序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梁荣茂《新序校补》(台北水牛出版社),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新序校释》(中华书局2001年版)。

30. 《说苑》

汉朝学者刘向采集传记、诸子百家及正史杂著所载古人行事之迹编辑而成。全书20卷,分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等,目的是“欲以为法戒”。此书广征博引,文字生动,在当时被广泛引用。《汉

书·艺文志》有《黄帝铭》六篇，今已亡。《金文铭》据学者考证，即为《黄帝铭》六篇之一。《金文铭》载刘向《说苑·敬慎篇》：“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左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名其背曰”云云。《孔子家语·观周》所载与此大致相同，很可能就抄自《说苑》。刘向在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以光禄大夫之职诏校经传诸子诗赋，遍览皇室藏书，所著《说苑》保存了大量先秦史料，不仅对于历史科学，而且也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先秦古籍《儒家者言》，许多内容见于《说苑》，足以说明《说苑》之真实可靠。

《说苑》在北宋初年已无全帙。宋曾巩校书时，虽然搜得15卷，加以补充、整理，仍有散佚。卢文弨《群书拾补》辑得25条，严可均《全汉文》亦有24条，俞樾《读书余录》、孙诒让《札迻》也校释出若干条文。

今人整理《说苑》有余嘉锡《说苑补正》（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1962年版）、向宗鲁《说苑疏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左松超《说苑集证》（台北“国立”编译馆2001年版）、刘文典《说苑斟补》、卢元骏《说苑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31. 《论衡》

东汉王充撰。30卷85篇。王充，字仲仁，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27年），卒于和帝永元八年（96年）。他非常好学，小时曾入学读《尚书》、《论语》之类的儒家经典。由于为生活所迫，辍学后曾一度流落在洛阳街头。在洛阳街头，他一面了解民俗风情，向社会学习；一面也常到书肆，“阅所卖书”，得到了许多学问，还当上了地方官吏。后来辞官回家，潜心积思地习读古文，专志于著述。王充是东汉时期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杰出的无神论者，一生著作多种，如《论衡》、《养性之书》、《讥俗之书》、《政务之书》等，可惜后三部书都佚不可考，流传至今的只有《论衡》一书。著作时间自明帝永平二年（59年）起，至和帝永元二年（90年）止，先后凡30年。

《论衡》今有篇目八十五，《招致》一篇有目无文，实存八十四篇，是研究王充思想的主要资料。全书最后是《自纪》，叙述作者的家世、经历，相当于自传；同时也叙述了他为什么写《论衡》的原因。书中说：“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论”者，评论之谓也；“衡”者，衡量、权衡之意，可见他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类著作都有自己的看法。《对作》篇阐述了写作《论衡》的目的。东汉初，豪族门阀把握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上以谶纬神学和天人感应论作为统治

工具，并结集了《白虎通义》作为代表。王充针锋相对，著作了《论衡》，希望能得到东汉王朝的重视，并把《论衡》作为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书中所论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而人事，旁而动植物，凡古今之变，性命之理，经传嫌疑，习俗是非，人才臧否，莫不包括。依其性质，可分十类：（一）谈天道者：《物势篇》41、《自然篇》54；（二）说人性者：《率性篇》8、《本性篇》13；（三）论命运者：《逢遇篇》1、《累害篇》2、《命禄篇》3、《气寿篇》4、《幸偶篇》5、《命义篇》6、《无形篇》7、《吉验篇》9、《偶会篇》10、《骨相篇》11、《初稟篇》12、《治期篇》53；（四）评古书者：《问孔篇》28、《非韩篇》92、《刺孟篇》30；（五）黜伪书者：《奇怪篇》15、《书虚篇》16、《道虚篇》24、《语增篇》25、《儒增篇》26、《艺增篇》27、《谈天篇》31、《说日篇》32、《正说篇》81、《书解篇》82、《案书篇》83；（六）驳天人感应者：《变虚篇》17、《异虚篇》18、《感虚篇》19、《福虚篇》20、《祸虚篇》21、《龙虚篇》22、《雷虚篇》23、《寒温篇》41、《谴告篇》42、《变动篇》43、《招致篇》44（阙）、《明雩篇》45、《感类篇》55；（七）斥迷信陋俗者：《论死篇》62、《死伪篇》63、《纪妖篇》64、《订鬼篇》65、《言毒篇》66、《薄葬篇》67、《四讳篇》68、《涧时篇》69、《讥日篇》70、《卜筮篇》71、《辨崇篇》72、《难岁篇》73、《诘术篇》74、《解除篇》75、《祀义篇》76、《祭意篇》77、《顺鼓篇》46、《乱龙篇》47、《遭虎篇》48、《商（适）虫篇》49；（八）论人才贤佞者：《答佞篇》33、《程材篇》34、《量知篇》35、《谢短篇》36、《效力篇》37、《别通篇》38、《超奇篇》39、《状留篇》40、《实知篇》78、《知实篇》79、《定贤篇》80；（九）扬汉代功德者：《讲瑞篇》50、《指瑞篇》51、《是应篇》52、《齐世篇》56、《宣汉篇》57、《恢国篇》58、《验符篇》59、《须颂篇》50、《佚文篇》61；（十）述身世抱负者：《对作篇》84、《自纪篇》85。由于王充对讖纬的批评及精通汉史，常据以阐发其主张，同时也提到了当时社会的不同风尚，因而此书是研究汉代社会史及政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作者又倡导言文一致，大胆采用通俗的语汇和句法，为汉语史留下了极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另外，研究王充思想，可以参阅《后汉书·王充传》。

版本、注释与参考书目：此书收于《汉魏丛书》、《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等，有清俞樾《读论衡》1卷（见《诸子平议》），孙诒让《论衡原本论衡校文》（见《札迻》），民国时期孙人和《论衡举正》4卷（1924年版）、吴承仕《论衡校录》、刘文典《论衡斟补》等注本，于《论衡》皆

有匡正疏通之功。其中后三种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重新整理出版。^① 近人黄晖《论衡校释》30 卷、付编 6 卷，注释较详，资料丰富，^② 博得胡适、王云五等人赞美。今人刘盼遂《论衡集解》30 卷、附录 1 卷，校勘和注释多有新见。^③ 这两部书有完全重复的部分。中华书局又将两种《论衡》研究著作合编，主要以《论衡校释》（附刘盼遂《论衡集解》）为主，补入《集解》校注文字、序言及附录，收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全 4 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虽然是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完成的，不免带有当时的时代痕迹，“但是从注释质量看，仍然应当肯定参与者的工作是符合学术规范的，可以看作历史文献研究的科学成果之一”^④，尤其是该书注文简明易读，便于初学者。田昌五《论衡导读》^⑤，也是研读《论衡》的简明参考书。另外，1943 年中华汉学研究所编《论衡通检》和 1960 年日本的加藤常贤、重泽俊郎《论衡事项别索引》，是两部检索《论衡》文字及事项的重要工具书。

20 世纪末出版的《论衡》研究成果，有郑文的《论衡析诂》（巴蜀书社 1999 年版）和杨宝忠的《论衡校笺》（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及陈蒲清、梅季点校注译的《论衡注译》。杨著《校笺》有考证翔实、校理精细的优点；《注译》是近年来最好的译注本。

32. 《白虎通义》

又名《白虎通德论》，省称《白虎通》，是了解汉代官方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汉代自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成为汉王朝的指导思想，皇帝诏命，臣民奏议都要经常引据儒家经书作为理论依据，以至裁断国家大事。西汉宣帝曾召集群儒在皇宫内石渠阁讨论五经异同，东汉建初四年（79 年），章帝也在皇宫白虎观大会群儒，讲论爵、号、谥、五祀等解释及五经经义，皇帝亲自参加并作总论。白虎观会议的讨论成果由著名史学家班固受命汇集成文，名《白虎通义》，共 4 卷。

全书共汇集四十三条名词解释，内容十分庞杂，涉及社会、礼仪、风习、国家制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其中有很多条目汇集了不同的学术观点，有些条目还并列了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如“王者不臣”条、“王霸”

① 《论衡举正》，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论衡校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论衡斟补》，见《三余札记》卷二，黄山书社 1990 年版。

② 黄晖：《论衡校释》，（长沙）商务印书馆 1939 年版。

③ 刘盼遂：《论衡集解》，（北京）古籍出版社 1957 年版。

④ 王子今：《20 世纪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76 页。

⑤ 田昌五：《论衡导读》，巴蜀书社 1989 年版。

条等，对有关解释都存而不决，以供人们参考。书中除引六经传记外，还融合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与谶纬迷信于一体，企图统一经学，建立神学经学，并将其奉为永恒的真理，要人们世代相沿，习之、诵之，不许怀疑和批判。又说《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孔子受“天命”而写的，可以“永为后世则”。《白虎通义》之所以要这样神化孔子及经书，实际上也就是为东汉王朝的长治久安，编造“永为后世则”的神学体系，让人们把孔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信奉。正因为如此，皇帝非常看重此书，被“钦定”为儒家注释手册。《隋书·经籍志》还把它载入“经”类，当作“国宪”看待。因为《白虎通义》用阴阳五行来普遍地具体地解释世界的一切事物，大者如“三纲五常”，小者如婚丧嫁娶、日常生活现象，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它谈的是鬼神迷信，解释的又牵强附会，所以不甚重视。事实上，它却是东汉王朝二百年来官方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是研究古代思想史的重要著作，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本书收于《汉魏丛书》、《四部丛刊》等。《白虎通义》现存世的最早版本是元大德五年无锡州学刻10卷本，后来的主要版本有黄丕烈跋元刻本2卷，清代卢文弨的校本，包括校文4卷、阙文1卷、校补遗1卷、考1卷，是较好的校勘本，收入《抱经堂丛书》及《丛书集成初编》中。目前校释较好的本子是清代陈立所撰《白虎通疏证》12卷，^①由吴则虞点校，对《白虎通义》作了详细的注释，集前人之大成。同时孙诒让《白虎通德论校》（见《札迻》），民国刘师培《白虎通义斟补》2卷、《白虎通义定本残》3卷、《白虎通德论补释》1卷（见《刘申叔遗书丙类》）也有参考的意义。哈佛燕京学社编的《白虎通义引得》（1966年台北出版）是点检该书的较好工具书。

33. 《新论》

东汉桓谭撰，原有29卷，今仅存16卷。桓谭，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人，精通天文，爱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喜“非毁俗儒”。汉哀帝、平帝时，其位不过郎官。王莽时，任掌乐大夫。刘玄即位，诏拜太中大夫。光武帝时，任议郎给事中。因坚决反对谶纬神学，“极言谶之非经”，“多见排斥”。被光武帝目为“非圣无法”，险遭处斩。由于桓谭坚决反对谶纬神学，又公开反对光武帝行为，晚年被贬六安，死于去六安的途中。^②《新论》是其主要论著。

^① 阮元汇刊：《皇清经解》，中华书局1994年8月重版。

^② 范曄：《后汉书·桓谭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后汉书·桓谭传》记载：“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视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肃宗使班固续成之。所著赋、诔、书、奏，凡二十六篇。”注云：“《新论》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辅，四言体，五见征，六谴非，七启寤，八祛蔽，九正经，十识通，十一离事，十二道赋，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闵友，十六琴道。《本造》、《述策》、《闵友》、《琴道》各一篇，余并有上下。《东观记》曰：‘光武读之，勅言卷大，令皆别为上下，凡二十九篇。’”注又引《东观记》曰：“《琴道》未毕，但有发首一章。”今存《仙赋》、《陈时政疏》、《抑讖重赏疏》等文（见《艺文类聚》及本传）。《隋书·经籍志·儒家类》云：“桓子《新论》十七卷，后汉六安丞桓谭撰。”

桓谭自述其著书之本旨时云：“董仲舒专精于述古，年至六十余，不窥园中菜。余为《新论》，述古今，亦欲兴治也，何异《春秋》褒贬邪？今有疑者，所谓蚌异蛤，二五为非十也。谭见刘向《新序》、陆贾《新语》，乃为《新论》。”^①《新论》之名，是取法于刘向《新序》、陆贾《新语》。《新论》的内容是述古今，不像董仲舒专精于述古，而不窥园中菜。《新论》的著述目的是欲兴治，如同《春秋》经的寓褒贬。书中阐述了他进步的政治观和哲学观。提倡治理国家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做到“政合于时”，绝不能“释近趋远”、“事事效古”。同时书中对光武提倡的讖纬神学坚决反对，认为天即自然，事在人为，极力驳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谬论，曰：“天非故为作也”（《新论·祛蔽》）；否定“灵魂不灭”，谴责“长生不老”，讥嘲神仙方术、卜筮祭祀等迷信行为，认为“生之有长，长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化矣”（《新论·形神》）。王充在《论衡》中对《新论》做了很高评价，认为其著作是“论世间事，辨昭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②。

《新论》29篇，至南宋时已散佚，^③根据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未载此书，仅散见于《群书治要》、《意林》及其他类书中，然皆为零章断句。现在流传的是清人严可均的辑本，共十六篇，收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其云据各书所载，“合并复重，联属断散，凡百七十二事，依《治要》、《意林》次第，以类相从，定为三卷。诸引但《琴道》有篇名，余无篇名，今望文分系，

① 桓谭：《新论·本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② 王充：《论衡·超奇》，《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③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仍加各篇旧名，取便检阅。”辑本之文字不多，当非《新论》之全貌，因据《东观汉记》所云，光武读之，勅言卷大，而别为上下，凡29篇，今之卷目不同，原书必倍于今所辑之本。另外，清孙冯翼也有辑本，收在《四部备要》内。梁僧佑编辑的《弘明集》卷五征引《新论·形神》一篇，又略见于《太平御览》卷870，是有关桓谭思想的重要史料。严辑本将《形神》收在《祛蔽篇》内，孙辑本没有收录。

今有黄霖、李力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新论》单行本。此书以严辑本为底本，不仅对其讹文误字进行改正，并择要作校勘记加以说明，还对漏辑条文，另作补遗，可供阅读查检。董俊彦著《桓谭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所附《桓子新论校补》有参考价值。

34. 《潜夫论》

东汉王符撰。10卷36篇。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东汉进步的思想家。据《后汉书·王符传》推测，他生活的年代大致在东汉和帝以后、灵帝以前，当时各种矛盾日趋严重，经济停滞，朝政腐败黑暗。书名所以称《潜夫论》者，范曄在《后汉书·王符传》中解释曰：王符“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得失，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①。《潜夫论》全书最迟在汉桓帝元嘉二年应已写定。

全书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是有关个人学习、品格修养与社会关系方面；第二是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教等问题的论述，在全书中占比例最大；第三是针对现实的主要问题所发的议论，《劝将》、《救世》等四篇集中讨论西羌民族造反所涉及的问题，提议政府要重视边远地区的防御和建设；第四是知识性内容，《卜列》以下四篇是卜卦、看相、占梦等内容，《释难》是问答，《五德志》是以传说中的古史帝王世次附会金木水火土相替代的内容，《志氏姓》是讲姓氏的来源变化的内容；第五是《叙录》，相当序言，逐篇介绍三十五篇的中心思想。《潜夫论》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除《卜列》等篇某些思想不可取外，其他篇涉及的知识都十分丰富，可窥见当时的许多文化现象。《志氏姓》内容相当杂，其讨论的方法却很正确，许多地方从语言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就使其结论科学可信。书中对当时经济、政治、社会风俗等方面的本末倒置、名实相违的黑暗情形进行尖锐的批评，所献的治国主张，见解新颖，对了解和研究秦汉思想及东汉社会历史、风俗民情极有帮助，是一部十分珍贵的书。

^① 范曄：《后汉书·王符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潜夫论》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历代官私书目，均有著录，今所传版本以钱遵王述古堂景宋写本最早，明本有黄丕烈士礼居旧藏明刻本、胡维新《两京遗编》本、程荣《汉魏丛书》本、何允中《广汉魏丛书》本等。清汪继培撰《潜夫论笺》，系据元刻《大德新刊》本，校以明程荣、何镗二本，及他书所引者，“解谬达指，传信阙疑，博访通人，致精极核”（王绍兰《潜夫论笺序》），但汪氏未见宋本，所采类书，为数亦鲜，故检视其书，“精辟之见，虽所在多有，而疏略之处，盖亦不免”（胡楚生《潜夫论集释·凡例》）。清人俞樾著《论潜夫论》1卷（见《诸子平议补录》）；孙诒让《潜夫论校》（见《札迻》卷8）。

1978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潜夫论笺》标点，以《潜夫论》名出版，这是《潜夫论》的第一个标点本。1974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由彭铎标点的《潜夫论笺》，此书除标点外，还有彭铎的校正。校正系据《士礼居》旧藏明刻本、冯舒校影宋写本及明刻《两京遗编》本，以及诸类书旧注所引覆校之，附识汪《笺》之末，其增识补正之处有千余条，实为王符之功臣。现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所收《潜夫论》，亦即此本。1979年11月鼎文书局出版了胡楚生《潜夫论集释》，此书以《四部丛刊》景宋写本为底本，佐以辅本九种，以相校讎而古注类书，前贤识见，尤多所搜罗，故此书虽然出版较晚，但对《潜夫论》研究用力最深。目前最新校本，是2001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万有文库丛书·潜夫论》，由四川教育学院龚祖培先生点校。索引有《潜夫论通检》，中法汉学研究所1945年版。

35. 《政论》

也称《崔氏政论》，东汉崔寔撰。1卷。崔寔，字子真，河北涿县人。“少沉静，好典籍”，出生在书香之家，祖父崔骃是班固级的大学者；父亲崔瑗是马融级的大学者。崔寔在父亲死后，“隐居墓侧”，不肯做官。东汉桓帝时，要选“至孝独行之士”，崔寔被看中。后来他“论当世便事数十条”，写了有名的《政论》。书撰成后所得评论甚高：范晔认为《政论》“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言当世理乱，虽晁错之徒不能过也”。仲长统也主张“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因为在书中他对社会政治进行了很敏锐的抨击。如他批评西汉文帝除肉刑是所谓德政之说时说：“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文帝虽除肉刑，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者弃市。右趾者既殒其命，笞挞者往往至死，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诏曰：‘笞与重罪无异，幸而

不死，不可为民。’乃定律，减笞轻捶。自是之后，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轻之也；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必欲行若言，当大定其本。……”尤其是书中论述了东汉末年的时势，抨击贵族官僚盘剥百姓的罪恶，主张以刑罚治乱世，为研究东汉当时的政治提供了宝贵资料。

《政论》原文散佚，今有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本和《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书文》从《后汉书·崔寔传》等所辑的逸文。

36. 《昌言》

亦称《仲长子昌言》，东汉仲长统撰。34篇。仲长统，字公理，山东邹县人。“少好学，博涉书记，赡于文辞”，“性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①。二十岁后在各地游学，跟他交朋友的，“多异之”。据记载仲长统因愤叹于东汉末年政治、社会的状况而著《昌言》。“昌言”，即是正言、直言之意，内容性质与崔氏的《政论》相仿，都是探讨东汉政治得失的。因仲长统对后汉政权已不抱多大希望，所以较能摆脱传统经学的羁绊，冷静剖析后汉衰败的原因，史料价值较大。

原书有93篇，十多万字，但大部分失传了。他的思想主要在“人事为本，天道为末”，这在当时迷信的环境中，显然是进步的。今辑本有马国翰所辑的《仲长子昌言》2卷（见于《玉函山房辑佚书》），《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全后汉文》也有辑录。

37. 《申鉴》

又名《小荀子》，东汉荀悦撰，成书于汉献帝时期。汉灵帝时，宦官当道，有志节的知识分子都隐居了，荀悦也隐居起来。汉献帝时，曹操当政，荀悦和他从弟荀彧，还有孔融等，“侍讲禁中，旦夕谈论”。虽然想施展抱负，可是谋无所用，乃做《申鉴》5篇。取其书名之原委见《申鉴·政体篇》卷一：“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五典以经之，群籍以纬之，咏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鉴既明，后复申之，故古之圣王，其于仁义也，申重而已。笃序无强，谓之申鉴。”目的是为了告诫皇帝鉴往知来，注意历史经验和教训。全书五篇，分五卷：政体、时事、俗贤、杂言上、杂言下。《政体篇》主要讲行仁义，效法古帝王，除去使政治不良的祸患，然后兴农业、正风俗、广教化、建武备、明赏罚等大政方针。《时事篇》是据《政体篇》的理论，结合现实问题提出的具体措施。《俗嫌篇》是就修身养性、天人感应、人神相通等一些道德伦理、哲学问题发表的议论，也有对当时占统治地

^① 范晔：《后汉书·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位的阴阳五行五方相配思想的批评。《杂言》上下篇，内容较杂，涉及个人的学习、品格、为臣之道，以及在政治、思想、风俗等方面的内容。《四库提要》说这一篇“皆泛论义理，颇似扬雄《法言》”是有一定道理的。《申鉴》之论政方式与王符《潜夫论》、崔寔《政论》、仲长统《昌言》有所不同，《申鉴》缺乏三书对现实猛烈评论的精神，所提都是原则性的议论，而且言辞含蓄矜整。这种特色反映出荀悦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及正统思想。虽然该书正统思想浓厚，但却反映了东汉末期社会现实情况，对研究东汉时期政治、文化、社会风俗及荀悦的思想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本书收于《汉魏丛书》、《四部丛刊》等，后者附有明人黄省曾的注。清人卢文弨有《申鉴校正》1卷，收入《抱经堂丛书》内。《申鉴》校勘较好的版本是清钱培名的校本，收入《丛书集成初编》。今人龚祖培的新校本，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索引有《申鉴通检》，中法汉学研究所，1947年版。对于荀悦的研究，可参考美籍华人陈启云先生的《荀悦与中古儒学》，高专诚译，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8. 《中论》

徐干撰。徐干，北海国剧城人，史书无传，事迹附于《三国志·王粲传》，为“建安七子”之一。曹植于七子中对徐干推崇最高，认为其品格高洁，不杂于流俗，是彬彬君子。《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及北宋书目等记载都为六卷，而今本仅有二卷。原有二十二篇，今缺《复三年丧》与《制役》两篇，存二十篇。从书前一篇无名氏的序文和本书内容判定，《中论》大致成书于建安年间，写作主旨是：“常欲损世之有口、益俗之不足，见辞人美丽之文并时而作，曾无阐弘大义、敷散道教、上求圣人之中、下救流俗之昏者，故废诗、赋、颂、铭、赞之文，著《中论》之书二十二篇。”^①此书在当时已获很高评价：“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词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②

《中论》主要是针对当时政治形势、社会风气，以及人们关心的一些问题所作的论述。卷上多论君子修养，对德行、言语、仪表各方面有详细的论述；下卷论政风与世风，言辞矜整不作激烈的批评，但观察入微，坚守原则。如《治学》、《修本》、《贵言》、《艺纪》、《谴交》等讲的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务本》、《审本臣》、《亡国》、《赏罚》、《民数》等讨论的是治国方略、措施一类的内容；《历数》、《复三年丧》（见“补

^① 徐干：《中论·序文》，《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版。

^② 曹丕：《与吴质书》，引自胡克家刻本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影印本。

遗”)、《夭寿》等是关于制度、礼仪及其某些哲学、伦理等方面的内容。从书中看，其思想倾向大体上遵奉儒家旨趣，多祖述先王、孔、孟之言，同时，也受道家、法家的某些影响，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大都阐发义理，原本经训，而归之于圣贤之道。”《中论》对时弊有所针砭，不过作者持论比较中庸谨慎，一般不指斥时事，所以显得辞旨邈远，较少锋芒。与同时的仲长统《昌言》相比，其揭露现实矛盾的深刻性和批判的尖锐性，都有所逊色。尽管如此，本书对研究东汉思想史、哲学史仍很重要。

《中论》2卷，《四部丛刊》有影印明嘉靖乙丑青州刊本。清人钱培名的校本是校勘性善本，收入《丛书集成初编》。今人龚祖培有新校本，收入《新世纪万有文库》（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此书将钱校本从《治要》中辑出的《复三年丧》和《制役》作为“补遗”附在书后，保留了《礼记》，删去了原书（钱校本）中曾巩、都穆、钱培名等人的题跋，基本恢复《中论》的原貌，可作为研读本书的参考书。

39. 讖纬之书

从西汉末年到东汉败亡这段时期内，“讖纬”是相当流行的。史书记载，西汉哀平之世，讖纬泛滥，在今文经学及政治思想领域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所谓“讖”，其由来甚远。《说文》言部“讖，验也，有徵言之书”，此即指神预示人间吉凶祸福的启示或隐言，但主要内容是政治性的；由于书上常有附图，故也称为“图书”、“图纬”、“讖书”、“图讖”。《淮南子·说山》曰：“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讖书著之。”所谓“纬”，是相对经而言的，就是假托神的意志，对儒家的经典作神学性的解释和推衍。《论衡·知实篇》曰：“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载，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明，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矣。”因为书中也夹杂着“讖”的文字，所以合称“讖纬”。这类书后人则以“纬书”名之，是在汉代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统治阶级企图欺骗舆论，摆脱困境，寻求福祐的唯心主义谬说。它是由董仲舒天人感应学说恶性发展而来的，经过王莽的鼓吹，光武帝刘秀的提倡，风靡一时。光武刘秀认为自己应讖言而定天下，对之深信不疑，因而于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讖于天下”，讖纬便成了官方的统治思想。但是讖纬具有神秘的色彩，各阶级、阶层的人士都可以从中寻找思想武器。东汉后期，它曾是豪族世家对抗皇权和宦官的武器。甚至黄巾起义也加以利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是以讖言形式发出起义的信号。

当时每种经书都有“纬”，每“纬”又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汉书·艺文志》对此没有著录。据《后汉书·方术列传·樊英传》李贤注，大体

如下：

《易》纬有《稽览图》、《乾凿度》、《坤凿图》（一名《凿图》）、《坤灵图》、《通卦验》、《是类谋》（一作《筮类谋》）、《辨终备》等。

《书》纬有《璇机铃》、《考灵曜》、《刑德放》、《帝命验》、《运期授》等。

《诗》纬有《推度灾》、《汜历枢（捩）》、《含神务》等。

《礼》纬有《含文嘉》、《稽命征》、《斗威仪》等。

《乐》纬有《动声仪》、《稽曜嘉》、《汁（叶）图征》。

《春秋》纬有《演孔图》、《元命苞》、《文跃钩》、《运斗枢（捩）》、《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干图》、《汉含孳》、《佐助期》、《推（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等。

《孝经》纬有《援神契》、《钩命决》等。^①

除以上三十五种纬书外，《旧唐书·艺文志》中还载有《论语》纬十卷，宋《太平御览》有《论语摘辅像撰考讖》，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怀疑此书。又《太平御览》中《书》纬还有《帝验期》，《礼》纬有《稽命曜》，《春秋》纬还有《命历序》，《孝经》纬还有《左右契》、《威嬉拒》等。^②

讖纬的内容，除了有个别地方讲到了一些科学知识外（《考灵曜》载：“地恒动不止，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闭牖而坐，舟行不觉也。”^③），大多数内容都是符命、预言等荒诞不经之事，所以被统治者当作护身符看待。尤其在王莽及刘秀时期，被抬到儒家正宗的地位，不许任何人对它发生怀疑，更不容对它作批评、指责和攻击。后来，由于进步思想家桓谭、王充、王符、仲长统的批判、挹伐、揭露，再加上从汉代明帝时起输入的佛教和原先的道教的发展，其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天堂地狱等封建迷信思想比之纬书所宣扬的那一套更为缜密、更有说服力，那时及其稍后，上至皇帝，下到贫民，包括朝野的大批知识分子，无不受其熏染和影响，因而纬书的灵光也就渐渐地暗淡下去，以至于魏晋以后统治者开始禁纬。《晋书·武帝纪》载：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年）十二月下诏：“禁星气讖纬之学。”^④刘宋后讖纬之书亦受到历朝查禁，所存仅少量残篇，有明《古微书》、清《七纬》

① [日]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② 李昉：《太平御览》，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③ 《考灵曜》是《尚书纬》的一种，东汉郑玄注。其中这种对运动相对性的观点，比伽利略的《对话》至少早约1500年。此观点说明我国古代物理思想达到过的高度。

④ 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等辑本存世。隋朝文帝、炀帝相继禁绝焚烧讖纬之书,《隋书·经籍志》也有有关记载:宋大明中,“禁图讖”^①。自此之后,纬书陆续散亡,“几于灭绝”,到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时,“录其见存”者十三部,合九十二卷。《新唐书·艺文志》仅录九部八十四卷。此后,各书所载就更少了。保存至今的有《易》纬中的《乾凿度》、《乾坤凿度》(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论《乾坤凿度》原作《坤凿度》),其余都是残篇片断。

纬书辑本有明孙穀《古微书》三十六卷和清赵在翰的《七纬》是较好的辑本,^②清黄奭《汉学堂丛书》辑讖纬十一类、五十五种,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纬书四十种。又唐刘赧的《稽瑞》,作为有关讖纬学的小型类书,也可供参考。近年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合著《纬书集成》,是较完备的辑本。此外,有关阴阳五行学说,可参阅秦汉《日书》简文。

讖纬之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资料,对研究两汉之际思想史发展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从文献学上看,其对经书的解说纯属穿凿附会,所记灾异感应、讖语符命,应该否定。但纬书的作者多通天文历法,纬书中关于天文地理、风土人情、自然知识等方面的材料,对于考释文献有参考价值。关于文字训诂、名物也有不少说法可取。如“社为土神,稷为谷神”的解说,即出自《孝经援神契》,赵在翰在《七纬》中增加按语说:“社稷之说,先儒不同,郑君(玄)据纬,独得真正。”所以,对于前人据纬解经,不应一概非之,应作具体分析,判断正误,决定取舍。

40. 《汜胜之书》

汜胜之撰。18篇。汜胜之曾于汉成帝时任议郎,《汉书》无传,生卒年不详,他曾在关中平原地区教导农业,获得丰收。《晋书·食货志》说:“昔汉遣轻骑使者汜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汜胜之书》就是他根据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农业生产技术的成就和经验撰成的,是整个汉朝四百多年间最杰出的农书,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书。它大概在南、北宋之际失传,所以现在看到的并非18篇全文,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这一小部分的内容已十分丰富,包括耕作的基本原则,即选种、播种、和土、施肥、灌溉、早锄、收获、贮藏等。还记载了许多农业技术,如洩种法、区种法、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种瓠法、穗选法、稻田用控制水流以调节水量的方法及桑苗截干法。同时对主要几种农作物如禾、麦、黍、菽、稻、桑、大麻等栽培技术和单位产量进行了叙述。对了解两汉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作物品

① 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

② 《七纬》见《纬书集成》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种、农业技术的发达程度和作物的产量等，提供了重要资料。此书在汉朝就有崇高地位，后汉经师注经，就一再引用《汜胜之书》，所以唐代贾公彦《周礼疏》说：“汉时农书有数家，汜胜为上。”^①

《汉书·艺文志》有《汜胜之书》18篇，《隋书·经籍志》等有《汜胜之书》2卷，但已散佚。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多有引用。在清代曾有3种辑本：第一种清人洪颐煊收集《齐民要术》等书的佚文，成辑本二卷，编入《经典集林》，1811年收入《问经堂丛书》，1926年陈乃乾曾据以影印；第二种是宋葆淳集辑《汉汜胜之遗书》，不分卷。有四种版本：《昭代丛书本》、《鄮斋丛书本》、《区种五种》原刊本、1917年浙江农校石印《区种五种》本，这是三种辑本中最不好的一种；第三种马国翰辑本二卷，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这三种辑本辑佚资料的来源，主要来自《齐民要术》。20世纪的辑佚成就，则有石声汉著的《汜胜之书今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万国鼎的《汜胜之书辑释》（中华书局1957年版），提供了研究汉代农业生产的基本资料。

41. 《四民月令》

东汉崔寔撰，1卷。仿《礼记·月令》体制所作，记述后汉时代一年中的行事。四民指士、农、工、商，内容是以豪族生活为中心。全书从一月到十二月按月序对东汉时期庄园的例行活动进行了记载，是我国最早的农家历。从所辑佚文看，书中大多记载的是有关农事活动，如粮食作物的种植时间以及与月令相关的农事安排等，其中关于稻秧移栽、果树埋植繁殖法等的记载都是最早的。也有对庄园中治丝析麻、纺织缝制、酿造修缮、采制药物等家庭手工业情况的记录，庄园对外贸易和文化教育也有涉及，反映了东汉时期大地主庄园经济自给自足的特征。《四民月令》虽然没有《汜胜之书》的史料价值大，但对探知当时豪族社会、经济的生活状况及东汉的庄园经济研究也十分重要。

《四民月令》原本已散佚，现存的本子是清代严可均从《齐民要术》、《王燭宝典》、《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中集录其逸文，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清人王谟《汉魏遗书抄》崔寔条也有收录。近人的辑释有石汉声《四民月令校注》（中华书局1965年版）和缪启愉辑释、万国鼎审订的《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以石汉声《四民月令校注》为优，其书后附录有《试论崔寔和四月令》。《汜胜之书》和《四民月令》，可以与《汉书·食货志》及相关人物传记相参照，来研究汉

^① 阮元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代经济史。另外，陶西圣《西汉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和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也可作为研究两汉经济的参考资料。

42. 《神农本草经》

秦汉间人伪托神农所撰。3卷。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是目前所见最早、最完整，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本草文献。该书总结了战国时期许多用药的经验，是秦汉以来药物学知识的总结。

《神农本草经》一般为三卷本，另有“序例”，序例是药物学的总论。共收入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不仅对这些药物按上、中、下三品进行分类：“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中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而且对每一种药物的名称、主治病症、性味及药物的产地、采集时间、入药部分、异名等也作了详细的说明。同时书中记载的病名多达170余种，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以及喉、耳、齿、眼等各科的不少疾病。在药用价值上，书中绝大多数药物临床应用都有很高的疗效，如补气的人参、黄芪，补血的当归、地黄，解表的麻黄、桂枝，泻下的朴硝、大黄，去寒的附子、吴茱萸，清热的黄连、石膏等所载用药，至今仍然沿用。《神农本草经》还提出了当时药物学的基本理论：第一，论述了立药和配药的“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第二，提出药物“七情和合”，即包括单行、相须、相使、相畏、相反、相恶、相杀七类药物的配伍宜忌；第三，论述了药物的性味及采集加工，指出五味（酸、咸、甘、苦、辛），四气（寒、热、温、凉），有毒，无毒，有关药物的加工和型剂；第四，提出了用药原则，按照病因、病位的用药要求和服药方法等，反映了东汉以前药物学的成就，是研究汉代乃至以前中医发展的基本史料。

《本草经》是后汉众多本草的一种，同时汉代本草著作中书名冠以“神农”的，应不仅《本草经》一种。陶弘景将众多的《本草经》版本汇集，编成《本草经集注》。由于此书体例完备，内容丰富，使得其他大多数同类本草著作渐渐湮没不传。唐代官修《新修本草》，以《本草经集注》为蓝本。北宋末蜀医唐慎微参用诸经，撰成《证类本草》。此书为本草著作之集大成者，此后大观、政和、南宋绍兴年间翻新本草，莫不据《证类》为蓝本，而少有涉及《本草经》者。因此，至南宋时，不惟《本草经》，《本草经集注》及《新修本草》亦渐失传。其佚文，除主要保存于梁代《本草经集注》、唐代《新修本草》、宋代《证类本草》中外，在唐宋以来的一些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以及其他一

些著作，如李善注《文选》、陆德明《经典释文》、释慧琳《一切经音义》等，亦或多或少地辑录了一些《本草经》文字，为《本草经》的辑佚工作奠定基础。后世又有二三十种辑本及辑注本，分别保存在国内、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等许多国家。现今流传的辑本主要有：①明代卢复辑本，是现存《神农本草经》的最早辑本，辑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该辑本所据蓝本众说不一，一般认为内容辑自《证类本草》，编排次序依据当时流行的药物学目录，与《本草纲目》不谋而合。卢复辑此书历时十余年始成。②清代孙星衍、孙冯翼辑本，辑于嘉庆四年（1799年），由商务印书馆1955年7月刻印，是现今流行较广的一种本子。辑本药物佚文及排列顺序依据《证类本草》，共载药358种。每品药物又分玉石、草、木、人、兽、禽、虫鱼、果、米谷、菜及未详诸类。各药原文之后，辑以吴普及《名医别录》古注，并附孙氏校语。③日本人森立之辑本是考证较详的本子，辑于咸丰四年（1854年）。书中所辑佚文多据《证类本草》，旁参日本所存《新修本草》、《真本千金方》、《医心方》等书。卷五为“考异”，为校注内容。

较新的辑本，有尚志钧《神农本草经校点》（皖南医学院科研处排印本），曹元宇《本草经辑注》（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王筠默、王恒芬辑注《神农本草经校证》（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尚志钧辑《神农本草经》，见“中医八大经典全注”（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马继兴主编《神农本草经辑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年版）及所辑《神农本草经》等。其中马继兴所辑的《神农本草经》，被称之诸辑本之首。他以明代卢复本为主，又据其《神农本草经辑注》，全面参据了众多中国及日本古医籍中所保存的《神农本草经》佚文，充分吸取了后世诸家辑本的优点。其特点是复原时保留了古貌，红字为《本经》原文，夹注于红字间的黑大字为《名医别录》，双行黑小字为“七情旧注”^①。

43. 《伤寒杂病论》

东汉张仲景撰，16卷。张仲景，字名机，东汉南阳（今河南南阳）人。本传记载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精究方术”，在继承先秦以来医学成果的基础上，总结自己的医疗实践，撰成《伤寒杂病论》，探讨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病症发生原因、性质、转变及其治疗、预防等。书中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提出了中医的四诊、八纲、八法及理法、方

^① 《神农本草经》在其早期传本中原文均写成红字，在其后的刻本中刻印作白字，以便与后世增补文字相区别。

药在内的较为完整的辨证论治原则，总结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使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与临床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直到今天仍有实用价值，被医学界称为“方术之祖”。原书包括“伤寒”和“杂病”两部分，其中10卷论伤寒，6卷论杂病。由于汉末、三国几十年的战乱及永嘉之乱，到东晋此书已散佚不全。晋医学家王叔和对残存的卷帙搜集、整理成《伤寒论》。《伤寒论》22篇397法，113术（实际上为112术，因禹余粮丸有方无药），专论伤寒方面的问题，是一部理、法、方、药较为完备的“辨证论治”规律的中医书。

《伤寒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时隐时现。至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仅有少数条文被征引，故有江南诸师秘仲景方而不传之语。至孙思邈晚年撰《千金翼方》时，《伤寒论》的大部分内容才被载于卷9、卷10之中。宋代初，《伤寒论》一书又处于若存若亡的状态。开宝年间（968—976年）彭城节度使高继冲把其珍藏的《伤寒论》加以编录后献给政府。治平元年（1064年），经宋代校正医书局林亿、高保衡等的考证校勘，将该书分为10卷、397条正式出版刊印，从此《伤寒论》才得以流传至今。金代医家成无己又为其作注，使之流传更广、影响更大。刻印后通行于国内外。

现在《伤寒论》通行的版本有宋版和成注本。宋版已无原刻本，只有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赵开美的复刻本，也称赵刻本。据记载在宋、金以后，历代及日本刻本之现存于国内者，有60多个版本。若计其节录、别本、发挥、集注、方论等，目前国内各图书馆收藏之国内外版本有近700种，1990年版多次刊印。《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一度失传。其中有些内容，在张仲景之后曾被一些方术书转引。而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则已有相当的转载。北宋仁宗时期（1023—1063年），翰林学士王洙在翰林院所存的残旧书籍中，得到一部《金匱玉函要略方》，实际上是《伤寒论》的节略本。共有三卷，上卷论伤寒病，中卷论杂病，下卷记载方剂及有关妇科的理论。以后林亿等人在校订此书时，鉴于《伤寒论》已有传本，就把上卷删去，只保留中、下卷论述杂病和妇人病部分。为便于临床应用，又把下卷的方剂分别列在各种病症之下，重新编为上、中、下三卷。此外，还采集唐家方书中转载张仲景治疗的医方及后世医家的一些良方，分类附在每篇之末，命名为《金匱要略方论》，简称《金匱要略》。所以，目前流行的《伤寒论》和《金匱要略》，是从《伤寒杂病论》中分割而成的。《金匱要略》，亦名《金匱玉函经》25篇、139法、269方，使用药物214味，总论病因、病机、病类、诊断、防治等理论问题和各科治疗问题，是一部包括内科、外科、疝气、蛔虫、妇科、产科、儿科、急救等

四十多种疾病治疗学的著作。自北宋林亿校正刊行后，以元刻本为我国现存之最早本子。其本文、注释、发挥、方论等刊印虽远不如《伤寒论》广泛，但其版本截止1949年国内图书馆收藏的国内外刊本也多达110多种，印刷也多达370余次，从而奠定了历代内科杂病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并为临床处方用药树立了典范。清人徐彬为《伤寒论》作注，将之分为24卷，与《素问》、《难经》并重于世。今人黄竹斋撰有《伤寒杂病论集注》一书。黄竹斋是一位中医文献学家，文献学功力深厚，擅长于考证集注，深谙版本、目录、音韵、校勘、注疏之学。他的著作《伤寒杂病论集注》曾“稿经四易，时历八年”，首刊于1925年。在印行两次后，经大量增补，1936年又刊印第三版。该书获得颇高评价，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作序说“能自出心裁，发前人所未发”。之后他又根据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撰成《伤寒杂病论会通》18卷，凡70万言，于1949年行世。

另外，张显成著《简帛药名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和《先秦两汉医学用语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版），是医学文献研究所获得的成果，也可作为秦汉医学文献研究的有益工具书。

44. 《九章算术》

作者不详。9卷。此书是中国古代数学专著，承先秦数学发展的源流，进入汉朝后又经许多学者的删补才最后成书，具体成书年代学者说法不一，大约在公元50年至100年间。书中系统地总结了战国、秦、汉以来的数学成就，共收集了246条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应用问题及其解法，依照问题的性质和解法，分别隶属于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九章。形式是提出具体问题，附解算方法和答案。作为数学文献，它在多元一次方程、二次方程、平面及立体的面积和体积计算等方面，显示了高度的水平，是世界上最早系统叙述分数运算的著作。而且在问题所述内容中包括了反映耕作面积的计算、牛马粟米的价格、徭役的征发计算、租佃借贷等有关汉时社会经济史料。

后世的数学家，大都是从《九章算术》开始学习和研究数学知识的。魏晋时期，刘徽为《九章算术》作注。唐宋两代由国家明令规定为教科书。1084年由当时的北宋朝廷进行刊刻，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本数学书。其本子收于《算经十书》、《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作了许多译注及研究工作，主要成果有：①白尚恕的《九章算术与刘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②白尚恕的《九章算术注释》（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③郭书春的《九章算术汇校》（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④白尚恕的《九章算术今译》（山东教育出

版社 1990 年版)；⑤李继闵的《关于〈九章算术〉及其刘徽注研究论文目录》(中文部分)(九章出版社 1992 年版)，论文目录按作者姓氏笔画排列，查阅非常简便。

45. 《周髀算经》

著者不详。凡 2 卷，意义 1 卷。《周髀算经》，原名《周髀》，成书于公元前 1 世纪的西汉时期，有人根据文中有周公的对话认为是西周时期的作品，这是不对的。按原书自己的解释，“周髀”意为“周代的晷表”，书中称它所含的观测资料都来自于周代都城晷表的测量结果。“算经”(数学经典)一词直到唐代才加在书名之上。《周髀算经》是由不同的两章合成，主要讨论历象与盖天说及数学知识。书中第一章开头以周公与商高的对话，解释了矩的数学意义，并简要提到了盖天说，认为天是半圆形，地成拱形，日月星辰附着于天地平转；同时又以商高和陈子之口叙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及用晷表于日中测影的方法。第二章主要是简短的宇宙论描述和使用晷表观测星星的办法。《周髀算经》是研究西汉时期数学和天文学的重要著作。书中提出的盖天说，尽管根据的是地球扁平的假说，在汉代已被越来越多的天文观测所否定，但它对昼夜现象、四季现象和它们在地球表面因位置不同而发生的变化方面的描述，却具有质的正确性。同时，书中的数学水平与《九章算术》有关部分相当，代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较高水平，如矩的用途、勾股定理及其在测量上的应用，相似直角三角形对应边成比例定理等。还提到“环矩以为圆，合矩以为方”，即固定直角三角形的斜边，它的直角顶点的轨迹是一个圆。另外，还有开平方的问题，等差级数的问题，以及应用于古代的“四分历”计算的相当复杂的分数运算。特别是测太阳高、远的陈子测日法，成为后来重差术的先驱。

《周髀算经》最早的注是三国的赵爽所作。唐代时李淳风对《周髀》作了再注，并在书名上加了“算经”二字，供太学生学习数学之用。《周髀算经》现存最好的本子是钱宝琮的校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书前有一个非常有用的引言。今人古克礼著有《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和数学：周髀算经》(剑桥大学出版社)，对《周髀》作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和翻译，涵盖了前人的许多研究成果。

46. 《浑天仪图注》、《灵宪》

东汉张衡撰。张衡字平子，河南南阳(今河南南阳)人，是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家。曾两度担任执管天文的太史令，精通天文历法，创制了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推算出日、月、星辰运动的位置。《浑天仪图注》是张衡以给浑天仪作注的形式，对汉代浑天说理论进行了全面

总结和论述。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用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理论，近似说明天体的运动，在当时影响很大。陈美东著有《张衡〈浑天仪注〉新探》是对《浑天仪图注》研究的较新成果，可以参考。

《灵宪》是张衡整理天文学说写成的一篇论文，系统完整地描述了天地万物生成变化发展的过程，其论点为：1. 指出月亮本身并不发光，月光是反射的太阳光；2. 对月蚀的成因作了科学的解释；3. 算出日、月的角直径，记录了在洛阳观察到的恒星 2500 颗，和近代天文学家观察的结果相近；4. 用赤道、黄道、北极、南极等名词，并画出中国第一张完备的星图，包括 2500 颗恒星。同时阐明了五大行星运动快慢及其与地球运动的关系，是世界史上不朽的天文学论著。

《灵宪》本书佚，现在严可均辑《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有辑本。

另外，郗萌著有《宣夜说》，与《周髀算经》、《浑天仪注》一样反映了汉代关于天体理论三大家（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的观点。扬雄还著有《难盖天》一卷，对盖天说提出怀疑与责难。这些著作体现了汉代天文学发展的成就。《难盖天》与《宣夜说》，收在《玉函山辑佚书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之中。

从《汜胜之书》到《灵宪》等篇，主要包括农业、医药、天文、数学等内容，是研究两汉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

47. 《太平经》

《太平经》是东汉末年原始道教的重要典籍，亦是研究汉代哲学、文学、史学、民俗学等领域的基本文献之一。原书 170 卷，今仅存 57 卷。在汉代称《太平经》者，据史书记载，有三种：一是前汉成帝时人甘可忠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12 卷，自称是天帝赤精子传授；二是后汉顺帝时问世的《太平清领书》；三是顺帝时张陵所得《太平洞极经》144 卷。这里所说的《太平经》是《太平清领书》。《太平清领书》据《后汉书·郎襄楷传》的说法是宫崇受于吉神书，而给朝廷。王明认为，本书最早是一个秘传的草本，很难断定是谁写的，以后逐渐增修，宫崇是个重要的编纂者。所以它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

关于《太平经》的形成及史料的缺失，只能从《太平经》和《后汉书》中窥其大略。《后汉书·郎襄楷传》记载：“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

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覡杂语。有司奏崇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唐王松年《仙苑编珠》又记载另一种说法：“于吉从帛和受《素书》二卷，乃《太平经》也。”可见，《太平经》起初篇幅并不很大，后经道教信徒们不断推行，形成一百七十卷。《太平经》对卷数及书名也有说法：“故作《太平经》一百七十卷，像天地为数，应阴阳为法，顺四时五行以五行，不敢失铢分也。”^①以“太平”名书，目的欲使“帝王立政太平”，成书过程充满着神秘气氛。唐末闾丘方远节录《太平经》编成《太平经钞》一书，今载在《道藏》中。《道藏》中还收有《太平经圣君秘旨》，其内容有的见于今本《太平经》。

关于《太平经》本身，宋《四库阙书目》及《宋史·艺文志》皆著录为“襄楷《太平经》一百七十卷”。这是误将向汉桓帝献“神书”的襄楷，当作为该经的造作者。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六说：“今甲乙十部合一百七十卷，今世所行。”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太平经》一百七十卷”。元赵道一《仙鉴》也说：“其经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部，每部一十七卷。”这说明《太平经》一百七十卷到元代还是完整存在的。及至明代，《太平经》便残缺严重了，明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及明李杰《道藏目录详注》都说《太平经》只存：卷一至十四，卷三十五至五十，卷五十一至九十（内有缺卷），卷九十一至一百七（内缺九十四、九十五），卷一百八至一百十九。这说明《正统道藏》中只存《太平经》八十七卷，除去外字号一至十卷为《太平经钞》，则实存本文仅七十七卷。迨至近代，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较之原刻本《正统道藏》中《太平经》卷帙，则又更为残缺，只存下五十七卷，即：卷三十五，卷三十六至三十七，卷三十九至五十五（五十一与五十三同卷，缺五十二），卷六十五至七十二，卷八十六，卷八十八至九十三，卷九十六至一百四，卷一百十四，卷一百十六至一百十九。另卷一至卷十，乃是闾丘方远的《太平经钞》。

通过《太平经钞》和《太平经圣君秘旨》，可以窥见《太平经》一百七十卷本的大体面貌。全书内容由三部分组成，一曰神道书，二曰核事文，三曰去浮华记。“神道书”就是作为全书理论思想基础的阴阳五行的神学理论；“核事文”即“兴国广嗣”之术，这是此书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救世”的实际措施；“去浮华记”则可能指对它所不赞成的种种理论和方术的批判。从其内容看，《太平经》是以汉代儒家理论阴阳五行为其理论基础，建

^① 《太平经》，见明本《道藏》，1988年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协作出版的影印本。

立的神道理论体系，比较符合东汉统治集团扶植倡导的神仙方术和讖纬学说。桓帝时，襄楷等把它看成儒家著作。《太平经》在东汉末年流传较广，当时农民起义如火如荼、连绵不断，即将成为燎原之势，而《太平经》中解除承负，享受太平、成仙、天道“助弱”以及崇奉天神、符水治病、天地共财等说法，比较符合农民心理，黄巾起义的领导人张角就利用此经义，作为动员和组织人民的思想武器。到西晋葛洪时，道儒结合，《太平经》被正式承认为道教的重要经典。《太平经》虽然其理论基础是唯心的，但在解释阴阳五行时，吸收和融化了自然科学的成分，具有唯物和辩证思想。引用《太平经》时，要正确把握其史料。

近代学者王明先生，根据多种道教经书及有关史籍，参照合校，编著了《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版），基本上还原了《太平经》一百七十卷的轮廓与内容，被公认为研究《太平经》的最权威、最详备的底本。然而，该书毕竟受到时代、史料等诸多客观条件的局限和制约，对于很多内容（如文辞、义理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深入发掘和系统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太平经》的研究（尤其在文字学方面）逐渐予以重视，先后出版了杨寄林《太平经释读》、王平《〈太平经〉研究》（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罗炽等《太平经注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龙晦等《太平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俞理明《太平经正读》（巴蜀书社2001年版）等著作，对于《太平经》的文字整理、白话文翻译等研究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由杨寄林先生译注的《〈太平经〉今注今译》（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堪称为古代典籍之全译的一部力作。该书援引《太平经合校》为底本，借鉴敦煌卷子作参考，吸取音韵学、文献学、考古学等方法，采撷众家所长，熔铸一家之言，拾遗补缺，弥补脱漏，取舍异文，校勘文字，对《太平经》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校订、考证、注释及翻译等工作。全书分为上下两卷，洋洋洒洒计132万余言，考辨真伪，见解到位，且译文通俗易懂，详略精当，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太平经》之本义。该书的出版、面世称得上是对《太平经》文字学研究的一次重大的新拓展，同时亦为道教文化研究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48. 《牟子理惑论》

旧题后汉太尉牟融撰，或云苍梧太守牟子博撰，均不可信。37篇。此书或作《牟子》，或作《理惑论》，是中国最早的佛学经典之一。

《牟子理惑论》是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由中国文人学士所写的一部宣扬佛教思想的著作。作者在用问答形式论述佛教的过程中，大量引用儒家、道

家经典，广取譬喻，而极少引用佛经，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一开始就深深地影响着佛教。后汉末年，佛教刚开始流行，对于外来宗教，人们还很生疏，很不了解，只能用中国的固有观念来看待它、理解它，牟子对佛陀及其教义的理解，正是这种时代的反映。牟子一面征引《老子》讲解佛教，又引用佛教教义附会《老子》；另一方面以儒者面孔去问，又以儒家思想去解答。说明在牟子身上，已明显地表现出融会儒、道、佛三家的倾向。牟子对佛教的这种理解，与印度佛教教义难免有许多不合之处，也说明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便和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思想发生了密切的关系。《牟子理惑论》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佛教的理解，是研究佛教传入中国初期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牟子理惑论》一书早佚，《弘明集》中保存佚文较多，可资利用。

49. 《急就章》

《急就章》原名《急就篇》，是西汉元帝时命令黄门令史游为儿童识字编的识字课本。因篇首有“急就”二字而得名。今本34章，用不同的字组成三言、四言或七言的韵文，内容涉及姓名、组织、生物、礼乐、职官等各方面，如一部小的百科全书。本书除为秦汉文化史料外，还可用作研究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等史迹的资料。

该文从汉至唐一直是社会流传的主要识字教材，同时，抄写规范精雅的本子也有作为临书范本的功能。唐代以后，《急就篇》的主导蒙学教材地位被《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所代替。

流传至今最早的《急就章》写本传为皇象书，^①今有刻本流传。而以明代吉水（今属江西省）杨政于正统四年（1439年）时据宋人叶梦得颖昌本摹刻的为最著名，因刻于松江，故名“松江本”。颖昌本是叶梦得根据唐人所摹皇象书《急就章》而刻于颖昌者。松江本《急就章》原石存上海市松江县博物馆。因祖本无存，松江本严格说属重刻本。高二适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是常见版本。

50. 《方言》

《方言》亦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共有13卷，是汉代一部语言学和训诂学的著作。因此书作于刘向《七略》完成之后，故未见著录，

^① 皇象，字体明，广陵江都人，官至青州刺史。三国吴著名书法家。善八分、小篆，尤善章草。其章草妙入神品。他的草书与曹不兴绘画、严武的围棋等并称“八绝”。《急就章》是古代的识字课本，以皇象写本最早。前人对皇象书法评价甚高，唐张怀瓘曰：“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体明章草，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可见他创造了“相众而形一”的书风，在书法史上有重要意义。

《汉书·扬雄传》和《汉书·艺文志》亦都未记载，不少人对此提出疑义。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最早指出其为西汉扬雄所作。章诒注引洪迈考证，以为是汉魏之际人所伪造：“洪内翰迈曰：世传扬子云《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汉成帝时刘子骏《与雄从取〈方言〉》及雄答书。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为文，初无所谓《方言》。观其《答刘子骏书》称蜀人严君平。按君平本姓庄，汉显宗讳庄，始改曰严。《法言》所称蜀庄沈冥、蜀庄之才之珍。吾珍庄也，皆是本字，何独至此独书而曰严。又子骏只从之求书，而答云必欲胁人以威，陵之以武，则谿死以从命也。何至是哉？即云成帝时子骏与雄书，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复抵牾。又书称汝颖之间，先汉人无此语也。必汉魏之际好事者为之云。”但清代卢文弨、王先谦等又一直认为是扬雄所作。从该书内容所展示的时代特点看，它成书于扬雄所处的西汉之际是可能的。其体例模仿于《尔雅》，但与《尔雅》相对，汇集了各地方言，并一一注明了通行范围。书中所搜集的方言资料，从时间上看，上溯自西周、历春秋战国秦汉，包括了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势力所及的广大地区，以汉语为主，兼及淮夷、南蛮、西羌、北狄等少数民族语言，资料丰富。每释一事物，一般都以无地域性的普通话、通行区较广之方言、一地之方言、古今变化以及其在时间与地域上的变化互相对照，成为当时的一部方言大全。因为该书以两汉之际的语言为主，并兼及周秦，所以秦汉以后又成为一部训诂的书，对于阅读先秦和秦汉时期的著作，可以提供其他著作不可替代的帮助。它不仅解决该书之前典籍中因方言产生的大部分理解上的障碍，而且也能解决该书之后一些著作中涉及的方言问题，还可以利用它来考释假借文字并证读今文，是研究两汉及以前史料重要的工具书。

西晋郭璞有《方言注》，收于《汉魏丛书》、《古今逸史》、《抱经堂丛书》、《四部丛刊》等。之后，不少学者对该书进行注释和后续工作。清人孙诒让《方言郭璞注校》（见《札迻》卷2）、刘台拱《方言补校》1卷（见《广雅书局丛书》）、钱绎《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笺疏》13卷（见《红蝠山房》）、戴震《方言疏证》、王念孙《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疏证补》1卷（见《高邮王氏遗书》），民国吴予天《方言注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为通行的版本。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编的《方言校笺通检》（1951年版）是检索《方言》的较好工具书。

51. 《释名》

东汉刘熙撰，8卷。刘熙，字成国，北海（今山东省寿光、高密一带）人，生活年代当在桓帝、灵帝之世，曾师从著名经学家郑玄，献帝建安中曾

避乱至交州，《后汉书》无传，事迹不详。据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三云：“汉征士刘熙成国撰。”吴韦昭曾作《辨释名》一卷，见《隋书·经籍志》；又《经典释文》中亦曾引用。全书共分名词二十七类，八卷，体例模仿《尔雅》，但是用音训（声训）的方法来解释字义、词语。卷首自序云：自古以来，器物事类“名号雅俗，各方名殊，……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说明刘熙撰此书的目的是使百姓知晓日常事物得名的缘由或含义。其27篇依次是：《释天》、《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释形体》、《释姿容》、《释长幼》、《释亲属》、《释言语》、《释饮食》、《释采帛》、《释首饰》、《释衣服》、《释宫室》、《释床帐》、《释书契》、《释典艺》、《释用器》、《释乐器》、《释兵》、《释车》、《释船》、《释疾病》、《释丧制》。所释名物典礼共计1502条。因内容涉及广泛，被称为古代百科名词词典。虽然此书采取对字词音义的训诂方式，但书中关于亲属、言语、衣服、器物、丧服等制度的解释，对研究汉代的社会生活、社会制度及文化制度，有重要参考价值。如《释书契》：“汉制，约敕封侯曰册。册，贖也，敕使整贖不犯之也。”说明汉代册封侯王时立有整敕其不得犯法的文书。又如《释典艺》：“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即物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碑的功用的演变由此可见。原来，古时丧葬，在墓坑两端各树一石碑，碑间架辘轳，以绳绕辘轳上，挽棺缓缓下放。后来碑用来追述先人功业。《释书契》：“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启白，则书其上，备忽忘也。”由此我们可了解古代朝会时大臣所执手板的用途。《释用器》：“枷，加也，加杖于柄头，以挝穗而出其谷也。”可见今天一些地区脱粒用的农具连枷的历史相当悠久。阅读这些记载，可以获得百科知识，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的文明史，考究事物缘始和汉代生产生活情况。所以清人毕沅说：“其书参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礼之异，洵为《尔雅》、《说文》以后不可少之书。”（《释名疏证·序》）这一评价是很中肯的。

《释名》产生后长期无人整理，到明代，郎奎金将它与《尔雅》、《小尔雅》、《广雅》、《埤雅》合刻，称《五雅全书》。因其他四书皆以“雅”名，于是改《释名》为《逸雅》。从此《释名》又别称《逸雅》。

《释名》今存最早刊本为《四部丛刊》影印明覆宋陈道人本。

《释名》的明刻本缺误较多，清人对它进行补证疏解，其中最重要的著

作是毕沅的《释名疏证》8卷、《补遗》1卷、《续释名》1卷（见于《广雅堂丛书》及《丛书集成初编》中）。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8卷、《续》1卷、《补遗》1卷、《补附》1卷，光绪年间长沙刻本，是清人研究整理《释名》的集大成之作。之后又有成蓉镜《释名补证》1卷（见《南齐书院全书》6）、孙诒让作《释名校》（见《札迻》）等。通行版本为1928年上海涵芬楼影宋本。

今人的研究论著有：方俊吉《释名考释》，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版；李维冀《释名研究》，大化书局1980年版；何宗周《释名释天绎》，香草山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版；徐芳敏《释名研究》，见《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之八十三，1989年版。这些著作对《释名》进行了系统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52. 《说文解字》

简称《说文》。东汉许慎著。完稿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由其子许冲把书稿献给汉安帝。许慎把汉字区分为独体之“文”与合体之“字”两类，他的这部书是为了说解“文”、“字”而作的，因此名为《说文解字》。该书是我国文字学史上第一部严格遵循表意汉字形义统一的原理，从分析小篆个体字符的字源结构入手，归纳出小篆字系的构形系统，从而证明汉字的构形原理与规律，揭示汉字构形系统性的重要著作，至今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是学习和研究汉语言文字学的必备工具书。

全书共15卷，其中正文14卷，叙目一卷。书中收字以小篆为主，把小篆列为正篆，而把古文、籀文等异体列为重文。全书共收正篆9353个，重文1163个。首创部首编排法，将9353个正篆按字源结构归入540部中。正文中对个体字符的说解，一般是先释义，后解形。释义与解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说解据义构形的本义和能够体现本义的字形的字源结构来显示形义之间的统一关系。《说文》是我国文字学的奠基之作，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说文》学研究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即《说文》学。

《说文》改变了周、秦到汉字书的编纂方法，将所收字编成四言、七言韵语的形式，开创了部首编排法，共分为五百四十部。许氏总结了先前的“六书”理论，创造了系统解释文字之法，是先解释字义，再剖析形体构造，最后注明读音。剖析字形的方法，是以前字书中没有出现过的。许慎作《说文》往往引群书（以经书为多）以为例证，所引之书对研究其他典籍，亦颇富参考价值。故云《说文》对古文字、古文献和古史的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说文》成书后，颇受重视。南朝梁时庾俨默著有《演说文》1卷，至隋已亡。隋时有无名氏撰《说文音隐》4卷（见《隋书·经籍志》）。南唐时徐铉和徐锴两兄弟对《说文》颇有研究。徐铉于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奉命校定《说文》，交国子监刊版，此本亦称“大徐本”；徐铉的弟弟徐锴传的《说文》为《说文解字系传》，称“小徐本”。现通行本的《说文解字》即为“大徐本”。通行本《说文解字》与《说文解字系传》在内容、每字的笔画注释、各字之间的次序上，均有所不同。徐氏本的篇目很多，每篇又分成了上下两卷，总共三十卷，收入9431字，重文1279字，解说122699字。现存版本以徐铉校订的宋刊本最早，《四部丛刊》初编和涵芬楼《续古逸丛刊》也有影印本。根据周祖谟先生的研究，《系传》有许多长处，它除引证古书和今语疏证古义和古语外，还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以许训解古书；二、说明古书的假借；三、说明古今字；四、说明引申义；五、兼举别义；六、辨声误。《说文解字系传》有三种版本流传，其中以清道光年间祁嵩藻刻本为最好，这个刻本据清顾千里所藏的影宋钞本和汪士钟所藏宋槧残本校勘而成，远胜其他本，故1987年中华书局据此本影印出版。

清代学者研究《说文》的很多，单作注的就有几十家，其中最著名的有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四大家。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30卷，附《六书音韵表》5卷，刊本较多，如原刻本、苏州重刻本、武昌局本等。民国时又有扫叶山房石印本。现流行本有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和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桂馥作《说文解字义证》1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王筠著《说文句读》30卷、《说文释例》20卷，最早有王氏自刻本，涵芬楼影印王氏自刻本。现通行本有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本。朱骏声作《说文通训定声》18卷，东韵1卷，原刻本，江宁局本，民国时上海书店影印本，现通行本有中华书局影印本及武汉市古籍书店影印本。近代的丁福保比较研究了先前各家专著，参考甲骨文、金文的资料，汇编成《说文解字诂林》，后来又补充资料编为《补遗》，汇总了历代对《说文解字》的研究。

今人苏宝荣、张田德编撰《〈说文解字〉导读》，是帮助人们阅读《说文》的一部辅助性的工具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说文解字》概述，对《说文》的作者、成书过程、著作体例、编排与查检作了概括的介绍。第二章《说文解字》导读，从汉字结构特征和《说文》释字特征两个方面，指导读者深入阅读和正确领会《说文》的字义说解。第三章《说文解字》常用字今注，融汇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说文》中所收、古籍阅读中又常用的字近两千个，用简明扼要的现

汉语作出注释和补充说解。第四章《说文解字》的研究，概述了《说文》研究的历史，介绍了历代《说文》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为读者深入钻研《说文》提供方便。该书编著过程中，始终坚持学术性与实用性的统一，科学性与通俗性的结合，既可成为《说文》初学者入门的阶梯，又可供《说文》研究者参考。另外，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已经被中国博物网做成了电子版，可以按笔画查询。

从《急就章》到《说文解字》诸篇，是经学研究过程中所诞生的几部与经相关的工具书，主要用来解决有关文字、音韵和训诂方面的问题，对研究汉代的语言文字学、训诂学以及社会风俗方面都有重要价值。

53. 《全汉文》、《全后汉文》

《全汉文》、《全后汉文》是《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分册。《全汉文》63卷，共收西汉作者334人；《全后汉文》106卷，收东汉作者469人。从所收内容看二书集中了两汉时期除史传、诸子、诗赋、专书以外的所有文字。所辑文字，均说明出处，有利于重检、核校。内容包括金石碑版、杂记、古注、历史文献、记令奏议、策论、书信、告谕、论著（赞、颂、论、序）以及宦官、列女、阙名、外国、流贼、仙道、鬼神、释等。书中对收入的作者，每人附有小传。大到鸿篇巨制，小到片言只字，无不穷究，对研究两汉历史、政治、文学、宗教、语言等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

三 两汉考古资料

汉代史的研究，除大量的文献资料外，考古出土的文字资料和图像也是其参考的重要部分。汉代的出土文字与图像主要包括简牍、缣帛、石刻、封泥、古印玺及画像石等。下面分别介绍：

（一）简牍资料（包括缣帛）

后人把写上字的汉代竹木简统称为简牍。简，指竹简；牍，指木牍，简称汉简。从历史记载看，早在晋时就有汉简发现。《晋书·束皙传》载：晋武帝时（265—290年）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行蝌蚪书，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华以问皙。皙曰：‘此汉明帝（58—75年）显节陵中策文也。’检验果然。”之后，宋代汉简又有多次发现。其中有邵博《邵氏见闻录》卷二十七记崇宁（1102—1106年）初在甘肃皋兰之天都山获后汉章和年号（87—88年）的木简；大观时（1107—1110年）黄伯思《东观余论·汉简辨》记“近岁关右人发地得古瓮，中

有东汉时竹简甚多，往往散乱不可考，独永初二年（108年）《讨羌符》文字尚完，章草书”等。虽然这些汉简比较散乱，但对校对古书仍有一定的作用。如奚椿年先生据《讨羌符》校《后汉书·安帝纪》还校出了不少错误。

从20世纪初到目前，在汉代边塞城障烽燧遗址及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简牍，从内容看记载了西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风俗、民族关系、中西交通和随葬制度等各方面的史实。加上它没有经过后人辗转抄写，保持着书写时较原始的状态，为研究汉代历史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有些内容还起到纠正和补充正史的作用。舒学《我国古代竹木简发现和出土情况资料》一文，发表于《文物》1978年第1期，对此情况有真实反映。

汉代简牍按其出土地点可分为汉塞简牍和汉墓简牍两大类。

1. 汉塞简牍

就其出土地点看，都出自西北边塞，或见于官署，或见于亭隧，皆为屯戍遗物，数量庞大；就其出土内容看，边塞汉简不是同一时期的遗物，早的写在汉武帝时期，晚的写在东汉末年；大多属于官方各种文书簿籍，也有一些吏卒私人的遗物。这一部分汉简是研究汉代历史十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史学工作者根据它来探索汉代西北边塞的农业生产、屯田制的推行、水利状况、行政机构、军事组织、防御体系、烽隧制度，以及地理、交通、民族情况，获得了不少新的认识。当然，边塞汉简的用处不限于研究汉代边塞状况，边塞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虽然有某些独特的内容，但与内地颇多相同之处。如中央制定的经济政策、规定的法律条文、下达的一些政令、颁布的历法等，边塞与内地是统一的。因此，边塞汉简也是研究整个汉代历史发展的重要史料。从总体来看，边塞汉简包括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罗布淖尔汉简（亦称罗布泊汉简）及悬泉汉简等。

（1）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是指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在疏勒河流域的许多地区先后发掘的几批竹木简牍。因最早发掘于敦煌，所以统称为敦煌汉简。

①发掘与整理

敦煌汉简的发掘过程，主要分1949年以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时期，前后共6次：

I. 1906年—1908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国政府派遣第二次到中亚考察，1907年，在敦煌以北东经 $94^{\circ}30'$ 至 $93^{\circ}10'$ ，北纬 40° 汉代长城遗址内，掘得木简708枚。这批简保存于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简影和释

文见于法籍汉学家沙畹的《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所获汉文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e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cus Les sable du Turkestan oriental. Vol. Oxford, 1913), 亦称《中国古文书》。1914年, 我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对沙畹发表的部分原简照片作了释文和考证, 合著《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为我们了解这批汉简提供了方便。这批简的主要内容是西汉敦煌边塞都尉府的主屯档案。

II. 1914年, 斯坦因第三次对中亚考察, 在今敦煌汉塞烽燧遗址中发现木简100枚, 又在安西、酒泉县境内掘得木简105枚, 陈梦家把这部分简称为酒泉汉简。^① 后来人们把这部分简统称为敦煌汉简。简影见于马伯乐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亦称《中国古文书》)(Les Documents chinois de la Troisieme Expedition de Sir Aurel Stein en Asia Centrale vol. London. 1953)、斯坦因《亚洲腹部考古记》和张凤的《汉晋西垂木简汇编》(1931年), 原简藏于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

III. 1920年, 国内学者周炳南等人在敦煌小方盘城遗址西北戈壁发现汉简17枚, 现藏敦煌研究院。

IV. 1944年,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和阎文儒等人在今敦煌市以北汉代边塞遗址中掘得汉简48枚。汉简出土情况见阎文儒的《河西考古杂记》(《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4期); 简影和释文见夏鼐的《新获之敦煌汉简》(收入《夏鼐考古学论文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第169—289页)。原简现藏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文物陈列馆。此馆中典藏的汉代简牍, 主要是20至40年代间, 中国与瑞典学者组成的西北考察团, 在新疆罗布淖尔与内蒙古、甘肃额济纳河流域、武威、敦煌等地, 进行考古发掘、调查的成果之一。其中以1930年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Folke 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的“居延汉简”为主, 约11000余枚。另外还包括1927年黄文弼在新疆盐泽发现的“罗布淖尔汉简”(58枚), 以及1944年、1945年夏鼐、阎文儒勘查玉门关、阳关及汉代边防烽燧遗址的路线, 所发现的“敦煌小方盘城汉简”(76枚)、“武威刺麻湾汉简”(7枚)。这批珍贵的考古遗物历经战乱, 由北京经香港转运美国, 1965年由美国运回台北入藏史语所。

V. 1977年8月, 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在玉门花海农场附近的长城烽燧遗址发掘了木简91枚, 这批简属汉代酒泉郡北部都尉的文书档案, 现藏在嘉峪关长城博物馆。

^① 陈梦家:《汉简缀述》, 中华书局1980年版。

VI. 1979年6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敦煌汉塞遗址,在小方盘城以西17公里的马圈湾遗址发掘木简1217枚,这次发掘是1949年以来在敦煌地区发掘简牍最多的一次。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文化馆《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发表于《文物》1981年第10期。

以上六次发掘,共得汉简2400枚,就其质地而言,大部分为木简,竹简较少。从时间上说,最早的纪年简为西汉武帝天汉三年(前98年)的简,最晚的是东汉永和三年(137年)的简,以西汉宣、元、成时期的简牍最多,其中,马圈湾遗址中的汉简以平帝至新莽时期居多,几乎占1207枚中的一半以上。敦煌汉简内容涉及诏书、秦记、檄文、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簿籍、符传、封检及与吏卒生活有关的私人书记、契券、历谱术数、方技、医药、字书等。

这批简内容丰富,形制复杂,不仅全面反映了汉代时期河西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文化、宗教等面貌,而且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当时全国的社会情况,尤其是对西北边塞地区军事防御设施、屯戍制度(包括烽火制度、徼巡制度、出入关制度、考绩制度、更戍制度、军屯制度等)、邮驿制度、文化制度、中西交往、民族关系以及汉代对边郡敦煌、酒泉的经营,记载得十分详细,是史书上从未记的,为我们研究汉代有关的重要历史问题提供了丰富可信的资料。

②敦煌汉简著录书目及论著

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3卷、《考释》3卷、《补遗》1卷、《补遗考释》1卷。1914年日本京都东山学社出版,1993年中华书局重版。此书是罗振玉、王国维根据法国汉学家沙畹的《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一书,对斯坦因曾在甘肃敦煌及新疆罗布淖尔发现的大批汉晋简牍加以释读考证的著作。其中按简牍内容和性质对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汉简进行分类研究,第一编《小学术数方技考释》和第3卷《简牍遗文考释》由罗振玉担任,第二编《屯戍丛残考释》由王国维担任。《补遗考释》是尼雅出土的简牍。《坠简》中不仅考核文字、诠释词语、疏通文义,还对与之有关系的汉代历史制度进行考证,其中对遗址性质、汉长城走向及障燧布局、屯戍组织、西域史地、中外交通的研究,对行文关系及文书制度、简牍缀合与编联的解析,创获尤多,至今仍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继《流沙坠简》之后,王国维又撰写出如《敦煌简跋十四则》(1914年)、《罗布淖尔北所出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书稿跋》(1914年)等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奠定了汉简研究的基础。因此学术界认为,“王国维可以说是近代汉简研究的开创人,他

对汉简研究的某些论点和研究方法，一直影响到第二阶段中居延汉简的研究，在学术上有很高的声誉。他很注意把汉简的内容与敦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恢复汉代烽燧的排列和组织，这是极有见识的”^①。但由于所据材料只是沙畹教授公布的 533 支简牍照片，在资料范围方面不免有一定局限性。另外，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补正》1 卷，^② 李均明的《〈流沙坠简〉释文校正》^③，贺昌群的《流沙坠简校补》、《流沙坠简补正》^④ 对此书有所补正。

林海村、李均明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此书对 1949 年以前出土的汉简释文、出土编号和出土情况等资料进行核对，并制成汉简出土地点编号和汉简著录编号一览表。书中纠正了过去的一些错误，对过去的释文也进行了重新校订。书后附有《参考文献要目》，为研究敦煌汉简提供了便利。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上、下两册，精装八开，中华书局 1991 年版。该书辑录了 20 世纪初以来在敦煌地区陆续发现的八批共 2484 枚汉简的简影和文字材料，包括全部汉简的图版、释文和部分汉简的摹本，并附编号索引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这些汉简内容丰富，多为汉代边防屯戍文书，也有私人信函、契约、古书残篇等，是有关汉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其史料价值可与《史记》、《汉书》相比拟，对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和边防情况、民族关系等具有重要意义。本书不仅首次刊布马圈湾汉简资料及有关发掘报告，还将原来零碎分散、难以寻觅的材料广为网罗，使之汇于一集，极大方便了研究者的使用。

陈直著《敦煌汉简释文评议》，载《摹庐丛著》1981 年版。

吴弼襄等《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日本人大庭修编《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简》，同朋舍 1990 年版。此书对了解敦煌汉简在国外的情况有重要帮助。

(2) 居延汉简

居延汉简是指 20 世纪 30 年代和 70 年代在甘肃北部额济纳河广大地区出土的简牍。这一带北边，原先为匈奴游牧之地，为防匈奴领主向中原侵

① 徐苹芳：《汉简的发现与研究》，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 年第 6 期，第 57 页。

② 王国维：《流沙坠简考释补正》，载《王国维遗书》第四册，上海书店 1983 年版。

③ 李均明：《〈流沙坠简〉释文校正》，载《文史》第 12 辑，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④ 贺昌群：《流沙坠简校补》，载《北平图书馆馆刊》第 8 卷第 5 期，1934 年；《流沙坠简补正》，载《图书季刊》第 2 卷第 1 期，1935 年。

扰，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的一二百年中，汉朝政府曾大规模地在这里屯戍并设有种种军事设施，至今还有遗迹存留，故地下文物特别多。简牍只是其中之一。由于这一带古代泛称居延，有人认为可能与汉代张掖郡的居延城有关，所以凡在这里所得的简牍，统称居延汉简。20世纪80年代出土的汉简，称居延新简。

①发掘与整理

居延汉简1949年以前后共有两次发现：

I. 1930年至1931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瑞典人贝格曼（Folke Bergman）等，在额济纳河的大湾、地湾、金关、破城子等80多个烽燧遗址中获得汉简11000余枚，这是1949年以前出土最多的一次。其中有大量的关于汉代烽燧制度、候官组织、兵制、屯田制以及河西经济生活等珍贵资料，还有一本兵器簿，由七十一支木简组成，内容是关于烽火台兵器现状的报表。这部分汉简的发掘情况见《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汉简的释文、考证和图版分别见于王国维的《版牍检署考》和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和《居延汉简——图版之部》^①。其他如马衡、黄文弼等学者在这方面也有研究。遗憾的是，这部分汉简后来有一些为英国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所盗，现藏于欧洲。除此之外，另有一部分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国民党运往美国，其余一些则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运到台湾。原简现存台湾南港史语所，劳干的《居延汉简》就是依据这些简所作的考证。

II.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建国后，汉简的发现更多。1972年至197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居延汉代的甲渠候官遗址、甲渠第四烽燧和肩水金关遗址进行了考察和发掘，共出土汉简20000多枚，发掘报告见《文物》1978年第1期。这次出土的汉简，数量上多于30年代，学术价值也较第一批居延汉简为高，尤其是出土了一批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子，包括残册在内，大致有一百多部，内容非常广泛，它不仅记录了居延地区的屯戍活动，而且保存了一批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政策法规、军事制度、社会经济、阶级斗争、民族关系等各方面的情况。

这批汉简年代上起元鼎元年（前128年），下迄建武八年（32年），以昭、宣、元、成、新莽、光武时期较多。其形制有简、两行、牍、检、符、

^① 劳干：《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居延汉简——考证之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1960年初版，1986年再版；《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一，1957年初版，1977年再版。

觚、签、册和有文字的封检、削衣等，内容涉及面很广，除古籍历书外，以簿书居多，有诏书、律令和事牍。下面摘录重要资料部分，以窥其面貌：

《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建武六年甲渠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共三枚；《大司农罪人入钱赎品》；《盐铁令品》；《建武初期残册》二十枚；成帝时期的《诏书辑录》残册；成帝永始三年《诏书》册十六枚；王莽的《诏书辑录》残册；建武初期《居延都尉吏奉谷秩别令》；甲渠候官《言府书》五种；建武初年《军情简》；《塞上烽火品约》十七枚；《候吏广德坐罪行罚》檄一枚；河平三年《斥免将军行塞所举燧长》简；《验问候史无追逐器》简；天凤三年甲渠《米糒少薄》；建武五年《候长王褒劾状》；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共36枚；《相利善剑刀》共六枚，内容为鉴别刀剑优劣；《算术书》、《九九术》、《急就篇》、《仓颉篇》、《论语》、《干支表》、《历书》、《纪年简》等。从简牍行文看，有例行公文、有官吏任免、人事变动、有边疆动静、有军纪处理、有奉廩、有劳作、物资输调、物品出入、检核、折伤等等，又有邮书、名籍、牒书、爰书、劾状，还有存档公文底稿及吏民买卖信贷契约等，对研究汉代文档制度、简册制度、边防设施、军事活动等，具有极高的科学、文物、历史价值。

②居延汉简著录书目

劳干《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1943年石印本；商务印书馆1949年铅印本。这两种版本共收简号约九千三百六十余个。劳氏考证按性质和用途分简牍为：书檄（1296枚）、封检（584枚）、刑讼（58枚）、符卷（24枚）、烽燧（258枚）、戍役（151枚）、病亡（35枚）、钱谷（1292枚）、器物（702枚）、车马（129枚）、酒食（50枚）、名籍（721枚）、资绩（46枚）、簿检（230枚）、计簿（8枚）、杂簿（157枚）、信札（338枚）、历谱（28枚）、律令（15枚）、小学（26枚）、诸子（7枚）、医方（4枚）、术数（10枚）、年号简（121枚），以及无简号者2809枚。1960年劳干在台湾出版了修订本，重分简牍为七大类计六十二项，体现了他多年来的研究新成果。1985年，台北简牍学社出版了劳干的学生马先醒先生等人补订的《居延汉简新编》，可资引证。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陈梦家主持整理《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此书是居延汉简早期的整理之作，虽然图片和简文不很全面，但对了解其概况仍有一定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上下两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该书是在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的基础上整理研究的成果，发表了这批简的全部照片和释文，并附有

中文的考古发掘报告，版图清晰、释文准确，是研究居延汉简最完整的一部资料。

谢桂华、李灼明、朱同绍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合校》是居延汉简释文的校本，虽然无图版，但它以《居延汉简甲乙编》为底本，在《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与《居延汉简甲乙编》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重新校订，纠正了原有版本存在的不少错误，并注明各版本的异文，对学术研究大有裨益。同时释文校注按编号排列，便于查阅，为研究居延汉简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台湾史语所的简牍整理小组《居延汉简补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九十九，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台北文渊企业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本书主体是根据从美国接收回来的居延汉简实物进行整理研究的成果，补充以前未收的简牍，特别是利用红外线摄影重新认清了模糊不清或表面已褪色的“空白简”上的字迹。在核对原简的基础上，对简牍进行整理：一是补充《居延汉简甲乙编》失照的图版；二是对原来误释和没有释文的简牍进行纠正或补充；三是补充《甲乙编》未曾收录的编号简和未有编号的简牍，使居延简更为完整。以上三书配套使用则甚好。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共同整理，由初师宾、张德芳等主编《居延新简》上下册，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此书按原简发掘出土单元、编号及排次排列，是对破城子等地新出土的19600多枚汉简的释文进行标点、诠释，同时对个别处作了修订，查阅非常方便，收入《中国简牍集成》第九——十二册，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中华书局1995年版。书中主要汇集了1972年至1982年间新发现的简牍8400余枚，内容包括官方文书簿册、私人信件、衣囊封检及各种书籍，从各个侧面和不同层面真实记录了汉代西北边陲的屯戍制度和生活风情，是重新认识、深入研究两汉历史的珍贵文献，对研究中外交通、丝绸之路和汉代文字均有极高价值。书中收集甲渠候官破城子和甲渠塞第四隧所出的全部简文和图版，图像文字清晰，查阅方便。而同时发掘的肩水金关出土的简牍11000多枚，至今尚未出版。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这虽是一个选本，但注释较好。

李振宏、孙英民《居延汉简人名编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版。本书以《甲乙编》、《新简》、《释文合校》的简文为依据，以帝王年号为序，以所考人物为线索，对两万多枚汉简进行集中、排比整理。认真考证，反复核对，考证出有确切年代的各类戍边人员 1400 余人以及相关的简文数千枚，使很多残简有了确切可信的年代。这本书虽然没有解决居延汉简编年中的全部疑难问题，但它的研究方法很值得重视：其一，它给人以系年研究简牍工作开创了一个新的范例，为解决简牍编年问题，找到一个新途径；其二，研究中发现了汉代屯戍制度的一些新问题，推进了研究的深入；其三，把众多的居延戍吏、戍卒的人名集中起来，对中国古代的姓氏研究，也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此书值得重视。

薛英群著《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此书对居延汉简中所涉及的年代、屯戍制度及戍卒人员等问题，进行总论分析。材料系统，观点新颖，是研究居延汉简的重要著作。

日本人永田英正《居延汉简研究》，同朋舍 1989 年版。此书提供了海外学者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情况。另有马衡《居延汉简考释两种》（载《考古通讯》，1957 年第 1 期）；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载《考古》1960 年第 4 期）、《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续）》（载《考古》1960 年第 10 期）、《居延汉简综论》、《居延汉简解要》、《居延汉简纪年》、《居延汉简编释文订误》；于豪亮《居延简校释》（载《考古》1964 年第 3 期）；吴昌廉《居延汉简中甲渠障塞所属的序号隧》（《劳贞一先生七秩荣庆论文集》，台北，P 335—350）及徐莘芳《居延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载《文物》1978 年第 1 期）等文章可参考。

（3）罗布淖尔汉简（亦称罗布泊汉简）

1930 年至 1934 年，中国考古学家、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黄文弼在罗布淖尔（亦称罗布泊）的默得沙尔防戍遗址里发现汉简 71 枚，这批汉简出土地点为居卢訾仓故址，属于西域都护，因靠近楼兰遗址，所以又可称它为楼兰汉简或西域汉简。据纪年汉简知，这批汉简大约为公元前 49 年至公元 8 年之物。内容以行政文书为主，亦有《论语》及汉律残简，是研究汉宣帝黄龙元年（前 49 年）至汉成帝绥和元年（前 8 年）汉代在西域活动情形的重要资料。后来又相继在额济纳河、吐鲁番城西二十里古交河城的雅尔岩、木札特河畔的拜城和色尔佛洞，得木牍十余枚。大者长八寸，宽 2 寸，小者长六寸，宽 2 寸，上端略窄，端有孔，两面有字，似梵文书。黄文弼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1948 年），对此事有记载。关于罗布淖尔汉简的释文，参见黄文弼《罗布淖尔汉简考释》，收入《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75—408 页。

(4) 悬泉汉简

① 发掘情况

悬泉汉简是指 1990 年至 1992 年间，甘肃省文物考古所在汉代敦煌郡悬泉置遗址所获得的 35000 多枚竹木简牍。悬泉置遗址在今甘肃省敦煌与安西县交界，地处戈壁高地，南依三危山，与疏勒河区汉长城烽燧相望，遗址面积二万二千五百平方米。悬泉水自其东南深谷崖壁流出。据发掘的简文知，内容多与邮驿有关，西汉时期此遗址名为“敦煌郡效谷悬泉置”。“置”为汉驿站的专名，东汉末称“邮”，唐以后改名为“驿”，是政府专门设置接待来往官吏和外国使者、传递官府文牒的邮驿机构。此简展示了汉代邮驿的面貌，对“置”的职能、管理组织和人员构成等都有明确记载。

② 内容与价值

悬泉汉简是当时边郡和内地有关活动的真实记录，年代从西汉武帝太始三年（前 92 年）到东汉永元十三年（101 年）。内容分为诏书、司法律令、官府文书、驿置簿籍、文化科技及其他杂类等，远远超过了居延、敦煌汉简的文化内涵。因居延、敦煌简主要记述了边塞的屯戍活动，而悬泉简则涉及边郡行政事务和地方邮驿业务以及与西域的往来关系。因为它的主要任务不仅要接待朝廷使者、郡太守、都尉、司马等高级军政长官，还要接待中原与西域往来的使者和官商，并传递上至朝廷、下至各官府的诏书公文，所以，它的发现特别重要。

另外，简牍还记载了大量的汉代敦煌郡宜禾都尉所属候官、候长、燧长和效谷县的乡、亭、里名称，为研究汉代地方行政组织和地理位置以及附近建“置”的邮驿系列，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 100 余件麻纸及纸文书向世人证明：纸在中国西汉时期已大量存在，并已用于书写。发现的《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是国内目前所见唯一保存较完整的壁书原件，具有很高的文物史料研究价值。出土的帛书信札，共 10 行，370 个字，是目前已知西汉时期最完整和文字最多的私人信件，这些均是研究汉代历史和丝绸之路的重要史料。总之，悬泉汉简的发现对研究汉廷与西域的关系、敦煌边塞军事机构、敦煌人口的性质和成分、农田水利建设和土地问题等，提供了新的资料。

悬泉汉简现保存于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其发掘情况，可参阅吴初骧的《敦煌悬泉汉代邮驿遗址的发掘与整理情况简介》。《文物》2000 年第 5 期公布了《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和《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但正式考古报告和全部简牍释文图版，尚在编校之中。

2. 汉墓简牍

从地点而言，基本出土于汉代墓室，范围极其广泛，遍于甘肃、山东、湖南、湖北、青海、江苏、河北、安徽、河南等区域。主要包括武威汉简、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简、江陵凤凰山汉简、定县汉简、阜阳汉简、上孙家寨汉简、张家山汉简、尹湾汉简、虎溪山汉简等十多处，这些汉简的内容，虽然有些属于先秦史料范畴，但大多数涉及或反映了汉代各方面情况，是研究汉代社会、历史、风俗、随葬制度等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十分珍贵。

(1) 武威汉简

武威汉简指从 1959 年至 1989 年在甘肃武威地区汉墓中陆续所发掘的竹木简牍。目前所知有：武威仪礼简、王杖十简、武威汉代医简、王杖诏令册、旱滩坡汉简等。

① 出土情况

1959 年，在武威市新华乡磨咀子 6 号东汉墓出土木简 480 枚，其中 469 简为儒家经典《仪礼》的原文，被称为《仪礼》简。《仪礼》简共计 27298 字，分甲、乙、丙三种本子，有 9 篇抄写于西汉末至王莽初。汉墓出土的《仪礼》与合传郑玄注本和贾公彦疏本不同，是目前所见《仪礼》的最古写本。这些简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甲本是七篇《仪礼》木简；乙本是一篇《服传》，它和甲本的《服传》是相同的钞本，只是木简稍短而狭，字小而密；丙本是抄在竹简上的《丧服》经。甲本共 378 枚简，存有七个篇名：《士相见》第三，计 16 枚简；《服传》第八，计 55 枚简；《特牧馈食》第十，计 49 枚简；《少牢馈食》第十一，计 45 枚简；《有司彻》第十二，计 73 枚简；《燕礼》第十三，计 39 枚简；《大射》第十四，计 101 枚简。其中只有《士相见》一篇保存完整，其余六篇均有损失，共约缺 40 余简。其他残简也为《仪礼》内容。甲、乙、丙三种《仪礼》共有九篇，总存字数约有 27400 余字，较之熹平石经七经残存的文字要多近 20000 字。另外，经考古学方法复原的《仪礼》简，对我们了解汉代编册书写格式提供了实物依据。这批木简的出土在文献学的研究上有着重大意义，它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汉代写本《仪礼》，还使我们看到了汉代所诵习经书的式样，对我们研究汉代的简册制度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考古》杂志 1960 年第 8 期发表了甘肃省博物馆撰写的《武威汉简在学术上的贡献》一文，全面介绍和论述了简本《仪礼》出土的意义和价值。

1959 年，武威磨咀子 18 号东汉墓又出土木简 10 枚，出土时简牍还缠在鸠杖上，被称为《王杖十简》。内容是汉代皇帝赐予墓主人年高的优待文书，对研究汉代“尊老”、“养老”制度及具体措施，有重大史料价值。

1972年，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木简96枚，其中有简札，也有板牍。主要内容是医药方技，其中比较完整的医方有30余个，如“治伤寒遂风方”、“治金创止痛方”、“治妇人膏药方”、“治百病膏药方”等，还有记录用针灸治疗的方法，内容相当丰富。这批医简是东汉医家手抄的一部医疗实践的经验总结，在临床医学方面，不仅有对疾病症状的描述和病名、病因、病理的记载，还有30多种各科治疗方剂。在药理学方面，列举了近100种药物，包括植物药63种，动物药12种，矿物药16种，其他药9种，对于这些药的炮制、剂型和用药方法，也都有较详尽的记录。这批医药简牍，部分地反映了近两千年前医药诊疗的科学水平，对研究我国古代的药理学、方剂学、治疗原则、用药剂量、调护工作、汉代药价等情况，特别是对探讨先秦和两汉时期我国医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981年，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木简26枚，内容主要是“王杖诏令书”，解决了“王杖十简”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释文与考释见武威县博物馆所撰《武威新出王杖诏令册》一文。

1984年，武威市韩佐乡红花村五坝山3号汉墓出土木简一枚，内容是有关冥间过所的问题。

1989年，旱滩坡汉墓又发掘出20多枚木简，称为旱滩坡汉简。内容主要是汉律文，对研究汉代法律制度提供了重要信息。

武威郡治在汉代的姑藏县，相对敦煌、居延、悬泉来说，地处内地，加上这些简又出自汉墓中，故内容与屯戍无关。

②著录书目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咀子六号汉墓》，载《考古》1960年第5期。该文介绍了磨咀子6号东汉墓出土的木简的情况。

甘肃省博物馆考古研究所编辑室《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王杖十简释文》，载《考古》1960年第9期。主要是对1959年磨咀子18号汉墓中《王杖十简》的释文介绍。

甘肃省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名发表的《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此书主要介绍1959年两批汉简的全部内容。

甘肃省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旱滩坡汉墓发掘简报——出土大批医药简牍》，载《文物》1973年第12期。主要是对1972年旱滩坡东汉墓出土的汉简发掘情况的介绍。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博物馆合编《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书中主要介绍旱滩坡汉墓医简的图版、释文、注释等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张延昌、朱建平二位则综合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编成《武威汉代

医简研究》(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6年版),这是我国首部有关汉代医简的研究专著,引起了海内外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可与《武威汉代医简》相互参证。

(2) 银雀山汉简

1972年,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对临沂市南银雀山上两座(1号、2号)西汉墓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出土竹木简4942枚,称之为银雀山汉简。这是继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出土490枚竹木简《仪礼》以后,又一批关于汉代书籍的竹木简,颇引人注目。其中除《孙子》、《六韬》、《尉缭子》、《管子》外,还有业已亡佚的《孙臆兵法》,为研究先秦时代兵家的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一点也反映了西汉时兵家很受重视。

① 出土情况.

1号墓出土的简大多是先秦古籍,分为现今还有的传本和古佚书两类,其中佚书数量较大,传世本包括:《孙子兵法》(即今《孙子兵法》13篇)以及4篇佚文;《六韬》14组;《尉缭子》5篇;《晏子》16章。古佚书类:《孙臆兵法》16篇;《守法守令十三篇》10篇;《论政论兵之类》50篇;《阴阳时令占候之类》12篇;《其他之类》13篇等。

2号墓出土的简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共32简。

从1、2号墓出土的钱币和2号墓的《元光元年历谱》推定,1号墓下葬年代在公元前140—前118年之间,2号墓下葬年代当在前134年—前118年之间。汉简字体属于早期隶书,汉简的书写年代当在西汉文帝、景帝和武帝初期这段时间内。

银雀山出土的《六韬》、《尉缭子》、《晏子》等书,证实了这些书西汉前期即已流传,竹简所记史实或与《史记》所记不同,作为独立来源讲是比《史记》更早的史料,所以竹简价值巨大。这些书籍在前面的战国史料部分已介绍过,此略,重点谈《元光元年历谱》。

《元光元年历谱》共有32简。简册完整,每简长69厘米,宽1厘米,厚0.2厘米,第一简记年,第二简记月,以十月为岁首,顺序排列至后九月,共十三个月。第三至三十二简记日,书每月一至三十日的干支,三十二简排列起来即为元光元年全年日历。还附记有腊、冬日至、夏日至、立春、立秋、初伏、中伏、后伏等节气,是当时的实用历谱,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据陈梦家的《汉简年历表叙》云,可推定的汉简历谱共十五件:“本始二年(前72年),本始四年(前70年),元康三年(前63年),神爵元年(前61年),神爵三年(前59年),五凤五年(前57年),永光五年(前39年),鸿嘉三年(前18年),永始四年(前13年),建平二年(前

5年),居摄元年(6年),居摄三年(8年),永元六年(94年),永元十七年(105年),永兴元年(153年)”。《元光元年历谱》(前134年)比《本始二年历谱》早六十余年。它所记的晦朔干支,订正了自宋代《资治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①有关汉简历谱的研究,参见赵荣琅和董作宾的《汉简历谱》,二文均载于《大陆杂志》1951年第2期。

总之,银雀山汉简的出土,对先秦、秦汉历史、哲学、古代兵法、古历法、古文字学、简册制度、书法艺术、古籍源流和校勘等方面研究,都是极其珍贵的资料。

②著录书目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全书分六个部分,对银雀山1、2号墓汉简的内容、形制、学术贡献做了概述。释文按原简顺序号排列,未经缀联、注释,对《元光元年历谱》进行了复原,附于书后。此书对了解银雀山汉简的丰富内容和原貌很有帮助。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全书对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汉简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分类,共分为3辑:第1辑包括《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及《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第2辑主要是佚书丛残;第3辑包括全部散碎竹简,篇题木版及《元光元年历谱》。每辑分图版、摹本及释文三部分,释文后附校注或简单注释(第3辑无摹本)。此书初稿整理编辑中有杨伯峻、刘起钎、商承祚、罗福颐、张政烺等著名学者参加,确保了质量,是银雀山汉简研究的最好参考书。

(3) 马王堆汉简

马王堆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汉代时是长沙国首府临湘县所在地。讹传五代十国时楚王马殷的墓地即在此地,所以有了马王堆这个地名。1972年和1973年分别对马王堆一号、三号汉墓进行了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竹木简牍,被称为马王堆汉简。

① 出土情况

1972年,湖南省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出大批随葬物品和312枚竹简,一号墓是软侯利仓夫人墓,其中出土的竹简是陪葬品的清单,称“遣策”。发掘情况参见《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出版社1972年版。

^① 清人汪日祺著《历代长术辑要》沿袭宋人的错误,近代陈垣先生著《二十史朔闰表》又承袭了汪日祺的失误,《元光元年历谱》的发现,使千年以来沿袭的谬误得到了纠正。

1973年12月，又在三号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和竹木简，其中“遣策”竹简410枚，竹木简医书200枚（三号墓主人可能是软侯利仓的儿子），从写有“十二年十二月己巳朔戊辰”等字样的木牍推定，该墓的下葬年代是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墓中帛书计28件，主要为《周易》、《春秋事语》、《战国策》、《老子》、《黄帝书》、《式法》、《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相马经》、《五十二病方》、《导引图》等，总计12万多字。三号墓还出土两卷医书简，一卷讲养生，内容与《黄帝内经》相似，一卷讲房中术。帛书已在春秋战国史料部分做过介绍，详细记载参阅《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1975年版。

一、三号墓出土的汉代竹木简，基本上是“遣策”，“遣策”就是坟墓内随葬品的清单或目录。《仪礼·既夕礼》中有“遣策”的记载：“书赠于方，若九、若七、若五，书遣于策。”意思是送给死者的物品“赠”，写在“方”上，可以写九行、七行或五行。因为“赠”是送给离开人世的死者的，所以又称“遣”，而将书写“赠”的方，连成一册，就成为“遣策”。

一号墓的“遣策”所列器物清单的大概顺序是：用漆木制九鼎、七鼎和三鼎、二鼎盛放的各种羹，用竹筍盛放的肉食品（包括禽、蛋和鱼类），用陶器盛放的酱和酒，用布囊盛放的粮食，以及漆木器具、梳妆用品、丝织衣物、乐器、扇、席和土质、木质的明器，但没有提到尸体的衣衾和相当数量的木俑。三号墓除大部分内容与1号墓相同外，还记有车骑、乐舞、童仆等侍从，包括所持仪仗、兵器和乐器等物。

遣策的主要作用，可以利用它同随葬品相对照，例如三号墓的遣策就能同出土的随葬物品、木俑和棺房两壁的帛画大体对照起来，也可以对有些不知为何物的葬品，根据遣策中所写名称，对照实物形制，确定它们的名称，从而对古代社会各方面情况，有更进一步了解。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遣策”，反映了汉代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同时为研究汉代的随葬制度及人们的鬼神观念和宗教意识提供了重要线索。

②著录书目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上、下），文物出版社1973年版。此书是一号汉墓的发掘报告，其中主要对“遣策”进行释文研究。

湖南省博物馆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发表《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4年第7期。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此书收集了1974年—1979年有关马王堆汉墓研究的部分文章或有关专著的个别篇章。按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把同一问题的论述排在一起，并对未选入本书的相关研究论文、介绍文章和

专著，列目附于其后，以供研究利用汉简者查阅参考。《马王堆汉墓研究》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对汉墓的研究状况。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马王堆汉墓帛书》，全书共4册，由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整理。此书对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进行了复原、整理、释文、注释，对研究帛书提供了方便。另外还有周一谋、肖佐桃主编《马王堆医书考注》（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魏启鹏《马王堆帛书·德行校释》（巴蜀书社1991年版）及魏启鹏、胡翔骅的《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二册，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等著作。

（4）江陵凤凰山汉简

湖北江陵县是楚国故都纪南城，在古城东南隅的凤凰山上有不少的汉墓，1973年从8、9、10号汉墓中共出土竹木简400余枚。其中8号墓出土竹简170枚；9号墓出土竹简80枚、木牍3支，主要为记载随葬品的“遣策”；10号出土竹简170枚、木简6支，主要记载了西汉初期赋税、田租、口算、户口、借贷、商业等方面的情况，是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直接史料，因而非常珍贵。1975年又分别从167号、168号汉墓中获得竹简共141枚。发掘者对遣策中器物名称和出土的实物作了细致的对照考释。168号墓出土竹简70余枚，据简文记载，墓主人名婴遂，生前为五大夫，下葬于西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年），比1972年发现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的女尸下葬时间还要早若干年，对研究汉初葬制有很大启示。

江陵凤凰山汉简的发掘及整理，参见其发掘简报，如下：（1）《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4年第6期；（2）《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5年第9期；（3）《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6年第10期。

（5）定县汉简

1973年在河北省定县八角廊村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发现了大批简牍，包括《论语》、《儒家者言》、《哀公问王义》、《保傅传》、《太公》、《文子》、《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和《日书·占卜》等。其中《六安王朝五凤二年正月起居记》主要记述了六安国繆王刘安到长安入朝的沿途生活和入朝的活动，尤详于沿途地名和相距里数，对研究汉代起居注记述及历史地理有重要参考价值。定州汉简的详细情况，参阅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和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载《文物》1981年第8期）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出版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6) 阜阳汉简

1977年安徽省阜阳市博物馆在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中发掘出大批竹简，因地点在阜阳，故称阜阳汉简。

① 出土情况

墓中同时出土的还有铜器、漆器、铁器、陶器等文物二百余件。根据出土器物上有“女（汝）阴侯”铭文及漆器铭文年纪最长为“十一年”等材料，确认墓主是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也有学者认为是夏侯大）。夏侯灶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之子，卒于文帝十五年（前165年）。因此，阜阳汉简的下限不得晚于这一年，大抵为汉初遗物，竹简出土于墓东边的箱内，出土时放在一漆竹筒内。

② 汉简内容

阜阳汉墓出土有竹简、木简和木牍，大部分非常破碎，但是它包含的内容却相当丰富，经过清理，发现有《诗经》、《周易》、《仓颉篇》、《年表》、《大事记》、《万物》、《作务员程》、《行气》、《相狗经》、《辞赋》、《刑法》、《日书》等。此外还出土了一些干支表残片。在这些古书中有关汉代或涉及汉代的内容不少。

《诗经》：整理出一百多个破碎的简片，包括今本《诗经·国风》中的近六十篇诗和《小雅》中的《鹿鸣》、《伐木》等，但遗憾的是已无一首完好者，有的仅存篇名。原简每诗皆有篇题和字数，如“《日月》九十六字”等等。某一《国风》之后又有尾题，如“右方”《北（邶）国》；“右方《郑国》”等等。《汉志》载《诗》有鲁（申培）、韩（婴）、齐（轅固）三家及毛传。清人陈桥樞《诗经四家异文考》云：“四家之诗，其始口相传授，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各有其乡音，故有同意而异字，同字而异音者。”今阜阳简《诗经》与上述四家又皆不同，有异文近百处，多为同音假借，也有异议的异文。这对于研究汉初语音和诗义很有价值。

《年表》、《大事记》：上起西周，下迄于汉。记周秦以来各国君王在位之年。此简残断尤甚，现存一百七十余片，绝大多数不相连属。表中王、公、侯、伯，多以溢号称谓，楚熊噩（鄂）、吴州于等称名。王、公、侯、伯之上皆未标国名，可能当初此卷简札右起第一只简专列国名，可惜已经看不到了。《大事记》仅存少量残简。

《万物》：共五十余条，这是阜阳简中较为完整的一部分。经学者们研究认为，此书成于春秋时代，内容属于本草类，纠正了人们一贯把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当作我国最早的药物学著作的认识。《汉志·方技略》有“神仙”十家，如《皇帝杂子十九家方》、《泰一杂子十五

家方》等。班固云：“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此类简或与神仙家著作相近。

《作务员程》：此类简近百片，也残破得相当厉害。主要内容有器物制造、建筑工程、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规格、标准，以及每人每天的工作量。劳动力有上工、中工、下工之分，工作量有夏日、春秋日、冬日之分，已相当精细。有些材料可与云梦秦简《秦律十八种·工人程》相互参证。云梦秦简《为吏之道》“除害于利”一节，有“作务员程”一语。作务，作业功绩之流；员程，计其人及日数为功程。此外还有一些度量制度的材料，可补文献之阙遗，可惜材料不多。

《行气》：这类竹简残存不多，内容主要讲行气的功能和方法。

《相狗经》：仅残存数条，讲狗的体态特征与善走的关系。《汉志·术语略》刑法家中有《相六畜》等书，此即其类。

《刑德》、《日书》：汉人十分迷信，言行举止，皆要避凶取吉。此类书即为当时必备的工具书，睡虎地秦墓、马王堆汉墓中均有出土。阜阳简中约有数百片。内容多为星相、天文与人间活动吉凶的关系。

阜阳简中还有《干支表》残片。《干支表》以朱线划栏，朱色绚丽，虽历经二千多年，乃十分耀眼。《干支表》可能是《日书》或《刑德》的附属。

③著录情况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县文化馆写的《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报道了墓葬情况和《诗经》、《仓颉篇》、《刑德》的部分照片，载《文物》1978年第8期。文物局文献室、阜阳地区博物馆组成的整理组写的《阜阳汉简简介》，对出土竹简的内容作了全面的介绍，载《文物》1983年第2期。阜阳汉简整理小组的《阜阳汉简〈万物〉释文》（载《文物》1988年第4期）和胡平生、韩志强合写的《〈万物〉略说》^①一文，比较详细地论述了《万物》篇出土的意义和价值。

(7) 上孙家寨汉简（又称金城汉简）

① 出土情况

1978年，青海省文物局考古工作队在大通县上孙家寨村西北发现了一片墓地，共发掘了178座汉墓，其中在115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简牍，因墓中出土的铜印上有阴刻篆文“马良私印”的字样，根据汉代墓内随葬名章

^① 《万物》篇，即1983年第2期《文物》杂志刊登的《阜阳汉简简介》中的第五种《杂方》类。

的习惯，知该墓墓主名为马良。在该墓出土器物中最有时代特征的五铢皆为武帝、昭帝、宣帝时的遗物，所以该墓葬的时代当为西汉晚期。该墓早年曾被盗掘过，因此出土的随葬器物不算很多，但在两棺之间却出土了一大批木简，共计有240枚之多。筒长25厘米，宽1厘米，厚0.2厘米。木简上的文字为墨迹隶体，每筒约有30—40字不等，出土时尚有400余片。根据出土木简的字体、内容，可将全部简文分作：1. 兵法类；2. 军法、法令、军爵类；3. 篇题目录。其中关于军队标志、旗帜的区别，与《尉繚子》内容相同，字句稍异。这批竹简的出土，对研究我国军事史、西汉军事制度以及当时中央政权在今青海地区屯戍情况，均有重要价值。

②著录情况

1981年第2期《文物》杂志刊登了由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写的《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详细介绍了该墓出土木简的情况。同期《文物》杂志还刊登了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和大通上孙家寨汉简整理小组共同整理的《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以及由朱国昭写的《上孙家寨木简初探》一文，对木简内容进行了初步的研究。199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由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上孙家寨汉晋墓》一书，书中较详细地介绍了115号汉墓的时代、形制以及出土文物的情况，并全部公布了该墓出土的木简照片及释文，可供参考。

(8) 张家山汉简

此简因发现于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而得名。

①出土情况

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三座西汉初期的古墓（247号，249号，258号）中，发现了大量竹简。其中247号墓出土竹简最多达1000多枚，大部分原贮于竹筒内，保存尚好，字迹明晰可辨。其他两墓所出比较少，残断也较厉害。这批竹简主要包括《汉律》、《奏讞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日书》、《历谱》及遣策等，内容主要以汉律为主，在数量上与睡虎地秦墓竹简相埒，是继秦律简后又一次重大发现。法律以外的各种内容，性质与马王堆银雀山等地所出佚籍近似，对研究汉代历史也相当重要。1988年，又在同地336号墓出土了一批竹简，汉律简数量不少，其中部分内容与247号墓相同。

②主要内容

为了对张家山汉简有更深入的了解，兹对竹简内容简单介绍如下：

《汉律》竹简五百余支，主要出土于247号墓，其第一支竹简背面有标题《二年律令》，同时又有《律令二十□种》、《律关津》等篇题。卷内每

一种律令都有题简，排在该律令之末，不与律文相连。这与睡虎地简秦律律名一般注在每条律文之末是不一样的。现知律令名称及其次第为：贼律、盗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收律、杂律、钱律、置吏律、均输律、传食律、田律、市律、行书律、复律、赐律、户律、效律、傅律、置后律、爵律、兴律、徭律、金布律、秩律、史律、津关令，共二十八种，内容十分丰富。与睡虎地竹简的《秦律十八种》对比，律名相同的有置吏律、传食律、田律、效律、徭律、金布律七种。也有近似和不相同的。这说明汉律是在李悝、商鞅六篇的基础上加以更改，再增加三篇，合为九章律。《二年律令》虽不是汉律的全部，但也反映了其主体，或至少有其一部分。内容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等许多方面，对汉代历史的研究将会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奏谏书》简约二百支，与汉律同出自 247 号墓，也是有关法律的重要文献。“谏”字，《说文》：“议罪也。”刑狱之事有疑上报称为“谏”，所以此字又训为请或疑。汉制，“县道官狱疑者，各谏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传所当比律令以闻”^①。竹简《奏谏书》正是这种议罪案例的汇集。另外，《奏谏书》中有史鳅、柳下惠判案的例证，说明汉代有时以《春秋》决狱，论事也常援引《春秋》经传的风气。

《盖庐》是一篇兵家著作，篇中阖庐只是提问，主要内容都是申胥（伍子胥）的话，因此实际上是记述申胥的军事思想。《盖庐》详论“用五行之道”、“用日月之道”。申胥谈到天时，强调“四时五行，以更相攻，天地为方圆，水火为阴阳，日月为刑德”等观念，其兵、阴阳家的倾向十分明显，与马王堆帛书各种有关佚书结合起来，对先秦至汉初兵、阴阳以及阴阳家思想的传统，可以达到较深入的认识。

《脉书》的内容，相当于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三种。据整理者认为帛书《五十二病方》卷前佚书实际是《足臂十一脉灸经》和《脉书》两种。这证明所谓《足臂十一脉灸经》确为与《阴阳十一脉灸经》不同的另一种书。竹简《脉书》比帛书还多一些文字，最重要的是有很多病名，依由头到足的次第叙述，其间也有属于全身的疾病。有不少病名，可以在帛书《五十二病方》里找到，足资比照。

《引书》是用文字讲述导引的专门著作。马王堆帛书中有《导引图》，被认为我国最早的健身图谱，在医学史、体育史上有很大意义。《引书》中详细描述了导引的各种单个动作，以及治疗诸般疾病的导引方法，对动作的

^① 班固：《汉书·刑法志》，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解说相当细致，可参看《导引图》，也可参考高大伦的《张家山汉简“引书”研究》，巴蜀书社1994年版。

《算数书》从形式看，与《九章算术》相似，也是一部数学问题集，其成书早于《九章算术》半个世纪以上，所以说它的出现是中国数学史的一个惊人发现。目前清理出的标题约有六十个，有些以算法为题，如《分乘》、《增减》、《相乘》、《分合》等；有些是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如《里田》、《税田》、《金贾（价）》、《程禾》等。因此，不仅对于数学史，而且对研究著述时的社会经济也很有意义。其释文公布于2000年第9期《文物》上。

《日书》出自249号墓中，原无标题，因其内容与睡虎地秦简《日书》大体相仿，即如此标题。阜阳双古堆竹简也有《日书》，可知西汉前期这种书是颇为流行的。

历谱出自247号和258号墓中，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历谱。据清理出的材料推算，247号墓的年代在吕后至文帝初年，258号墓则在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或稍后。

遣策属于247号墓，所记殉葬器物多可与墓中出土实物比对。

③著录情况

张家山汉墓竹简的情况，可参看荆州博物馆《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与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均见《文物》1985年第1期；江陵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的《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可资参考。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王贵元先生的《张家山汉简字词释读》，对《汉墓竹简》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商榷，纠正了其中的不足。江陵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的《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谏书〉释文》（一）、（二），分别在《文物》1993年第8期和1995年第3期发表。

另外，关于张家山汉简及《二年律令》问题，《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3期组织了一批笔谈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汉律价值进行探讨，推动了汉简的研究。主要文章有：李学勤《张家山汉简研究的几个问题》，高敏《漫谈〈张家山汉墓竹简〉的主要价值与作用》，李均明《〈二年律令·具律〉中应分出〈囚律〉条款》，谢桂华《〈二年律令〉所见汉初政治制度》，徐世虹《对汉代民法渊源的新认识》，彭浩《〈津关令〉的颁行年代与文书格式》等。

（9）尹湾汉简

尹湾汉简出自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的师饶墓中，墓位于连云港市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西南约2000米的高岭上。1993年在此共发掘汉墓6座，出

土了大量铜、铁、陶、骨角、漆木、玉、琉璃器和纺织品。二号墓中的缁绣衾被，大幅刺绣图案，纹饰独特，其中在6号墓中出土木牍24枚、竹简134支。经过整理和初步研究，这批简牍共计有17种，竹简有《神鸟赋》、《元延三年日书》、《刑德行时》、《行道吉凶》，木牍有《集簿》、《东海郡吏员簿》、《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东海郡下辖长吏不在署未到官者名籍》、《东海郡属吏设置簿》、《永始四年武库兵车器集簿》、《赠钱名籍》、《礼钱簿》、《神龟占·六甲占雨》、《博局占》、《元延元年历谱》、《元延三年历谱》、《君兄衣物疏》、《君兄缁方经中物疏》、《君兄节笥小物疏》以及名谒等等，文字近4万字。时代大约为西汉成帝时期。这批简牍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文书、遣策、历谱、日书等不同类别，反映了西汉末年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郡级行政文书档案。日书也和以往出土的日书不同，注出许多历史事件，用以证明自己的占算的准确性。其中元延三年（前10年）五月之历谱是我国迄今所发现最早的完整的日书。《神鸟赋》21支简，是一篇基本完整的创作于西汉时代的佚赋，全赋（连同残字）约有660字，讲述了一个生动完整的关于鸟的故事，风格独特，比《孔雀东南飞》早了200年以上。美食方详细记载了各种食物的选料和加工方法。此简不仅对我国秦汉史、古代文学史、古代术数史、书法艺术史、档案学、简帛学的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为研究汉代上计制度、行政建置、吏员设置、官吏迁除、国家盐铁生产、国家兵器制造与贮存以及户口、垦田等等，均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可以用来补充订正《汉书》、《后汉书》等史籍记载的缺漏和讹误，并据以判定前人有关研究的是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尹湾汉简得到了张政烺、饶宗颐、李学勤、裘锡圭等著名学者的高度评价，并被列为1995年度全国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藤昭宗主持了尹湾汉墓简牍的释文工作，在《尹湾汉墓简牍概述》（载《文物》1996年第8期）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出土简牍的内容及其价值。如《东海郡辖下长吏名籍》澄清了《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记载的缺漏错误，如《汉志》“倚下”注明“有铁官”应为“有盐官”之误。其他将“海西”误作“海曲”，“况其”误作“祝其”，“兰祺”误作“兰旗”，“南城”误作“南成”，“干乡”误作“于乡”，“曲平”乃“平曲”之误等。同时，根据《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可知东海郡设置有武库，亦可以补载籍之缺。此外，《集簿》将乡、里和亭、邮分别列项统计，说明乡里和亭邮属于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从而解决了史学界一直存在分歧的汉代乡亭里的统辖问题。对于东海郡的吏员设置，过去完全不了

解。《集簿》的吏员统计属于综合统计,《东海郡吏员簿》则属于分类明细统计,依次分别记载太守府、都尉府和各县、邑、侯国以及盐、铁官所辖各种吏员的统计。除了史书所载主管一乡事务的乡有秩外,还设有官有秩,主管县的某个部门的秩为百石的少吏。与此相对应,除乡啬夫和乡佐之外,还有官啬夫和官佐,其他如牢监、邮佐,也不见于文献记载,可补史籍之缺佚。由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中国文物研究所联合撰写的《尹湾汉墓简牍初探》(载《文物》1996年第10期)中,着重探讨了尹湾简的学术价值。199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牌图版、释文以及文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可供参考。1998年,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廖伯源先生的论著《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包括《汉代仕进制度新考》、《汉代郡县属吏制度补考》、《汉代地方官吏之籍贯限制补正》、《〈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释证》、《汉书敬丘侯国与瑕丘侯国辩》、《东海郡官文书杂考》等六篇论文,对汉代文书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另外,卜宪群^①、杨际平^②、周振鹤^③、谢桂华^④、于琨奇^⑤等学者关于尹湾简牍与汉代史研究方面的文章,也值得一读。

(10) 虎溪山汉简

此简因发现于湖南省沅陵县城关镇西的虎溪山一号汉墓而得名。1999年6—9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对其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共出土竹简1000余枚,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的数项空白。竹简的内容经初步的整理,主要可分为“黄簿”、“日书”和“美食方”三类。黄簿有170余枚,虽不全面,但记载了侯国向中央政府呈报的户口、田亩、赋税、牲畜、船只、武器等数据和分次调查统计的变化及变化的原因,侯国至相邻各郡县的距离,各乡至侯国的距离,特别是侯国至当时朝廷长安两条道路的水陆距离,详细注出水路及陆路里程。对研究汉前期侯国的户籍档案制度及汉代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材料。《日书》有800多枚,有“阎氏五胜”的篇题,内容有别于

① 卜宪群:《尹湾简牍与汉史研究》,载《光明日报》1999年4月2日。

② 杨际平:《汉代内郡的吏员构成与乡、亭、里关系——东海郡尹湾汉简研究》,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

③ 周振鹤:《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载《学术月刊》1997年第5期。

④ 谢桂华:《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载《文物》1997年第3期;《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

⑤ 于琨奇:《尹湾汉墓简牍与西汉官制探析》,载《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

睡虎地、放马滩秦简《日书》，记载许多秦末汉初的事件、人物，如“陈胜反攻秦”、“楚军项籍助赵”、“攻秦矩（巨）鹿章衔（邯）降项籍以八月西略秦”等。汉代日者很多，日书非常流行，此《日书》有可能为汉代改编过的情况；《美食方》亦即食谱大全，记载了饭菜的用料、制作方法，对食物熟煮火候也有很细致的规定，有“为中浆饭方”、“为中黄饭方”、“为稻黍方”、“大养茨酸羔方”等，以往传统古籍中对中国古代食物的制作流程均乏记载，《美食方》的出土填补了其不足，使汉代饮食文化及养生之道研究有了新的突破。“日书”简与“美食方”简同出于北边厢，出土时散乱于靠近内椁立板处，压在倾塌的椁盖板之下。整筒长 27 厘米、宽 0.8 厘米，两道编绳，简端齐平，书写或工整或行草。墓中同时还出土玉印章一枚，阴文篆刻“吴阳”二字，考古工作者据此推测一号墓主人为吴阳，为第一代沅陵侯，高后元年（前 187 年）受封，死于文帝后元二年（前 162 年），这应是这批竹简的时代下限。

简文内容及发掘情况参阅《沅陵虎溪山一号汉墓发掘简报》，载《文物》2003 年第 1 期。

（11）孔家坡汉简

2000 年 3 月，湖北省随州市北郊孔家坡 8 号汉墓出土了 785 枚简牍，其中算术简 703 枚，内容基本同于睡虎地、放马滩秦简《日书》，可以互相比勘；历谱简 78 枚；木牍 4 枚，其中 1 枚有字，可能是告地策。李学勤的《随州孔家坡 8 号墓的年代学问题》一文，根据木牍“二年正月壬子朔”的记载，论定墓葬时间应为淮南王刘长二年，即汉高祖十二年（前 195 年）。

汉简的具体内容见《随州孔家坡墓地出土简牍概述》^①。同时相关报道见晓林所撰的《“编钟故里”出土竹简七百余枚》^②和《“编钟故国”又有重要考古发现》^③一文，对三月十日湖北省随州市北郊孔家坡 8 号墓出土简牍数量（700 余枚）、内容作了介绍。

（12）其他简牍资料

除上述介绍的简牍以外，还有一些汉简值得重视：

长沙汉简：1951 年至 1952 年在湖南长沙徐家湾、杨家大山出土汉木牍 10 枚。参见《文物参考资料》1952 年第 2 期。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昌平于 2000 年 8 月 19—22 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新出土简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

^② 《中国文物报》第 48 期（总 817 期），2000 年 6 月 18 日。

^③ 晓林：《“编钟故里”出土竹简七百余枚》和《“编钟故国”又有重要考古发现》，载《光明日报》2000 年 7 月 14 日。

刘家渠汉简：1956年在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出土了2枚木简。《简报》见《考古通讯》1957年第4期。

云梦汉简：1972年在湖北云梦西汉墓出土木简1枚。《简报》见《文物》1973年第9期。

光化汉简：1973年在湖北光化县五座汉墓出土了30枚竹简。《简报》见《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海州汉简：共有三次发现：第一次，1962年在江苏连云港市海州汉墓出土木简2枚；^①第二次，1973年在江苏连云港市西汉霍贺墓出土木简7支；^②第三次，1973年在江苏连云港市海州西汉侍其繇墓出土木简2支。^③

盐城汉简：1963年在江苏盐城三洋墩发现汉木简1支。《简报》见《考古》1964年第8期。

此外，20世纪70年代在南方两处汉墓中也发现了一些木牍：1976年在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座西汉初期的墓中掘得大量文物，其中有木牍5枚，正背面皆是秦隶墨书，从内容看为遣策。1979年江苏邗江掘得西汉后期木牍16枚。由于木牍一般在北方不产竹的地方使用，南方发现的很少，所以显得极为宝贵。21世纪初，吉林省文物考古所在重庆云阳旧县遗址发现20余枚汉代简牍，这是首次在重庆地区发现的汉代简牍，为研究峡江地区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更直接的历史信息。

3. 缣帛资料

两汉以前包括两汉时期，人们书写的主要载体仍是竹简和缣帛。《太平御览》卷606引应劭《风俗通义》：“汉刘向为孝成皇帝点校书籍二十余年，皆先竹书，改易刊定，可缮写者以上素。”这里的素兼指洁白的竹简与缣帛。可见，西汉皇家校书，稿本只用竹简，定本才书写在竹素和缣帛上。东汉时，丝织品用作文献载体的数量也越大。《后汉书·儒林列传》载：“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两千余辆，自此以后，参（三）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籍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膝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载七十八乘。”^④这则史料告诉我们，东汉末“图书”主要是“缣帛”，由于离乱，毁坏得比较严重。20世纪汉代的缣帛有两次发现：

① 见《考古》1963年第6期。

② 见《考古》1974年第3期。

③ 见《考古》1975年第3期。

④ 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

(1) 1908年斯坦因在甘肃敦煌得帛书两件，为私人信函，虽没有注明日期，但据同时出土的文物考察，当是王莽天凤二年（15年）至刘秀建武中元元年（56年）之间的实物。具体内容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有叙述。

(2) 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26件帛书，共计12万余字。大部分用朱丝栏墨签书，字体有篆、隶两种，篆书写本约写于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左右，隶书写本约写于汉文帝初年。帛书内容涉及汉初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技等方面，学术价值很高。特别是《老子》的甲、乙写本及佚文，是研究儒家五行学说的汉初黄老思想的宝贵资料。另有关于阴阳、刑德之书以及中国现存的最早的地图等。^①

4. 简帛研究与综合论著书目

(1) 国内外研究状况

汉简的发现为汉代史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一个世纪以来，汉简的研究在大陆及港台地区不间断地进行着。在大陆，陈梦家、陈直、于豪亮等学者于简牍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其中陈梦家的《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于豪亮的《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和陈直的《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就是20世纪40年代之前简牍研究的总结性成果。其间重要论著还有贺昌群的《烽燧考》（《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陈邦福的《汉魏木简义证》，马衡的《汉兵物簿记略》，傅振伦的《道院简牍说》、《汉武年号延和说》，陈般的《汉简遗简偶述》、《汉简遗简偶述续稿》，黄文弼的《罗布淖尔考古记》，严耕望的《西汉郡县属吏考》及补证，夏鼐的《新获之敦煌汉简》等考证论文。这些研究成果，结合文献资料，深入探讨了汉代的边郡组织、防御系统、屯田状况、邮驿制度、烽燧制度以及戍卒的工作和生活等一系列问题，对汉魏政治制度、经济生活、社会文化、历史地理等的研究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极大地扩展了汉魏历史研究的内容。这些论著直到今天，对于简帛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与此同时，台湾学者继劳干之后，又有马先醒等一批学者，他们以《简牍学报》为阵地，进行学术研究。马先醒先生的《汉简与汉代城市》

^① 见《文物》1974年第7期、第9期和1975年第2期相关文章。

(分上、中、下三卷)^①、《简牍论集》^② 以及《居延汉简新编》^③ 等，都是高水平的研究著作。

香港的简牍研究以饶宗颐先生为代表，他在利用简帛资料研究社会风俗和宗教方面，有许多独到之处。他的著作主要有《云梦秦简日书研究》^④、《敦煌汉简编年考证》^⑤ 等。

从 80 年代开始，介绍简牍的一般知识和简牍的整理、研究情况的普及性读物陆续出现，如林剑鸣的《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郑有国的《中国简牍学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和高敏的《简牍研究入门》（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这些著作对初学者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秦汉史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和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秘书处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通讯特辑》（总第 12 期，1986 年版）也是简牍研究专辑。为了进一步推动简牍研究、加强中外学术交流，在谢桂华先生的组织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和第二辑，^⑥ 有计划地选译国外有参考价值的论文，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简牍研究动态、借鉴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便利。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从 1993 年开始，先后创办了《简帛研究》和《简帛研究译丛》两个不定期刊物，对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的学术交流起到了很好的联络作用。到目前为止，这两个刊物的出版情况如下：李学勤、林剑鸣、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第一辑、第二辑；^⑦ 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谢桂华、陈松长、刘乐贤主编《简帛研究译丛》第一辑、第二辑；^⑧ 李学勤、谢桂华主编《简帛研究二〇〇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2）综合论著介绍

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 1980 年版。此书是陈梦家先生对武威

① 马先醒：《汉简与汉代城市》，简牍社丛书之一，台北简牍学社 1976 年版。

② 马先醒：《简牍论集》，台北简牍学社 1977 年版。

③ 马先醒：《居延汉简新编》，台北简牍学社 1981 年版。

④ 饶宗颐、曾宪通合著：《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⑤ 饶宗颐、李均明合著：《敦煌汉简编年考证》，见“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5 年版。

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 1 辑，1983 年；第 2 辑，1987 年。

⑦ 法律出版社，第 1 辑，1993 年；第 2 辑，1996 年。

⑧ 湖南人民出版社，第 1 辑，1996 年；第 2 辑，1998 年。

汉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酒泉和罗布淖尔汉简整理研究汉代西北边塞历史状况的专著。内容包括：汉简考述；汉简所见居延边塞和边御组织；汉简所见太守、都尉二府属吏；汉简都尉考；汉简所见奉例；关于大小石斛；汉代烽燧制度；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汉武边塞考略；汉居延考；汉简年历表叙；西汉施行诏书目录；武威汉简补述；由实物所见汉代简册制度等十五个专题论文。从篇目内容看，主要是依据居延汉简的出土地点，结合遗址情况和简的年代，考察汉代边塞的烽燧制度和相关问题，是汉简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

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此书是陈直在《西汉屯戍研究》^①的基础上，对居延汉简研究的新成果。全书因事命篇，钩稽贯串，与汉代流传的古籍互相印证，对全部简文一一探索，是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研究的重要著作。

林剑鸣《简牍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全书共有十四个部分，前言介绍了简牍的含义及写作目的，第一章至第十一章正文部分重点阐述了简牍的出土历史、形式、名称和分类，书后附有“基本资料目录”，包括原始资料、发掘简报及1983年之前简牍方面的研究论文，是学习、研究简牍的最好入门著作。

《中国简牍集成》（标注本，12册），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版。共三辑23册。本书以图文形式囊括了20世纪一百年间甘肃、内蒙古、湖南、湖北、山东、安徽、河北、江苏、四川、青海、新疆等省区发掘出土并已发表的全部简牍，是目前集简牍资料集大成的巨编。内容涉及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中西交通、社会习俗、边塞屯戍等各个方面。此书主编、分卷主编都是研究汉简的专家学者，不仅确保了质量，而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科研和学术价值。全书第一辑12册已经出版，其余各册也将陆续问世。第一、二册为简牍图版选录，后附有全国出土简牍一览表；第三、四册为甘肃省卷，主要是敦煌汉简和酒泉汉简；第五、六、七、八册为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卷（居延汉简）一、二、三、四，后附有居延汉简出土图及额济纳河流域汉塞分布图；第九、十、十一、十二册为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卷（居延新简）一、二、三、四部分，附有居延新简遗址发掘复原图和甲渠遗址复原图。此书不仅登录全面，而且对全书文字进行整理、校补、标点和注译，尤其对历史时期的特定专用词汇、文例以及口语文字进行考证性解释，增加了简牍资料的使用价值。

^① 陈直：《西汉屯戍研究》，《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李均明、何双全辑《散见简牍合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此书对散见于各处的简牍进行整理，编辑于一书，对研究引用汉简的学者有一定的意义。

王震亚撰《竹木春秋》，甘肃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此书主要以甘肃出土的秦汉简牍为基本材料，对简牍源流及其历史文化价值和汉简中所反映的各方面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资料翔实，论述有据，是秦汉简牍研究的最新成果。

朱渊清撰《中国出土文献与传统学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本书回顾了中国出土文献的发现历程，着重在第七、八、九章介绍了轰动世界的银雀山、马王堆、郭店等几种简牍的发现及研究情况；并于第六章介绍了直到2000年10月为止的有关出土文献的最新信息，书前有彩色插图，书后附有“新出土简帛书籍概览表”，检阅方便，可资参考。

骈宇騫、段世安撰《本世纪以来出土简帛概述》（资料篇·论著目录篇），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此书系统介绍了20世纪以来简帛的出土情况及意义。

陈伟武《简帛兵学文献探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李玉《秦汉简帛书音韵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余忠鑫《汉简历考》，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陈直《汉代木简考略》，摹庐丛著之一，石印本一册，1934年；王梦鸥《汉简文字类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汉简进行了研究。

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此书是迄今为止全面介绍从1901年汉晋木简的出土到2002年湖北里耶秦简的发现，中国简帛学百年发展里程的第一本著作。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建立起中国简帛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并试图对百年来中国简帛学界的研究成果作全面清理、总结和评价，对简帛学的发展无疑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书中几乎吸收了截止2003年上半年以前的所有研究成果，这就使得它比同类的通论性论著在内容上更为完整。书后附录中有《简帛学论著目录（1998—2003）》，弥补了目前简帛学研究目录仅编至1997年的欠缺。

除以上著作和专门研究刊物外，《考古》、《文物》、《考古学报》、《考古与文物》、《华夏考古》、《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简牍篇二、三”（吴昌廉主编，台北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编辑委员会，1986年版），各博物馆刊等也相继登载过大量有关简牍的文章。如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辑的《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辑的《秦汉简牍

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汇编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对研究者而言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图像资料室开发的《简帛金石资料库》,是目前较完备的简帛资料数据库。此库收集了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日本的40余种资料,包括了已经整理出版的先秦至魏晋的简牍、帛书、碑刻、官印、镜铭等,还收录了相关的书目、索引等,总字数达3401684字,内容极为丰富,既包括《睡虎地秦墓竹简》、《居延汉简甲乙编》、《居延新简》、《敦煌汉简》等大型报告,也包括了近年来散见于各种文物考古刊物中有关新出土的张家山汉简、尹湾汉简的部分释文,还有大陆学者难得一见的《两汉镜铭集录》等内容。此数据库可进行全文和目录复合检索。目前大陆学者使用虽有些障碍,但一旦能够利用,将会便利无穷。

5. 简帛的价值

竹简木牍是中国古代纸张发明以前最主要的书写材料,百余年来,中国西北地区汉晋烽燧遗址或各地战国秦汉墓葬出土大量的简牍,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提供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科技、法律、宗教等第一手的丰富可靠资料。这些汉代边塞地区及各地汉墓中出土的简牍文书,直接、生动地记录了西汉中晚期到东汉初期,当地军民之军事、法律、教育、经济、信仰以及日常生活的情形,举凡汉代的吏制、养老、抚恤、秩奉、农垦屯田、货算、上计、边塞防御、算数、历法等问题,均可从所藏简牍得到深具价值的研究素材。其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证实了一些有疑义的历史事实。如同甲骨文、金文印证商周史一样,简帛对于证实秦汉魏晋史同样意义重大。如陈直的《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就是运用简帛、石刻、铜器、陶器铭文印证司马迁、班固之记载的真实性与否,取得了较以往单纯以文献证文献的训诂方法所无法比拟的成就。历史上许多有疑义的问题,由于简帛资料的出土而使其真相大白。如秦汉之际的楚爵问题,文献上虽有记载但语焉不详,江陵汉简《奏谏书》的公布确证了楚爵制在秦汉之际的确实行过。又比如人们一向认为《神农本草经》是我国最早的药理学著作,成书时间在南北朝以后,但近年来在阜阳发现的那批汉简中又发现了《万物》一书,经学者研究确定,此书成于春秋时代,其内容同样属于本草类。再如在银雀山一号汉墓掘得的《孙臯兵法》,已失传了两千多年,虽然一些古书上记载有此书之名,因为谁也未见到过,所以不少学者曾怀疑其真伪,甚至有些学者否认其存在。现在在汉墓中发现了实物,疑团自然消失了。

其次，汉墓出土的简牍有的可补正史之缺漏。例如关于秦汉边郡的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西北简提供了文献所无法比拟的材料。劳干、陈直、陈梦家等学者的研究揭示了边郡行政组织的特殊性以及防御系统、屯田、烽燧、戍卒等问题的基本情况，特别是陈梦家的《汉简缀述》一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尹湾汉简则又提供了汉帝国内郡的行政、军事组织的基本情况，二者相互参照，可以对汉代政治结构有更清楚的了解。又如文书制度和职官制度，过去只能依据文献进行研究，所知有限。简帛提供了包括诏书在内的各级上行、下行、平行文书，提供了为文献所少载、缺载的各级低级行政吏员官名。正因为此，关于汉代的文书研究才成为可能，汉代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才可能出现新的生机。简帛为法制史研究补充了极为重要的材料。以秦汉为例，文献所载法律内容较为简略，如除了知道秦律残暴外，具体条文所知甚少；汉律也是如此，如大家根据汉初实际，对黄老政治、施德缓刑的推行有疑义，但亦缺乏证据。历代学者对秦汉律的研究，如程树德的《九朝律考》等也是从文献到文献。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西北简的出土，使秦律研究不再限于描述性的语言，也证明了汉初法律更多直接继承秦律的历史事实，认识到汉初法律的“宽松”是有限的，而对秦汉法律程序、名词的分析研究也有了更多具体案例佐证，同时也提供了汉代书法艺术研究宝贵的资料。

再次，简帛材料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汉代公文文书研究是目前秦汉史研究中的前沿课题之一，这一课题的形成可以说是简帛材料出土之后的事。关于汉代邮传制度研究以往也未予重视，简帛中的大量材料直接推动了这一课题的形成，随着悬泉置汉简的公布，研究将更加深入。其他如日书研究、边郡地区社会生活与文化研究、汉代不同地区的经济与物价比较研究等也因简帛材料的出现而出现。在古医学、科技史、古文字等领域中，简帛所带来的新课题同样不胜枚举。1979年、1989年，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向学术界贡献了《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①、《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②，后者是研究尹湾汉墓简牍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全书5卷，主题为：“汉代仕进制度新考”；“汉代郡县属吏制度补考”；“汉代地方官吏之籍贯限制补证”；“《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释证”；“杂考”。考论严

^① 廖伯源：《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台北商务印书馆1998年5月版。此书是一部论文集，所收论文6篇，如《西汉皇宫宿卫警备杂考》、《汉代监军制度试释》、《东汉将军制度之演变》等。

^② 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

谨、结论信实，体现出一种良好的学术作风。还有其他一些著作和论文，对汉代皇宫的宿卫警备、监军制度、将军制度、爵邑制度、乡里制度等，做了进一步更细的探索。

最后，简帛材料拓宽了秦汉史研究的视野。历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往往同材料与方法的运用密切相关。但二者又不是截然分开的，新材料能激发新方法的援引，新方法又可以使新材料（当然也包括旧材料）得到更高层次上的解释。就秦汉史的研究来说，可以作为信史的材料十分有限，因此简帛的出土，丰富了史料的内容，使这段历史的研究视野大大拓宽，整体水平提高。但必须看到，20世纪简帛学所取得的成就，又与20世纪史学理论、方法的发展与进步不可分离。特别是唯物史观的方法被中国史学家接受以后，不仅给简帛学带来了新的生机，使简帛资料不再局限于一般史实考证的层面上，也使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结合得到更深层次的检验与佐证。特别是80年代以后，史学方法的多样化，史学研究角度的多样化，为简帛材料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简帛材料深层次的挖掘与利用，将随着史学家对客观历史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深化，也将随着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而愈益显得丰富多彩。

关于简牍文字的价值，可参阅方孝坤《简牍文字的文化价值》一文，载《丝绸之路》1999年11月。

（二）石刻文字与图像数据资料

石刻文字是汉代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近几十年考古研究表明，汉代石刻文字留存较多，而且十分重要。尤其是东汉时期的石刻文字，史料价值更为珍贵。东汉的石刻文字主要有碑刻、摩崖、石阙、画像、石砖等几大类型，其中碑刻和摩崖比重最大。

1. 碑刻文字

碑刻实指碑碣墓志。碑碣本是用来记功或悼念死者的，立在地面上叫“碑碣”（方曰碑，圆曰碣），葬在坟墓中叫“墓志”。现存最早的墓志是东汉殇帝、桓帝时的遗物。^① 西汉碑刻无一物存世，这一情况与当时的风俗有一定关系。墓前、庙前树碑，是东汉人的习俗，西汉末期虽已出现了一些坟坛、祠堂神位等丧葬用的石刻，但不能算做真正意义上的碑刻，所以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说：“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② 他的《集古录》中没有收入任何西汉石刻文字，赵明诚《金石录》

^①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② 欧阳修：《集古录》，《石刻史料新编》第2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版。

中也仅收入上谷府卿坟坛、祝其卿坟坛等几种西汉石刻，不仅文字少，内容也简单，不能反映当时的重要史实。东汉的碑刻留存较多，《水经注》中共记录有百余座。《隶释》中收录汉碑文 115 件。据统计，有明确记年的东汉碑刻有 160 余品，其中属桓帝年间刻制者 59 件，灵帝年间刻制者 76 件，占了绝大多数。前人据此判断桓、灵年间为东汉碑刻最盛的时期。这一时期正是东汉社会危机四伏、外戚宦官之愈演愈烈、世家大族兴起、党锢之禁屡兴的时期。当时的碑刻中，门生故吏为其府主歌功颂德，尊崇儒教，宣扬礼义的碑文占了较大比例。表现出当时儒学盛行，门生故吏党附成风的社会现状。如立于东汉延熹七年（164 年）七月的《孔宙碑》，碑阴部分刻为孔宙采嘉石立碑的门人故吏姓名，总计门生 43 人，故吏 9 人，弟子 10 人。

现存汉碑绝大部分为传世品，主要保存在陕西西安碑林，山东曲阜孔庙，泰安岱庙，济宁市教育局，河南安阳、偃师、南阳等地文博部门。其中著名的墓碑有：中平二年《曹全碑》、永元四年《袁安碑》、元初四年《袁敞碑》、建宁元年《衡方碑》、中平三年《张迁碑》、永康元年《武荣碑》、熹平二年《鲁峻碑》、永兴元年《乙瑛碑》、永寿二年《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延熹七年《孔宙碑》及《王孝渊碑》、《景君碑》、《鲜于璜碑》、《夏承碑》、《孔彪碑》、《韩仁碑》、《尹宙碑》、《赵宽碑》、《魏元丕碑》等。庙碑有：《仓颉庙碑》、《西岳华山庙碑》、《白石神君碑》、《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碑》、《准源庙碑》、《宛令李孟初神祠碑》、《桐柏淮源庙碑》等珍品。这些碑的碑志部分详细地记载了死者姓氏、籍贯、家族、世系、官职升迁、生平事迹、卒葬年代等，对研究东汉历史及补正史实有着重要作用，有的碑文内容相当珍贵。下面重点介绍几块碑文。

(1) 《乙瑛碑》。刊立于东汉永兴元年（153 年），现藏山东曲阜孔庙，全称《汉鲁相乙瑛置百石卒史碑》，也称《汉鲁相请置百石卒史碑》。碑高为 183 厘米，宽 83 厘米，碑面刻文 18 行，每行 40 字，碑文实际由 3 件汉代公文和一篇颂词组成，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是珍贵的汉代公文资料。第一行到第九行是一件公文，是司徒、司空转奏鲁国相乙瑛的文书，请求皇帝批准设置百石卒史，为孔子“典主守庙”。第二件文书是司徒、司空下发鲁相的公文，告知设官一事已获皇帝批准，让挑选一位 40 岁以上，至少能通一艺者充任百石卒史。第三件文书为鲁相上报司空府的公文，汇报已由孔和任百石卒史。最后为颂扬鲁国前相乙瑛的文章。劳干的《孔庙百石卒史碑考》一文，^① 对此碑做了详细考证。

^① 劳干：《孔庙百石卒史碑考》，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2 年第 34 本上册。

(2) 《裴岑纪功碑》。刊立于东汉顺帝永和二年(137年),清雍正七年(1729年)岳钟琪得此碑,后移存新疆巴里坤(今伊犁哈萨克自治县)关帝庙前。此碑上锐下宽,远望如同石人,所以当地人称它“石人子”。内容记述敦煌太守裴岑带领3000人征讨呼衍王,为平定西域、保卫边疆作出贡献。《汉书》未记载此事,可补史缺,有重要价值。

在近50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出现了一些前人未见的碑石,对于古代石刻与考古学研究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新出土的比较重要的东汉碑石有河南偃师出土的侍廷里父老买田约束石券,河南南阳出土的张景造土牛碑,偃师出土的汉肥致碑,天津出土的鲜于璜碑,四川郫县出土的犀浦簿书残碑、四川昭觉出土的五曹诏书碑,山东平度出土的汉王舍人碑等,这些碑都具有重要的历史资料价值。

(3) 《侍廷里父老买田约束石券》。刊立于东汉建初二年(77年),1973年在河南偃师出土。现存碑文12行,213字,其中记载:东汉永平十五年(72年),侍廷里的父老25人组成一个叫作“父老俾”的互助团体,共聚集61500钱作为基金,购买了82亩土地,将这块土地借给担任里父老的人,以出产的收入作为担任里父老的经费,当此人不再担任里父老后,就将这块地转给下一位担任里父老的人使用。成员的权益,在其死后可以由子孙一个人来继承。这件石刻是比较罕见的汉代社会实用石刻,记录的社会基层生活状况可以补充古代文献的不足。它对于了解汉代民间社会中残存的原始公社制度,进而了解中国古代社会中生产关系的演化过程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详细情况参考黄土斌的《河南偃师县发现汉代买田约束石券》^①。

(4) 《鲜于璜碑》。此碑刊立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年),1973年出土于天津武清县兰城村,是东汉考古中的重大发现,也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汉碑。碑通高242厘米,宽81厘米,厚12厘米,圭首,上部中央有碑穿,碑上装饰有青龙、白虎、朱雀与云纹等图案,雕刻得十分精致,书体整齐秀美,具有典型的特征,是汉隶中别具一格的作品,墓主鲜于璜,出生于北方大族,由上郡王府察孝拜为郎中,累迁至雁门太守。此碑是门人故吏为鲜于璜树立的颂功墓碑,碑文中记录了大量重要史料,极富参考价值。碑现存天津历史博物馆。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有《武清东汉鲜于璜墓》一文。^②

(5) 《张景造土牛碑》。刊立于东汉延熹二年(159年),1958年在河南南阳出土。此碑碑身四周皆残,碑首可隐约见到碑穿痕迹。现存125厘米

^① 黄土斌:《河南偃师县发现汉代买田约束石券》,载《文物》1982年第12期。

^②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考古队:《武清东汉鲜于璜墓》,载《考古学报》1982年第3期。

高，54厘米宽的一段碑身，碑上有隶书文字12行，共229字。全文是有关官府允许张景包修祭祀用的劝农土牛、土人等偶像，从而免除其世代劳役的一组文书。现藏南阳汉碑亭，郑杰祥有《南阳新出土的东汉张景造土牛碑》一文。^①

(6) 汉代王孝渊残石碑。1966年，在四川郫县出土了两件被后人改作他用的汉代残石刻，一件是东汉永建三年（128年）的王孝渊碑。碑的正面记录的是一批家庭资产，包括田地、奴婢、牛等，并注明其价值。这是古代被称为“资簿”的文书记录，汉代的文书账簿出现在石刻中，这还是首次。关于此碑的情况详见谢雁翔的《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一文。^②

(7) “五曹诏书”残碑。1983年，在四川省昭觉县出土。现存文字约400字，碑文内容是东汉光和四年（181年）领方右户曹史张湛任命冯佑为安乡有秩，并且免除了该地上诸、安乡二乡赋税的文书公告，对于了解汉代官司行政制度与文书情况具有参考价值。

近年来在内蒙古包头市南郊的召湾村91号汉墓出土了一件内容比较完整的汉代墓碑。墓碑已经残损，共有3块残石。第一块存9行，90余字；第二块存3行，可辨识5字；第三块存2行，可辨识4字。据残留的纪年，该碑石刻于东汉建宁三年（170年）十一月。这是在内蒙古发现的首件较完整的汉碑，意义十分重大。魏坚所著的《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对此碑有详细介绍。^③

2. 摩崖石刻文字

摩崖刻石可以说肇始于西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6年）所刻的《群臣上寿石》，已属摩崖的范畴，但西汉摩崖还是偶然为之。摩崖形成气候是在东汉，与立碑的兴起和鼎盛同步。东汉时期的摩崖石刻很多，著名的有保存至今的褒斜道石刻，位于陕西省汉中市褒城镇石门。集中在这一带的石刻共45种，属于东汉的有永平六年汉中太守钜鹿《郾君开通褒斜道碑》、建和二年《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即著名的《石门颂》）、永寿元年《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摩崖》、《杨淮、杨弼表记摩崖》、汉隶大字《“石虎”摩崖》、汉隶大字《“石门”摩崖》、汉隶大字《“玉盆”摩崖》、汉隶大字《“袞雪”摩崖》等，这些石刻都是在路旁崖壁上略加修整后刻写的。书体雄健浑厚，是汉隶佳作。1970年因修褒河水库，已将这批石刻移至汉中市

① 郑杰祥：《南阳新出土的东汉张景造土牛碑》，载《文物》1963年第11期。

② 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载《文物》1974年第3期。

③ 魏坚：《内蒙古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汉台陈列。这些石刻的内容大多是开凿褒斜道过程中的颂功记事文字。

(1)《郾君开通褒斜道碑》，刻于东汉明帝永平六年（63年）至九年（66年），全称是《汉中太守鉅鹿君开通褒斜道碑》。它为褒斜道最早的摩崖，也是汉代实物仍存的第一处摩崖。刻文主要是记述陕西汉中太守郾君受皇帝诏命承担修整汉中褒谷郾綽南斜古栈道的情况，并详细记载工匠全为广汉、蜀郡、巴郡征调的刑徒，共计2690人。文中有“作桥格六百二十三间，大桥五，为道二百五十八里”的记载。所谓桥格，就是栈道、栈阁，在258里栈道上还设有邮亭、驿置等64所。这种摩崖是研究我国栈道史的重要材料。

(2)《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又称《杨君石门颂》，凿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是汉中太守王升为东汉顺帝初年的司隶校尉杨孟文所撰写的一篇歌颂之词。高327厘米，宽254厘米，隶额“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10字。刻文叙述杨孟文在栈道损毁后，数次上奏，请求修复，终于得到皇帝同意，重修栈道。后面还附一篇铭文，赞颂杨君的功德和坚忍不拔的精神。

(3)《西狭颂》，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凿于建宁四年（171年）。在甘肃成县天井山，是一处著名的东汉摩崖，高160厘米，宽157厘米。刻文主要记述故吏因太守为政有方，勤政爱民，亲自勘察修通险路，所以刊石立碑颂扬其德。

(4)《刘平国治路颂》，亦称《刘平国碑》，凿于东汉永寿四年（158年）。在新疆拜城东北喀拉克达格山崖壁，刻文记述当时的龟兹将军刘平国主持修治了道路，其部下就写了一篇颂扬文章勒于山岩。

以上摩崖石刻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散见于各种学术刊物上的碑刻摩崖研究文章，也值得重视。如马衡《汉司空袁敞碑跋》（《北京大学国学周刊》第1卷第2期），吴其昌《汉敦煌太守裴岑破北匈奴纪功碑跋尾》（《国学季刊》第2卷第2期，1929年），《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东乌累关城制亭诵跋尾》（《清华周刊》第37卷第4期，1932年）。后两篇文章，是较早注意新疆的汉代碑刻并进行有关历史考证的作品，文章结合铭文，对汉代北匈奴的活动情况和汉王朝攻击匈奴的政策作了分析。马雍《新疆巴里坤、哈密汉唐石刻丛考》（《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集释考订》（《文物集刊》第2辑，1980年）。这两篇文章，将东汉永元五年（93年）任尚碑、永和二年（137年）裴岑碑、永和五年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等东汉石刻予以文字考证与历史研究，纠正了前人认识不清的地方，并且结合碑石，对东汉时期北匈奴与汉朝的战

争情况作了详细的讨论。马雍《东汉“曹全碑”中有关西域的重要材料》（《文史》第12辑，1981年），就碑中有关汉军攻击西域疏勒国的战役情况作了研究，指出国外认为东汉中期以后贵霜王国扩张到葱岭以东，汉朝对西域失去控制的说法是错误的。冯国瑞《东都新发现东汉灵帝光和三年护羌校尉赵宽碑考证》（《西北论衡》第10卷第7期，1942年），王献堂《新出汉三老赵宽碑考释》（《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1943年），此二文证实东汉王朝对西域的统治一直维持到灵帝时期。黄盛璋《褒斜道与石门石刻》（载《文物》1963年第2期），王景元《浅谈石门摩崖石刻的传播》（载《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1期），张仁镜《试论石门摩崖研究的历史意义》（载《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1期），舟子《羊祉与“石门铭”初考三题》（载《文博》1989年第3期）。这几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开凿石门的史功绩，石门的开凿时间，石门题记的书法价值，以及蜀道问题作了探讨，在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特别是古代交通的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

3. 石阙、黄肠石文字

石阙是东汉魏晋特有的一种石制建筑，大型石阙上往往雕刻画像，附有文字题记。现存汉阙中基本完整的有25座，主要留存于四川、河南、山东等地。其中著名的如河南登封县太室、少室、启母三阙，四川雅安县高颐阙，渠县冯焕、沈府君二阙，锦阳县平阳府君阙等。这些石阙上的文字，是研究东汉陵庙制度及建筑的重要资料。河南省博物馆编写有《中岳汉三阙》，四川编写有《四川的汉阙》，文物出版社1992年出版。还有，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北京西郊发现汉代石阙情况简报》^①；吉木布初、关荣华的《四川昭觉县发现东汉石表和石阙残石》^②，都可供参考。

黄肠石，是指汉代构筑大型陵墓使用的石料。这些石料上往往有刻写或墨书的文字。内容主要是记录工匠的名字、籍贯、石料的编号等，虽然简略，却对于认识汉代陵墓建筑情况与确定陵墓的时代、主人等重大问题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因此，在清代就已经有金石学者注意到它。20世纪中，在一些考古调查与发掘中，曾经发现汉代的各种黄肠石刻。其中年代最早的可能是徐州龟山西汉楚王陵室石上的刻铭，而数量尤为突出的是近年在河南永城县芒砀山西汉梁国王陵出土的一批石刻。研究成果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①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发现汉代石阙情况简报》，载《文物》1964年第11期。

② 吉木布初、关荣华：《四川昭觉县发现东汉石表和石阙残石》，载《考古》1987年第5期。

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①。

4. 画像石与画像砖

除了上述简牍文书及石刻文字外，画像石与画像砖是现今两汉史学研究中相当重要的图像数据。清末以来在山东地区（含苏北的徐州），河南地区（以南阳为主，含湖北北部地区），四川地区的成都、重庆等地，陕北地区的榆林、绥德、米脂等地，大量出土刻绘图像之石砖构造的汉代墓葬、祠堂、墓阙等建筑遗存。河南地区的洛阳、新郑、南阳等地，四川地区的成都、重庆等地是画像砖的主要分布区。我国画像石出现和使用时间，主要在东汉，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成熟的刻石技术；其二，社会需要。它的出现与汉代政治上崇尚儒家孝道、厚葬之风有密切关系。打破过去多以文字性材料建构两汉的历史面貌，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呈现丰富多元又活泼生动的内容题材。其内容可归纳为四大类：（一）社会现实类，反映当时的生产、生活状况，如狩猎、农耕、畜牧、纺织、捕鱼、冶铁等生产活动；抑或宴饮、庖厨、百戏乐舞、车马行列、建筑等日常生活场景；（二）神话类，包括神话传说、仙人灵异、奇禽怪兽等；（三）历史人物故事类，反映儒家思想、表现忠孝仁义精神，包括古代著名的帝王将相、圣贤人物、孝子烈女、刺客高士等图像；（四）自然景物类，包括日月、星辰、云气、山峦、河流、树木等。这些画像石不仅使我们了解汉代的社会生活、生产状况、思想意识、风俗习惯、雕刻艺术等情形，同时也开拓了我们认识两汉历史的新视野。这种融合绘画、雕刻、建筑艺术之美的汉代文物，除了涉及墓葬制度、宗教信仰的研究范畴，更是了解汉代工艺美术、社会生活等文化史之重要图像史料。如位于山东嘉祥县武翟山北麓的《武氏祠画像》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例。武氏祠是汉代武氏家族墓地所建祠堂的总称，包括武英祠、武梁祠、武开明祠、武班祠等。据祠阙铭载，东汉后期，嘉祥武氏世代为官，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其子孙开始在墓前建武氏祠堂，数十年乃成。祠中有石阙、石狮、墓碑、画像。现存画像石仍达40多块。画像石内容多为历史人物、历史故事、孝义故事、烈女故事、神话传说和各种车马出行、宴筵乐舞、水陆攻战、神瑞灾异、动物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风土人情、典章制度和宗教信仰，不仅是精美的石刻艺术品，也是研究东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实物史料。由于它是最早被人们注意与加以著录的汉代画像石刻，在美术史、金石学以及近代考古学的研究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北宋末年赵明诚《金石录》著录了山东嘉祥武氏祠的榜题。南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宋洪适《隶释》还收录了武氏祠部分图像摹本。

汉代画像石的最早研究是对汉画像石的收集和著录，随着汉代画像石墓的大量发掘，画像石的数量日益增多，研究汉代画像石的高水平论著不断面世，这些研究成果涉及到汉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了汉代人的鬼神信仰和理想追求，为研究汉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风俗、书法绘画和雕刻艺术诸方面提供了丰富而又重要的实物资料，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漏。汉代画像石（砖）的大规模收集著录始于20世纪。综合性的著录与研究论著有：傅惜华《汉代画像全集》（初编、二编），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1950年、1951年刊印。段拭《汉画》，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版。吴曾德《汉代画像石》，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南阳汉代画像石学术讨论会办公室编《汉代画像石研究》，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萧亢达《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顾森《中国汉画图典》，浙江摄影出版社1997年版。信立祥《汉画像石的分区与分期研究》^①、《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王建中《汉代画像石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其中南阳汉代画像石学术讨论会办公室编《汉代画像石研究》（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汇集了1985年在南阳汉画像石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的主要论文25篇，从汉画像石墓的分期、墓葬的形制、画像石的题材、画像艺术的风格以及汉代画像石所反映的汉代社会状况等作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讨，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新研究成果。台湾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收藏的汉代石刻画像拓片最为丰富。

汉画像石与画像砖分布地区不均衡，各地著录与研究成果也有差异。山东地区主要有：容庚的《汉武梁祠画像考释》，燕京大学考古社1932年版。瞿中溶《汉代武梁祠画像考》，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李发林《山东汉画像石研究》，齐鲁书社1982年版。山东省博物馆等《山东汉画像石选》，齐鲁书社1982年版。蒋英炬、吴文祺的《武氏祠画像配置考》^②、《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③、巫鸿《武梁祠研究——中国早期的绘画艺术观念》^④、信立祥《论汉代的墓上祠堂及其画像》^⑤、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和《嘉

① 俞伟超编：《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蒋英炬、吴文祺：《武氏祠画像配置考》，载《考古学报》1981年第2期。

③ 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

④ The WuLiang Shrine: The Ideology of Early Chinese Oictorial Ar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⑤ 南阳汉代画像石学术讨论会办公室编：《汉代画像石研究》，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祥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 1992 年版)等都是研究武氏祠画像石的重要论著。江苏徐州地区有:徐毅英主编《徐州汉画像石》,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5 年版。田忠恩、武利华等《睢宁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 1998 年版。河南南阳地区有: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中华书局 1930 年版。孙文青《南阳汉画像汇存》,金陵大学文学研究所 1937 年版。南阳汉代画像石编辑委员会《南阳汉代画像石》,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周到、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黄明兰《密县汉画像砖》、《洛阳汉画像砖》,河南美术出版社 1986 年版。闪修山等《南阳汉画像石》,河南美术出版社 1989 年版。薛文灿等《河南新郑汉代画像砖》,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3 年版。周到、王晓《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郑州汉画像砖》、南阳文物研究所《南阳汉代画像砖》、《河南汉画像砖精品拓片集》等也著录了许多汉代画像。四川主要有: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 1983 年版。高文《四川汉画像石》,巴蜀书社 1987 年版;《四川汉代画像砖》,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7 年版。高文《四川汉代石棺画像集》,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7 年版。龚廷万等《巴蜀汉代画像集》,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陕西画像石主要出土于陕北米脂与绥德一带,主要著作有:陕西省博物馆等编《陕北东汉画像石选集》,文物出版社 1959 年版。张鸿修《陕西汉画》,三秦出版社 1994 年版。李林等《陕北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李贵龙等《绥德汉代画像石》,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1 年版。陕西省考古研究、榆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神木保当第 11 号、第 23 号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97 年第 9 期)也可参照。

外国学者对画像石(砖)研究成果也颇丰,如日本长广敏雄主编的《汉代画像的研究》(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社 1965 年版),是最早的一部对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墓室壁画进行综合研究的专著,该书收录了国际上研究汉画像石的许多重要文章,其中所收德国学者库劳瓦森从透视学角度分析武梁祠画像构图特点的论文,是一篇立意新颖的佳作,值得重视。日本永田英正编《汉代石刻集成》(京都同朋舍 1994 年版),收集了保存在国内外的两汉时期石刻释文,同时也辑录了能收集到的图版,编成《汉代石刻集成·图版、释文编》,为我们了解两汉史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还有日本土居淑子的《古代中国的画像石》(同朋舍 1986 年版)一书,对汉画像的构图以及五行思想对画像内容的影响作了精辟阐述,很有参考价值。

关于汉代画像石(砖)的研究情况,还可参阅深圳博物馆所编《中国

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文献目录》^① 和刘太祥《汉代画像石研究综述》^②。

5. 石刻文字的著录书目及研究论著

宋人洪适撰《隶释》，27卷。此书成于乾道二年（1166年），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集录和考释汉魏晋石刻文字的专著。书中收汉魏碑19卷，《水经注》碑目1卷，欧阳修《集古录目》1卷，赵明诚《金石录》3卷，无名氏《天下碑录》1卷，其中对《集古录目》和《金石录》只撮目而未录文。《集古录》和《金石录》仅有汉碑的目录和跋语，收录碑文则从洪适开始。他把隶书体的汉碑文用楷书写出，故书名为《隶释》。此书连同后来成书的《隶续》21卷，共著录汉碑碑文、碑阴等258种，魏和西晋碑17种，又收集汉晋铜、铁器铭文及砖文20种。书中还用图来表示汉碑的不同式样，又著录了不少汉画石像，这是在其他金石书中所少见的。每种碑文之后都附有较好的论考，十分宝贵。《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自有碑刻以来，推是书为最精博”。清乾隆四十三年（1728年），据汪氏楼松书屋刊本印的《洪氏晦木斋丛书》是较好的刻本。《四部丛刊》中有张元济校勘的《隶释》21卷。《丛书集成初编》中有黄丕烈的《汪本隶释刊误》，亦可参考。《隶续》则仅存抄本。乾隆年间汪氏刻印二书，由于没有好的底本，《隶续》缺第九、十卷，第二十一卷不全，已非原书的旧貌。同治年间洪氏覆刻汪本，并把它收在《隶释刊误》之中。现行单本是上海书店1985年据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重印的。

清钱泳编《汉碑大观》，中国书店1984年版。全书共八集，收《三公山碑》、《嵩山太室神道石阙》、《杨君石门颂》、《孔谦碑》等原碑刻、摩崖、石阙等48种，每集前附目录，查阅方便。

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本书主要著录的是汉代原石或无原石而有原拓本的碑刻、摩崖及个别墓记。书中排列先后以立碑年代为序，收碑60种。特点是有录文、有考释、有标点。并勘审群书，旁征博引，是研究汉碑的重要参考书。

袁维春《秦汉碑述》，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本书共收秦汉石刻文字88种，除秦的五种之外，全为汉的碑刻文字。所收碑刻按原碑年代先后为序，并对碑文分行逐句释读，既对文字进行考订辨伪，又对史实作补阙更正。在采摘前人论述基础上，直抒己见，成一家之言。书中每节又附有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内容翔实，既可作为工具书查阅，又可作为研

① 深圳博物馆所编：《中国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文献目录》，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刘太祥：《汉代画像石研究综述》，载《南都学刊》，2002年第3期，第8—18页。

究专著参考。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此书是作者二十年来对汉画像石进行综合分析的总结。全书共分九章：第一章为汉画像石的发现和研究简史；第二章为汉画像石的区域分布和产生的社会背景；第三章为汉画像石的艺术表现手法；第四章为墓地祠堂画像石；第五章为地下墓室画像石；第六章为石阙画像；第七章为墓室画像与祠、阙画像之间的关系；第八章为江苏连云港孔望山的摩崖画像；第九章为汉画像石各分布区间的交流和影响。书中采用图像学与文献史料相结合的方法，对汉代画像石作了全面的研究，着重解决了汉代画像石的分区、分期及整体复原等问题，是迄今画像石研究领域最全面、最系统、最能反映20世纪汉代画像石研究学术水平的一本著作。

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此书在综合阐述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的题材内容、表现技法及研究简史等方面内容的基础上，按分布区域对其进行了全面而有重点的分析和总结，是了解汉画像石区域特点的重要著作。王建中《汉代画像石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可与之相互补充。

赵超《古代石刻》，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全面介绍了整个20世纪有关碑石、墓志、摩崖题记、石阙、石窟造像及汉代画像石的发现与研究情况，是一部比较完备的综述性论著。

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收集102种重要汉文石刻文献编成的《石刻史料新编》、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全1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及严耕望编《石刻史料丛书》等书目汇编，是开发利用金石碑刻资料不可或缺的重要检索工具。

严耕望编《石刻史料丛书》，台北县文印书馆1967年影印本。精装100册，分甲、乙两编。甲编为文录类，收录石刻文字，收书22种；乙编为目录跋尾类，收书26种。其中所收汉代史料很多。

《石刻史料新编》，此书分三辑共90册，收书近千种。第一辑30册，1977年版，收书102种；第二辑20册，1979年版，收书104种；第三辑40册，1986年版，收书700种。它比《石刻史料丛书》搜罗更广，第一、二两辑分“一般”、“地方”、“目录题跋”三类。第三辑增“研究参考”类。可以参考汉代部分。

《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由北京书同文公司制作成网络电子资源，汉代部分可资利用。原书编者查阅了现存的千余种的金石志书（包括地方志中的金石志），经过认真对比去其重复，从中精心辑录出一万五千余篇

石刻文献，并附有历代金石学家撰写的考释文字，总计1150万字。所有碑文按朝代排序，利于读者查阅。全书从秦砖汉瓦到碑文墓志，上下两千年，内容涵盖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文学、科技、民俗、教育、地理等各个方面，堪称大型中国古代史料文献汇编。同时，石刻文献因制作的特殊性而极少脱、讹、衍、误等，故其原始性和真实性向为学界所重，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十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各地域在人物、家族、名胜、重要历史事件等方面的研究和文化开发，极有价值。全文检索软件中的文献资料经过全文数字化，文献内容字字可查、句句可检，读者可利用全文检索工具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信息量。系统提供中日、简繁、异体汉字关联查询，打破了时空、地域的汉字使用习惯，增强了知识检索的全面性。软件提供了逻辑检索及字、词间距检索。同时也可以不输入任何检索文字实现按朝代浏览碑文，^① 方便易行。

（三）印章与封泥文字资料

印章指官印或私印。封泥是钤有印章的土块，在中国古代使用简牍的时代，公私文书大都写在简牍上，封发时用绳捆绑，在绳端或交叉处加以检木，封以黏土，上盖印章，作为信验，以防私拆。印章和封泥对研究和考证汉代社会情况也提供了重要依据。

1. 印章

古印章是古代遗留下的文物，其内容反映出古代文字的演变，尤其汉代官印，更是有助于全面了解当时职官设置、地理沿革、姓氏渊源等历史文化现象的珍贵的文物资料。留存至今的汉代印章数量较大，内涵也极其复杂，有西汉官印、西汉私印，汉缪篆私印、汉鸟篆私印，新莽官印、私印，东汉官印、私印等。从官印看，有帝王、封君、诸侯、地方政权王侯用印，如西汉“皇后之玺”、“淮阳王玺”、“软侯之印”，东汉“朔宁王太后玺”、“广陵王玺”；有中央政府属官印，如“大行丞印”、“大鸿胪印”、“大司农丞”印等；有军旅印，如“平东将军章”、“校尉之印章”、“部曲将印”、“司禾府印”；有宦者印，如“宦者丞印”、“中官丞印”、“中府丞印”、“宫臣丞印”、“居室寺从”、“内者”、“御府之印”、“御府丞印”、“私府丞印”、“中厩”、“中厩丞印”、“中厩马府”、“中车府丞”、“中羞府印”、“中羞丞

^① 使用《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需要先安装《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客户端软件。安装后在开始菜单中找到“书同文——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打开“历代石刻客户端”即可进入。在用户名和密码处都输入 public，伺服器输入：202.119.47.4，即可进入检索。

印”、“北宫宦丞”、“北宫私丞”、“高章宦者”、“高章宦丞”、“尚衣”、“尚浴”、“尚浴府印”，等等。利用这类玺印，往往能大体上恢复一部金字塔式的古代职官名阶谱，是研究汉代政治史的重要资料，其价值不亚于翔实可信的历史文献。从私印看，有记录私人姓氏名字号的印，这类印比公印要多，反映了私人身份，表达了私人对印章的某种用途或某种思想感情，有姓名、姓字加画印、有姓名词名印，如“耿宪夫宜酒食长贵宜”印；有地望姓名印，如“汝南女阴公孙安汉印”。这类印对今人研究古代美学、民俗学、历史地理有一定作用。也有职官、身份加姓名印，如“司徒中士张尚”印，朝鲜出土东汉木质“乐浪太守掾王光之印、臣光”双面印，传世的东汉“刘延、俊靡丞印”。这类私印对研究历史官职制度有一定作用。另外，还有颁赐给民族地区及域外的印章，如西汉时“滇王之印”，新莽时期“新西国安千制外羌伯右小长”印，东汉“汉委奴国王”玺、“汉匈奴恶适尸逐王”等，这类玺印为了解汉代时民族地区、域外诸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提供了重要信息，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民族史的不可缺少、不可替代的基本资料。

2. 封泥

封泥，又称泥封，是印章按于泥上作为实物和木制牍函封缄的凭证。卫宏《旧汉仪》中有“天子信玺皆以武都紫泥封”的记载。瞿中溶《集古官印考》、吴式芬《封泥考略》及周明泰《续封泥考略》等书，都把古玺印和古代官制、地理等联系起来。王国维《齐鲁封泥集存序》中说：“封泥与古玺印相表见，而官印之种类则较古玺印为较多，其足以考证古代官制、地理者，为用至大。”^①随着汉简的相继发现，封泥也大量出土，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硬陶罐口部的封泥盒，封泥文字“软侯家丞”；甘肃金塔县汉代“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封存文书的封泥装置上的封泥盒，封泥文字“居延右尉”；1977年安徽阜阳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女阴家丞”封泥；还有“御史大夫”、“皇帝信玺”、“泰山大守章”、“渔阳大守章”、“梁丞相印”、“钟官火丞”、“齐官司丞”、“夜丞之印”等，都是古人使用封泥形式的珍贵物证。其官印封泥较多，把这些封泥与《汉志》及《后汉志》相对照，可以起到纠正和补充史志的作用。

3. 封泥、印章的著录书目及研究论著

清人吴式芬、陈介祺撰《封泥考略》，10卷。此书光绪三十年（1904年）刊行，是编集封泥资料的最早专书。封泥相当于后世封蜡。古代在文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八，收入《王国维遗书》第3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

书上加盖封印时所用的泥块。所盖印章上有地名和官名，因此是珍贵的史料。此书中共收封泥 849 方，大多出自四川和西安，也有一部分是山东临淄所出。其中绝大部分是秦汉时期的，战国封泥仅几方。书中排列先是官印，后是私印与闲印，官印又分中朝官、王国、侯国和郡县诸官。每种封泥都有与原来大小一致的拓片，后附文字考释，对研究古代的官制有重要价值。文字考释主要由翁大年撰写而成。《考略》一书无序言、凡例、跋文，可能是在未定稿时就提前付印的。

周明泰撰《续封泥考略》、《再续封泥考略》。1928 年，周明泰以他个人的藏品，再加上罗振玉的《齐鲁封泥集存》1 卷和陈宝琛的《澄秋馆藏古封泥》两书所收，共集封泥 800 余方，摹仿《封泥封略》体例，编成《续封泥考略》六卷、《再续封泥考略》四卷。其中大部分是汉封泥资料。

吴禔《封泥汇编》，1931 年成书。上海古籍书店 1984 年重版。此书基本上是依据吴式芬的《封泥考略》、周明泰的《续封泥考略》和《再续封泥考略》三编，去其印文重复、印面过于破损的部分，同时删去原书的考释文字，共得周、秦、两汉封泥 1115 枚。印图清晰可辨，是历代封泥汇录之冠。另外，吴熊的《封泥汇编》1 卷，马衡的《封泥存真》1 卷，王献唐的《临淄封泥文字叙目》等书中，也有许多汉代部分的封泥资料。

陈直著《汉封泥考略》，见《文物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此书是陈直先生在秦汉史研究方面的早期之作，书中依据文献资料，对发现的大量封泥进行分析考证，有些得出甚为精当的结论，对研究汉代的官职制度及地名沿革，有一定的重要性。

陈介祺撰《十钟山房印举》30 卷，上海函芬楼 1922 年影印。此书共 12 册，收吉金斋、藩氏看篆楼、叶氏平安馆及作者所藏之印万余枚。所收玺印，按类排列，不计时代先后，共有三十举。其中第二举的“官印”部分，涉及汉代印章较多，为汉代官职制度研究提供了资料。但因书中无释文、无索引，查阅较为不便。民国十一年（1922 年）的函芬楼影印本为较好版本。

罗福颐编《古玺印概论》，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此书实物主要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古玺印精品为主，印文是手拓，按时代先后分类，包括十四个专题：古玺印的书体名称；历代玺印的名称变迁；历代玺印纽制举例；历代古玺印的物质；传世古玺印的类别；传世古玺印的由来；古玺印时代的考证；古代用印的遗迹；古玺印印文排列方式；古官印及封泥考证举例；古姓氏及人名考证举例；古玺印及封泥的辨伪；关于古玺印印谱。其中每个专题内都涉列汉代玺印，为研究汉代史开拓了新的途径。书后附有“古玺印参考书目”便于学习和掌握古玺印研究的状况。

桑行之等编《说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此书是有关印章书籍的汇编，书中共收入研究、介绍、品鉴我国印章的著作六十三种，如古代邱衍撰的《学古编》、清人朱象贤的《印典》八卷和《印识》等书。全书按每种著作的内容及著录方法，划分为印说、印纪、印考、印图四个部分，对了解古代印章研究及著述有很大用途。书中有关汉代印章的部分，十分重要。

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全书11卷，按朝代顺序把秦至南北朝时期的官方印章一一排列，共收印章2658方。包括君印、朝官印、将军印及地方郡县乡官印等不同种类，分别介绍其内容、形制、质地和所属等项，如第50方：时间为汉初；内容为“代马丞印”；形制为田字格印、兽纽。其中，卷二到卷六是汉官印部分，共有印章223方，品类齐全，对研究汉代官制及政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清人汪启淑的《汉铜印丛》、谢春生的《秦汉印存正续》、姚瑾元的《汉印偶存》、吴大澂的《周秦两汉名人印考》、吴隐的《遁庵秦汉古铜印谱》，近人王献唐的《两汉印录》，今人商承祚的《古陶轩秦汉印存》等都是著录汉代印章的专门论著，有重要参考价值。

现代学者关于汉印封泥研究的文章也不少，重要的有汪桂海《汉印制度杂考》（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一文，利用文献记载，结合新的考古发现，讨论了汉代官印的刻制、管理和使用等问题，使人们对于汉代官印制度得到了新的认识。以秦封泥为对象的研究成果，还有周晓陆等《秦汉封泥对读》和余华青《新发现的封泥资料与秦汉宦官制度研究》（载《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1期）。

（四）瓦当文字

瓦当为房屋檐际之盖头瓦，俗称筒瓦头。瓦当纹饰基本上分为图像纹瓦当、图案纹瓦当和文字瓦当三种。文字瓦当在汉瓦中占有突出之地位，较诸花纹瓦当更具时代特色。瓦当文字多为阳文，字数不一，有一字、二字、三字、四字……多至十六字者。字体丰润美妙，变化无穷，而以篆书为多，隶书次之，并有英芝体、龟蛇体、虫书体等多种，随势拙曲为之，章法绝精。汉瓦当面多分区划界，文字布局则有一定模式。一字瓦文多居中心，如“卫”、“关”、“空”等。二字瓦文多上下直书或左右并列，如“上林”、“甘林”、“寿成”等。四字瓦文最多，多作四分法布施，对读或环读，十分匀称和谐；亦有分作两瓦或四瓦，鱼贯排列于檐际，联读为文。五字者格式不拘。七字以上者，或作辐射状，环读；或竖行直读，文字随体异形，巧妙屈伸，突破一般模式，自成一格。一字之变，多至数十，同文之瓦，而字体

又有所不同，是知非一人一手所书。古代匠师们以熟练得心之巧，信手举笔，所书瓦文严谨宽博，疏朗隽秀，堪称中国书法艺术宝库中一份重要之遗产。

文字瓦当，秦以前绝少，西汉最为流行，其后又趋罕见。西汉瓦文词藻艳丽，内容复杂多样，除一般吉祥颂词外，大都根据建筑物之性质而变化。约分为宫苑类、官署类、仓庾类、祠墓类、私人宅舍类以及纪年、纪事类和其他内容的字句，如“永受嘉福”、“长生吉利”、“千秋利君”、“延寿万岁常与天久长”、“蕲年宫当”、“兰池宫当”、“上林”、“京师庾当”、“百万巨仓”、“长陵西神”、“马氏殿多”、“吴尹舍当”、“永和六年大泉五十”、“汉并天下”、“单于和亲”、“乐哉破胡”、“长毋相忘”等。若把这些瓦当文字搜集在一起研究，可发现许多文献上不易见到的资料。另外，由于瓦当文字可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因此依据其出土地点，可以对我们寻找和研究古代早已湮没的宫室、祠墓、亭台楼阁建筑具有十分重要之参考价值。

1. 瓦文著录书目

瓦当之学开始于北宋中期，乾嘉以后，藏家辈出，著录专集达十余种之多。北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陕西宝鸡权氏浚池时得一古瓦，上书“羽阳千岁”。事载王辟之《渑水燕谈录》^①中，瓦当文字见于册籍盖始于此。元符年间进士黄伯思的《东观余论》据“益延寿”瓦订正颜氏《汉书》注文之误，首开瓦当文字考据之端。^②南宋无名氏《续考古图》卷一，摹写汉“益延寿”、“宫立石苑”、“长乐未央”和“羽阳千岁”四瓦的文字，未见释文。这恐是瓦当的最早摹拓。元李好文《长安志图》（3卷）载有“长乐未央”、“长生无极”、“汉并天下”、“储胥未央”、“万寿无疆”、“永奉无疆”、“上林”等七瓦，并曰：“汉瓦形制古妙，工极精制，虽尘壤渍蚀，残缺漫漶，破之如新。人有得其瓦头者，皆作古篆，盘曲隐起，以为华藻。……昔人有于陈仓得秦瓦，文曰‘羽阳千岁’。羽阳，秦武王宫也。以是知古人之作不苟，虽一瓦甃，必有铭识，不特鼎彝为然耳。”^③清康熙朝，福建人林佶游甘泉宫旧址，得汉瓦文曰“长生未央”，著有《汉甘泉宫瓦记》1卷。乾隆初年，朱枫得关中汉瓦三十枚，著《秦汉瓦当图记》，才

^① 王辟之撰、吕友仁点校：《渑水燕谈录》（5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文曰：“秦武公作羽阳宫，在凤翔、宝鸡县界，岁久不可究知何处。元祐六年正月，直县门之东百步，居民权氏浚池得古铜瓦五皆破，独一完瓦。面径四寸四分，瓦面隐起四字，曰‘羽阳千岁’。”

^② 黄伯思：《东观余论》，汲古阁刊本，安徽省博物馆藏。

^③ 李好文：《长安志图》中卷，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确定了瓦当的专名，奠定了瓦当文字的地位。孙星衍、毕沅、王昶等闻风响应，竞相寻访，极一时之盛。继而林佶的《汉甘泉宫瓦当》，程敦的《秦汉瓦当文字》2卷、续1卷，申兆定的《涵真阁秦汉瓦当图说》，毕沅的《秦汉瓦当图》1卷，陈广宁《汉宫瓦当》1卷，钱坫《汉瓦图录》4卷（钞本），都是影响一时的专著。吴大澂《窳斋砖瓦录》，冯云鹏、冯云鹗《金石索》，王昶《金石萃编》，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毕沅之《关中金石记》以及武树善编纂的《陕西金石志》等书，也都录有部分瓦文。可见金石学在清已成风尚。

近代集诸家著录瓦当之大成者，首推罗振玉《秦汉瓦当文字》一书。民国三年（1914年）木刻本，共收秦汉瓦当319枚148种。全部按类汇编，共分为五卷。卷一是宫阙殿署关仓屯冢等瓦；卷二、卷三是吉语瓦；卷四是画瓦；卷五为补遗。书前有目录，目录内容为每枚瓦当的释文。每条目下附有瓦当出土地及藏家，对了解瓦当的出处和源流很有帮助。所选瓦当瓦文清晰、图案精美。其中80枚为当时的藏家所未见，十分珍贵，是秦汉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史料。

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地出土瓦当较多，《考古》、《文物》、《考古学报》、《考古与文物》等杂志多有记述。专门的瓦当著录有陈直的《秦汉瓦当概述》（载《文物》1963年第11期），60年代陕西省博物馆《秦汉瓦当》（文物出版社1964年版），80年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新编秦汉瓦当图录》（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徐锡台、楼宇栋、魏效祖等《周秦汉瓦当》（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刘士莪编《西北大学藏瓦选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等。特别是90年代末，张文彬主编的《新中国出土瓦当集录》，是一部全面反映陕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战国、秦汉、隋唐时期古城遗址出土的瓦当资料。按遗址立卷，分集成册，这对于促进瓦当的深入研究将起积极作用。

国外学者关于瓦当的著录和研究有日本关野雄的《半瓦当之研究》、堀口苏山的《秦汉瓦砖集录》和村上和夫的《中国古代瓦当纹样研究》。《半瓦当之研究》一书收入瓦当拓片、照片共113件，出土地点包括山东临淄、曲阜、薛城、福山，山西夏县禹王台，河北易县燕下都，陕西西安等地。全书十万字左右，对半瓦当研究相当详细。《秦汉瓦专集录》共收入瓦当85种159件，是了解秦汉时期瓦当的重要参考资料。

（五）铜器、钱币、古铜镜等金石文字

汉代时期，货币、铜镜、钟鼎等器物仍刻有文字，虽然字数较少，也是研究汉史的重要资料。

两汉铜器器形及铭文均不如商周器，但其铭文在学术研究上仍有一定的价值，故早已引起学者重视。历代专门著录和研究汉代金石文字的著作不多，今人容庚编《汉金文录》（所著录为民国二十年以前出土）和王仲殊的《汉代考古学概说》的相关部分，算是专门性的研究。孙慰祖等《秦汉金文编》有较新的资料。今人综合性的著作有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研究》。涉及汉代金石文字的其他著作较多，如黄易的《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清人王昶的《金石萃编》、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刘喜海的《金石苑》、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近人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都可作为研究的参考资料。

清王昶撰《金石萃编》160卷，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据1921年扫叶山房本影印。此书是王昶据《集古录》、《金石录》、《隶释》、《隶续》及自己所藏金石1500余通汇编而成。从所录金石时代看，上至三代，下迄明朝。书中对所收金石内容加以甄录；对文辞漫漶不可辨识者，引他书记载做旁注；删除各书重复的部分，并对前贤没有援引的古籍，加以己见，编写按语。尤其是对全秦汉三国六朝篆隶之书，有古文别体者，摹其点画，加以训释，对了解研究汉代金石文字有重要意义。

钱币也是研究汉代经济史和货币史的重要材料，清代就有学者对其著录，如李佐贤的《古泉汇》、李佐贤和鲍康的《续泉汇》等。现代学者对两汉钱币研究更加关注，著述丰富，专门性的著作有陕西省钱币学会《秦汉钱范》（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新莽钱范》（1997年）、《上海博物馆藏钱币·秦汉钱币》；通论性著作有宋叙五《西汉货币史初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1年初版）、钱剑夫《秦汉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张楠《秦汉货币史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及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中华书局1997年版）等，都是颇有分量的成果。

中国考古发掘出土的铜镜以汉镜数量最多，研究成果也比较明显。早期著作有清罗振玉撰《古镜图录》，三卷附补遗，1916年影印本。此书是罗氏据己三十年所藏及友刘铁云和蒋伯斧等所藏古镜墨本集录而成。据书序讲，“取千镜中尤精者成书三卷”。书中把有纪年的古镜列于最前，其中汉之元兴至明之洪武，共有30品。其次选文字及刻镂精美者列于后，选录中对镜的比例略有缩小。图案清晰可辨，是古镜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书。1949年以来，我国出版了一系列集铜镜断代、鉴赏、收藏及学术研究为一体的专著、图录和考古报告集。如《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的问世，标志着铜镜的分类及编年已基本完成。二书分别收录铜镜118面及157面。在铭文研究方面有周世荣《湖南

出土汉代铜镜文字研究》和林素清《两汉镜铭集录》等，后者共收汉代1745镜铭文，书见台湾史语所简帛金石资料库。书中对镜的名称、时代、来源、铭文字数及内容进行详细介绍，对研究两汉文化、风俗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汉镜进行全方位学术研究的著作首推程林泉、韩国河合著的《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初版，2004年再版。书中以收录的336面秦汉镜为基础，分四章内容，即汉镜源流、汉镜概论、长安战国秦镜研究和长安汉镜研究，对汉镜的各种类型进行了分型分式和内容分析，是目前所知汉镜类型最为细化的研究。书后附录二《西安地区出土铜镜统计表》和《先秦两汉铜镜资料目录索引》，详细列出了铜镜的基本属性和墓葬的形制、随葬品、时代及1900—1998年先秦两汉铜镜收录与研究论著，资料丰富翔实，便于学习或检索。

国外在汉镜研究方面也取得一些成绩，如日本学者樋口隆康的《古镜》（东京新潮社1979年版），冈村秀典《西汉镜的编年与样式》、《东汉镜的编年》、《汉六朝的纪年镜》，上野祥史《神兽镜的系谱及其盛衰》，秋山进午《关于夔凤镜》等著述，也应予以重视。

（六）与两汉史相关的考古论著与刊物

除以上所介绍的五种类别资料外，建国后新出土的两汉时期的各种古文字资料，不论是秦汉简牍、石刻、瓦文，还是封泥印玺，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远远超过任何历史时期。考古工作者将发掘与研究紧密结合，全面整理资料，深入开展研究，根据最新发掘资料，编辑出版了许多重要考古的报告。除前面介绍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居延新简》、《敦煌悬泉汉代邮驿遗址的发掘与整理情况简介》、《银雀山汉墓竹简》、《阜阳汉简简介》、《张家山汉墓竹简》等简报以外，梁思永、尹达、夏鼐、苏秉琦、贾兰坡、安志敏、邹衡、马衡、于省吾、杨树达、李学勤、王仲殊、陈梦家、郭宝钧等考古学者也都发表了这方面的重要论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和《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文物出版社编著的《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充分展现了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考古学的辉煌成就。尤其是近数十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总结研究的论著更多，汉代部分的比例较大。兹介绍几部重要著作：

王仲殊著《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此书是王仲殊先生1979年10月至12月在美国哈佛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讲演稿。共包括九篇文章：《西汉的都城（长安）》、《东汉的都城（洛

阳)》、《汉代农业》、《汉代的漆器》、《汉代的铜器》、《汉代的铁器》、《汉代的陶器》、《汉代的墓葬》(上、下)。对汉代两都的形制、布局、汉代农业手工业及墓制、葬俗和随葬品的演变等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书后附有插图和图版,是汉代考古学研究的综合性著作。

张文彬等主编《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此书是对整个20世纪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的汇集。内容包括对20世纪考古与文物工作概括的综合阐述,对一些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和当代区域文化研究情况的叙述;对重要文物考古的专题研究;对重要的文物考古发现、发掘及研究的个例纪实。第一批已出版,共有四辑:第一辑为综述,包括《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考古》、《两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隋唐考古》、《宋元明考古》等八书;第二辑为考古学文化与地域文化,包括《楚文化》、《秦文化》、《滇文化》三书;第三辑专题研究,包括《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古代石刻》二书;第四辑为重大考古发现,包括《曾侯乙墓》、《满城汉墓》、《渤海遗址》三书。其中汉代部分的内容,为研究汉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49—1966年),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此书提供了1949年以来至“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考古学研究情况。《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1983—1990年),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此书汇集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因全书按类编排,查阅汉代考古文献十分方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文物编辑委员会汇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79年)。以上三书对1949年以来全国各地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作了概括性、全面性的总结,两汉部分内容十分丰富。

宿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此书不同于通常的文物图录,不仅仅是精美文物图片的集合,而是按照历史考古的序列,图文并茂地介绍上述各个时代考古学50年来的工作。这是一部考古学家编撰的书,除由各有关研究领域卓有声望的专家和学科带头人担任分段主编之外,近120个极具代表性的重大考古项目简短的说明文字都尽可能约请发掘工作的主持者或直接参与者撰稿,图片的内容也不限于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照片,还将发掘现场的照片和重要的线图放在了重要的地位,着重强调的是科学性,同时兼顾文物的美学价值。有关汉代部分可资参考。

另外,还有许多汉代资料及研究性论文散见于《考古》、《文物》、《考

古学报》、《考古学集刊》、《文物资料丛刊》、《南京博物院集刊》、《江汉考古》、《考古与文物》、《中原文物》、《东南文化》、《文物春秋》、《四川文物》、《华夏考古》、《北方文物》及历年的《中国考古学年鉴》和《中国考古学会年会论文集》等社会科学期刊，查找时可利用每年最后一期附录的全年论文索引目录。

附言：本章写作过程中，于吴树平先生、林剑鸣先生、高敏先生、陈高华先生、陈智超先生、日本学者山根幸夫先生、英国学者鲁惟一先生等所著编之书有所参考，特此声明并致感谢。介绍汉代史料的著作本已不少，而且有些精深之作已不可完全替代。但是其不足之处往往在于不够全面、完备，而近年文献学研究的新成果、考古新资料也未及收入，所以，本章在吸收前贤成果的基础上，注意了详备，尽力收集了汉代史料的各个方面。但由于时间的仓促，加之本人学识、见闻的不足，遗漏之处尚在不少。故书中介绍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指正，以待来日修改增补之用。



附录一 古文字中记数使用“又（有）”字的演变及其断代作用考

王 晖

古书中记数是常见的现象，在先秦载籍中记数使用连词“有”字与否则有很明显的时代性，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特征来鉴别先秦典籍的年代。多年前洪诚先生就曾看出这一点，他说：

从语法看，文献中凡春秋以前之文，十数与零数之间皆用“有”字连之，战国中期之文即不用。《尚书》、《春秋经》、《论语》、《仪礼》经文、《易·系辞传》皆必用。《穆天子传》以用为常。《王制》、《庄子》不定。《左传》、《国语》以不用为常。《山海经》中之《五藏山经》不用。《孟子》除论述与《尚书》有关之事而外亦不用。《周礼》之经、记全部用，此种语法与《尚书》、《春秋经》同，故非战国时人之作。^①

利用这种方法来鉴定古书年代是对的。但深入考虑，还有一些问题，首先是“有”字的发展线索不清楚；其次是现存先秦古籍大多数形成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时代相对地比较集中，而在论证先秦古籍时，洪氏所引用古书的成书年代说法纷纭，尚难确定，这样，“有”字还不能作为断代的一个标尺。如《春秋经》中整数与零数之间全用“有”字，其成书年代也是明确的，但还不能贸然断定这就是使用“有”字的下限。因为何时不用“有”字的上限还不能确定，那么，用它判定作品时代也就不易精确了。如洪氏说：“《周礼》之经、记全部用，此种语法与《尚书》、《春秋经》同，故非战国时人之作。”在整数和零数之间使用“有”的下限和不用“有”的上限尚难断定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显得不太严密，不大可靠了。

不过，利用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从殷商甲文到战国文字，记数现象常见，而这些古文字资料的年代多数都是具体可考的。

^① 洪诚：《读〈周礼正义〉》，见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编《孙诒让研究》，1963年版，第26页；并参见洪诚《训诂杂议》，载《中国语文》1975年第5期。

即使有一些不能肯定具体年代，但根据同时出土的器物、字体和纹饰等等因素，其相对的时段还是可知的，这比先秦载籍的成书年代要可靠而且确切多了。这些文字资料，很清楚地展示了整数与零数之间用“又（有）”字的产生、发展、成熟以及消失的轨迹。对这种现象进行归纳，整理，不仅对汉语史的研究来说是必要的，而且，正如洪城先生所做的，对考订先秦典籍的成书年代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作用，对时代不明的出土文字资料，也可以起一个辅助断代的标尺作用。

本文将古文字中整数与零数之间使用“又（有）”字的演变过程归纳为四个阶段：一、产生期；二、发展成熟期；三、衰变期；四、消亡期。下面我们依次讨论。

殷商武丁至帝辛时代是记数使用“又”或“屮”^①的产生期；其使用比较随便，可有可无，而且它们与单位名词以及个、十位以上数字的组合形式比较灵活。殷商时期记数用“又”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 记数之中“又”（屮）字的使用与否是比较随便的

(1) 记数连词“又”（屮）一般用在十位与个位数之间：

在十月又一 （《合集》37840）

俘人十屮六人 （《菁华》6）

示十屯又一屯 （《粹编》1504）

自上甲十示又三 （《合集》34117）

(2) 但也有只在百位与十位数之间用“又”，而十位与个位之间不用，如：

允禽（擒）三百又四十八 （《后编》下41·12）

羊百屮五十八 （《乙编》540）

(3) 也有百、十、个位之间全用“又”字的：

麇百屮九十屮九 （《合集》10407 正）

允禽（擒）二百屮九 （《前编》4·4·2）

(4) 也有在个、十、百、千位之间不用“又”的：

^① 此字作连词时同“又”。本文所引古文字或是与古字相应的今字，或是与假借字相应的本字，或为音近借用字，均依今之通用字读之。个别情况我们在括号里对文字构形情况作以说明，一般不另注明。

鹿七十一，豕四十一 (《佚存》43)

二百六十九 (《合集》10761)

一千五百七十 (《双剑》212)

允伐二千六百五十六人 (《后编》下43·9)

从上可见，“又”字的使用是比较随便的。另外，十位以上的百位、千位数之间以不用“又”为常，个位与十位之间用“又”就比较多。^①

2. 殷代数词、名词和连词排列方式与后代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特点：

(1) 整数—名词—零数

用十人五 (《合集》26994)

王在十月一 (《合集》23810)

(2) 整数—名词—连词—零数

羌十人又五 (《粹编》593)

自上甲十示又三 (《通纂》225)

(3) 整数—名词—连词—零数—一—名词

示十屯又一屯 (《粹编》1504)

十犬又五犬 (《佚存》194)

这三种数词、名词及连词“又”的结合方式，在后世很少见，特别是第一类则更无人用了。

这三种排列方式上的共同特点，是在十位与个位之间加单位名词。而这三种记数方式，也都全用在殷代纪年纪月的序数之中了。如肆簋“在十月一”、俞尊“惟王十祀又五”，等等，这对于断定作品的时代是有作用的。这一点后面将详细谈到。

第一期武丁时代的卜辞，十一月、十二月基本都是合文：“十”与“月”并列，个位数一、二、三在上。第二期祖庚、祖甲时代的卜辞，仍是合文，但已把个位数“一”、“二”移于并列的“十”、“月”之下，一直沿用到商末帝乙帝辛时期。不过这种记数法在武丁时期早已开始，如《合集》9650：“乙丑卜，王贞：今岁受年？十月二。”（合文：“二”在并列的“十月”之下。）到祖庚、祖甲时就全部是这种表示法了。如记有祖甲时贞人尹的《合集》23244“在十月二”，记有同时贞人旅的《合集》24802“在十月二”、《合集》24805“在十月二”，等等。这种合文一般读作“十月一”、“十月二”是对的；而有的学者读作“十一月”，“十二月”，则是错的。因为：（1）零数“一”、

^① 参看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0页；又见王力《汉语史稿》中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6页。

“二”置于并列的“十月”，再读“一”、“二”；（2）到第五期帝乙帝辛时纪月纪年的表示法一般不作合文，而按上下顺序作“在十月一”（《合集》36846，37966）、“在十月二”（《合集》37972），这种情况不可能是语法组合规则的改变，而只是书写方式的改变。从第三期廪辛卜辞起，又出现了一种表示法，即在“十月”与个位数“一”、“二”之间加“又”，如“十月又二”（《甲编》2647，2622，2491）。同时，“十月一”、“十月二”的用法依然存在。后来，这两种用法一直沿用到晚期帝乙、帝辛时代。

到第五期帝乙、帝辛时代，纪年的序数词才逐渐地多起来了。在此以前，卜辞中只有出组卜辞有“自今十年出五”（《合集》24610）的纪年表示法。而宰桴尊“惟王廿祀又五”，俞尊“维王十祀又一”，一般是用“整一名一连（又）一零”的表示法。另外，纪月的序数，还出现一种在十位与个位之后都用“月”的表示法，如我作父乙簋“十月又一月”。这种记数法早在武丁时期就产生了。如《粹编》1504“示十屯又一屯”。但作为序数表示法出现较晚而且使用得很少。不过，到周初，这几种序数表示法都悄然消失了，而代之以“整一又一零一名”的表示法，这可为我们提供一个判断殷商和西周作品年代的条件。

在卜辞中有一个序数词表示法的问题是需要提出的，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武丁时期十以上月份的记数绝大多数是合文：“十”与“月”并列，“一、二、三”分置其上。一般都读为“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这恐怕是按后世读法读的，是否合乎当时的读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1）从祖庚到廪辛时十以上的纪月序数，作十、月并列，一、二置下的合文，应读作“十月一”、“十月二”。这从以后未分写时的情况可看出来，如《合集》36846。另外，在第三期廪辛时的卜辞，其他表示基数的词，也有作合文的，如《合集》26994“用十人五”，“十”与“人”并列，“五”置其下；而《合集》27021、27022、27023有“十人又五”。“十”与“人”为并列的合文，“又”、“五”分写其下。可见这些并列的“十”、“人”应先读，再读其下的“五”。在武丁时期绝大多数十月以上的纪月也是合文，但排列方式是一、二、三置于并列的“十”、“月”之上，到祖庚祖甲时这种纪月合文的排列方式突然改变，成为“一”、“二”置于并列的十月之下。可见这是一种书写时排列方式的变化，而不是一种语法组合规则的变化——因为语法的发展变化是缓慢交替的，不可能从“十一月”、“十二月”这种组合法彻底干净地变为“十月一”、“十月二”。（2）武丁时期这种十以上的纪月合文，也应先读“十月”，再读其上的“一”、“二”、“三”，就如甲文中“五十”、“六十”、“八十”的合文一样，先读下，再读上；而且，如

前所说，凡是并列的合文应连在一起读也是卜辞文例的一个通则。因此。我们认为，武丁时一、二、三置于并列的“十”、“月”之上这种纪月合文，也应读作“十月一”、“十月二”、“十月三”，而表示的概念实际是“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

根据殷商时期纪数法特别是序数表示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过去在句读、文例方面被认为是疑难的问题。

例如商代我作父乙簋中有“佳十月又一月”，肆簋有“在十月一”，有的学者没有认识到殷商时有“整一名一零”这种记数法，就说“月下一字非蚀即衍，因句形奇特从无此例”^①。其实“月”下一字很清楚就是“一”字，非蚀亦非衍。说“句形奇特”也只能与周初以后的习惯相比，却不能说殷商卜辞、金文“从无此例”。《合集》26994有“用十人五”。至于纪月序数中就更常见了，祖庚祖甲时代卜辞中有《合集》24802“在十月二”、《合集》24805“在十月二”，帝乙帝辛时代卜辞中有“在十月一”（《合集》37966）、“在十月二”（《合集》37972）；甚至在同一条卜辞中既有“在十月一”，又有“在十月又一”（见《合集》36846）；商金文小子鬲卣有“在十月二”，《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释文及注（五）云：“‘十月二’，十月又二月的简省。商代纪月与此相似的有我方鼎铭‘十月又一月’，肆簋铭‘才十月一’。”^②这里承认这种纪月方式为商代特有是对的，而说“十月二”是“十月又二月”的简省就不对了。这种“十月二”的纪月法在卜辞中常见，祖庚到廪辛时十一月、十二月均读为“十月一”、“十月二”。还有，按照我们的看法，武丁时期表示十以上纪月序数的合文，也应该为“十月一”、“十月二”、“十月三”，那么，我作父乙簋“在十月一”的现象，不但不能说“从无此例”，而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了。

另外，如前所举，宰梲尊有“唯王廿祀（字作‘祀’下加‘翼’的象形初文）又五”，董作宾《殷历谱·祀谱三》读此句为“唯王廿祀翌又五”，并说：“‘廿祀翌又五’与‘廿祀又五翌’‘廿又五祀翌’并同。”陈梦家也把此句读作“唯王廿祀羽又五”^③，但未作解释；唐兰也读为“唯王

① 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71页。

②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③ 《殷墟卜辞综述》第236页说：“从武丁到祖甲，‘十一月’‘十二月’作‘十月一’‘十月二’。”这句话似乎还欠分明，不知他说的是把置于“十月”之上和之下的“一”、“二”两种形式都包括了，还是只指“一”“二”置于“十月”之下的一种。而从《综述》所引例句来看，他一般把武丁时的卜辞写作“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第219页），而把祖庚祖甲时的写作“十月一”、“十月二”（第220页），似乎他这里所说的只指“一”、“二”置于其下的一种。

廿祀羽又五”，说“羽，当是语词”。按唐氏说为语词，这不合文例。因为这种“整一名一连二零”的序数表示法中间从没有加“羽”一类语词的先例。董氏把此句中的“翌”读到“五”后，但“翌”一般是置于“日”或干支之前，未见单置于序数词之后的。其实，这里“祀”和“翼”的象形初文是一个字，读为两个字是错误的。“祀”的下面这一形体，在甲文中有时加意符“日”，有时加声符“立”，意即《说文》训为“明日”的“昱”。古籍多作“翌”、“翼”。作“翌”、“翊”与甲文中此形之旁加“立”全同：“翌”、“昱”、“翼”上右音均为喻母职部，而与“祀”邪母之部音则是相近的：“韵部为阴入对转，故《说文》‘祀’下引异体字作‘禩’。”段注：“古文已声异声同在一部，故异形而同字也。”宰橈尊“祀”下从“翼”的象形初文，这是具有双声符的一个字，^①而不是两个字。另外，甲文中有“翌”（为“翼”字象形初文旁加“日”字），在卜辞中有作祭祀动词的，如《佚存》906：“癸亥卜，王贞：旬亡（无）咎。乙丑，翌于大乙。”《契》22：“庚辰……贞翌辛翌于口辛。”从这里的用法来看，“翌”应读为“禩”（祀）。依此来看，宰橈尊“祀”下一形体的确应作为“祀”的声符。可见，宰橈尊中的纪年仍合乎殷商时的序数表示法。

二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晚期，为整数与零数之间用“又”的发展与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西周早期、中期为记数用“又”的发展期，西周晚期到春秋晚期为记数用“又”的成熟期。

一、记数用“又”的发展期：西周初期到中期

这一时期记数的个、十、百、千之间绝大多数都用“又”，不用的很少。下面分序数词和基数词两方面来看。

1. 纪年纪月的序数词必用“又”，例如：

高卣盖 惟十又二月
大孟鼎 惟王廿又三祀
史兽鼎 十又一月

^① 《音乐研究》1981年第2期刊裘锡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释文说明》，其文说：“古文字里常见由同音或音近的两个字合成的字，如‘替’‘伺’等。”见第17页。

小孟鼎 惟王廿又五祀 (上为康王时)^①

旅鼎 在十又一月

肆簋 惟十又二月

遣尊 惟十又三月

作册鬯尊 惟十又九年 (上为昭王时)^②

庚嬴鼎 惟廿又二年

爰尊 惟十又三月

禹鼎 惟十又一月

善鼎 唯十又一月 (上为穆王时)^③

永孟 惟十又二年

望簋 惟王十又三年

大鼎 惟十又五年

师汤父鼎 惟十又二月 (上为恭王时)^④

敌簋 惟王十又一月

疾壶 惟十又三年 (上为懿王时)^⑤

召卣 惟十又三月 (此为孝王时)^⑥

在西周早期、中期的金文中，纪年纪月的序数词出现频率相当高，但这些序数词全部用“又”，无一例外。不过，西周早、中期用“又”的序数词与殷代晚期卜辞用“又”的序数词用法明显不同，殷金文卜辞中“祀”、“月”均介于序数词的十位与个位之中，如《合集》37840：“在十月又一”；俞尊：“惟王十祀又五。”，等等。而西周纪年纪月的序数词中，年、祀、月均在序数之后。

2. 基数词中“又”字可用可不用

(1) “又”字全用的

如成王时王来奠新邑鼎^⑦：“二旬又四日丁卯”；康王时大孟鼎^⑧：“人

① 康王时四器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下简称《史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页高卣盖，第140页史兽鼎，第169页大孟鼎，第179页小孟鼎。

② 昭王时四器见《史征》第215页旅鼎，第291页遣尊，第293页作册鬯尊，肆簋见《三代》8·49。

③ 穆王时四器分别见《史征》第388页，第391页，第394页，第398页。

④ 恭王时四器分别见《史征》第420页，第426页，第435页，第424页。

⑤ 懿王时二器，敌簋见《史征》第480页；疾壶见《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第2辑，第29—30页。

⑥ 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1页上。

⑦ 见《史征》第45页。

⑧ 《史征》第169—171页。

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康王时俎侯矢簋^①：“厥宅邑三十又五”，“庶人六百又四十又六夫”。

(2) “又”字全不用的

……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牛三百五十五牛，羊二十八羊。……俘馘二百三十七馘，……（小孟鼎，康王时）^②

西周早期中期，基数词记数的个位、十位以及百位、千位数之间不用“又”的仅见康王时的小孟鼎，^③ 这种情况，其实是殷代卜辞记数特点的残余。如：《合集》10198 正：“狐二百六十四，麇百五十九”；又，10408 正：“……豕十五”。这些记数的个、十、百、千之间都不用“又”，即使到第五期乙、辛时代的卜辞也是这样（如小臣墙刻辞，见《合集》36481 正）。卜辞中连词“又”可用可不用，虽有在个、十、百位之间全用的（如：《合集》10407 正），但毕竟是少数。所以西周早期小孟鼎这种十位以上的记数，各数间不用“又”，正是殷代记数特点的残余。

不过，同殷代序数与基数表示法有别一样，西周早期纪年纪月的十位与个位之间也均用“又”字。即使小孟鼎中记载战利品的数目时，一律不用“又”，但纪年的“惟王廿又五祀”却用了“又”，可见这一现象已成规律。

二、记数用“又”的成熟期

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晚期，是记数用“又”的全盛期。不仅序数全用，而且基数也全用。

1. 序数之间：

伯克壶	惟十又六年
小克鼎	惟王廿又三年
克钟	惟十又六年
克盨	惟十又八年十又二月（上为夷王时） ^④
无彘簋	惟十又三年
微絜鼎	惟王廿又三年 ^⑤
寰盘	惟廿又八年

① 《史征》，第 153 页。

② 同上书，第 179—181 页。

③ 郭沫若：《长安县张家坡铜器群铭文汇释》（《考古学报》1962 年第 1 期）把西周中期师事簋（乙）“倂女甲五”隶作“倂女十五”是不对的。西周时期“十”字均作上下尖瘦，中为肥笔，这里在长竖中画一短横，应为“甲”。

④ 上夷王诸器分别见《史征》第 500 页；《大系》第 112 页上，第 123 页下，第 123 页上。

⑤ 上厉王四器依次见《大系》第 120 页下，第 126 页下，第 123 页下，第 134 页上。

- 番匜生壶 惟廿又六年(上为厉王时)^①
- 伯吉父鼎 唯十又二月(《文物》1974·11·85)
- 虢季子白盘 惟十又二年(《大系》103下)
- 此鼎 惟十又七年十又二月(《史征》第500页)
- 善父山鼎 惟三十又七年(《文物》1965·7·17)(上为宣王时)
- 叔上匜 惟十又二月(春秋早期郑国,见《大系》第181页下)
- 都公緘鼎 惟十又三月^②(春秋早期都国,见《大系》第176页上)
- 申公彭字簠 惟正十又一月(春秋早期申国,见《中原文物》1982·1·39)
- 者沪钟 惟越十有九年(越勾践十九年,前479年,见《大系》第157页上眉批)

2. 基数之间

凡以公车折首二百又口又五人,执讯廿又三人,俘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折首三十又六人,……折首百又十又五人,执讯二人。(多友鼎,夷王时,见《人文杂志》1984·4·15)

我们还可看到,厉王时虢仲盨有“十又二”^③,酏从盨有“十又三邑”,矢盘有“凡十又五夫”,鞅钟有“廿又六邦”;约为春秋早、中期的鞅罍有“二百又九十又九邑”;约为前584年的秦公簠和钟有“十又二公”;前566年的齐叔夷罍有“三百又五十家”,等等。总之,这段时间的古文字资料中,只要是两位数以上,均用了“又”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郑虢仲簠铭文有“惟十又一月既生霸庚戌”一句,有二器,盖器同铭,两器四铭。^④其中有一器铭文把“十又一月”写作“十一又一月”,不过在“又”字上加了一斜撇,郭沫若先生说:“‘一又’二字倒,而又字多一横钩(即斜撇),此金文钩倒之确例。”^⑤以现在人们在书写中钩倒的情况来看,这是先在范上刻出了“十一”,立即发现丢了连词“又”字,于是补写了“又”。为了

① 本作“十又四月”,依《大系》第176页上的说法改正。

② 这里所引几件器物断代主要参考书目为:虢仲盨,《大系》第120页上;酏从盨,《大系》第124页下;矢盘,《大系》第129页上、下;鞅钟,《史征》第503页;鞅罍,见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00页;秦公簠、钟,见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96页;齐叔夷罍,《大系》第205页。

③ 见《三代》8·17·3与4。

④ 见《大系》第181页上。

⑤ 同上。

让人知道“又”在“一”字前面，于是又加了一笔斜钩。郑虢仲是西周晚期人，说明当时记数时“又”绝不能没有，是记个位数以上时必须用的。所以从西周晚期至战国前期，只要有两位数以上时，“又”字就不能不用。

三

战国前期与中期前段，是记数全用“又”字（西周晚期到春秋晚期）向全不用“又”字（战国中期后段直至今日，文人仿古例外）的转变时期。在这个转变时期，战国前期用“又”常见，不用少见；战国中期前段则不用为常，使用少见。

1. 战国前期（约前475年—前391年）

（1）使用“又”字的：

……共四十又四，少（小）共十又三

乐人之器：一盘程首钟，小大十又二

小囊糗四十又八，一大囊糗十又三

皇胫廿又五

以上信阳楚墓竹简文字，战国早期。^①

惟王五十又六祀（楚王畬章钟及铸，前433年，《大系》第166页上，《文物》1979·7·13）

十又一月甲寅月出乙丑（侯马盟书木牍，约前424年，见《文物》1983·3·78）

广车十乘又二乘（曾侯乙墓竹简文，前433年，见《文物》1979·7·12）

姑洗十反又三在此（曾侯乙墓漆木磬匣，湖北省博物馆藏）

（2）不用“又”字的：

十六 廿三 廿八 三十六 三十九 四十一（曾侯乙墓石磬编号，湖北省博物馆藏）

十五年十二月乙未朔（温县盟书，见《文物》1983·3·84，与侯马盟书年代略同）

十一年十一月乙巳朔（公朱鼎，前391年，见《中原文物》1981·4，黄盛璋文）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简文），第129—130、121—123页。

从曾侯乙墓的记数现象来看，竹简上记载车辆和漆木磬匣上的记数用了，而石磬编号不用，这恐已开了不用“又”来记数的先河，到战国中期就越来越普遍了。

2. 战国中期前段（约前 390 年—前 340 年）

唯十又四年（陈侯午敦，前 361 年）^①

梁十九年（梁十九年鼎，前 351 年）^②

十八年，……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商鞅量，前 344 年，《大系》第 250 页上）

梁廿又七年（梁廿七年上官鼎 前 343 年）^③

从上面所引例句来看，战国中期前段绝大多数的记数已不用连词“又”了，使用的仅为三例。而且，同是魏惠王十九年到二十七年间铜鼎，在大梁司寇鼎和梁二十七年上官鼎中用了“又”，而在早一些的梁十九年铜鼎中却不用，说明这时记数用“又”已趋于末期了。而自此以后，不管是序数还是基数之中就都不用“又”了。

四

战国中期后段之后，记数的个、十、百、千位之间便没有用“又”来联系的了。例如，约为前 338 年的魏戈（《考古》1977·5·357）有“三十三年”；前 334 年秦封宗邑瓦书有“冬十壹月”（《古文字研究》14·177）；前 325 年相邦义戈有“十三年”（《文物参考资料》1957·8·38）；前 293 年秦相邦冉戈有“十四年”（《文物参考资料》1957·8·39）。特别是出土不久的战国中山国诸器物中记数现象不少，据我们统计共有 36 例，不管是序数还是基数之中均不用“又”。^④ 例如，兆域图：“廿四步”、“廿五步”、“三十六步”、“百五十尺”；方壶：“惟十四年”；嫡子盗圆壶圈足铭：“重一石三百三十九刀之重”，等等。中山国器物年代约在前 313—310 年之间，^⑤ 可见战国中期后段（约前 339—前 300 年）记数就不用连词“又”了。

至于战国晚期（前 299—前 222 年）的器物铭文，就更不用“又”字

① 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99 页。

②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3、184 页。

③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 53 页。

④ 参看徐中舒主编：《殷周金文集录》第 711—744 号，四川辞书出版社 1984 年版。

⑤ 参看《文物》1979 年第 1 期，第 9—10 页。

了，例证从略。

从古文字资料来看，记数法在战国时期演变的踪迹最为明显：西周晚期到战国前期记数均用“又”字，战国中期为转变时期，而大约从前340年以后就不用了，战国晚期出土的文字资料十分丰富，却未见在记数时使用“又”字。洪诚先生在分析记数用“有”的演变情况时说：“金石文保守性较强，秦刻石纪年犹用‘有’字，不足为例。”^①所以他仅以载籍文献作为分析根据，这其实是把两种材料的价值和作用弄颠倒了，在反映记数用“又”（有）的演变情况上，地下文字资料更符合语言演化的实际情况，而古文献中特别是战国晚期诸子散文中，反倒是有一定的保守性。至于洪氏所说“秦刻石纪年犹用‘有’字”，盖是指峰山刻石“廿有六年”^②一类。其实廿与六之间用“有”是有句式上的原因，段玉裁指出：“古文廿仍读二、十两字，秦碑小篆则‘维廿六年’、‘维廿九年’、‘卅有七年’，皆读一字，以合四言。廿之读如入，卅之读如极，皆自反也。”^③段氏所引秦碑“维廿六年”、“维廿九年”、“卅有七年”，与峰山刻石“廿有六年”一样，都是四言。因刻石文体都是四言一句，“二十”写作“廿”，只能读为一字，为了凑足四字的音节，就有时加“维”；有时沿用前代语法现象，在十、个位之间加“有”。但用“维”不用“有”，用“有”不用“维”，可见二者均是可用可不用。而其他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诏权、诏版等，同是二十六年，却全不用“有”、“又”，^④说明这时一般情况下都是不用的。

但是先秦典籍中记数用“有”演变情况，则远不如地下文字资料那样有规律性。许多显为战国后期的作品，在记数的上下位之间，有时仍沿用连词“有”字，例如《墨子·明鬼下》：“使予锡女寿十年有九”；《庄子·逍遥游》：“旬有五日而后反”；又《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古本竹书纪年》说穆王“西征亿有九万里，南征亿有七百三里”^⑤；《荀子·强国》“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又《成相》“十有四世”；《韩非子·五蠹》“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等等。这种现象盖因这些载籍常有明引或暗引古书、古语的，明引还易于区别，暗用则不易觉

① 见《孙诒让研究·读〈周礼正义〉》，第26页。

② 见《增订寰宇贞石图》1·7。

③ 见《说文》“廿”下段注，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④ 参看容庚《秦金文录》，1931年版。

⑤ 见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页。

察；另外，这些博学的诸子、史官在写作时，自然还会使用一些古语成分。而古文字资料则不然，大多数是记事，多用当时口语，尤其是战国器物上多为“物勒工名”式的刻辞，作者文化素养不高，则更能反映当时的语言实际。

五

综上所述，在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中，凡记数时有两位以上，使用连词“又”的情况，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消失的过程。殷商时期是记数连词“又”或“卪”的产生期：“又”的使用是随便的，不过十位与个位之间使用的较多；周代前期与中期是发展时期，“又”的使用十分频繁，而且在序数之中是必用的，在基数之中不用的也只是个别情况；西周晚期到春秋晚期，记数时必用“又”（或“有”）字；战国前期至战国中期前段是个转变时期，转变之迹还是明显可见的，战国前期使用“又”是常见的，到战国中期前段已以不用“又”为常见的了；而大约从公元前340年之后，就全不用了。

至于记数连词“又”的写法，在地下文字中，除武丁时写作“卪”，春秋晚期者沪钟^①写作“有”外，其余一律写作“又”。但在文献载籍中则一般借“有”表示，未见写作“又”的，不过这个“有”的意思还是“又”。马建忠说：“凡数书零位，率参以‘有’字，言更有加也。有云有者又也。”^②杨树达说：“（有）读去声，与又不同。”^③可见，载籍中用“有”是借字，地下文字资料中用“又”，是本字。

了解了记数连词“又”（及“卪”、“有”）的产生、发展、成熟、衰变、消失的历程，对考证文献典籍及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的年代，是有帮助作用的。特别是记数连词“又”字衰变、消失时代的确定，就可以作为标尺并结合其他的条件，来断定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之年代：凡是作品中均用“又”或“有”的，其时代不会晚于战国中期前段（前391—340年）；凡是作品中全不用“有”的其时代不会早于战国前期。这些问题，因篇幅所限，当另属文详之。这里试图就本文的一些结论和《尚书·尧典》的成文年代问题谈谈如何利用“又”、“有”的历史演变去分

① 钟铭作：“唯越十有九年。”见《三代》1·39—40。

② 见《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24页。

③ 见《词诠》，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86页“有”第（四）条。

析先秦典籍的成文年代。

关于《尧典》的成篇年代，自古以来说法纷纭。董作宾先生在《〈尧典〉天文历法新证》中据其篇中记数用“有”的现象去推断了它的成文年代。他说：“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这种‘纪日法’，相当于殷代旧派武丁祖庚世，……以后就不再用了。”但他的证明过程是仅就卜辞而言，说卜辞中“十日为一旬，十日以上以旬为单位，由一句以至九旬。十日不称十日而称‘旬’”；说（“旧派前期”，即祖庚以前）“‘百日’‘旬’与‘日’，三个纪日单位之间，皆介以‘又’字”；还说：“又此例亦仅用于‘纪日法’，纪其他数目，百十单位之间，不加‘又’字。”而说“旧派后期”的纪日法，“在百日、旬、月三单位词之间，不加介词‘又’字”，举例即“五百四旬七日”。^①

这些说法中有三个问题是需要指出的：（1）董氏说除了纪日法，“纪其他数目，百十单位之间，不加‘又’字”，这是不正确的。如前所引卜辞，百十之间是不乏用“又”或“有”的：《合集》10407正：“麀百又九十又九”；《后编》下41·12：“允擒三百又四十八”等。（2）这也是最主要的一点。董氏为了证成《尧典》为武丁祖庚以前的作品，只分析卜辞中的材料，而把西周以后的文献和地下材料弃置不顾。如前所说，从西周至战国前期之间，出现像《尧典》那种“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记数现象完全可能，因为这时记数几个、十、百位之间皆用“又”或“有”，而且满十日即用“旬”这种记日并不限于卜辞，在地下文字资料和文献中常见，如王来奠新邑鼎说：“癸卯，王来奠新邑。……二旬又四日丁卯……”（《史征》第45页）这种记时法在古书直至战国时还常见。^②可见，董氏把“三百有六旬六日”的记日法据“有”字的特点断在殷祖庚以前是有问题的。而从文内其他的记数现象来看，《尧典》绝非殷中期之前作品。《尧典》有两处序数表示法：“十有一月朔巡守”，“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③。而查殷代的卜辞和金文，则知这种纪年纪月法，是绝对没有的，如“十有一月”，在殷代只能表示为“十月一”，“十月又一”，“十月又一月”，而“十有一月”显然是西周以来的序数表示法。另外，《尧典》还说“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咨十有二牧”，“咨汝二十有二人”，这种记数法也不见于殷代，殷

① 见《董作宾学术论著》下册，台北世界书局1979年版，总第1033、1039、1040页。

② 如《仪礼·少牢馈食礼》：“筮旬有一日”；《庄子·逍遥游》：“旬有五日而后反。”《左传·宣公十二年》：“旬有五日。”

③ 这两句今文《尚书》在《尧典》，古文在《舜典》。《孟子·万章上》引之并谓出《尧典》，可见今文是而古文非。

卜辞可说“俘人十出六人”（《菁华》6），并不见说“封十有二山”的格式，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种“‘整一连二零一名’的形式，在殷代是不存在的”^①。根据这些记数现象，可见《尧典》只能是西周以后的作品，至于它的确切时代，尚要结合其他条件去考定，但它不会成文于西周以前，则是可以肯定的。



^① 参看《殷墟卜辞综述》第110页。

附录二 从数词组合方式的演变 看先秦古籍的断代问题

王 晖

本文试就古文字中记数数词组合方式演变的一些结论，以及各个不同时期的使用特点，用来推定一些先秦时期年代不太确切的地下文字资料以及一些有争论的载籍成文年代，并试图为断代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标尺。

一

殷商时期是记数连词“又”的产生时期，这时“又”字的使用是随便的，不过是以十位与个位之间使用的较多。作于商周之际的《逸周书·世俘解》的记数数词的组合方式，就反映了这种特点。

洪诚先生曾就《世俘解》中数词的组合方式推测过它的产生时代是在春秋与战国之交，他说《左传》中“万、千、百、十四位数之间，与百、十、个三位之间只用一个‘有’字。……《逸周书·世俘》篇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和《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严格性大不相同”。^① 郭沫若先生认为《逸周书·世俘解》是周初文字中最为可信的一篇，他说：“《世俘解》之可信，除文字体例当属于周初以外，其中所纪社会情形与习尚多与卜辞及古金（文）中所载者相合”，并举出“国族之多”、“国族称方”、“猎兽之多”、“用牲之多”、“用人为牲”等五个方面与卜辞相合的情况证明“《世俘解》必非后人所伪托”^②；王国维先生也认为《世俘解》所记的祭祀制度，与殷礼相合；^③ 顾颉刚先生也认为这篇文字“在周初史料中该占有极崇高的地位”^④。而《世俘解》中的记数现象也正反映了殷周之际

① 洪诚：《读〈周礼正义〉》，见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编《孙诒让研究》，1963年版，第26页。

② 《郭沫若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9—300页。

③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71页。

④ 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76页。

的特点，请看：

俘艾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十两。^①

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麋^②）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牦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黑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麀^③十有六，麋五十，麋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

武王遂征四方，凡敦（本上敦下心）国九十有九国，馘魔〔磨^④〕亿有七^⑤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

用牛于天子稷五百有四，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

凡武王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⑥

《世俘解》数词词组组合方式的特点有二：（1）名词的排列位置与卜辞同。《世俘解》名词和数词、连词组合时的排列方式有两种：A. 名词 + 整数 + 连词 + 零数 + 零数，如“熊百五十有一”，这种排列方式占绝大多数。B. 名词 + 整数 + 连词 + 名词，如“凡敦国九十有九国”。这两种形式常见于卜辞，《合集》10308：“唯擒鹿五十虫（又）六”；《菁华》6：“俘人十虫（又）六人”^⑦。这种B式，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与西周金文的‘十又三月’、‘十又五年’是完全不相同的，后者是‘整一连二零一名’的形式，在殷代是不存在的”，而且“到西周以后，渐已绝灭”^⑧。依次看，《世俘解》绝不会是西周以后的作品。（2）《世俘解》记数词组用“有”的方式亦同卜辞。从上面引例可见，除“麋五千二百三十五”一句之外，其余十位与个位数之间都用了连词“有”字；“亿”、“万”有时与下一位之间用“有”；一组数字最多可以有两个“有”字，而千位以下的一般只在十位与

①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8页。

② 同上书，第250页。

③ 此字即后来的“牡”，义为“牡鹿”，非尘土之“麀”，甲文常见。

④ 今本误作“魔”，依卢校本改。

⑤ 此字今本作“十”，依郭沫若说改，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1页。

⑥ 原文与引文不同，依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一《逸周书》第二“旧玉亿有百万”条改，见中国书店1985年版，上册，第19页。

⑦ 本文所引古文字材料中的繁难字，或直作与古字相应的今字，或作与假借字相应的本字，有时则用同声符的借用字表示。

⑧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0、111页。

个位或百位与个位之间用一个“有”字。这种现象和“殷代数词组中只有一个连词，往往在零数之前”^①的规律和特点是完全相同的。这说明了《世俘解》基本上还保留着殷商数词组合方式的特点，它应是武王克商不久的作品。

二

根据古文字与古文献资料，我们认为，记数法在战国时期演变的踪迹最为明显：西周晚期至战国前期记数均用“又”字，战国中期为转变时期，而大约从前340年以后就不用了。以此为标尺并结合其他的条件，则可断定：凡是作品中均用“又”或“有”的，其时代不会晚于战国中期前段（前390—340年^②）。以此来看，《尚书》、《仪礼》经文、《春秋》经文、《论语》、《周礼》（包括《考工记》）等都是全用的，毫无疑问应是战国前期以前的作品。从下面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急剧变动时代数词组合方式的明显变化。《考工记》：“镇圭尺有二寸”，“大琮十有二寸”，“故兵车之轮六尺有六寸，田车之轮六尺有三寸，乘车之轮六尺有六寸”；而作于前344年的商鞅量^③则不用“又”或“有”：“十六年，……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寸五分一为升”；约作于公元前313—310年的中山国诸器物^④记数亦不用“又”字，中山王兆域图“夫人堂方百五十尺”，中山国圆壶“重一石百四十二斤之重”，中山国扁壶一“重四百六斤之重”等。而《仪礼·丧服》经文：“衽二尺有五寸”，“衣二尺有二寸”；《仪礼·士丧礼》传文：“握手用玄眡裹长尺二寸”；经文用而传文则不用。《春秋》经文与《左传》也有这种区别，《春秋经·哀公十二年》：“十有二年春”，“冬十有二月”；《左传》作“十二年春”，“冬十二月”。这些经文与传文的时代区别是很清楚的。

三

根据古文字材料的考察，我们认为战国前期至中期前段是个转变时期，

①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110页。

② 战国始年说法较多，本文暂依《史记·六国年表》的起点，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

③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50页上—251页下。

④ 见《文物》1979年第1期，第9—10页。

战国前期使用“又”字最为常见；而大约从公元前340年之后，就全不用了。因此，凡是作品中全不用“有”或“又”的，其时代不会早于战国时期；而全用的，时代则应在战国中期前段（约前390—前340年）以前。下面我们准备用这些结论对战国以来的古籍作一些讨论。

1. 战国前期至战国中期前段的作品

《周易·系辞上》有不少两位以上的记数，如：“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有五。……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十有八变而成卦。”从上可见，凡是个位、十位的记数，则用连词“有”；有个、十、百三位数的，“有”也用在个、十位之间；有十、百、千、万四位而无个位的则用在最高位与次位之间。而个、十、百位之间已没有多友鼎那种“折首百又十又五人”连用两个“又”的现象，说明这时已处于由全用向不用转变的时代，其时间大约在战国早期至战国中期前段。杨伯峻先生曾根据《系辞》中有些话被汉初人所引用，^①认为《系辞》作于西汉以前；又因《系辞》开头“天尊地卑”二十二句，《礼记·乐记》也有大同小异的语句，推论“《乐记》抄袭《系辞》的可能性大。那么《系辞》更作于《乐记》之前，至迟当为战国晚期的作品”^②。杨先生的推论是有道理的，不过，杨先生给了一个最下限。其实，《系辞》不会晚到战国晚期，依记数的组合现象最迟也在战国中期。

《穆天子传》数词组合中有用“又”或“有”的，也有不用的，例如卷四“三千有四百里”、“二千又五百里”、“千又九百里”、“各行兼数三万有五千里”等，这些是用连词“有”或“又”的；卷四“万四千里”、卷五“天子赐许男骏马十六”、“乃陈腥俎十二”等，这些是不用连词的。可见成书时代处在数词组合使用连词的转变时代，应在战国早期至中期之间。我们还可以把它与相传同出自汲冢而成文年代基本可定的古本《竹书纪年》^③作一比较。古本《竹书纪年》中纪年纪月的序数词一律不用连词“有”或“又”；基数词两位数以上者，一般也不用。如：“自禹到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七〔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等

① 如《新语·辩惑篇》引“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明诚篇》引“天垂象，见吉凶”；《史记·司马迁自序》引“天下同归而殊途”；《韩诗外传》卷三引“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等等。

② 杨伯峻《周易》，见文史知识编辑部编《经书浅谈》，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③ 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71页。

等。而用“有”的只有个别情况：“穆王东征天下二亿二千五百里，西征亿有九万里，南征亿有七百三里，北征二亿七里。”^①单就最后一条看，“有”字有时用有时不用，已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了。除这两条出自旧文法的残余外，可以说古《竹书纪年》数词的组合基本不用“有”了。古本《竹书纪年》终止于“今王”（魏哀王）二十年^②，即公元前299年，已处于战国晚期，而上面说的《穆天子传》记数时多数还用“有”或“又”字，说明后者成书至少在战国中期。

2. 战国中期以后的作品

我们先谈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佚文《吴问》的成文年代问题，为便于讨论，引全文如下：

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是（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氏）为次。”“孰为之次？”“韩、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

吴王曰：“其说可得闻乎？”孙子曰：“可。范、中行是（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本从女从冤），以百六十步为亩，而伍税之。其□田狭（狭），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范、中行是（氏）次。韩、魏制田，以百步为畹，以二百步为亩，而伍税[之]。其□田狭（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智是（氏）次。越是（氏）制田，以百廿步为畹，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公无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主合（俭）臣□，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吴王曰：“善。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③

关于《吴问》的成文时代，吴树平先生认为应该在公元前453年到403年之间的50年间，他说：“晋哀公四年（前453年），赵、韩、魏共灭智氏，尽并其他。《吴问》产生的时间应在范、中行、智氏灭亡之后，不然的话，作者绝不会那么准确地预料到三卿的灭亡次序。对于赵、魏、韩三家的

① 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分别见第17、21、24、28、35页。

② 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第68页及71页“二十年”[补]文。

③ 银雀山墓竹简整理小组：《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孙子兵法残简释文》，见《文物》1974年第12期。

发展，作者认为韩、魏继亡于智氏之后，晋国全部归属赵氏。他的估计全然错了，说明作者既没有看到晋静公二年（前 376 年）三家最后瓜分晋公室，也没有看到晋烈公十七年（前 403 年）三家正式建立侯国的重大历史发展。由此可知，《吴问》是在智氏亡，到赵、魏、韩三家自立为侯的 50 年内撰成的。”^① 后来，郑良树先生也肯定了这一说法；^② 而魏汝霖先生则认为《吴问》这段问答应出现在公元前 512 年至前 496 年之间，说：“按史书记载，伍子胥推荐孙武于吴王阖庐为周敬王八年（前 512 年），阖庐死于周敬王二十四年（前 496 年）的伐越之战，因此，上述问答时间，大致不出于这段时间内。”^③ 郑良树曾对魏氏之说提出质疑，认为《吴问》应为后人追述而非孙武自己手写；而文中记述的史事，是在孙武逝世 40 年后所发生的，则《吴问》的作成时代应该在这些史实发生之时或之后。^④ 郑说是有道理的，魏氏说法是不正确的。然而，吴、郑等人认为《吴问》作成于公元前 453—前 403 年之间，而不少历史教科书则直接以《吴问》所提供的文字资料论证春秋晚期晋国新兴势力六卿改革亩制的情况，这些说法都是很不妥当的。

首先，我们以记数数词组合方式作为标准就马上可以看出《吴问》的成文年代问题。“以百六十步为亩”、“以百廿步为畹，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这些数词组合中均没有用连词“又”或“有”，这是战国中期后段（相当前 304 年）以来的记数现象。结合这种数词组合不用连词的特点，我们又从其他角度对《吴问》的成文年代作了考证，认为它是战国晚期的作品，具体地说，大约是赵武灵王在公元前 307 年胡服骑射的改革之后至前 260 年秦赵长平大战之间的作品。这一问题，我们拟另属文详之，本文仅述要点如下：（1）《吴问》称范氏、中行氏、智氏以及韩、赵氏均为“公家”，并称赵氏为“公”：“赵氏制田，……公无税焉。”实际上，依《左传》、《国语》只有晋侯称“公”，其家族称“公室”、“公族”，与此相对的六卿虽强大犹称“私家”、“家门”。《左传·昭三年》：“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晋之公族尽矣！”这种现象说明《吴问》应写成于前 403 年以后，即韩、赵、魏三家自立为侯并得到周天子的正式承认之后，这时才称三家为“公”、“公家”，并连及称范、中行、智氏也为“公家”。因

① 吴树平：《从临沂汉墓竹简〈吴问〉看孙武的法家思想》，见《文物》1975 年第 4 期。

② 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70 页。

③ 魏汝霖：《大陆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释文之研究》，见《东方杂志》第 9 卷第 3 期。

④ 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第 89、90 页。

此,《吴问》成文不会早于公元前403年之前。(2)徐中舒先生说:“六国称王始于魏、齐徐州之会(前334年),这是战国时代晋齐绝世以后又一次更大的变局,魏国霸权从此告终。《左传》讲霸业不讲王道,孟子讲王道不讲霸业,这完全是两个不同时代所反映出来的问题。”^①徐先生所言极是。《吴问》谓赵氏制田广,无税收为“王者之道”,可见它的写成不会早于公元前334年魏国霸权结束、六国称王之前。(3)《吴问》所说晋国六卿的亩制,范、中行以一百六十步为亩,韩、魏以二百步为亩,赵以二百四十步为亩,我们不能认为这些说法反映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实际情况。首先,据《通典食货一》记商鞅改周制“步百为亩”为二百四十步为亩,是因为商鞅认为“三晋地狭人贫,秦地广人寡,故草不尽量,地利不尽出。于是诱三晋之人,利其田宅”,此说是可信的。《史记·货殖列传》说:“夫三河(按,指河东、河内、河南)在天下之中,……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地狭人众的三晋地区亩制的改大却在地广人少的秦国之前。其次,传说均谓废井田、开阡陌、扩亩制以尽地力始于商鞅相秦之时。此说见于《汉书·食货志上》、《说文》田部“晦”下、《通典·食货一》、《新唐书·突厥上》引杜佑语、《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引,等等。而《吴问》却说早在春秋晚期晋六卿就改革加大亩制,赵氏已成为二百四十步的亩制了。实情恐非如此,其他不说,单依魏氏情况来看,在李悝相魏文侯之时魏国仍实行步百为亩的周制。《汉书·食货志上》说:“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按《汉书·艺文志》法家有《李子》三十二篇,注:“名悝,相魏文侯,富国强兵。”“尽地力之教”盖即《李子》之文。“尽地力之教”谓方百里则为田九万顷,一顷百亩,九万顷则九百万亩;按《大戴礼记·王言》、《韩诗外传》卷四、《穀梁传·宣十五年》等均谓古者三百步为一里,依此则方圆百里合九亿平方步,除九百九亩,得一亩为一百平方步。这说明在魏文侯(当政在前445年—前396年)时魏国仍实行“百步为亩”的古制。^②依此来看,韩、赵、魏等国亩制变化应在商鞅变法之后,三晋人多地少,战国早期亩制并未变化,后来盖因秦为了吸收三晋耕农,废井田、开阡陌,扩大亩制。在这种情形的胁

^① 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载《历史教学》1962年第11期。

^② 《孟子·滕文公上》曰“方里而井,井方百亩”,此与《礼记·王制》所说“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同。按一里三百步,“方里”则为九万平方步,那么《孟子》、《王制》所说古制一亩为一百平方步,另外《新唐书·突厥上》引杜佑语“周制步百为亩”的田制应该是较古的,谓周制也是可信的。

迫之下，三晋才可能加大亩制，但改革情况并不一致，韩、魏二百步为亩，只有赵与秦国新制全同：二百四十步为亩，《吴问》所说“赵毋失其故法”，这“故法”只能是秦国改革后的田亩制度，不可能是西周春秋时期的田制。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吴问》只能是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商鞅变法）后的作品。那么，《吴问》的产生具体应在何时呢？这仍可依《吴问》作者对六卿存亡次第的估计来分析。《吴问》猜测范、中行、智氏三家相继而亡，这里作者预测对了，正如吴树平先生所分析的，是作者已看到范、中行、智氏相继而亡的史实。但作者估计韩魏先赵而亡却错了，我们认为，这说明了作者的时代是赵国强大而韩魏弱小的时代。这个时代绝不可能是战国中期以前，因战国早期的形势是魏强而赵弱。魏弱的时代是在公元前340年连败于齐、秦之后，而赵强的时代是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至公元前260年长平大战之前，赵国力量十分强大，韩魏不归齐则必事赵“归赵”（《战国策·赵三》），《吴问》大概就写成于此时，这种推测与前面几点分析是相合的，与《吴问》记数数词组合特点的时代性也是一致的。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左传》、《国语》的成书年代问题。《左传》的成文时代，凡序数词一律不用连词“有”字，如前所说，《春秋》经文的纪年纪日全部用“有”，而《左传》则一律不用；而基数词亦绝大多数不用。例如，僖二十四年“二十四年春”；桓二年“惠之二十四年”；“惠之四十五”；“七姓十二国之祖”，等等。用连词“有”字的数词组合很少且位置很不固定，例如，襄三十年“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昭公二十八年“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等等。这些三位数、四位数之间只用一个“有”字，而十位与个位之间基本不用，用的只是极个别的现象。这正如洪诚先生所说：“可能是古史旧文落在作者笔下的遗迹。”^① 根据这种数词是否用连词的组合方式，说明《左传》的写作年代是可信的。因为“《左传》讲霸业不讲王道，《孟子》讲王道不讲霸业”，以及“《左传》好预言因果休咎而以卜筮为征验”，如“郑其先亡”（襄二十九年），“郑先卫亡”（昭四年），秦穆公死时断言“秦之不复东征”（文六年），“毕万之后必大”（闵元年）等等应验的或不验的预言，徐先生断定《左传》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至前351年之间，^② 这与纪数一般不用“有”的时代特点也是吻合的。

《国语》记数时连词“有”的使用情况与《左传》相似，纪年纪月的

① 洪诚：《训诂杂议》，见《中国语文》1975年第5期。

② 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见《历史教学》1962年第11期。

序数词皆不用“有”，基数词绝大多数也不用，只有个别使用。《晋语四》“十有二年，必获此土”；《鲁语下》“其长尺有咫”；《越语上》“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如洪诚先生所言，这些“有”字“可能是古史旧文落在作者笔下的残迹”。根据《国语》记数绝大多数不用“有”的现象，它的编写成文应在战国中期之后。现在一般认为是春秋末年或战国初年成书，似乎是提早了一些。《国语》中以《晋语》最多，占有了九卷，几乎是全书的二分之一，所以过去有人认为是晋国的史书，也是有一些道理的。而从《晋语》中我们可以推测到它的成文年代。《晋语四》引姜氏对丈夫重耳说：“吾闻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阍伯之星也，实纪商人。商之飡国，三十一王，瞽史之《纪》曰：‘唐叔之世，将如商。’今未半也。”韦注“今未半也”说：“自唐叔至惠公十四世，古曰未半。”瞽史之纪与姜氏之言刚好应验，从晋始祖唐叔到晋桓公国灭正巧为三十一世。这种先验性的预言，正如徐中舒先生谓《左传》“凡验的预言，可以说都是事后比附之词”^①。说明《国语》的作者应该看到了晋桓公二十年时，韩赵迁之于屯留而国灭的局面。所以《晋语》的成文年代应在晋桓公二十年，周烈王七年，即公元前369年之后。《国语》其余部分也应与《晋语》的编定时代相去不远。而這些与纪数现象也是一致的，公元前369年之后，记数数词组合之中也就基本不用连词“有”（又）了。



^① 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附录三 20 世纪以来秦汉史研究的部分论著要目

贾俊侠辑

一 综合性著作

-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重庆大呼出版公司 1946 年版。张传玺补订，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 劳干：《秦汉史》，华冈出版有限公司 1952 年版
- 钱穆：《秦汉史》，东大图书公司 1952 年版；三联书店 2004 年 4 月版
- 何兹全：《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
- 安作璋：《汉史初探》，学习生活出版社 1955 年版
- 杨翼骧：《秦汉史纲要》，新知识出版社 1956 年版
- 栗原朋信：《秦汉史的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 1977 年版
- 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初版，1989、2003 年再版
- 马元材（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 高敏：《秦汉史论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 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
- 王云度编辑：《秦史编年》、《汉史编年》，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 韩连琪：《先秦两汉史论丛》，齐鲁书社 1986 年版
- 邢义田：《秦汉史论稿》，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87 年版
- [英] 鲁惟一：《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 221 ~ 公元 220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 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 张荣芳：《秦汉史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 高敏：《秦汉史探讨》，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 丁毅华：《湖北通史·秦汉卷》，华中师大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版
- 刘季高：《东汉三国时期的谈论》，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版
- 田静：《秦史研究论著目录》（秦俑秦文化丛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7 月版

- 罗二虎：《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天地出版社 2000 年 6 月版
- 林剑鸣、赵宏：《秦汉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版
- 张文立：《二十五年秦俑研究综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版
- 张铭治主编：《长安史话·上古周秦两汉卷》，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
- 马植杰：《秦汉三国史论文选》，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4 月版
- 王子今、方光华：《秦汉魏晋南北朝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7 月版
- 孟祥才：《先秦秦汉史论》，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版
- 孙浩晖：《大秦帝国》，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版
- 黎东方、王子今：《细说秦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版
- 廖伯源：《秦汉史论丛》，台湾五南图书公司 2003 年 5 月版
-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修订本），中华书局 2004 年 2 月版
- 《中国史话》编写组：《气吞山河的雄奇帝国》，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版
- 《文明探索》丛书编委会：《丝绸之路的起点——汉朝》，大象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版
- 祝中熹：《早期秦史》，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版

二 专题性的著作

（一）政治、法律制度方面

- 程树德：《汉律考》，1919 年自刊
- 程树德：《九朝律考》，商务印书馆 1927 年版
- 周振甫：《东汉党锢》，开明书店 1935 年版
- 曾资生：《两汉文官制度》，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1 年版
- 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
- 徐复观：《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香港新亚研究所 1972 年版；或《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台北学生书局 1974 年版
- 张维华：《汉史论集》，齐鲁书社 1980 年版
- 朱绍侯：《军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 1984 年版
- 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 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粟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刘修明：《从崩溃到中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罗彤华：《汉代的流民问题》，台湾学生书局 1989 年版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陈玉屏：《西汉前期的政坛》，成都出版社 1996 年版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军功受益阶层研究》，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中国社会史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 5 月版

卜宪群：《秦汉官僚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版

曹旅宁：《张家山汉律研究》，中华书局 2005 年 8 月版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二）经济形态和土地制度方面

陶希圣：《西汉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31 年版

陈啸江：《西汉社会经济研究》，上海新生命书局 1936 年版

王恒：《汉代土地制度》，重庆正中书局 1945 年版

陈竺同：《两汉和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 1957 年、1958 年先后出版

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

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 1979 年版

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华盛顿大学出版社 1980 年版

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版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杨宽：《中国古代冶金技术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秦汉经济思想史》，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钱剑夫：《秦汉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谢天佑：《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兼评自然经济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

黄今言主编：《秦汉间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版

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9 年版

王彦辉：《汉代豪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6 月版

薛瑞泽：《汉唐间河洛地区经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版

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版

冷鹏飞：《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中华书局 2002 年 3 月版

张骅：《秦郑国渠》（陕西旅游历史文化丛书），三秦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

（三）思想文化史、社会史方面

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

何联奎：《中国礼俗研究》，台湾中华书局 1973 年版

吕凯：《郑玄之讖纬学》，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周贵钿：《王充哲学思想新探》，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

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林安弘：《儒家孝道思想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2 年版

陈启云：《汉晋六朝文化、社会、制度》台北新文丰出版社 1997 年版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此书对以往较少注意的汉代下层社会观念进行了尝试性整合

彭年：《秦汉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版

袁仲一、刘钰：《秦文字通假集释》（秦俑秦文化丛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张文立：《秦俑学》（秦俑秦文化丛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5 月版

- 王辉、程学华：《秦文字集证》，台北艺文印书馆 1999 年 6 月版
- 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文明》，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8 月版
- 袁仲一主编：《中华秦文化辞典》，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版
- 陈启云：《荀悦与中古儒学》，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 周桂钿：《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版
- 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年 3 月版
- 熊铁基：《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3 月版
- 王仁波主编：《秦汉文化》（中华五千年文化系列），学林出版社 2001 年 5 月版
- 全盛渊：《权霸——秦始皇集权御臣一统天下的方略》，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1 年 5 月版
- 王学理、梁云：《秦文化》（20 世纪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文物出版社 2001 年 6 月版
-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 2001 年 7 月版
- 张峰屹：《西汉文学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版
- 孙家洲：《两汉政治文化窥要》，泰山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版
- 李珺平：《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版
- 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齐鲁书社 2002 年 1 月版
- 庞天佑：《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3 月版
- 吴永琪等主编：《秦汉文化比较——秦汉兵马俑比较暨两汉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三秦出版社 2002 年 4 月版
- 赵经都：《石鼓文新解》，紫禁城出版社 2002 年 6 月版
- 文林堂编：《石鼓文：篆草》，福建美术出版社 2002 年 6 月版
- 宣兆琦：《齐文化发展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孟祥才、胡新生：《齐鲁思想文化史（先秦秦汉卷）——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7 月版
- 黄留珠：《秦汉历史文化论稿》，三秦出版社 2002 年 8 月版
- 赵沛：《两汉宗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8 月版
- 丁毅华著：《丁毅华史学论文自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9 月版
- 赵国华：《赵国华史学论文初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9 月版
- 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版

吴辛丑：《简帛典籍异文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版

林剑鸣、吴永琪主编：《秦汉文化史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版

姜林祥、李景明：《中国儒学史·秦汉卷》，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徐华：《两汉艺术精神嬗变论》，学林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版

崔永东：《简帛文献与古代法文化》（新出简帛研究丛书），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版

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新出简帛研究丛书），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2 月版

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3 月版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 2003 年 3 月版

段清波：《帝国的卫士：秦俑》（俗雅中国丛书），百家出版社 2003 年 4 月版

杨师群：《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 4 月版

王继训：《汉代诸子与经学》（西部开发与人文学术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4 月版

胡玉康：《战国秦汉漆器艺术》，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 年 6 月版

陈昭容：《秦系文字研究：从汉字史的角度考察》，2003 年 7 月版

陶磊：《〈淮南子·天文〉研究》，齐鲁书社 2003 年 7 月版

徐湖平主编：《泗水王陵出土西汉木雕》，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版

孙继民、郝良真等：《先秦两汉赵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版

陈平：《燕秦文化研究——陈平学术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3 年 11 月版

张文立：《秦学术史探赜》（秦俑秦文化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

田静：《秦铜车马》（陕西旅游历史文化丛书），三秦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汉礼制建筑遗址》，文物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

黄晓峰：《壮阔雄浑——秦汉雕塑艺术》（中国古代美术丛书），文物出版社 2004 年 1 月版

黄雅峰：《南阳汉画像砖石的视觉造型》，河南美术出版社 2004 年 1

月版

- 扬州博物馆编：《汉广陵国漆器》，文物出版社 2004 年 2 月版
 宗鸣安：《汉代文字考释与欣赏》，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 年 2 月版
 秦文化论丛编委会：《秦文化论丛选辑》，三秦出版社 2004 年 6 月版
 张从军：《黄河下游的汉画像石艺术》，齐鲁书社 2004 年 8 月版
 师风轩：《秦风——天水秦文化掠影》，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8 月版
 陈燮君：《周秦汉唐文明》，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版
 韩星：《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版

礼县秦西垂文化研究会、礼县博物馆：《秦西垂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 2005 年 4 月版

- 陈泽：《西垂文化研究》，五洲文明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版
 陈公柔：《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文物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版
 张荣芳：《秦汉史与岭南文化论稿》，中华书局 2005 年 6 月版
 熊铁基、赵国华：《秦汉思想文化研究》，希望出版社 2005 年 7 月版
 王世荣：《周秦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三秦出版社 2005 年 9 月版

(四) 农民战争方面

- 刘开扬：《秦末农民战争史略》，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漆侠等：《秦汉农民战争史》，三联书店 1962 年版
 罗秉英：《黄巾起义》，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田昌五：《中国古代农民革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孙达人：《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年版

- 安作璋编辑：《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朱大昫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郭淑珍、王关成：《秦军事史》（秦俑秦文化丛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版

张卫星：《秦战争述略》，三秦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

(五) 宗教相术方面

- 宋佩伟：《东汉宗教史》，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稿》，中华书局 1955 年版
 林富士：《汉代的巫者》，台北稻香出版社 1988 年版
 祝平一：《汉代的相人术》，台北学生书局 1990 年版
 李零：《中国方术考》，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

熊铁基：《秦汉新道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3 月版

(六) 秦汉时期自然地理、环境方面

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徐卫民：《秦汉历史地理研究》，三秦出版社 2005 年 2 月版

(七) 少数民族史方面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 1962 年版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三联书店 1962 年版

米文平：《鲜卑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八) 日常生活和社会风俗方面

生活礼俗史的研究是近年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汉代生活礼俗史的研究应包括物质文化之衣、食、住、行，以及生命礼俗之出生、成年、婚姻、丧葬、医疗，社会礼俗之节庆、休假、社交，精神礼俗之信仰、祭祀、教育、娱乐等。

瞿宣颖：《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北平广业书社 1929 年版

马伯乐：《汉代中国人的私生活》，商务印书馆 1932 年版

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

朱杰勤：《秦汉美术史》，商务印书馆 1936 年版

张末元：《汉代服饰参考数据》，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0 年版

鲁惟一：《汉代的中华帝国初期的日常生活》，台北商务印书馆 1968 年版

何浩天：《汉画与汉代社会生活》，台湾中华丛书编委会 1969 年版

刘增贵：《汉代婚姻制度》，台北华世出版社 1980 年版

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黄留珠合著：《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谢国桢：《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韩养民、张来斌：《秦汉风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 1988 年版

张孟伦：《汉魏饮食考》，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周汛、高春明：《中国古代服饰风俗》，台北文津出版社 1989 年版

高洪兴等编：《妇女风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

王炜民：《中国古代礼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

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岳麓书社 1991 年版

岳庆平：《中国秦汉习俗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李如森：《汉代丧葬制度》，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叶国良：《古代礼制与风俗》，台湾书店 1997 年版

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书社 1997 年版

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华友根：《西汉礼学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

黎虎主编：《汉唐饮食文化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韩国河：《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晋文：《以经治国与汉代社会》，广州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版

彭卫、杨振红：《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年 3 月版

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韩养民、韩小晶：《风水与西汉陵》（陕西旅游历史文化丛书），三秦出版社 2003 年版

具圣姬：《汉代人的死亡观》，民族出版社 2003 年 3 月版

程世和：《汉初世风与汉初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6 月版

（九）人物研究方面

孙毓修：《马援》，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版

周振甫：《班超生活》，开明书店 1934 年版

张孟伦：《汉魏人名考》，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孙启琛：《汉光武帝传》，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钱穆：《刘向刘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第 7 卷，1930 年版

钟肇鹏：《王充年谱》，齐鲁书社 1983 年版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臧知非：《吕不韦传》（宰相列传丛书），重庆出版社 1999 年 3 月版

丁毅华：《商鞅传》（宰相列传丛书），重庆出版社 1999 年 3 月版

杨建宏：《李斯传》（宰相列传丛书），重庆出版社 1999 年 3 月版

张文立：《秦始皇帝评传》，台北里仁书局 2000 年 11 月版

于迎春：《秦汉士史》（国学研究丛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版

韩耀旗：《吕不韦》，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

刘乐土：《秦始皇》（中国大皇帝书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

卢鹰：《秦始皇嬴政》，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3 月版

赖长洪：《商鞅成败说》，金城出版社 2001 年 5 月版

杨生民：《汉武帝传》，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8 月版

伍心铭：《秦始皇》，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版

张鹤泉：《汉明帝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2 年 1 月版

施觉怀：《韩非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2 月版

张大可、徐日辉：《张良、萧何、韩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5 月版

朱绍侯、龚留柱：《盛衰沧桑——汉元成二帝传》，大象出版社 2002 年 9 月版

季镇淮：《司马迁》，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柳明瑞：《嬴姓溯源——兼论嬴秦祖根在东方》，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版

丁毅华：《商君书语》（诸子解读丛书），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版

阮忠：《韩非御法》（诸子解读丛书），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版

黄留珠：《汉武帝》，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3 月版

王继训：《汉代诸子与经学》（西部开发与人文学术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4 月版

王占军：《汉武帝》，华夏出版社 2003 年 7 月版

杨玉坤、广润集：《吕不韦与嬴秦政权》，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版

张敏、张文立：《秦始皇帝陵》（陕西旅游历史文化丛书），三秦出版社 2003 年 11 月版

王学理：《汉景帝与阳陵》（陕西旅游历史文化丛书），三秦出版社 2003 年 11 月版

林剑鸣：《汉武帝》（陕西旅游历史文化丛书），三秦出版社 2003 年 11 月版

葛承雍：《王莽新政》（陕西旅游历史文化丛书），三秦出版社 2003 年 11 月版

李劫：《汉末党锢之谜》，新世界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

杨东晨、杨建国：《汉代名将》（陕西旅游历史文化丛书），三秦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

王志杰：《汉武帝与茂陵》（陕西旅游历史文化丛书），三秦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

翟文明：《秦始皇传》（中国皇帝图传丛书），光明日报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

翟文明：《刘邦传》（中国皇帝图传丛书），光明日报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 1 月版

翟文明：《刘秀传》（中国皇帝图传丛书），光明日报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年 1 月版

唐浩明：《秦始皇》，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 3 月版

博文：《解读吕不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6 月版

彭文、赵震：《画说秦史——秦始皇帝》，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4 年 9 月版

唐浩明：《汉武大帝》，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版

唐浩明：《刘秀皇帝》，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版

安作璋、孟祥才：《秦始皇帝大传》，中华书局 2005 年 1 月版

张文立、张敏：《秦始皇》（古都西安丛书），西安出版社 2005 年 3 月版

晋文：《桑弘羊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版

（十）帝陵与考古研究方面

广州文物局：《秦汉广东三大考古发现》，广州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版

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 1999 年 8 月版

徐卫民：《秦都城研究》（秦俑秦文化丛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版

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安龙首原汉墓》，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版

周天游主编：《秦汉雄风——雄风振采的历史画卷》（中国博物馆漫步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版

高敏：《睡虎地秦简初探》，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 2000 年 4 月版

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岳麓书社 2000 年 7 月版

秦俑博物馆编：《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8 月版

王辉：《秦出土文献编年》，台北新文风出版公司 2000 年 9 月版

- 张涛：《检阅秦俑》，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版
-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10 月版
- 蒋英炬、杨爱国：《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20 世纪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文物出版社 2001 年 3 月版
- 马永赢、王保平：《走进汉阳陵》，文物出版社 2001 年 4 月版
- 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华书局 2001 年 8 月版
- 何宏：《秦陵兵马俑》，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1 年 8 月版
- 孟剑明：《苏醒的秦代兵团》，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版
-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版
- 秦俑考古队编：《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2 月版
- 北京旭日文化交流服务中心编：《帝国的辉煌——秦陵兵马俑》，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徐卫民：《地下军阵——秦兵马俑坑考古大发现》，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 年 3 月版
- 王文建：《岭南之光：南越王墓考古大发现》，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 年 3 月版
- 傅举有：《不朽之侯：马王堆汉墓考古大发现》，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 年 3 月版
- 刘怀君、王力军：《秦汉珍遗——眉县秦汉瓦当图录》，三秦出版社 2002 年 5 月版
- 罗二虎：《汉画像石棺》，巴蜀书社 2002 年 5 月版
- 蔡万进：《尹湾汉墓简牍论考》，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002 年 5 月版
- 田静：《秦军出巡——兵马俑外展纪实》，三秦出版社 2002 年 7 月版
- 河北省文物局编：《河北文物精华之一：满城汉墓》，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2 年 7 月版
- 张涛：《秦陵秦俑百题》，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2 年 9 月版
- 徐卫民：《秦公帝王陵》，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版
- 雷依群、徐卫民主编：《秦都咸阳与秦文化研究》，陕西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 袁仲一：《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11 月版

王学理：《轻车锐骑带甲兵——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与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

沙石：《帝都秦城的苦旅——咸阳城市变迁崛起》，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版

《考古与文物》编辑部：《考古与文物 2002 年增刊汉唐考古》，2002 年 12 月版

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新出简帛研究丛书），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陈文豪：《简帛研究汇刊（第一辑）第一届简帛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简帛学文教基金会筹备处，2003 年 5 月发行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白鹿原汉墓》，三秦出版社 2003 年版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3 月版

翟中溶：《汉武梁祠画像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年 3 月版

徐卫民：《游访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版

福建博物院、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主编：《武夷山城村汉城遗址发掘报告》，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4 月版

具圣姬：《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坞壁》，民族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版

袁仲一：《秦兵马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年 5 月版

鹤间和幸：《始皇帝陵和兵马俑》，讲谈社 2004 年 5 月版

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版

张涛：《凝视秦兵马俑》，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版

吴永琪主编：《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三秦出版社 2004 年 6 月版

秦伟：《黄河下游的汉画像石艺术》，湖北美术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版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一），文物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版

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世纪出版集团 2004 年 7 月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壁土城：战国西汉城址墓地调查勘探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版

姜宝莲、秦建明主编：《汉钟官铸钱遗址》，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版

金铁木：《帝国军团——秦军秘史》，中华书局 2004 年 9 月版

何介钧：《马王堆汉墓》（20 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文物出版社 2004 年 9 月版

吴永琪主编：《陕西出土秦金银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 年 9 月版

- 吉仕梅：《秦汉简帛语言研究》，巴蜀书社 2004 年 9 月版
- 中国汉画学会、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中国汉画研究》（第一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版
- 礼县博物馆：《秦西垂陵区》，文物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版
-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郑州大学考古专业：《长安汉墓》，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秦墓》，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版
-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陵张卜秦汉唐墓》，三秦出版社 2004 年 11 月版
- 王长虎、景宏伟等：《秦发祥地雍城》（陕西旅游历史文化丛书），三秦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版
- 杨焕亭、雷国胜：《秦始皇与秦都咸阳》（陕西旅游历史文化丛书），三秦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版
- 李立：《汉墓神画研究——神话与艺术精神的考察与分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版
- 汉阳陵考古陈列馆：《汉阳陵考古陈列馆》，文物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版
- 朱顺龙、诸馨：《周秦汉唐皇皇国宝》，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版
-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编：《简牍学研究》（第四辑），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版
- 张涛：《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版
- 朱存明：《汉画像的象征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版
- 王永波：《长清西汉济北陵》，三联书店 2005 年 2 月版
- 张占民：《秦皇骊山园——神秘的地下王宫》，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5 年 4 月版
- 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4 月版
-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山大学历史系、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 2005 年 4 月版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工作队、襄阳地区文物管理所：《襄阳王坡东周秦汉墓》，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8 月版
-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任家嘴秦墓》，科学出版社 2005 年 8 月版
- 孟剑明《复活的军团》，西安出版社 2005 年 8 月版

王恺、葛明宇《徐州狮子山楚王陵（中国重大考古发掘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9月版

（十一）论集、综述、索引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秦汉史论丛》第1—9辑。1981—2004年陆续出版

第一辑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二辑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三辑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第四辑 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五辑 法律出版社1992年8月版

第六辑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第七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6月版

第八辑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第九辑 三秦出版社2004年7月版

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1—4辑），三秦出版社版

第一辑 2002年7月版

第二辑 2003年11月版

第三辑 2004年11月版

第四辑 2006年3月版

秦俑博物馆编《秦文化论丛》第1—13辑，1993—2006年陆续出版

第一辑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

第二辑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第三辑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第四辑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

第五辑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版

第六辑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

第七辑 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

第八辑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

第九辑 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第十辑 三秦出版社2003年7月版

第十一辑 三秦出版社2004年7月版

第十二辑 三秦出版社2005年7月版

第十三辑 三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其中，第一、四、五、七—十三辑中有苏文、田静等编辑的2005年之前秦文化及秦汉史研究的论著要目

王子今、白建钢、彭卫主编：《纪念林剑鸣教授史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秦汉文化比较研究——秦汉兵马俑暨两汉文化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黄留珠主编：《周秦汉唐文明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北大学史学丛刊4），三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王志民主编：《齐鲁文化研究》（第1—3辑），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2004年版

张传玺等编：《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1900—1980），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张传玺：《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续编》（1981—199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张传玺：《战国秦汉史论著索引三编》（1991—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孙家洲、邬文玲：《1998年秦汉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9期

邢文：《近年海外简帛研究述评》，光明日报2000年10月13日

王健：《2000年秦汉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7期

田延峰、陈博：《2001年中国大陆周秦汉唐文化研究论著要目》，《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一）三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陈文豪：《2001年台湾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综述》，《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一），三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刘恒武：《2001年度日本出版和发表的中国学（商周秦汉唐）著书与论文目录》，《周秦汉唐文化研究》（一），三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徐卫民：《2001年秦汉史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2期

何双全：《中国简牍的世纪综述》，中国文物信息网，2003年1月

王万盈：《2003年先秦秦汉经济史研究综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昭惠：《2003年秦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概况》，《秦文化论丛》（11），

三秦出版社 2004 年版

小寺敦著，黄建秋译：《2002 年日本学界关于战国秦汉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 年第 6 期

田静：《秦汉史研究论著目录》（1999—2005 年），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信息网、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网站，2005 年

彭卫：《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地区秦汉史研究综说》，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6 年 4 月 26 日



附录四 古文字著录书目简称与全称对照

- 《合集》——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
《前编》——罗振玉《殷墟书契》
《后编》——罗振玉《殷墟书契后编》
《菁华》——罗振玉《殷墟书契菁华》
《甲编》——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
《乙编》——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
《粹编》——郭沫若《殷契粹编》
《通纂》——郭沫若《卜辞通纂》
《契》——孙诒让《契文举例》
《珠》——金祖同《殷契遗珠》
《宁》——胡厚宣《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
《征》——王襄《簠室殷契征文》
《英国》——李学勤、齐文心、艾兰《英国所藏甲骨集》
《怀特》——许进雄《怀特氏等所藏甲骨文集》
《屯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
《佚存》——商承祚《殷契佚存》
《双剑》——胡厚宣《双剑谿所藏甲骨文字》
《摭续》——李亚农《殷契摭佚续编》
《三代》——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
《大系》——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集录》——徐中舒主编《殷周金文集录》
《史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先秦秦汉史史料学

作者 = 王晖, 贾俊侠著

页数 = 332

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 2007

SS号 = 12076133

DX号 = 000006599643

简介 =

url = <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599643&d=3B4AE0B5E7928F7A39E711E27E19EBCE&fenlei=110303>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概论
	一 史料学的研究目的与内容
	二 先秦秦汉时期史料学的特点
	三 古书年代与辨伪问题
	四 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相互关系
	五 关于处理先秦文献的一些方法
第二章	古史传说时期
	一 从古文字材料看战国秦汉时古文献中所见传说资料的史料价值
	二 传说时代的史料
	三 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以及反映传说时代的古文字资料
	四 夏代史料与考古资料
第三章	殷商时代
	一 商代的文献资料
	二 商代的考古资料
	三 商代甲骨文资料
第四章	西周春秋时代
	一 西周春秋古文献书籍
	二 西周春秋时期金文及其他考古资料
第五章	战国秦朝时期
	一 战国时期的古代史著和现代史著
	二 战国秦朝时期的古文献资料
	三 从战国秦汉简帛资料看战国文献的年代问题
	四 战国秦朝时期的出土文字资料
	五 有关先秦史料的汉代简帛资料
第六章	两汉时代
	一 两汉史料概述
	二 两汉文献资料
	三 两汉考古资料
附录一	古文字中记数使用“又(有)”字的演变及其断代作用考
附录二	从数词组合方式的演变看先秦古籍的断代问题
附录三	20世纪以来秦汉史研究的部分论著要目
附录四	古文字著录书目简称与全称对照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先秦秦汉史史料学

作者 = 王晖, 贾俊侠著

页数 = 332

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 2007

SS号 = 12076133

DX号 = 000006599643

简介 =

url = <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599643&d=3B4AE0B5E7928F7A39E711E27E19EBCE&fenlei=110303>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章	概论
	一 史料学的研究目的与内容
	二 先秦秦汉时期史料学的特点
	三 古书年代与辨伪问题
	四 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的相互关系
	五 关于处理先秦文献的一些方法
第二章	古史传说时期
	一 从古文字材料看战国秦汉时古文献中所见传说资料的史料价值
	二 传说时代的史料
	三 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以及反映传说时代的古文字资料
	四 夏代史料与考古资料
第三章	殷商时代
	一 商代的文献资料
	二 商代的考古资料
	三 商代甲骨文资料
第四章	西周春秋时代
	一 西周春秋古文献书籍
	二 西周春秋时期金文及其他考古资料
第五章	战国秦朝时期
	一 战国时期的古代史著和现代史著
	二 战国秦朝时期的古文献资料
	三 从战国秦汉简帛资料看战国文献的年代问题
	四 战国秦朝时期的出土文字资料
	五 有关先秦史料的汉代简帛资料
第六章	两汉时代
	一 两汉史料概述
	二 两汉文献资料
	三 两汉考古资料
附录一	古文字中记数使用“又(有)”字的演变及其断代作用考
附录二	从数词组合方式的演变看先秦古籍的断代问题
附录三	20世纪以来秦汉史研究的部分论著要目
附录四	古文字著录书目简称与全称对照